

陳舜臣 ● 大時代三部曲

③

道半ば

# 半路上



「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都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

以推理小說享譽日本文壇、與司馬遼太郎並列「歷史小說雙璧」的陳舜臣，著作等身且獲獎無數。然而，中文世界的讀者多半只知其書而不識其人。

陳舜臣在兩度中風之間完成了唯一的自傳《半路上》，此時年近八十的他已行至人生旅程的最後階段，佇足回首寫下前半生的昭和時光。

在這部半生記裡，陳舜臣回憶自己於殖民母國的成長點滴，以及身為在日台灣人的真切感受；戰後回到故鄉新莊待了三年半，參與台灣社會紛擾動盪的新局，也經歷令他沈痛哀傷的二二八事件；重返日本後蟄伏於家族事業，十年的沈潛期為日後波瀾壯闊的文豪生涯奠定重要基礎。

這些在歲月沖刷後沈澱下來的文字，揭露了陳舜臣埋藏心中最深的情感與記憶，也呈顯出他如何在時勢左右下，從命運中汲取孕育文學人生的珍貴養分。



游擊文化



ISBN 978-986-92364-3-0



9789869236430 003801

平裝：ISBN 978-986-92364-3-0  
定價：NT\$380

內容力  
內  
○  
三

陳舜臣 ● 大時代三部曲

# 半路上



道半ば

林琪禎、黃耀進——譯

游擊文化

「我到底是誰？」的身分疑惑，是小說家在人生旅途上不住回望的緣由，也是他寫作生涯裡探尋不懈的永恆提問。

# 半路上

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



《憤怒的菩薩》(怒りの菩薩, 1962)  
陳舜臣唯一一本以台灣為場景的長篇推理小說，一窺戰後台灣社會與政治的詭譎氛圍。



《青雲之軸》(青雲の軸, 1974)  
陳舜臣自傳小說，娓娓道出一位小說家的青春畫像，與他身為殖民地人民所走過的大時代。



《半路上》(道半ば, 2003)  
陳舜臣的半生記，詳述他於神戶的成長經歷、遭逢二二八事件的沉痛哀傷，以及進入文壇前的蛰伏沈潛。

書系企劃  
團隊簡介

內容力  
Power of Content; POC

由一群擁有豐富東亞跨國生活經驗的人文社會學者所組成的新興「內容策畫」團隊，相信「內容」能生產出各種形式的溝通力量，並且促進東亞區域內的相互理解與發展。因此，不拘泥於既有產業類別的限制，而致力挖掘能跨越語言、文化、國境限制，並引發人們共鳴的「好內容」，再經由專業團隊在製作、編輯、轉譯、代理授權等方面的努力，跨越「內容流通」的障礙，最終開發出具有文化內涵與市場價值的多元化「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並為台灣與東亞區域內的文化交流與內容產業發展貢獻心力。

## 陳舜臣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於日本神戶元町的台灣人家。一九四一年進入大阪外國語學校印度語科就讀(隔年司馬遼太郎入讀蒙古語科，此後兩人結為終生摯友)，一九四三年因戰事提早畢業，留在母校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擔任助手，參與編纂印度語辭典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回到宛如異鄉的故鄉——台灣，受聘擔任新莊中學英語教師，並親眼見證戰後台灣的社會巨變。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造成他極大的衝擊與創傷，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後便於一九四九年返回日本。

在家族事業從事貿易工作的十年間，陳舜臣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也興起寫作的念頭。一九六一年，他以《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初入文壇。之後陸續發表推理小說、中國歷史小說、隨筆、評論等作品，並得到直木賞、推理作家協會賞、每日出版文化賞等文壇大獎的推崇。一九九三年，NHK將歷史小說《琉球之風》改編成同名大河劇。

陳舜臣於一九六二年發表了以戰後台灣為場景的長篇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一九七四年，發表自傳體小說《青雲之軸》，揭述其生為在日台灣人所遭逢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成長故事。二〇〇三年發表自傳《半路上》，讓人一窺這位小說家動人的半生歲月與他走過的大時代。

日中建交後，陳舜臣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他放棄中國籍，正式歸化日本籍。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陳舜臣於最鍾愛的城市神戶辭世，留下一百六十多部作品以及波瀾壯闊的一生。

## 林琪禎

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學術)，曾任出版社外稿譯者多年，目前為和春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專任助理教授，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流通總監。著有《帝國日本の教育総力戦：植民地の「国民学校」制度と初等義務教育政策の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日本學研究叢書18)。

## 黃耀進

曾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員，目前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製作總監。譯有《東京日和》(流行風)、《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流行風)、《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八旗文化)等書。



內容力

內○三

陳舜臣◎大時代三部曲

半路上



道半ば

林琪禎、黃耀進——譯



游擊文化

道半ば

陳舜臣◎天時代三部曲

# 半路上

林琪禎、黃耀進——譯



道半ば

# 目次

出版緣起 大時代下的身世飄零與歸屬——重訪陳舜臣 陳思宇 3

---

童年歲月	17	歸鄉	159
位於海岸通的家	27	登陸	177
中山手和北長狹	35	歸隱田園	187
升學	45	開始授課	197
水災前	55	消逝的牧歌時代	217
飄落的旗幟	65	二二八事件	227
大平洋戰爭前夕	75	紛亂不息	255
戰爭的序幕	85	台灣春秋	265
越洋的人們	95	別了台灣	285
上八時代	105	獲頒亂步賞爲止	301
大火前後	123	後日譚	329
戰爭結束	141		

---

編注

陳舜臣年表

357 335

## 【出版緣起】大時代下的身世飄零與歸屬——重訪陳舜臣

二〇一三年初，我因為得到國外經費的支援，有機會到日本進行約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以往雖有多次出國經驗，但多是短期停留，因此，這算是我第一次以「外國人」的身分，學習如何在不同文化習慣的社會環境中生活。

在日本期間，除了有些語言障礙，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實不常遭遇到自己被視為是「少數人」的「差別待遇」。然而，當地朋友卻對我這個「新參者」如何看待日本社會感到好奇，時不時會拋出一些問題。有些議題是我以往在台灣不曾面臨也未曾思考過的，其中之一就是「從『外國人』的立場，如何看待日本社會中的『外國人問題』？」坦白說，當我初次聽到這個問題時，內心除了感到困惑，也有些尷尬與不悅，因為「我就是個『外國人』啊，要如何將『自己』當作個『問題』來分析呢？」

後來，我逐漸理解，日本朋友在提問中所指稱的「外國人」，並不包括我在內，他們指涉的是一群「於日本出生、成長，但始終以『外國人』身分在當地生活的少數群體」；「外國人問題」，可說是存在於日本社會的一種「少數族群問題」。另一方面，在日本，「外國人問題」確實相當複雜，主因在於「在日外國人」的身分及概念，並沒有相當明確的定義與界線，實際上

包含來自不同地方、歷史淵源的群體，例如在日朝鮮人、在日台灣人、在日中國人、華僑等等。狹義而言，「在日外國人」是指戰前由舊殖民地朝鮮、台灣移居日本「內地」，並且在戰後仍持續居留日本的少數群體。戰後，日本政府將這群人排除在「日本國民」的範圍之外，導致他們喪失了日本國籍，一夕間成為「外國人」，因此形成了「在日朝鮮人」、「在日台灣人」等身分團體。廣義而言，許多戰前、戰後移居日本，但始終未取得日本國籍的外來移民，也被包含於「在日外國人」的範圍內。我來自台灣，最常被詢問也最關切的自然是「在日台灣人」問題，但也必須承認自己對於「他們」的處境了解甚淺。當有次被問及「你認為『他們』是『台灣人』嗎？」我既困惑也不安，始終無法給個答案，因為「他們的歷史」並未被寫入我以往熟知的「台灣史」當中啊！

因此，我在既有的工作之餘，也開始閱讀關於「在日外國人」、「在日台灣人」等議題的研宄及報導，並且試著與當地朋友討論，希望藉此替自己補課，沒想到卻誤打誤撞進而開啟了一連串特殊的「機遇」。而這段故事則始於課堂上的幾次無心閒談。

### 故事的開始：與陳舜臣的邂逅

我的日語會話老師便是個深富好奇心又喜歡用各種問題考我的日本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歷史小說迷，有次突然聊起「可以跟司馬遼太郎比較的該算是陳舜臣，他們兩人是同窗也是好友，

但作品特色不太相同，司馬遼太郎是寫日本戰國時代及幕末最佳，但陳舜臣是中國歷史小說第一人！我曾經是透過他的作品了解中國歷史。」「比起來，司馬先生強在塑造人物，但陳舜臣先生的文筆更佳，簡潔明白！」他接著問我有沒有讀過陳舜臣的作品，並且建議我可以讀讀陳舜臣的隨筆來練習日文。「陳舜臣？」對我而言，這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因為，二十多年前，台灣本地的出版社曾經翻譯、出版了一系列陳舜臣的推理小說與歷史小說，我從記憶中翻出一本本曾經閱讀過的陳舜臣作品，心想：「原來司馬遼太郎跟陳舜臣是好朋友！但為什麼好久沒聽到這位大作家的消息？」我當時不知為何靈光一現回答：「當然讀過喔！因為，陳舜臣雖然是戰前出生在神戶，但他老家在台灣，算是『在日台灣人』，而且，他戰後曾經回到台灣，不久才又返回日本。」老師相當驚訝：「我只知道陳舜臣是出生在日本的『華僑』，並不知道他是台灣人！記得他曾經是『中國國籍』，後來才入了日本籍！」「中國國籍？」我有點困惑，回答：「那指的應該是『中華民國國籍』吧？戰前出生在日本的台灣人，通常會持『中華民國護照』……。」但老師斬釘截鐵地回答：「不！他應該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這答案令我大驚失色，暗想：「陳舜臣怎麼可能從『在日台灣人』、『華僑』，突然變成有對岸國籍的『在日中國人』呢？」接著幾天，我開始找尋資料，希望能釐清困惑，沒想到卻遭遇一個又一個難解的疑問，「陳舜臣」這個名字背後似乎隱藏了一個巨大的歷史謎團！

大約一星期後，日文老師與我又在課堂談到有關陳舜臣的話題。我憑藉掌握到的資訊，向老

師拼湊出一個簡單卻不完整的「陳舜臣圖像」：「一九二四年，陳舜臣出生於日本神戶，原籍是台灣新莊，父親一代從台灣到日本後，在神戶從事進出口貿易，活躍於當地華僑商界，所以戰前陳家人似乎同時擁有日本國民、台灣人、華僑等多重身分！陳舜臣與司馬遼太郎同樣就讀大阪外國語學校，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手，專攻印度語，不料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所有殖民地出身的『外地人』都喪失日本國籍，使他一夕間成為『外國人』，同時也失去原本在國立大學的職位。一九四六年，陳舜臣連同弟弟一起回台，任職於新莊當地的中學，教授英文。或許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他僅在『故鄉』短暫停留了三年，一九四九年就離開台灣，再次回到神戶，很長一段時間都未曾再前往台灣。回到神戶後，他在家中從事貿易工作，十多年後，突然動筆從事小說創作，從此進入文壇。日台斷交、日中建交後，一九七三年，陳舜臣申請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經常前往中國，在身分上成為在日本的中國國民。然而，一九八九年，由於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他深受衝擊，同年宣布放棄中國國籍，加入日本籍。因此，相隔了半個多世紀，陳舜臣又再次成為『日本人』！並且在一九九〇年再次回到台灣。」我跟老師都驚嘆這真是個曲折的過程！同時也得知陳先生近年來長期臥病的訊息而感到惋惜。

然而，這個不完整的圖像，非但未能解答我們的疑惑，反而讓我開始更積極地重新閱讀手邊能夠取得的陳舜臣作品，並且希望以他為窗口，進一步了解「在日台灣人」的歷史處境。如今回想起來，這是一次相當特別的閱讀經驗。我有時會感到困惑甚至焦慮，因為遲遲未能從這些

小說及隨筆作品中，辨識出「台灣人」陳舜臣的具體形象！陳舜臣的書寫題材相當廣泛，由神戶、中國擴及至草原、海洋，但卻很少在作品中談論自己的內心世界。相較於其他殖民地出身的「在日外國人作家」，他似乎未曾以自己在日本的邊緣處境作為創作主題，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與社會差別做出嚴厲批判。或許是因為日文書寫特有的淡然筆調，陳舜臣在作品中，並不強調濃重的感情與情緒，面對歷史上出現的戰爭、動亂、主角人物的艱難選擇，乃至他所深愛的家鄉神戶遭到毀滅性破壞，他也僅是客觀描述，偶爾表露對世事曲折的感嘆。另一方面，再次閱讀陳舜臣，卻也讓人發現他有異於同期作家的廣闊視野！陳舜臣筆下的華僑偵探、口岸商賈、乃至落魄天涯的革命家等故事主角，多半是現實社會中的邊緣人物，卻不拘於一隅，反而遊走於既有的界線，甚至開拓出未曾有的想像空間。因此，在他筆下，海洋、草原、沙漠都不是限制人們活動的邊境，而是傳遞物質和文化的通道，更是自由的象徵。我猜想，或許陳舜臣正是以此挑戰始終束縛他的國籍問題。

二〇一四年夏天，我正好有個機會前往神戶參加一個研究活動，由於這是在日本生活的最後一個夏天，所以我也趁機安排了一次周遊西日本的畢業旅行。行前規劃旅程時，無意間發現神戶當地將設立一座「陳舜臣亞細亞文藝館」，表彰這位作家的文學成就及其對神戶的貢獻。因此，「尋訪陳舜臣」便成了此行的重點。

## 相逢：小說家從未遠去的身影

記得那是個炎熱的夏日，當我拉著行李走出神戶三宮車站時，隨即湧現一股異樣的情緒。事實上這只是我第二次到神戶，非但無法說出眼前的街景與建築物名稱，如果不依賴手中的地圖與當地指標，也難以前往元町、南京町、海岸通、神戶港等地。但經過這大半年來大量閱讀陳舜臣的作品，感覺起來卻似乎來到了一座熟悉的城市。

午後，往海邊走去，先參觀了位於南京町中華街附近的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陳舜臣筆下的華僑偵探陶展文，正是活躍於這個充滿各色人等的海岸地帶，而陳舜臣家族的舊居「三色之家」也在附近。根據館員的介紹，陳舜臣與司馬遼太郎常在博物館碰面閒談，館內還掛著一幅兩位文豪會面時的珍貴寫真。館員也告訴我，正在試營運階段的「陳舜臣亞細亞文藝館」離此地不遠，問明地址及方向後，我便獨自前往位於神戶港埠頭附近的文藝館一探究竟！不料，我走著走著卻在神戶港附近迷了路，歷經波折方抵達目的地。進入館內，發現內部空間不大且相當安靜，直到幾位長者用日語向我搭話，我才知道來對地方！幾位老人家都是館內志工，我是當天唯一的參訪者，起初他們相當困惑為何有個年輕人熱天跑到此地，但一知道我來自台灣，便熱情地開始介紹各種典藏。無奈，我的日語會話能力實在沒什麼長進，更不熟悉當地口音，僅片面了解他們所提到的幾個人名，何既明、李登輝等都是我熟悉的名字，但他們跟陳舜臣有什麼關係？我暗自感到疑惑。

正當我在參觀陳舜臣寫作使用的工具與手寫原稿之際，不經意發現一份印刷資料，原來陳舜臣曾在神戶新聞及一份名為《陳舜臣中國圖書館》的刊物上，連載他的半生傳記。因此，我開始一篇篇細讀這份資料，而在那個下午，我過去曾在閱讀其作品的過程中出現的疑惑，居然都有了初步的答案！

陳舜臣在系列連載中，不但記錄了家族從台灣移居神戶的發展，敘述自己在神戶的成長過程，也提及他跟台灣的文化與血脈因緣。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陳舜臣以相當多的篇幅，敘述戰後三年他的「台灣經驗」，包括他在台北及新莊當地的所見所聞、學校中的人事關係，在家鄉遭遇的另一種語言衝突等等。原來，陳舜臣是受好友何既明的鼓吹而決定回台，因為「台灣雖說是我的故鄉，可是我只有在那裡短暫停留兩、三次。這回我終於有機會能夠親眼親耳去體驗從何既明那裡聽來的故鄉台灣。」何既明是日後台灣醫界著名的醫師。戰前，陳舜臣與何既明便因兩家是世交而成為好友，且陳舜臣深受這位朋友的影響。同一時間，何既明也在從日本到台灣的運補船上，結識了留日學生李登輝，兩人成為終身摯友。陳舜臣、何既明、李登輝這幾個我再熟悉不過的名字，竟因戰爭造成的動亂結下了因緣，但最終卻因為二二八事件走上不同的道路。

由於時間已近閉館，而我卻仍未消化完手邊的閱讀資料，雖然無禮但也只能碰碰運氣向志工



詢問是否能影印這份連載。怎知有位志工伯伯突然拿出一本書，告訴我這系列連載早已集結修改出版，成為他手上那本名為《半路上》的傳記著作！當我翻開書，內心實在百味交陳，因為這本書出版於二〇〇三年，算起來已有十年之久，但包括我在內的中文世界讀者、出版界、研究學者，卻不曾聽聞也從未討論過這本傳記，這似乎代表陳舜臣確實已被眾人遺忘了！我試著想像，當時年近八十且因腦溢血而行動不便的作家，是以什麼心情寫下這份生涯紀錄？他將這本書定名為《半路上》，是因為胸懷未竟之志，而有繼續寫作的計畫？或是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仍有未解的困惑？「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總是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吧。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我反覆琢磨陳舜臣寫下的這段話。

記下手邊《半路上》一書的出版資料，匆匆謝過志工的幫忙後，我便離開文藝館。但望著神戶海邊的朗朗晴空，思緒及心情卻有些混亂，因此隨手在路邊的自動販賣機按了罐冰可樂喝，順便整理一下腦中混亂的想法。思慮略為沉澱後，我在腦海中逐漸形成兩個構想：一方面，陳舜臣先生的生涯與他寫下的紀錄，確實有助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了解「在日台灣人」的歷史經驗，或許有機會能在台灣翻譯出版《半路上》；另一方面，《半路上》實際上是一部「半生記」，陳舜臣雖在書中細數了他自生到出道成為作家的點滴，但對後半生的記敘相對較少，讀者無法了解他為何在寫作黃金期，突然選擇加入中國籍，放棄了回台灣的機會？我想或許能透過拍攝

紀錄片或傳記書寫的方式，補上一些空白，更清楚呈現陳舜臣先生走過的生命軌跡。

此外，我當時已得知有日本及台灣的紀錄片團隊，正在拍攝以殖民時期台灣的「日本語世代」及「在台出生的日本人」（灣生）為主題的歷史紀錄片，但似乎都忽略了「在日台灣人」的歷史處境。我認為，由於日本帝國在短期內由擴張到崩潰，導致大量人口必須在快速變化的界線中移動，各種身分及文化認同都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然而冷戰各方當時卻迅速建立意識型態的僵硬壁壘，瞬間阻擋了人群的移動，並且劃分出政治、語言、文化等各種界線，因此同時形成了如「日本語世代」、「灣生」或「在日台灣人」等身分群體。記得曾聽一位學者這麼形容：「日本語世代、灣生、在日台灣人，都算是習慣以日語溝通的『台灣人』！承載了複雜多變的東亞近代史。」無論此種說法是否適切，我想，拍攝一部以陳舜臣生涯為主題的影像紀錄片，應該都能使台灣人或台灣史的圖像更為完整。

那天下午，我雖然已形成初步構想，但也深知這是個困難的工程，必須從長計議。然而，啟動任何事業也像「滾雪球」，只要起心動念，再找到一片濕漉漉的雪，或發現一座坡度剛好的斜坡，「雪球」就會開始滾動！只是我從未料到，居然這麼快就找到那片「濕雪」！當天晚上，同行的研究團體有個晚餐聚會，參加者中有神戶當地研究華僑貿易的著名學者陳來幸教授，我突然動念「陳教授世居神戶，或許認識陳舜臣先生的家人」，因此託人代為詢問，未料陳老師的回覆竟是「陳舜臣是我的二伯」，得知這個訊息，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因一些關係，很早

就得知陳教授的大名及業績，但並不熟識，居然誤打誤撞得到她的協助，如今回顧，整個計畫構想能如「滾雪球」一般啟動，終能成形，大多時候，都是仰賴來幸老師出手相助。

結束在關西的畢業旅行後，我回到東京，繼續完成手上的工作，再不久，便離開日本返回台灣，結束了在日本的「外國人生活」。在這段期間，我持續與幾個朋友討論如何完成整個計畫，最終，大家決定創立一間公司、一個團隊，跨出學界，到未曾涉足的市場上尋找完成計畫的各種資源。

故事不曾結束：我們的路仍在繼續

經由許多人的合作與努力，我們的計畫逐漸得到關鍵性的發展資源，並且逐漸發展出不同於其他內容製作計畫的特色。整個計畫的核心精神與執行方向同時包含兩個內容：「大時代下的陳舜臣」與「陳舜臣筆下的時代故事」，即陳舜臣本人的故事與他筆下的創作。具體的內容呈現最初包含兩部分：影像紀錄與作品出版。然而，我們希望這是個具有生命力的企劃，而且深信故事內容所具有的潛力，必能不斷創造出足以展現內容的最佳形式。最初，我們也曾苦惱於如何定義、定位整個計畫，就如同我們難以辨識陳舜臣是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他的文學是台灣文學？日本文學或中國文學？如今則期待這個立體、具備延伸性、穿透性的內容創作及出版計畫，能夠不斷跨出既有的界線，開拓出更寬廣的想像空間。

最早進入執行階段的是紀錄片的田野調查活動，而推動調查工作持續進行的關鍵性資源則是「人」。最初，我們依賴《半路上》一書為重要文本，做為尋訪陳舜臣在台灣活動足跡的線索，但是也清楚紀錄片的製作絕非僅是單純將文字影像化，必須具備自身獨有的內容與觀點。幸運的是，我們在田調過程中，也很快找到那片未曾預料到的「濕雪」，一路上不斷滾動，讓我們找到陳舜臣在台灣的親人，以及在新莊任教時的同事與學生，甚至是遠在北京的親友。此外，在過程中也有不少個人與團隊陸續加入，游擊文化、杯杯文創及偵探書屋，都分別與我們建立合作關係，發展出不同的計畫項目。

二〇一五年初，由於傳來陳舜臣先生去世的消息，促使我們加快推動計畫的腳步，由游擊文化主導的「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出版專案成為第一個企劃完成並上市的項目。此一項目是以《半路上》一書的出版構想為原型，結合紀錄片田調活動，進一步發展出的「陳舜臣作品出版計畫」。在企劃紀錄片內容的研究階段，內容力企劃團隊與游擊文化的編輯團隊，便定期在獨立書店偵探書屋研讀陳舜臣的其他作品，希望進一步發掘企劃與編輯靈感，因此在《半路上》之外，又陸續挖掘了《青雲之軸》與《憤怒的菩薩》這兩部類型迥異的陳舜臣小說作品，並且與《半路上》一書組成三部曲。

我至今仍清楚記得第一次翻閱《青雲之軸》與《憤怒的菩薩》這兩本作品時的心情，因為這兩本不同類型的小說，完全顛覆我對陳舜臣小說創作的既有印象：陳舜臣不但書寫了一部以

「在日台灣人」為主角的成長小說，甚至在創作生涯早期，便已寫下一本以台灣人為主角、以故鄉新莊為背景的推理小說！

《青雲之軸》是部自傳性小說，主角陳俊仁是以陳舜臣本人為模型所塑造的人物。故事始於主角幼時經歷的內外不同語言文化的世界，觸及戰前台灣人在殖民母國遭受的歧視與戰爭經驗，最終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也正是陳舜臣失去「日本人」身分而成為「在日台灣人」的那天。我以往從未見過其他作家嘗試類似的創作形式與主題。《憤怒的菩薩》是陳舜臣唯一以戰後台灣為背景創作的長篇推理小說，小說背景設定在一九四六年的台北新莊，也正是陳舜臣自日本回台的同一年。小說以「漢奸」問題引發的殺人事件為主題，勾勒出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樣態，以及台灣人面臨舊殖民者離去、新政權到來時的複雜情緒。

當初，企劃與編輯團隊是以「憂喜參半」的心情，看待手上挖掘出的這三本著作：一方面，眾人對於挖掘出以往少見的陳舜臣作品感到興奮；另一方面，由於這三本作品的寫作體例、類型與故事主題差異甚大，編輯們擔心無法整合出一個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鮮明主題。但開始參與紀錄片製作過程後，編輯團隊逐漸能把握陳舜臣的生命經驗與創作特性，便一掃原有的憂心。我們將由《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組成的「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以陳舜臣筆下虛實交錯的「陳舜臣生命經驗」為核心內容，提供讀者一種可隨機運用各種閱讀方法與視角進入陳舜臣筆下時代故事的全新體驗。

當我開始著手撰寫這篇出版緣起，記憶難免回到在神戶港邊的那個下午，而我的眼前也浮現陳舜臣當年望著那片海，在被國籍、身分及意識型態禁錮的時代，陳舜臣似乎知道那片海會帶著他到達想像力所能延伸的極限之處，並且能連結他與各色各樣的人與故事。或許，在海邊的那天，我也成了陳舜臣手中拾起的那片「濕雪」，重新滾動起屬於他與我們及所有愛讀「故事」者的那顆「雪球」。如今這顆「雪球」已經愈滾愈大，不但一步步滾出一個包括「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出版項目在內，結合出版、影像紀錄、文學活動、策展等等的跨界合作計畫，也滾出了一個難以定位的合作團隊，連結的網絡由神戶、東京，擴及到台北、北京，而「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的正式出版，將讓這個繼續滾動的「雪球」留下一道最深刻的軌跡。

陳思宇（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營運企劃長）

## 童年歲月

我生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八日。以日本的年號來說，是大正十三年。大正只有十五年就結束了，因此到我懂事時，早已過了大正時代。

大正十三年歲次甲子。甲是天干之首，子為地支之首。這一年，一間巨大的球場在西宮市落成，命名為「甲子園」。雖非特別值得紀念的一年，但確實是時序上嶄新的開始。甲子為干支之首，之前的癸亥即為干支之末。我出生前一年的癸亥年，是關東大震災之年。

對於幼年時代，我有一些片段的記憶，不過對於時序，已經記不太清了。印象之中有一幕情景頗為鮮明。

地點在台灣。我敢確定在台灣，是因為一次都沒到過日本的孀婆在場。當時我大約是勉強能站的年紀。

台灣的家主要空間叫「正廳」，也稱為客廳。客廳中有張客桌，祭祀時用以擺放供品。當天不是祭祀之日，因此客桌上沒放什麼東西。為什麼我會知道呢？因為那天我曾經爬上去。

客桌的對面，擺放著我們稱為「公媽」的祖宗牌位，以及各種神像。觀世音菩薩與媽祖（在廣東似乎叫做天后）是一定會供奉的神明。此外另有留著鬍子的神像，幼時的我似乎對於那尊神像特別感興趣。我爬上客桌伸出手，拉神像的鬍子邊玩邊唱到：

——台灣人是這款的。

這當然只是小孩子的話。

等我察覺有人接近，心想「糟糕」，已經太遲了。嬸婆就站在那裡。很快地，家裡的人都知道了，加上是鄉下，因此連左鄰右舍也知道了。

——台灣人就是這樣子的。

那句台語應該可以這樣翻譯。

一般而言，這樣的小事應該連當事人也很快就忘記了。但托叔母的福，讓我想忘也忘不掉了。小學三年級的春假跟中學二年級的暑假回到家鄉時，總會被左鄰右舍問道：

「你就是『台灣人』的舜臣嗎？」

不僅如此，戰後回到國內，成為故鄉中學的老師，我的名字還是會被冠上「台灣人……」幾個字。嬸婆當時已年過九十，每次當我回去，都會去探望她。

因為傳了出去，又常常被提起，因此這段往事在我的記憶之中變得越發鮮明。

當時被我拉鬍子的神像應該是關羽吧。在台灣人稱關帝爺，是家家戶戶幾乎都會祭拜的神明。我常說「台灣人云云」，恐怕是我自己對於台灣人的身分很在意的緣故。自己應該是台灣人，不過周遭都是日本人，這讓小孩子感到混亂。

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都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孩提時的童言童語，不只逗人發噱，也成為我自己難以忘懷的記憶。雖然成為鄰里的笑柄有點難為情，不過許多美好的回憶，也因此保存了下來，這應該是一種幸運吧。

幼時的記憶，其他還有跌落河中、腳受傷等，背景都是在台灣。跌落的河也許只是一條水溝。那是親戚阿姨帶我去其他人家時發生的事。必須要渡過架在水溝上的小橋才能到達對方家裡。我就是從那座小橋（搞不好也只是片木板）掉下去的。我並沒有被沖走，可能是下方有片水潭。摔得一身濕的我被脫個精光，還只是孩子的我也感到難為情。或許就是因為這份難為情，讓我留下了這段記憶。

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受傷的腳非常痛，也流了許多血，哭得很大聲。這對我來說是從沒想過的意外，因為若是母親帶我去，總是會牽著我的手。

我們家後來全部搬到日本去了，留在台灣最親近的親戚是父親的堂兄弟。他們住的地方是

台北近郊的新莊，現在台北和新莊之間的交通已經十分便利，但當時兩地間還有大片田園，我便是走在那樣的鄉間小路。

到處都是竹林。挺拔的孟宗竹。聽說竹林能防颱，也不怕地震。竹子是竹藝品的原料。孟宗竹可以長到十公尺高，但製作竹藝品時大概要捨棄一半的竹身。切竹子的作業大多在路邊進行。為了製作竹蓆或竹籠，必須先將竹子切細。竹子的表面跟裡面都要刮過，因此常要翻轉竹身。翻轉竹身時，人要站在竹子的一端，把長竹子的另一端像跳舞似地甩高，並且啪的一聲敲在地面。

剛好就在那時，我路過了那裡。宛如刀刃般又細又尖的竹子，不偏不倚地削到我左腳的腳背。一瞬間我以為我的腳就從這裡切斷了。

——再也不能走路了。

我一邊哭，一邊這麼想。

竹子雖然割得很深，不過並沒有傷到骨頭。現在我的左腳背上，還留有淡淡的痕跡。

上小學之前，我曾經回台灣兩三次。每次回台灣再回日本，我就會忘記日語。大我三歲的哥哥也一樣。殖民地台灣的小孩，到了日本也必須就讀日本的小學，因此我和哥哥每次回到日本就得拚命想起忘掉的日語。因為附近有愛擋路的小霸王，忘了日語就等於失去自衛的武器。

「對了！有好辦法了！」

不知道是我們兄弟倆誰先想到的，總之有了一個好點子。當時貨物的運送還仰賴馬車，我們暱稱為「馬力」，由「馬大叔」駕駛。

若衝到馬車前面，馬大叔會怎麼做呢？年幼的兩兄弟忘掉的日語，應該就藏在馬大叔的嘴裡！於是兩兄弟就這麼手牽著手，往馬車的前頭跳去。

「こら！そこ退け！」（混帳！讓開！）

馬大叔大喝道。兩兄弟手牽著手一溜煙逃離了現場。「想起來了！想起來了！」兩人不知是用日語還是台語開心地邊跑邊喊。

＊

昭和初期的神戶，還有鐵路穿過市區。在我小學一年級時，鐵路才高架化，不在路面奔馳。鐵路高架化是浩大的工程，整個城市都是工程引起的灰塵，噪音也十分驚人。當時神戶的鐵路歸鐵道省管轄，稱之為省線。

從台灣移居神戶之後，有一段期間是租屋棲身。搬家的次數不少，在我記憶中，上學前就輾轉住過元町七丁目、中山手三丁目、北長狹四丁目。

我的記憶是從元町七丁目開始的。也許那裡正是我出生的家。現在已經變成馬路了。近鄰舊三越百貨的這個家，對面是一間製酒公司的倉庫。後來才知道藏在那裡的酒叫「白鶴」。這一區後來遭空襲燒毀，之後才改建為道路。

幼年的我常到附近的三越百貨玩。一樓的櫥窗中展示著紅色的童鞋，曾經拜託母親買給我，母親說鞋子的尺寸比我的腳大很多，再長大一點就買給我。小孩子天真地擔心自己看上的那雙鞋被買走，幾乎每天都跑去確認。結果有一天，那雙鞋子真的消失了，我很傷心。雖然忘了自己當時有沒有哭，不過我小時候的綽號是「愛哭鬼」，想必是哭了吧。

長大之後才想到，為什麼當初不找祖父討那雙鞋子呢？我們家用錢很謹慎，當時我不知道，家裡只有祖父是非最高級品不買的人。經常往來台灣和日本之間的祖父，一定是買頭等船票。買一雙紅色的鞋子給愛孫，應該不算什麼吧。

跟祖父相比，與其說父親是個節儉的人，不如說他是個不在意品質的人。因此我買東西時，如果隨便買一買，別人會說「果然是你爸的兒子」，要是買了不符合身分地位的好東西，別人又會說「不愧是你爺爺的孫子」。

我真正的祖母當時已經不在這個世上，我們喚作祖母的人，是祖父的繼室。祖母在世時，祖父就已經與這位繼祖母形影不離了。那個年代，就算娶幾個姨太太也不會有人覺得有問

題，但繼祖母在新竹曾經是某個名人愛慕的對象，而那人也有正室，換句話說，祖父與某名人相爭這名女子，並在這場戀愛競賽中獲得勝利。

從我懂事以來，繼祖母就已經在家裡了。還是小孩子的我自然不知道祖母的事，因此當大人談論到真正的祖母時，就令我感到混亂。

對我而言最大的問題，在於讀小學的時候。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四月，我進入神戶市立諏訪山尋常小學校<sup>1</sup>就讀。在上小學前，我跟祖父學習台灣音（一般稱為閩南音）的讀書寫字。正確地說，跟祖父學讀書寫字的是我哥哥，我只是在一旁跟著學而已。就學齡而言，哥哥篤臣比我大兩歲，但用生日算，他比我大二年十個月。我總是哥哥的跟屁蟲，因此他學讀書時，我也在一旁跟著唸。

我一年級的時候，哥哥已經升上三年級。跟著哥哥讀書的我，不只片假名、平假名，連漢字也認得了幾個。因此學校的學習就不怎麼當一回事。

當時的神戶正在進行鐵路的高架化，同時因為登基大典（昭和天皇即位）的紀念儀式而熱鬧非凡。

「大典，你去過幾次了？」

這是當時學校裡最常出現的話題。會場主要在湊川公園。據年表所記，登基大典紀念博覽

會是昭和三年的秋天舉辦的，應該是我進小學就讀的二年前。但既然在學校裡還常談論到，應該是正式活動結束後，商店跟遊樂設施仍在營業。我記得我還看過「人體大砲」的表演。人從大型的砲筒之中發射出來，射向前方二、三公尺處的紙製標靶，身體大概有一半插進標靶裡。

「什麼？就這樣而已啊？」

就連小孩子也感覺得出來是騙小孩的玩意。

現在我翻閱年表，發現我進入小學那一年的九月還舉辦了「海港博覽會」。也許我是將兩個活動搞混了也說不定。

小學之前應該還有幼稚園，不過我並沒有上幼稚園。不只是我，那個年代去讀幼稚園的一般都認為是頂尖階層的少爺小姐。小學一個年級（五十名左右學童）之中，讀過幼稚園的不到一成。小學的同學之間，印象中幾乎不曾聊過幼稚園的話題。

學校所在的地方，在合併成為中央區之前，有一部分屬於生田區，更早之前叫作神戶區。地址就是神戶市神戶區。自以為是神戶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所以命名為神戶區，其實並非如此。現在元町通附近，過去是一個稱為神戶村的聚落。神戶之名確實由此而來，但過去的神戶區以及神戶校，也只代表這裡「以前是神戶村」而已。

現在成為中央區一部分的神戶區，總共有六間小學。神戶、諏訪山、山手、下山手、北野、中宮這六校。其中中宮只有高等科，其他都是尋常科的小學。

比我們早一個世代的學童，連小學也是男女分校。現在看來，諏訪山校跟山手校比鄰而建有些奇異，其實是因為過去前者為男校、後者為女校。男女分校的時代，神戶校的隔壁是女子就讀的長狹校，男女共學之後，長狹校廢校，校舍轉由青年學校<sup>2</sup>使用。

高等科集中到中宮校之前，是附設在神戶校的。義務教育尋常科為六年，要繼續升學的學童，就升到高等科就讀。此外，中學落榜的學童，也會回到高等科補習。

今東光<sup>3</sup>先生從諏訪山校畢業後，沒考上中學，進入神戶校附設的高等科就讀，最後考入關西學院的中學。我提起自己在諏訪山校讀到二年級，三年級時轉到神戶校，今法師大笑著對我說：

「所以，你在這兩間學校都是我的學弟。哈哈。」

小學二年級九月，滿洲事變爆發。事變爆發之前經濟很不景氣，但小孩子完全不受影響。對我而言，那是個聞不到煙硝味，和平悠閒的時代。



## 位於海岸通的家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在意起報紙上刊登的傷亡新聞。幾年前，我看到死者欄出現小室芳保這個名字，嚇了一跳。小室是我小學的同學，也住在海岸通五丁目，是同一區的居民。

小室在一家大型保險公司擔任重要職位，同學會上聽人說過。報紙上寫著，他擔任那家公司的常務董事。因為住在同一區，畢業之前經常會見到面。

我們這個世代的離別通常是這個樣子，畢業或是學業尚未完成就去服兵役，在那之後房子因空襲燒毀，同區的人就幾乎見不到面了。我們班在「學徒出陣」<sup>1</sup>的送行會開始前沒多久就已經被徵召了。因為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提早畢業了，當那個有名的送行會（同年十月）舉行時，我們已經不是學生了。

總之，我忘了是怎麼和小室分開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像平時那樣在住家附近嗎？還是在我們經常去的元町寶文館書店呢？小室從神戶高商、我從大阪外語畢業，照理來說，見面應該是聊聊就職的話題，不過當時的學生在就職前先進入軍隊，因此談論要當預備幹部或是軍隊預備學生比較實際。應該有談到要進入哪個連隊之類的話題，但是已經記不得了。無論誰

都一樣，在那時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我想，最後說的話大概就是「那麼，再見了」吧。平安退伍回來的消息應該是在同學會上聽人說的吧。他去了東京，而我回到台灣，戰爭結束後那段時間我們都沒有彼此的消息。

戰後十年，昭和三十年代，混亂期終於結束，邁向安定期，大家常舉辦同學會。我從台灣回到神戶，開始繼承家裡的貿易事務，也見到以前的同伴，並聽到沒參加同學會的人的消息。

同年級的片岡修問：「小室怎麼了？」

我回答他：「似乎在東京過得還不錯。好像進了保險公司。」

因為過去和小室住得很近，大家認為他的消息只要問我就知道了吧。

分別之後再也沒見過面，但是我認識小室的姊姊。

「汽車保險這個點子，是我弟弟想到的喔。」

由於常聽到她稱讚弟弟，因此跟其他同學比起來我確實知道比較多小室的消息。

散文家岡部伊都子是小室的表親，學生時代經常到神戶海岸通的小室家小住。我偶爾遇到岡部，小室的事情就成為我們的話題。

小學時的玩伴根據體格差異而有所不同。小室很高大，我則矮小，而且是同伴中最矮的幾個之一。所以就算在住家附近玩，我們倆那時候也不在同一個團體。片岡不高也不矮屬於中

等身材，經常在高大和矮小兩個團體之間遊走。加上片岡是班長，必須和大家保持友好關係。

小學時代，放學後大部分的學生都直接回家，我則會跟著朋友們回家之後才回去。和朋友分別時總是很難過。從神戶小學出發，穿過花隈町的中心，最近的是木下忠一（在神戶一中就讀時病逝）的家，和他說「再見」之後，從後藤哉（就職於松岡汽船）家到大倉山的八宮神社社務所晃一圈，那是山本甲子男（之後考上會計師）的家，再往南走經過我家一段距離後才折返回家。有時候會走過三越到海員會館附近的石炭批發商，那是片岡的家。

應該就是那個時候，我養成了四處遊蕩的嗜好。因為是大家族，就算有個人不在家也不會被發現。利用這一點，可以到處閒逛。

片岡曾以進入京大工學部學習飛機設計為升學目標，因為戰敗而轉換跑道。之後以優秀工程師的身分，在神戶製鋼大展身手，當上了副社長，現在已經退休。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分意外地，我在演講中因為中風而昏倒，被送到了「神鋼醫院」。有一段時間昏迷不醒。家人相當擔心我的病況，並封鎖了住院的消息。

恢復意識後，為了向昏迷期間來探望的人道謝，我看了探病紀錄。因為沒有公布我住的醫院，來訪的人不多。這是神戶製鋼的醫院，跟神戶製鋼有關係的人才會知道。和前任社長牧冬彥的名字排在一起，前任副社長片岡的名字也出現了。

「果然，片岡也來看我了。」

這時出現兒時玩伴的名字讓我安心許多。雖然右半身還動不了，知道這消息後感覺輕鬆不少。剛恢復行走的時候，還是要依靠拐杖、彎著腰走，我在神鋼醫院的復健室做走路和活動手脚的訓練。這時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人，是同樣在做復健的山本甲子男。

他對我說：「這是第二次中風了。」

他曾經是很厲害的執業會計師，在業界享有盛名，像這樣的男人也不敵病魔，瘦了一大圈。喪妻且無子，他應該非常寂寞吧。我想起來了，數年前，他收養了親戚裡的一名年輕人，希望由他繼承自己的衣鉢。

「加油啊！我想再聽一次你的歌聲，還有看你跳舞。」

雖然我也是復健室的病人，我還是對他說了這句激勵的話。山本的歌聲很好，也學過舞。

他對我說：「你也是啊，一起熬過去吧。」

總覺得他的聲音沒什麼力氣。

我在醫院住了五個月，出院四天後，神戶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山本熬過了地震，但是病情一直沒有好轉。不久後就接到他的訃聞。

收到也是同學的月田潔的訃聞是在地震三年後。就讀神戶小學的時候，他在考試前成績會

突飛猛進，是很努力的人。希望他的死不是因為地震。大約是學徒出陣的前一年，見到了戴著四高制服帽子的他。我記得當時跟他在元町聊了一下，戴著厚厚眼鏡的他用手指輕敲了一下鏡框：「這個樣子當不成醫生吧，所以我想去藥學科。」

高度近視要當上醫生好像很困難。而且他家本来就是開藥局的。

月田從東大畢業後，去美國留學，後來當上了神戶藥大（當時是女校）的教授。我開始寫推理小說的時候，曾經向他請教過，從犯人的角度來看什麼樣的藥比較好用，怎樣的毒藥才不容易留下證據。

藥大的附近有賞櫻的好地點，知道的人不多，他曾邀我回去，那時他正擔任學生部長。他特地邀請了我，但是那年櫻花盛開的時候有事去不成，讓我非常懊悔。

\*

我們海岸通五丁目的家就在大馬路旁。戰爭前、戰爭時的運輸仍多依賴馬車，海岸旁的大馬路都是馬糞的味道。我家在五丁目正中央，西側鄰接住友倉庫，位置很明顯。我們租屋經常搬家，在我小學四年級時搬到這裡，到遭空襲燒毀前大概有十年，可以說是定居在這裡。

海岸通的北邊是榮町，再往北是元町。榮町有路面電車，海岸通有公車。公車道和路面電

車軌道間有道路，不知道是不是正式名稱，我們都稱它為「內海岸」。因為它的南邊有海岸通，北邊則是榮町。小室家也在海岸通，就在我家後面，背貼著背。

內海岸上有海產的批發店，排列得相當整齊。那裡最具代表性的是賣海產的店，不過也有香菇行、雜糧行等等。無論哪家店都是批發商，一般客人是不會上門的。內海岸的客人大多是華僑，在那邊購入商品，裝入輸出用的箱子後運到船上。所以華僑的店都不在內海岸，而是跟我家一樣在海岸旁的大馬路上或是內海岸附近。

我家是典型的華僑商館，早期我寫的推理小說就是以這裡為舞台，房間配置之類的就直接用上自己家的設計。作品名是《三色之家》。

那是一棟三層樓的建築，一樓是倉庫，二樓則是辦公室，店主的家人住在三樓。只有倉庫的部分是磚造建築，二樓和三樓是塗上灰泥的木造建築。這棟建築本來名為「仁記公司」，是華僑富商的房子，仁記的老闆鄭先生事業發達，在四丁目的主要道路上蓋了一棟鋼筋水泥的四層樓建築，搬到那邊了。原本當成公司的建築物空了下來，於是我父親搬了進去。

搬到那個地方遇到的難題是，三樓面對大馬路的部分刻了「仁記公司」四個大字。曾經想過塗掉它，但後來父親選了更簡單的方法，直接掛上塗滿綠色油漆的鐵皮把三樓的部分圍起來。一樓的紅磚，二樓的白色灰泥，三樓的綠色鐵皮，就形成了絕妙的配色。附近的人都說

那是「三色之家」，這家的兒子就直接把這當成推理小說的作品名。

二樓是辦公室，放了打字機之類的東西、用來辦公的前半部稱為「店頭」，二樓的後半則是吃飯的地方，稱為「灶腳」（廚房）。

——賺錢就是為了吃飯。

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不變的真理，所以賺錢的地方和吃飯的地方同樣重要。因此「店頭」的主管和「灶腳」的主廚地位相當。

過去，所有工作人員都要從家鄉帶過來，是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習慣。我家用餐時，通勤的店員會帶便當或者外食，住在我家的店員大部分都是從台灣新莊來的，這些人則多是在我家（也就是三樓）吃飯或者外食。

從滿州事變到上海事變（昭和六、七年），多數華僑商社都收店回國。老闆回國了，有的廚師就藉這個機會獨立開店。

我家的前任屋主仁記，似乎沒有關門，只是把主要辦公處移回上海。

雖然都是華僑商社，批發商之間有分天津組、上海組、廣東組、福建組。華僑為了分散風險，同樣系統的店主也互相擔任大股東。批發商偶爾也會說台灣組，不過當時來自台灣的海產貿易商，包含我家在內根本沒幾家，大概三、四家吧。應該稱為同業聯合組織的「公所」

也有分別，廣東人是廣業公所，上海人則是三江公所（江蘇、浙江、江西），福建人屬於福建公所。我不知道天津人公所的正式名稱是什麼，只知道他們屬於「北幫」。少數的台灣商人是屬於福建公所。

我聽父親說過一件插曲。有一次父親被特別高等警察<sup>2</sup>找去，理由是他出席了福建公所的會議，特高認為這樣很不像話，因為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國籍是日本。

——為何加入支那人團體還出席那邊的會議？難道你們忘了台灣人是天日本帝國的臣民嗎？

特高這樣問我父親。

父親料想大概會有這番質問，於是帶著公司登記證前去。大股東內有中國籍的人，身為東家理應幫他們說明。其實警察很清楚這些事情。中國的福建人裡也有人取得日本籍，特高的人也會推薦有力人士加入日本籍，當時福建公所的會長就是日本籍。

——明明知道這些事情還把我叫過去，就是想要榨油水啦。

父親這樣說。

「榨油水」這個詞，在日本和台灣表達的意思差很多。在日本的意思是像榨油一樣極力找麻煩，台灣則是指想要賄賂。

我想這次事件過後沒幾天，父親應該在哪裡擺桌請客了吧。

## 中山手和北長狹

我們搬到海岸通「三色之家」前，租過不少房子。我記得的有元町七丁目、中山手三丁目，還有北長狹四丁目。我進入諏訪山小學的時候是住在中山手，那邊的學區剛好在這，搬到北長狹時學區是神戶小學，因為父親做事情一板一眼的，就讓小孩轉學到這裡。

兩間學校的程度差不多。諏訪山學區的居民大多為公務員，神戶學區的學生則是元町三宮的商家子弟較多。所以中學考試的時候不分上下，兩校都稱得上是升學的名校。

神戶校同期的學生有個叫做生島仲茂的人，就住在諏訪山校園邊，走路一兩分鐘就到了，不知道為什麼來讀神戶校。從生島家到神戶校走路要十五分鐘。就如前面敘述的，兩校沒有什麼差別，為什麼他要這麼大費周章地到這裡？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果然神戶校比諏訪山校好。

只能做這樣的解釋了。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生島家的人對於「方位」相當講究，往諏訪山校的方向通學似乎不怎

麼好。

生島家在幕府末期是神戶村的村長，原本就是大地主，在設置海軍操練所的時候，當時的負責人勝海舟<sup>1</sup>對他們這麼說：

——這附近將來會有發展，趁現在把土地買下來比較好。

生島在小學時就是好學生。身材瘦小有內分泌的問題，所以脖子經常纏著繃帶。那個繃帶很適合他。小學時不同班所以不熟，只不過生島這個人大家都聽說過。曾經當過班長，遠足和運動會的時候父親都會同行，用小型攝影機錄下我們的身影，所以相當有名。

到他進入三高之前還都有消息，在那之後以醫大教授的身分經常出現在電視上，這是從報社的朋友那聽說的。

那時的他不再是那個弱不經風、瘦小且有內分泌問題的生島，已經成為體格壯碩的大學教授。原以為有機會再見到他，但再聽到他的消息時卻已是重病纏身。約地震前十年就接到他的死訊了。

我從諏訪山小學轉學到神戶小學，是因為中山手的家有狐狸出沒，才急著搬家。這些事情幾乎不會跟小孩子說，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太喜歡那個家。房子的緣廊下有水溝。附近住著很多華僑，現在仍然被稱為廣東村。我們搬到元町的理由則不太清楚，那附近很少華僑，

我想不會日語的母親應該覺得很寂寞吧。

住在中山手時的回憶不多。可能是因為住的時間不太長，只有幾個月而已，剛搬過來就準備搬走了。

我家是少見的大家族。七男三女，共有十人的兄弟姊妹。我是次男，在戶籍上是三男。長男出生沒多久就死了，戶籍上記載名為「寬裕」。兄弟們從次男開始名字都有個「臣」字。在那之後連續生出男孩共四人，住在中山手的時候也有一個男孩誕生。那個孩子叫榮臣，只活了一個月就死了。繼祖母認為這孩子夭折是因為狐狸，急著搬家應該是這個緣故。我不太記得住在中山手時的事情，大概是因為我不想記住這些吧。

連續出生六個孩子都是男孩，總覺得有點奇怪。生了孫子祖父雖然開心，不過沒有孫女應該也覺得很失落吧。於是他從貿易商夥伴，川泰洋行的葉先生那兒收了個女孩，給我父母當養女。想藉此招來孫女吧。儘管是迷信，之後我家確實招來了女孩，一連生了三個女兒。大家族裡平安長大的孩子有七男三女，加上養女一名。

父親在那個時候身為貿易商的東主，非常忙碌，母親也因為是大家庭的主婦而非非常忙。祖父在滿五十歲前就過著隱居生活，為了興趣而活，過得很愜意。祖父的藏書還保存了不少，所有的漢文書都是他自己裝訂的。除了書以外還迷上種蘭花。

搬到北長狹租屋處時，庭院很狹窄，滿是蘭花的盆栽。在那之後還迷過篆刻。我曾經看過他一邊流鼻水一邊刻字，我想這已經超越興趣的程度了。我對祖父的嗜好也開始感興趣，唯獨不想碰篆刻。這是祖父活著的時候最後的興趣，我想大概是他對此太熱中而減少了壽命吧。

祖父享年六十。是在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四月時過世，是我轉學到神戶校不久的事。喪禮是屬於台式的喪禮。麻製喪服沒有收邊。父親他們身穿白麻，額頭的部分用粗麻。女眷頭戴幾乎蓋過全身的麻布，穿著就像伊斯蘭教的女信徒。小孩子則戴著類似寺廟住持夫人所戴的帽子頭巾。因為有照片才能如此描述，否則我自己一心想忘掉這些，這場異樣喪禮的細節已經記不太清楚了。那時上海事變<sup>2</sup>剛結束，附近還能聽到〈爆彈三勇士之歌〉<sup>3</sup>。

廟行鎮的敲陣

我們的隊友已進攻

正是冰凍的二月

二十二日的清晨五時

應該是很勇壯的歌曲，在我聽來則是相當的悲傷。

女眷的哭喊聲聽起來就像在替那首歌伴奏。那有一定的節奏，母親、祖母和其他女性親戚，像是配合那節奏哭泣。

\*

住在北長狹約三年，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到四年級。一年級是在中山手，二年級大部分的時間在北長狹，轉學是在升上三年級時，正好是一個段落。學校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諏訪山校的小孩子個性比較沉著安靜，神戶校的則是比較活潑。

五年級的時候搬到海岸通。本來這裡是下山手校的校區，但是父親沒讓我轉學。同為五丁目的孩子，小室也是神戶校的學生，而和我們同一排的寒天批發商富永商店的孩子，則是下山手校的學生。

北長狹的租屋處於鯉川筋的內側。大馬路上有佐野病院，我經常被父親帶來這看病。並不是哪邊有病痛，只是缺少孩子該有的活潑讓父親有點擔心。

——買台腳踏車給他如何？

這是佐野先生診斷的結果。

多虧了這件事情我得到了一台兒童腳踏車，可以到比較遠的地方了。我想表現出充滿活力

的樣子，應該就是給父親最好的回報吧，所以那時候稍微勉強自己活潑一點。我在四年級的時候，一年內骨折三次。左腕兩次、右腕一次，讓一位叫赤柴的接骨醫生覺得很誇張。

——你又骨折了嗎。學柔道的話就不會骨折了，要我教你嗎？

他一邊做拋人的動作，一邊對我說。

——放過我吧！

我發出這樣的慘叫。

我明白骨頭是很脆弱的，從那之後我就很小心。這位赤柴醫生在昭和二十年六月五日的空襲中殉職了。他是地區的警防團長<sup>4</sup>。

在北長狹的時候必須勉強自己很有精神地玩耍。我經常跟佐野病院院長的小孩一起玩。

——要把你的兄弟姊妹找來和我們一起聊聊以前的事嗎？

爾後當上大阪大學教授的長男佐野勇寄信給我。我的弟弟和勇的弟弟豐，是神戶校的同學。和住在東京的弟弟連絡，卻聽到意外的消息：佐野勇為了出席學術研討會去瑞士出差，結果死在外地。他是一位優秀的精神科學者，真是太可惜了。

勇的弟弟豐，則是在東京府立醫大當校長。兒時玩伴真是不錯的聯繫，因為在鄰近區域一起遊玩，才可以發展出這樣的關係吧。

在北長狹的時候玩心很重。當時升學考試的競爭很激烈，升上五年級的時候已經沒辦法一直玩了。所以四年級的時候才會那樣骨折三次。因為滿州事變產生的轉機，讓日本經濟好轉，讓更多只能小學畢業或者是高等科畢業的孩子有升學機會。就算不是這樣，景氣好轉也讓都市人口暴增。

神戶校都快收不下學生了。甚至出現了「流浪班級」。體操時間、畫圖、手工、理科要到特殊教室上課的班級，就把「一般教室」借出去。就算如此，也不能讓學生這樣流浪一整年，每幾個月就會輪流。幸好五年級和六年級因為要考升學考，不用這樣到處流浪。

以前男女分校的時代，當時的女校（長狹校），成為青年學校，早上的時候可以借用教室。青年學校是夜校，只有晚上才上課。我們六年級的時候被分配到那裡。

神戶校就在兵庫縣政府的正門前。六年級的教室在靠近道路那邊。只有那邊是木造的校舍，主要建築是鋼筋水泥。我們把木造的校舍給別的年級，移動到青年學校那邊。

老師好像很開心。到目前為止就算是夏天也得放下窗簾偷偷做升學考的補習。當時不能夠做這種補習，不過好像每間學校都這樣做，只是不能公開而已。特別是神戶校在縣政府的正對面，一直都必須注意教育委員會的動向。放學後得假裝校舍內沒人，就算是夏天也要把窗簾放下來，老師滿頭大汗地幫學生補習。現在搬到縣政府看不太到的青年學校的教室，夏天



就可以把窗戶打開來上課了。

那個時候一個年級有八個班。男女各四個班，比我們大一個年級的六年級則不同，好像有不升學的班，還有成績異常差的學生也被集中在一個班。在我的記憶中，只有這個班是男女合班的。

這個班級的班長有點不一樣。班上學生大多是去高等科或是直接去當學徒或保母，不管朝哪個方向，都不用參加升學考試，也沒有讓其他學生很頭痛的課後補習。而這個大我們一個年級的班長，經常在三宮附近徘徊。他是我們這些膽小鬼的好夥伴，會去威嚇我們的天敵，那些會欺負人的傢伙。

那些壞心眼會欺負人的學生，我們都稱為「可怕的傢伙」。

這個班長問我們：「把你們弄哭的傢伙在哪？」

膽小鬼就把可怕的傢伙的名字告訴他。只要這樣做，那些可怕的傢伙就不會欺負膽小鬼了。

我們都說：「那傢伙被修理了一頓。」

那些欺負人的傢伙大概被這個班長制裁了。這件插曲，讓三宮這附近成為我們的安全地帶。高一一個年級的學生畢業後，我們升上了最高的六年級。借用青年學校的教室來課後補習很辛苦，喜歡四處徘徊的我，也沒辦法經常到三宮附近閒逛了。

但還是很常聽到那位令我在意的高年級班長的消息。

「似乎是去你鄉下老家了。因為上了高等科，還是能升學。沒留下來補習也讀得很好啊，很有一套嘛。」

我聽到這消息的時候放心了。和你一起到鄉下，指的是台灣。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和日本內地有同樣等級的中學。班長進了高雄商業學校就讀。在那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聽到他的名字——大下弘。

戰爭結束後，職業棒球復活，他成了一名強打者。如同彗星般登場的球界新人，正是當時那個值得信賴的班長。

神戶校的同學會中，他也有出現，和國高中生聊過棒球。他出乎意料地早逝。

## 升學

那個年代，商家的習慣是讓長男繼承家業，因此長男都就讀商業學校，次男以下就自由發展了。家裡有個比我年長三歲的哥哥，就讀市立第一神港商業學校。就像我自嘲是「備用人」一樣，也因為兄弟很多，我們像是為了哥哥的意外狀況而預備的人。

現在回想起來，父母親都沒有叫我去唸書。母親不懂日文，所以沒有出席過PTA這類（當時似乎稱為父兄會）的活動。父親因為忙著工作，沒有空閒為討論孩子的升學問題進出學校。在學校看來，我們家是不重視教育的家庭吧。父親並不是不重視教育，只不過對學歷的信仰比一般的家長薄弱一點。

父親的時代，台灣沒有大學、高職，就連中等教育都不完善。台灣的最高學府是「國語學校」，這如同「內地」的師範學校。後來成為工業學校的「工業講習所」就是理工科的最高學府。父親進入了最難考上的電子科，但是沒多久就退學了。入學考試寫錯很多，父親心想這樣應該考不上，結果合格了。入學後才知道，入學考試的成績是第一名。

似乎是從那以後父親對入學考試就抱著猜疑的心態，孩子的入學考試也就沒有這麼積極。收到父兄會的通知也只說，「閒著沒事的人去就好了。」這對身為孩子的我真是太好了。

想成為技師的父親，為什麼轉換跑道當商人呢？我有一次問過父親。

——從那地方畢業也當不了技師。入學後看了學校的規定，上面寫了本校培育善良的職工。所以我就不唸了。

父親這樣回答我。我想應該還有其他理由。我認為比起生意人，父親應該更適合當工程師。以商人來說，父親的話太少了。

作為備用人的我，果然也得進入商業學校。但是父親替我準備了一條稍微不同的路。

父親經營的「泰安公司」就像其他華僑商社一樣，為了分散風險，讓別的公司成為股東。父親的大股東之中，有個名為裕興的商行，經營者是詹延英。裕興原本是福建廈門的大商社，在神戶也有分店，詹氏本是神戶分店店長。廈門的裕興是由許氏經營，後來突然就倒閉了。

像這種大公司倒閉是常有的事情。這種建立在信用上的交易，就算有信用狀，也靠不住。信用好的店，自然經手比較多的商品，也因此，如果往來的商家出了問題，連鎖的影響就會大到無法挽救。

廈門的裕興雖然倒閉了，神戶的裕興卻是生意興隆，變成分店援助本店，也就是詹氏支援

老東家許氏。因為詹氏是我家的股東之一，我們也接收了廈門許氏的員工；那個人是畢業自廈門的日本人商業學校。

父親似乎也打算讓我讀那間學校。在外地的日本人學校，原本就是為了當地日本人而設立的教育機構，所以盡可能仿效日本風格。但是踏出學校後就是閩南語（福建南部的方言，和台灣的語言幾乎一樣）的世界。父親擔心我們會忘記故鄉的語言，所以希望我們進入能夠繼續接受日語教育，又可以聽到家鄉語言的廈門的日本人學校。

——可是，舜臣的個性會不會太內向了。活潑的敏臣似乎比較適合。

父親考量我的性格和經常跑佐野醫院的健康狀況，把我到廈門念書的期待轉往弟弟身上。我的下面有個晚我一年出生的弟弟，如果算虛歲的話是差兩歲，學齡也低兩級。他入學考試的前一年發生盧溝橋事變，要把剛從小學畢業的孩子一個人送往廈門，就算是我父親也做不到。

接受日本教育的中國人，就讀於當地的日本人學校是常有的事情。詩人黃瀛就是其中一個。黃瀛是中日混血，是個命運奇特的人，年輕時讀過青島的日本人中學，作家南條範夫<sup>2</sup>當時好像也在那裡就讀。

一九九二年我在成都認識了黃瀛。年紀已經很大了，依然在大學任教。年輕的時候黃氏在

文化學院學習，寫了很多日文詩，他之後不知為何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歸國當上國民政府軍的軍官。那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

他是個詩人，徹頭徹尾的文學青年，為什麼會選擇這條路呢？這是我長久以來的疑問。日中兩國開戰的時候，從正規軍校畢業的他，已經成了幹部軍官。和他相熟的日本詩人都很驚訝；竹中郁的詩裡就有一首〈為什麼你會變成將軍〉。和他談起這件事，他笑著說：「當時沒考上一高。留學生最容易考進去的就是陸軍士官學校。」戰爭結束時他應該是中將，之後他以高階將領的身分和紅軍交戰，打輸了。過了很長的一段獄中生活後，終於當上適合他的日語教師。談得有點遠了，總之，那種讓外地日本人就讀的學校，我也差一點就被送進去了。

\*

為了升學考試而做的課後輔導，對老師來說是犧牲自己的時間。可是對於考生來說，好不容易上完課了，還得盯著教科書和講義好幾個小時。

——希望他們隨便一點。

這些忤逆的話，當然是老師不在的時候才會說的。

——「放過我們吧」這種話也說不出口呀。

對熱心教導我們的老師，當然講不出這種話。

大家都講不出口，但我想大家都在心裡這樣想吧。不敢誠實面對自己不是一件好事情。

——這樣的話，我說我要早點回家自己念書，你們就跟著說，我們也一樣，好嗎？

說這話的是班長片岡。這是大膽的反抗。

——好耶，上吧！

密謀似的東西就這樣成立了。課後輔導前，片岡舉起手，說了剛剛講好的話，井原老師的臉色立刻變了。

「滾回去！」老師大吼。

片岡則是不慌不忙地抱起收拾好的書包，悠哉地走出教室。之前說我們也會跟上的傢伙一個也沒動。就像被五花大綁一樣動彈不得。

同學都很難過背叛了片岡。片岡相信有人會支持他而走出教室。我們說會跟上去，結果沒有一個人跟著片岡出去。小學的最後一年，就因為這件事帶著難受的回憶。我不知道這事後來是怎麼了結的。片岡依然是班長，井原老師在那之後很平淡地繼續課後補習。

我們在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三月畢業，這個事件是在那前一年發生。六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在一九九四年中風倒下，住在片岡擔任副社長的神戶製鋼關係機構神鋼病院五個

月。

——又承蒙他照顧了。

那個事件我怎麼也忘不了。讓我深刻體會到，背叛別人會帶來多大的痛苦。

小學最後那一年特別冷。除此之外，讓人心寒的事情也經常發生。畢業前發生了二二六事件<sup>3</sup>。我們小孩子雖然不清楚詳細經過，但也知道總理大臣被襲擊不是件小事。

我的考試似乎沒有大問題。因為是哥哥讀過的學校，總覺得很熟悉，對我來說沒什麼新鮮感。總之，可以不用去廈門讓我安心不少。只是在店裡工作的許先生對於我沒能成為學弟這件事好像很遺憾。

第一神港的名號在國內十分響亮，因為棒球很強。我入學時正好有名的選手畢業，棒球熱潮衰退，但是柔道等還是很強。

因為棒球打響了知名度的關係，那段時間入學考試變得很難。我並不知道這件事，糊里糊塗就進來了。老師們經常提起貝比山下、二出川、島、岸本等有名選手的舊事。教化學的清原老師是棒球社社長，如果教太多，考試會變得很辛苦，就希望老師說些課外的話來「打發上課時間」。那個時候，棒球是最常出現的話題。

「春季的選拔達成二連霸的只有我們學校。我們和六大學聯盟<sup>4</sup>的隊伍打也能打得很精采

喔。夏季沒拿到優勝是因為春季選拔獲勝的話，夏季就會到美國去，因此夏季的時候只剩下二軍。就算是我們學校，二軍要獲勝也不太可能。《每日新聞》招待我們去美國是為了讓夏季的《朝日新聞》變得很無趣。夏季《朝日新聞》的大賽，就像是第一神港這個橫綱不在的相撲一樣呢。」

把化學方程式丟到一旁，清原老師講到棒球就會不知道節制。清原老師是帶選手遠征美國的人。只是第一神港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當時兵庫的中學棒球是別當<sup>5</sup>所在的甲陽和別所<sup>6</sup>所在的瀧川的時代了。

看似和平的時代，但我們尚未察覺的戰亂腳步確實正步步逼近。預兆就是小學畢業前的二二六事件。

還是小孩子的我們並不了解那些事。就讀第一神港，可以穿上卡其色的制服和綁上綁腿讓我很開心。第一次穿皮鞋也讓我很有興奮，但是無論哪雙鞋，都只有其中一側有磨損，是走路方式有問題還是身體方面有缺陷，讓我有點擔心。不過，操練的時候，走路方式不好的學生會被糾正，派到我們學校的教官少佐並沒有說過什麼，至今我還記得當時放下一顆心的感覺。

有很多人從神戶小學考上第一神港，山本甲子男也是其中一人。果然多是商家的長男，雖

然不是同一個年級，元町升屋的近藤也一起，襯衫店的岡田很可憐地在中學的時候病死了。因為小室去了二中，我們這一區沒有其他第一神港的學生，但是有住在四丁目的栗井。雖然也是神戶校出來的，不過他是高一個年級的前輩，是從高等科一年級進來的學生。

從高等科過來的學生意外地多。蹉跎了一年，但並不都是因為前年沒考上。原本是打算高等科二年級時出社會的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好轉，可以讓他升學就讀商業學校之類的例子變多了。景氣變好了，而且主要是軍事需要帶動的景氣。神戶小學會爆滿，出現流浪學級，也是因為景氣好轉人口增加的緣故。

神戶有三菱重工、川崎造船，以及鈴木商店系統的神戶製鋼等軍需工廠，下游工廠也在找工人。因此也出現了把人分門別類的歧視現象。指著地方出身的員工子女喊「鄉下人、鄉下人」。

對中國人和台灣人不是完全沒有歧視，但是並不嚴重。聽台灣來的人說，在台灣的差別待遇很嚴重。不過在神戶，由於我們人數太少，且多半已融入日本人的生活，所以才沒有發展成大問題吧。

在神戶小學時，有個比我大四、五年級、姓何的前輩是班長。小我四個年級的弟弟也是班長。和我同年級的坂本也是班長，家裡賣中藥，其實是廣東人。雖然是坂本這種日式的姓氏，

但我去過他家，知道他是中國人。或許他知道我不是日本人才邀請我去他家的吧。

坂本沒有升學，也沒有讀高等科，回故鄉去了。大概就跟我差點被送往廈門一樣吧。很有可能到了廣東那邊繼續讀書。

神戶也有華僑學校，最大的是「同文學校」，用廣東話授課。華僑學校整合後，全部用北京話授課是一年後的事情了。日本從中國（清朝）的義和團事件中拿到的賠償金，一部分用在跟中國有關係的文化事業上，資助華僑學校的錢也是從那裡來的，條件就是學校整合後要使用北京話。

## 水災前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我入讀第一神港，十二年發生盧溝橋事變。十三年則是神戶淹大水。

我在盧溝橋事變後的暑假回台暫住，那一年我家因為發生了間諜事件，被特高警察搜索。去除小時候模糊的記憶，我在台灣的回憶剩下國小三年級的春假和中學二年級的暑假而已。國小三年級的春假回台灣是因為祖父的法事。祖父的喪事和埋葬都在神戶辦理，但根據台灣的習俗，需要由道士進行「做功德」的儀式，如果地點不在台灣就沒辦法舉行。我想是因為在日本湊不齊所需的道士人數吧。

道士們不停地朗誦長長的類似「祝詞」的文字。我也學了一點，雖然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內容，不過也被叫去唸了。接二連三地唸著。道士們輪流像參加歌唱比賽似地高聲誦唸，對小孩來說真是厭煩。

唸最後的祝詞的人，唸了祖父的住處和名字。這個我知道。住處並不是在台灣，是搬過去

之前的住處。

——泉州府同安縣……。

這句泉州府出現後就告一段落了，讓我可以喘一口氣。

我只記得法事舉辦的日程。因為幾乎沒有出門，且是春假期間，應該只有短短幾天。相比之下，昭和十二年回台灣的暑假則有一個月樣子。來回都是搭乘大阪商船高砂丸，我只記得那個船晃得很厲害。

昭和十二年回故鄉是除了爸爸以外的全家旅行。父親很忙沒有休假。

住處是父親的弟弟或妹妹家，因此同族的人都來了。從新莊的城鎮和附近的郊區去台北市只要搭公車半小時，所以經常跑去玩。

新莊靠近台北的中興村那裡有叔父，舊仔林有姑姑。姑姑就是爸爸的姊妹。舊仔林的姑姑有來過神戶，和我們很熟。

姑姑的名字是「幼」，嫁給了舊仔林一位名叫徐火炎的富農。

姑姑是個個性剛烈的美人，和丈夫徐火炎相差好幾歲。這對夫妻經常吵架，一吵架姑姑就會離家出走。

「我要回娘家了。」

他的娘家是指位於神戶，我父親的家。只要離家出走就會從台灣到神戶，我們家這邊。雖說是父親的妹妹，但因為是女性所以比父親早結婚，生了一個女兒，那個女兒比我的哥哥還要年長兩歲。

——你還真敢把女兒丟著離家出走啊。

父親對她的行為有點驚訝。總之，她就是跑到我家兩、三個月。之後，徐火炎會特地從台灣來神戶接她回去，把這事解決。離家出走的原因是什麼，沒有人跟我講。大概是不能讓小孩子知道的事吧。

昭和十二年回國的時候，住在舊仔林的姑姑來迎接我們。女兒正好從女校畢業，還沒開始工作，可以帶我們四處遊覽。她的名字叫做「妍」，但是有另外的名字，家裡比較常叫「月雲」。學校就用妍這個名字。

月雲姊是從台北第三女高畢業的。台北的台灣人子女，男生讀二中，女生讀第三女高。跟內地人（日本人）比起來，台灣的人數比較多。

盧溝橋事變是那年的七月七日，我們回到台灣後馬上就發生了。從小孩的角度看來，神戶和台灣都沒有什麼緊張的氣氛。只覺得城市裡面的軍歌和軍服變多了而已。



\*

但是，有個事件讓我們突然感受到「戰爭」就在身邊。

在父親店裡工作的林天俠被特高警察檢舉了。

林天俠是個年近四十、身材矮胖的男人。林天俠會待在父親店裡，是因為他在香港和廈門都有生意夥伴，要做出口生意卻沒有自己的公司，所以借用我們公司的名義。不是我們的正式員工，在中國稱為「客商」<sup>1</sup>。他在中國領事館有同鄉的朋友，經常過去玩。

在盧溝橋開始的戰爭，是沒有宣戰就發動的，領事館也還在。但是重要人物，也就是高階公務員，都回國了，剩下的只有當地僱用的人和二線的工作人員。

當時的中國總領事館在神戶，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駐神戶總領事館」。不是阪神而是神戶。民間團體和中華會館都用神戶。會長的任期，出身神戶的做兩年，出身大阪的做一年。神戶的中國人數也是壓倒性地多。領事館的地點在生田神社靠進西邊那側。

就算在紛亂中，領事館依然有外交特權，警察沒辦法輕易進入。那個時候沒有高層人士在，可以安心地賭博。林天俠的籍貫是福建省永春縣，領事館內也有同鄉的人，所以經常去打麻將。似乎是因為進出頻繁所以被盯上了。

——你經常去給他們送情報吧。

頭腦簡單的特高警察檢舉了林天俠，搜索了他的住處。找不到什麼可以當證據的東西。但是卻找到了紀念照，從那張照片看來，林天俠是個大人物。

永春縣有七個地區，那一帶有很多土匪（當地的盜賊團），因而有個警衛隊。志願者很少，所以把服裝弄得很威風，用於招募隊員。穿著比正規兵還要體面。這樣的隊員有兩百人左右，因為有七隊，每一隊不超過三十人。紀念照是團體照，隊員都站著，七個隊長坐著。林天俠是第一隊的隊長，坐在中央，兩手放在軍刀上。就像他率領著所有人一樣。

——他至少有少將等級吧。

特高警察興奮起來了。

把那照片拿給憲兵鑑定。

——照片裡的制服不是軍服，像是中國租界的消防團體的制服。

憲兵這麼說。

能判定林天俠有罪的證據一個都沒有。但特高警察只要舉發，無論如何都想人人於罪。

林天俠把寫給中國朋友的信，都用複寫紙複製下來。因為父親的店裡所有的信件都會這樣複製下來，林天俠也就用一樣的信紙。寫過的東西都會留下來，間諜根本不會用這種東西。

就算如此，特高警察非要從中找出可以把林天俠趕到國外的「證據」才肯罷手。

——日兵滿街（滿街都是日本的軍隊）。

他的信上寫了這句話。

這就構成流言蜚語罪了。把沒有根據的事情到處亂說就是「流言蜚語」，也就是造謠。判斷什麼是謠言，就是特高警察的自由。

林天俠因此遭到流放，搭上往香港的船。

對我來說，林天俠本是一種英雄，流放則讓他在我心中的形象破滅了。因為根據查收的書信內容，我們得知他在父親的店當客商，接受一宿一食的恩惠，還背叛我們。

這個事件原本父親極力庇護林天俠。但特高對父親說：

「陳先生，你為什麼要當濫好人。給你看看林在信上寫了什麼東西，這樣你就會知道林是怎樣的人了。」

特高的人把查收的書信複本給父親看。

林天俠洩漏父親生意上的秘密給海外的相關人士，甚至橫刀奪走我們快要談成的買賣。不僅如此，他還中傷我們公司：

——老闆是個日本籍的台灣人，為了假裝是華僑，名義上找幾個中國人當股東而已。

他寫了這些，竟還把自己設立的空殼公司賣給我們。

在間諜事件上，父親也很危險。因為造謠「日兵滿街」的流言蜚語罪，是足以流放到國外的罪，不管是什麼都可以入罪。

父親店內書信的複製工作是由數名員工處理的，但是承擔責任的人是父親。書信內，把日本人稱作「倭」，有時候還寫「倭寇」。父親以為這些事情會被迫追究責任，結果並沒有問題。

——所謂倭寇，就是出現在中國沿海的日本海盜。現在還是令人恐懼的對象。是很威猛的人，這就是倭寇。……這類英勇的事蹟留在歷史上。

特高的人認為「倭寇」是很英勇的，甚至值得誇耀。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是，商品堆上船的時間晚了，所用的理由。

——因為扶桑丸被徵去當御用船了……。

御用船的徵收是軍事機密，是不能明說的事情。

——不能說是御用船。要說是○○船。

特高告訴我們，要像這樣把字藏起來。

寫○○船，實際上還是讀作御用船，因為不是這麼明白地寫，他們似乎認為可以守住秘密。戰爭才剛開始，沒想到竟會持續八年之久。

戰爭爆發、回國、間諜事件，多事之秋的昭和十二年過去後。隔年七月，下了連日大雨，五日的時候六甲諸川氾濫，淹過了市街，造成從未有過的大水災。

「山海嘯」這古老的用語剛好可以用在這裡。

死傷失蹤近四千人、被沖走和全毀的房屋有七千戶、淹水的房子有二十二萬戶的大慘劇。這場大水災和七年後的大空襲，加上一九九五年奪走六千條人命的大地震，到目前為止，我所愛的神戶，在我的面前已經經歷了三次危機。

現在我從住了二十九年、十分習慣的伯母野山的家搬到住吉川附近。是久原房之助舊邸遺址上蓋的住宅大樓。渡過住吉川上的久原橋，是我散步的起點。過橋後約走一兩分鐘左右有甲南小學，學校正門的轉彎處有谷崎潤一郎提筆所寫的「細雪」這個石碑。

谷崎在這附近看到了昭和十三年的大水災，把當年的場景描寫在《細雪》裡面。

——與其說驚訝，不如說是茫然、看得著迷了。

這是谷崎描述的水災。

我靠繩索渡過滿是濁水且有漩渦的路面電車道回到海岸通的家。大概淹了一公尺高吧。我想一樓倉庫放的商品都泡水了。但是淹的是泥水。水裡的泥巴就像水泥一樣填滿所有縫隙，因此倉庫內幾乎沒有溼。

從這之後不只是我，大部分的人區隔時間，都自然而然地使用水災前、水災後這類用語。市街區的復興很快，父親他們每天爬的再度山<sup>2</sup>也因為洪水而改變了樣貌。就算到現在，我夢中的再度山，還是水災前和水災後的景色重疊在一起的樣子。跟著父親一起爬再度山主要是小學的時候，所以水災前的回憶比較深刻。

只要回憶再度山，總會想起小學時代，同校但不同年級同學，擔任班長的前田新藏，也和他的父親一起爬山。我也是跟著父親爬山，所以兩邊在大道上碰到面總會有些不好意思。

前田是原町的商店「淤能碁呂屋」的小開，出身淡路，到他這代移居三宮，店名也變成「京町約會」。兒時玩伴還住在同一個城市真令人開心。是一起逃過水災、空襲、地震的同伴。

## 飄落的旗幟

哥哥好像從一開始就想當領薪水的上班族。大概是在父親身邊看到經營者的辛苦吧。

父親每天忙到很晚，忙著對帳簿、寫信之類的事情，唯一的樂趣大概就只有每天一大早的爬山。說是爬山，其實比較接近散步。再度山是因為弘法大師爬過兩次而得名的。地圖上的標高有四六八米，但是我們沒有爬到那邊。道路旁有茶店，有稻荷茶屋、燈籠茶屋、中茶屋之類的店，那裡有各個登山會的簽名。會員簽了名，喝茶、吃吐司後才回去。也有喜歡在茶店聊天的人。

三宮和元町一帶的人爬再度山，楠公大人（湊川神社的別稱）以西的人則爬同樣是六甲山系的高取山。高取山和再度山同為神戶市民所喜愛的山，標高只有三二一米，並不是很高的山。

神戶水災後，山也受到相當大的損害，不過因為房子不多，只是道路有所改變。再度山接近山頂附近有大龍寺，那裡還完好。因為是河川氾濫造成的水災，沒有太多支流的上游受到

的損害比較小。

再度山很早就建設了車道。昭和初期，我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那邊就鋪設柏油路了。登山道是沿著溪谷修建的，損傷很嚴重，車道和谷川交接的部分較少，受害比較輕微。我們在水災後經常走車道爬山。那時候外國人也常使用這條路。他們走過被稱為cap的這條小路爬到接近山頂的「修法之原」。因為外國人的墓地被搬到那邊去了。

大龍寺是真言宗的寺廟。弘法大師來過這山兩次，所以和大師信仰結合，沿路上大量的茶屋，一開始也不是為了登山客，而是為了參拜客開設的店吧。

「修法之原」之名是因真言密教<sup>1</sup>於此處進行護摩<sup>2</sup>儀式而來的。我們小時候，二十一日稱為「大師日」，參拜的人特別多。

水災隔年，不知道為什麼經常去爬山。沿著車道有一家二軒茶屋，我經常去那裡。也必須說「不知為何」，我大多是一個人行動。

我不是討厭人群。口才不好所以不擅長交際，但也不是特別喜歡獨自一人。

只有這個時期特別想一個人過。上筒井的舊關西學院遺址不像現在有動物園，是很荒涼的地方。很安靜，可以好好思考事情。

兄長從學校畢業後很快就工作了。父親讓他在其他地方磨練，應該是想把店給他繼承吧。

不過哥哥似乎沒有那種想法。這樣的話，事情就會落到我頭上。該怎麼辦？我也不太想做。還有很多弟弟。我的個性不適合商業，父親應該知道這點才對。

所以我到底想做什麼？

當時的我有這些煩惱，所以常常想自己一個人。

總之先從學校畢業吧。

升上商業學校四年級時，會根據畢業後的選擇分班。我的成績並不是很好。國語和英文很好，但其他學科格外地差。特別是數理方面的科目根本不行。理由我很清楚，因為我根本沒興趣。

——拿出幹勁去做，馬上就會了。

雖然這樣想，但從來沒有提起幹勁做這件事。

我想這應該是小時候的壞習慣。因為跟著祖父學習素讀，認識了很多字。只是沒辦法用日語說而已，我自己這樣想。

自然而然的就會了。

——我一直以來都這樣認為。但那些並不是自然而然的東西。

不努力不行，我明白這一點。但是並沒有實際努力。只是認為做得到，所以就安心了。

——有更讓我感興趣的東西。那就是電影。

因為兄弟很多，管不到我這邊，當時的我經常去校方禁止的電影院。聽起來像是藉口，但一開始被電影吸引是因為認為那樣可以學習英文。之後，就被那之外的東西所吸引。並不是只有語言而已。

我不怎麼擅長運動。會不會再骨折呢？一直這樣恐懼著。因為當時的氣氛非加入一個社團不可，我考慮許久決定加入「滑翔機社」。

滑翔機是新的運動，城市裡的學校空地很小沒辦法練習。所以星期日的時候都會去六甲背面的押部谷練習。那樣的話，每天都可以早一點回家，還能去看場電影。而且哥哥已經畢業了，所以不會被發現吧。但是，申請入社時前輩對我說：

——你很瘦小、很輕，也許你認為這樣可以很快坐上滑翔機，那你就錯了。剛開始只負責拉滑翔機，所以我們不需要像你這種看起來沒什麼力氣的人。

就這樣被拒絕了。

其實我也只是被必須選擇社團的氣氛影響，才選擇滑翔機社而已。被拒絕反而更好。

——申請了，但是被拒絕了。

可以拿這個當理由。

在家就說我在練習滑翔機，這樣就可以挪出看電影的時間了。那個時候人們對電影的稱呼並不怎麼稱頭，通常是「會動的照片」，多半簡稱為「會動的」。

我利用假裝練習滑翔機的時間看過兩次尚·嘉賓 (Jean Gabin) 的《望鄉》 (Pepe Le Moko)。

那時透過電影和小說，擴展了我的世界。

\*

畢業的時間越來越近，得決定未來的方向了。學校裡分為升學班和就職班，是根據學生自己的意願。我雖然決定升學，卻對學校說希望就業。

如果去升學班，就會有小學時代最討厭的課後補習。那樣的話我就沒辦法去電影院，喜歡的書也沒時間看。

因為進了就職班，連一小時的課後補習都沒有。當時大受好評的電影是《管弦樂團的少女》 (Mad About Music)。主演是黛安娜·杜賓 (Deanna Durbin)，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偶像」。

我升學的目標從一開始就決定是大阪外語 (大阪外國語學校，後來改為大阪外國語大學)。

因為我喜歡英文，第一神港的英文老師北代周造和柴田一夫都是大阪外語畢業的老師，他們很照顧我。對於老師的好惡影響了對學科的好惡，我的情形就是如此。小學時的班導井原老師稱讚過我的寫作能力，讓我感覺自己好像很喜歡作文。

我入小學的那一年，同樣學校畢業的學長之中，有一位名叫島尾敏雄。神戶校那邊，那時候有個後來成為作家的若杉惠（筆名是若杉慧）老師任教。若杉不是島尾的班導師，但是他很早就稱讚過島尾的文章。

我入學的前一年，島尾是六年級。那一年天皇的侍從來了學校。天皇的侍從等於天皇的身，是代替天皇來視察的，因此學校氣氛十分緊繃。整個學校做了大掃除，每個角落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學生的作品也展示出來。圖畫、手工、習字、文章等。圖畫也就罷了，貼出來的文章天皇的侍從不可能一一讀過吧。即使如此，還是必須選出最好的作品貼出來。學校調查了目前為止的成績，要讓其中最優秀的人來寫文章，而挑選工作由若杉老師負責。

若杉老師選出的六年級寫作代表就是島尾敏雄。不知道侍從最後讀到沒有，但是島尾的文章確實被貼了出來。這是在成為作家後，向若杉老師、島尾學長確認過的事情。

島尾和我是學長和學弟的關係，但實際上在神戶校的時候卻是剛好錯過，並沒有同時就讀。島尾最後一次發病倒在書架旁，那上面正好放著我的《中國歷史》。這是島尾的妻子告

訴我的。若杉老師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教過我畫圖。我對畫圖有點興趣可能就是因為若杉老師指導過我吧。

——那個時候，如果島尾知道我曾經修改他的文章，不知道會怎麼想？

一年後，若杉老師笑著這麼說。

水災後我在口袋中放了小本子，想畫圖就可以拿出來畫。小學時期成績單上的評分，只有五年級的圖畫不是由班導師負責，而是若杉老師。我拿到九分。得到十分的非常少，九分算是很好的成績了。

那時候廈門許先生的哥哥來訪，他是西洋畫家，因此有段時間我認為自己可能成為畫家。當畫家的許先生名為許聲基，戰後到日本辦過好幾個回個展。在台灣的畫壇也很活躍。

因為興趣廣泛，我投入過不少事。所以被問到考試準備得如何，我不記得自己認真讀過書。從一開始就決定要考大阪外語的印度語科。我有自信英語跟漢語就算不唸也沒問題。當時國立學校的入學考試不考數理的只有大阪外語和上野的美術學校跟音樂學校（後來改為藝術大學）。

會選擇印度語，是因為那時候讀了譯成英文的泰戈爾小說《戈拉》，受到那本小說的影響。小說寫的是印度知識分子從民族主義到普遍主義的過程，而我認為印度語科或許就有自己

當時疑惑的解答。

大阪外語的入學考試對我來說有個問題，那就是英語考試中有聽寫這個項目。第一神港有英國老師格蘭特和瓊斯，和其他學校相比應該是比較有利。只不過，升上五年級之後就沒有外國老師的課了。

畢竟英文已經聽慣了，只要有人能讀英文給我聽，讓我練習把它寫下來就可以了。

神戶有間帕莫爾 (Plamore Institute) 夜校。入學很容易，但是要順利升上去卻很難。畢業更是難上加難。帕莫爾這間學校畢業的人，外語大多十分優秀。因為是夜校，也有在學的人去讀，不過學生主要是白天在商社工作的人。

第一神港同期的學生中有個叫田中正次的人，他是就職班的學生，已經決定在兼松工作，晚上就去帕莫爾念書。他不是初級，已經升到很上面的班級了。發音在帕莫爾被鍛鍊過。我請他唸英文，讓我練習聽寫。練習的地方多在諏訪山公園的長椅。準備入學考試的回憶大概就是這些了。

因為在就職班，對於升學沒什麼緊張的感覺，很幸運可以悠悠哉哉過日子。可是這個世界並不是這麼悠哉。每過一天戰爭的腳步就越來越近。也開始感受到物資的缺乏。

昭和十五年，西元一九四〇年，從神武天皇即位開始算的話，就是「皇紀」兩千六百年。

這年的十一月，全國各地都在舉辦紀元兩千六百年的儀式。神戶的市立學校集合在東遊樂區，到處都有升國旗、唱國歌、傳唱紀元兩千六百年的紀念歌等活動，當然也少不了許多市內大人物的演講。

因為最好的市立學校是第一神港，升國旗這件事情，由我和同學來做。我們是最上面的五年級。日本國旗乘著〈君之代〉的旋律，緩緩升起。

——直到小石變巨岩，直到巨岩長青苔。

唱到這裡，旋律達到最高潮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綁著國旗的繩子突然斷了。

國旗就這樣隨風飄落了。

升旗的兩個人是班長。他們很慌張地撿起旗子，突然靈機一動，把旗子綁在升旗桿的底部。日本國旗掉下來是不好的象徵。東遊樂區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由外國人的團體在管理。升旗台已經很久沒使用了。繩子因為太老舊，就算快斷掉了也很正常。

那陣子都在接收外國人管理的東西，已經蔓延到把香菸 Golden Bat 的商標改成「金鴉」，cherry 改成「櫻」的程度了。國旗落下的事件，恐怕應該是給急著恢復國家特色的日本一個小小的警鐘吧。



## 太平洋戰爭前夕

昭和十五（一九四〇年）、十六年，大陸的戰線陷入膠著，物資逐漸短缺。

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揭開了青春的序幕。滿州事變之後，軍國主義益發高漲，令人窒息的時代到來。我們若想嗅一嗅青春的氣味，煙硝味也會隨之一同吸入肺裡。

雖說是青春氣味，但在當時男生女生被嚴格地分成兩半。男女同班的現今更無法想像當時男女有別的程度。連和鄰居的女同學講話都不被允許。原則上，國小即便是男女同校就讀，也不會是男女同班。有的學校是一同念到二年級後分班，有的因學級編制，在學生升上高年級後不得不設置男女同班的班級，但那些都是「例外」。神戶的小學也有同班到六年級的學校，從同班學校畢業的學生升上國中後，就會成為人人稱羨的焦點。

不用說，即使不同班，男同學還是時時注意女同學，知道幾個醒目的女同學叫什麼名字。所謂醒目，多半是擔任班長、在朝會發號施令的女學生。

就算是面熟的同年級女生也不曾交談過。

第一次和國小同年級的女生講到話已經是畢業後很久的事了。甚至有人是被徵兵入部隊，在區民會送行時，才與女生有了第一次的交談。

「請好好保重，祝您平安歸來。」

「謝謝，我出發了。」

對話僅止於此。

這時的「出發」二字參雜著複雜的心情，無法說得太過露骨。入部隊後會收到女同學寫來的「慰問信」，有人根本不記得寄信女同學的樣貌，令人啼笑皆非。

神戶曾遭受空襲的摧殘，振興市民生活不見起色，更因生活型態的改變，很多部分已經不可能恢復原狀了。戰後十到二十年，才真正地進入安定期。

這時期各間學校陸續舉辦同學會。

——當時還發生了那種事呢。

偶爾還能聽到諸如此類的祕辛。

我在男女方面似乎算是晚熟，青春期也沒有那方面的小插曲。

成為作家後，我曾參加過國小時期女同學的小聚會。是若杉老師的班級。導師若杉惠後來成為作家活躍於文壇。

定居在東京的老師偶爾回到神戶時，同學就會聚在一塊兒。這個小聚會被老師稱為「萬里會」，取鵬程萬里之意。

同班的宮崎絹子在神戶車站附近經營日式料理餐廳「三輪」，我們的同學會經常在這裡舉辦。宮崎另外還在鈴蘭台經營養老中心，我和同在若杉班級的栗原富濟子和石井初幸曾一起到那裡去慰問老人家。最近收到了石井的訃聞。

聽說若杉惠老師逝世前，若杉班級的女同學前往醫院，師生悲傷地哭成一團。

女生和男生一樣，共有四個班級。我依稀記得各班長的名字。末積和子也是其中之一，家裡在大丸前開裱框店，可說是運動會的大明星。是相當有名的接力賽跑選手。

也像班長般優秀的久萬幸子，音樂方面的長才非常出名。我的孫女從幼稚園開始，就在久萬的學生開設的音樂教室學鋼琴。久萬的哥哥是上兩屆的學長，之後成為阪神電鐵的社長，也當過球團老闆。哥哥曾向妹妹抱怨阪神隊實在是太弱。

——那是哥哥你不怎麼懂棒球吧。

妹妹這樣回答。

我現在偶爾還是會感嘆，如果沒有空襲，市民的生活沒有被摧毀得那麼淒慘，現在日本各地已經發展出更具特色的區域社會了吧。我參加大阪外語的入學考試是在昭和十六年的二

月。需搭乘省線（鐵道省的路線）到大阪，再從那裡轉搭城東線。現在城東線和西邊的鐵路連結，稱作環狀線。

大阪外語位在天王寺區的上本町八丁目。搭乘城東線到鶴橋後，再從那裡轉搭近鐵，只要一站就到上本町六丁目了。當時，近鐵周圍的鐵路是「大阪軌道」，簡稱「大軌」。上六是最終站。從上六步行到位在上八的學校。

我有時候不在鶴橋轉車，而是在下一站的桃谷下車，再走到位在上八的學校。比起從上六那個路線，是稍微（大約晚五分鐘）遠了一點兒，可是因為轉車太麻煩，入學考試之後我大都是選擇這個路線。因為是去上學的，並沒有閒工夫搭訕女生。

大阪外語的印度語科有十五個名額。這只是表定的名額。一年級大概有十五個人，一升二的時候，每年都會有學生留級，因此有些一年級是留級生。我們那年入學也才十二個人。

\*

當時五年制的舊制中學當然不是義務教育。就連小學的高等科也不是義務教育，念完尋常科的六年，就去做學徒的以農村出身的學生居多。

在大阪外國語學校教國文學的吉田教授開始講授井原西鶴之前，正襟危坐地對我們說：

——希望各位不要忘記你們的背後有二十五位勤勞的青年。

應該是根據當時的統計，大約二十五人中有一人從舊制中等學校（中學、師範、商業、農業等學校）畢業後，會升學到上級的學校。

我們「外語」的學生要跟隨兩位優秀的國文學者，吉田老師跟另一位長谷川老師學習「國語」。這是一件相當幸福的事情。

大我兩屆的庄野潤三、小我一屆的司馬遼太郎（福田定一）等，都是這個時期從大阪外語畢業的作家。

外語也有文藝部的組織，曾出版名為《咲耶》的雜誌。這名字大概是取自《古事記》中也能讀到的神話故事《木花咲耶姬》。到了我們的時代，或許是因為紙張不易取得，並沒有發行雜誌。

我當時並非文學青年，沒有參加文藝部。不只是我，日後成為職業作家的庄野潤三和司馬遼太郎，沒有一個人加入過文藝部。一般都覺得很不可思議。我只是因為當時在畫畫，也忙於其他事物，加上從神戶通勤上學很耗費時間，才沒有參加任何的社團活動。

我入學時，日中戰爭已經邁入第四年。「大東亞戰爭」，也就是主攻美國的「太平洋戰爭」

尚未開始。

當時，台灣航線算是日本國內線，所以往返基隆、神戶的船不需要通過主稅關即從中突堤<sup>2</sup>出發。其作法如同沖繩與別府航線。下船的地方在海岸通四丁目，和位於五丁目的我家非常接近。要到東京的人大多數會在神戶停留一晚，或是當天搭乘夜間巴士前往東京。我家偶爾也會出現這樣留宿的客人。好幾位親戚或是父親朋友的小孩在考試期間住在我家，多年後回台灣時還常有人向我道謝：

——我學生時代，往返台灣時常受到你們家照顧。

像這樣的客人以前大多是我年長的人，我進入大阪外語就讀後，為考試而來的同鄉子弟中，與我同年的年輕人漸漸多了起來。同鄉的吳建熹，我們父親是同窗；遠親的何既明<sup>3</sup>和吳建熹是台北二中時的同學，和我的表姊月雲也是親戚。與他們來往，我多少也能勉強了解一些故鄉的狀況。

與同鄉的人來往，然後在學校念外語，開始對印度和西亞產生興趣，我的世界逐漸寬廣起來。

台灣實施志願兵制度是從昭和十七年開始。這件事刊登在報紙上是前一年的六月。於太平洋戰爭前夕開始宣傳，開戰之後正式實施。詢問台灣的學生此事，他們會這麼說：

——這種事早就知道了啦。前陣子韓國才開始徵兵，大家都覺得台灣一年內也會徵兵。雖然志願兵也是軍隊，待遇跟軍隊大致相同吧。但只是名義上的軍隊，實際上根本就是軍夫<sup>4</sup>。此時發生了納粹的副元首赫斯駕駛飛機前往英國的奇怪事件。

學校即使已經過完暑假，英語科和俄語科教室中漸漸不見三年級學生的身影。

——被軍隊徵召了。

就是這麼一回事。

是發布了封口令嗎？關於這件事情，大家都三緘其口不願多談。

看來軍隊在此刻已決意要對美國開戰了。軍令部委託年輕且閱歷鮮少的外語科學生解讀暗號或審查通信。

恰巧這個班級有庄野潤三，當時也被軍隊選上了。不過他打算升學到九州大學，軍隊也尊重他的想法。

俄語科的學生也被分派了審查信件的工作，但是用俄文寫的信並沒有那麼多吧。應該是如果只徵召英語科的學生，很明顯是要對美國開戰，所以作為障眼法，才一同徵召了俄語科的學生。

雖然對英美的戰爭尚未開打，可是從這些生活周遭的事物就可略知開戰的可能。

——即將佔領鄭州。

這則新聞刊登出來的時候，我是這樣想的：

（搞什麼？原來還沒佔領鄭州啊。）

日本軍的佔領地還只是「點與線」，完全沒有擴大的趨勢。大陸戰線到這局面，已經沒有退路了。

雖說在台灣實施志願兵制度，可是一旦實施，「志願」只是空有其名，任何人都清楚實質上是「強制」徵兵。

台灣的年輕人即使不是志願兵，也會作為軍夫被派到大陸戰線，尤其是華南地區。

（等我二十歲的時候，台灣就會有徵兵制了吧？）

當時我才正要滿十八歲。

感覺像是在倒數自己的死期一般。

明明還年輕，卻相當珍惜每日每夜。當時的年輕人應該都是這樣想的吧。

那年夏天，泰戈爾逝世。他的著作多為孟加拉語，大部分被翻譯成英文。我讀過他的《戈拉》英譯本，這可說是我與印度結緣的開始。

以印度為背景的电影《雨來了》上映時，我還記得自己莫名感動，劇情卻都忘記了。

國外電影不再上映，《華府風雲》(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被稱作最後一部國外電影，

雖然劇情我也忘記了，但記得自己感動不已。看來這時期的我是個非常容易感動的人。

本庄咖啡館在距離我家五分鐘路程的地方，利用高架橋的下方經營電影院。我記得叫做本庄電影院，票價非常便宜，上映些有名的西洋老片。

熟悉學校後，偶爾上學途中翹課，從鶴橋轉搭往奈良的電車，到古都散步。

昭和十六年的十二月八日，日本向美國宣戰前夕，還算是有那麼點悠閒。雖然物資逐漸缺乏，但對我來說都是珍貴的青春日子。

我是在上學途中得知宣戰消息的。從賣菸小店的收音機傳來尖銳的吶喊。從桃谷到上本町的途中，先察覺到收音機聲音的是馬來語科的牛尾。他是我從神戶一起通學的朋友，畢業於神戶二中。現在翻閱名冊，牛尾正幸也在死者欄位中。戰後我與他見過幾次面。我搭船往南返台時，還說不久後會去拜訪他。最近我常看電視轉播足球比賽，每次看足球時，我總會想起曾是足球選手的牛尾。

## 戰爭的序幕

我倒是記得非常清楚，宣告開戰的那一天。全校師生被集合到禮堂。

和美國或英國打仗代表什麼意義？稍微思考就知道是非常嚴重的事。無法想像進攻到華盛頓或是倫敦等地。

奮力作戰、達成和解——光思考這個就精疲力盡了。

這一天某教授在教室裡對學生說：

——這是一場敗仗，各位，請好好保重身體。戰爭結束後才是各位發揮本領之時。

傳聞散布開來。當場聽到這發言的學生，並無任何一人走漏風聲。或許是為了保護那個教授吧。在那個時代，這種事被公開的話，是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最近在同學會的雜誌上刊載了學生談論親耳聽到的教授發言。即使不少人聽過那「反戰言論」，走漏消息的程度也僅止於傳聞而已。雖然在場的學生立場不同，保護老師的想法卻是一致的。

集合到禮堂時，有不少學生因亢奮渾身顫抖，這或許可以形容成一種武士精神。不過，大家都認知到事態的嚴重性。

從這年開始，畢業提前到十二月。雖說全校師生在宣告開戰那日在禮堂集合，但是因為英、俄語科的三年級生被徵召入伍，也不知道有沒有來集合。我們在國立學校中，是學生人數最少的學校之一。大阪外語因為是三年制，規模比四年制的東京外語還要小。

現在計算當時名冊中全校的總人數：

華語二〇五 蒙古語四十八

馬來語六十二 印度語三十三

阿拉伯語二十 英語九十三

法語七十三 德語七十

西班牙語六十五 俄語四十六

這就是全部了。華語科每學年編成兩班。阿拉伯語科是從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開始招生，所以沒有三年級。

雖說是全校師生，總人數只有七一五人，東洋語科共三六八人，西洋語科共三四七人。

我們印度語科有三十三人，其中三年級有六人，二年級有十四人，一年級有十三人。

三年級人數特別少是因為留級生很多。他們幾天後將從學校畢業。僅僅六人的三年級學生中，細野英一常與我聊天。細野是印度語會話的名人，他常跟印度出身的瓦爾瑪老師交談，我們都相當欽佩他。只是細野的手風琴演奏比他的印度語還要厲害。

說起來，身為學弟的我會與細野熟稔，是因為常在神戶的元町遇見他。細野在元町二丁目的樂器行教手風琴。雖然年經，但老師畢竟是老師，可不能穿著學生制服。在元町遇見時，細野總是穿著和服。

學校的軍訓課時，細野擔任小隊長或中隊長，拔出軍刀指揮的樣子很適合他。他當時是個英俊的長臉摩登男孩。

大約在細野面試上關西塗料後、去當兵前，我曾與母親一同在路上看見穿著學生制服的他，只與他交談了一兩句話，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

細野少尉殉職於緬甸戰役<sup>1</sup>。

在外語即使同樣是三年級，按照在校年數的不同，特意分別稱作第五學年三年級、第四學年三年級。細野只是正規的第三學年二年級，二年級的六人當中，第三學年只佔了半數三人。另外三人是第五學年三年級。我們甚至沒有第四學年三年級。

入學時的新生歡迎會上，三年級的中尾毅這樣自我介紹：

「我是第五學年三年級的中尾。」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奇妙的頭銜。

中尾從府立北野中學時期就以劍道聞名。我們進外語的時候，中尾已是劍道五段的箇中好手。

——要是我畢業，外語的劍道就會沒落，所以我只好留級啦。

中尾是這麼解釋的。

山田榮三和細野同樣是第三學年三年級生，在運動方面稍有知名度。山田是陸上競技的選手。但是根據中尾的描述，路上競技即使沒有山田也無所謂。雖然山田很優秀，可是並非頂尖人物。

之後軍方選了大量的海軍預備生，不過在日本宣戰前，選的人並不多。山田被錄用為海軍預備生，畢業後馬上就去當兵了。

因為印度語科學生總共才三十多人，即使集結在禮堂，也只是在一個小角落聆聽宣告。我相當意外站在我旁邊的山田渾身顫抖。

山田在海軍做到中尉還是大尉，似乎是專門負責教導預備生。

戰爭結束後，山田進入朝日新聞社工作，在政治部擔任記者，當佐藤榮作<sup>2</sup>如日中天時，專門負責追蹤佐藤，印象中他還在新潮社出版過佐藤榮作評傳之類的書。我從最近的名冊上得知他已過世。

我剛入學時的「三年級」共六人，已無一人在世。根據同學會的記錄，有首歌曲名為〈印度語科之歌〉，因年代久遠疏於傳唱，已被眾人遺忘，最近又被「挖掘」出來。

青史物換星移幾度秋

浪濤 澎湃的印度洋

恆河的潮水悠遠細流

今朝依舊打入昨日岸

菩提樹下栽培後學

探究淵博的印度思想

學子們，奮勵自強

昭和十六年，若松喜彥所填的詞。我入學時歌曲已經存在，可能是入學前一年的學生祭上創作的曲子。填詞的若松大我一屆，作曲者則是殞落於戰場上的手風琴名人細野英一。



\*

當時，大阪外語的印度語科主任是澤英二教授。「學究」說的正是像教授這樣的人，正面意義的不諳世事。

在這「時局」輕易介入學問世界的時代，教授瀟灑地擋開了那些事。這樣的時代，能被這樣的老師指導，真是我們的福氣。

學校方面也沒有依循時勢，而是應付了事。

被分派到大阪外語的駐校教官金田大佐是個勇猛的人，在畢業時送了我們幾句話。

——諸位知道貞操和命哪個比較重要嗎？答案是命。原因請諸位自行思考吧。

他說了這些奇妙的話。

雖然宣告開戰時一度緊張，新學期終究開始了。庄野潤三畢業，我們升上二年級，一年級的新生也入學了。

這年入學的新生有司馬遼太郎（福田定一）和以前衛俳句著名的赤尾兜子<sup>3</sup>。這些人而後成為我終生的摯友，不過那時我們的科別不同（司馬念蒙古語，赤尾念華語）。因為學校規模小，常常碰面。這個學校可略分為東洋語科和西洋語科，同為東洋語科，法律、哲學、國

文、歷史、地理、會計等一般科目是共同上課的。軍事訓練等課也不分科別、學年編排部隊，尤其像印度語或蒙古語等小科只是不斷被打散重整。福田定一人很早就因辯論才能成名。

「那個男人簡直是話術的天才。」

眾人皆對其相當欽佩。

升上二年級後，稍為鬆懈，我與同學年的間島正夫在大和平野<sup>4</sup>到處遊蕩。當然也翹課過。

那天是四月十八日。雖然新學期已經開始了，可是常常停課，甚至有些教授沒有好好準備教課內容。既然如此，我們乾脆自行停課好了。

詳細的情形記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地記得昭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這一天。

杜立德少佐麾下十六架轟炸機從美國的大黃蜂號航空母艦起飛，襲擊日本。其中一架轟炸機派來神戶進行轟炸。空襲發生在白天，正巧是午飯時間，我和間島在大和平野吃飽喝足正躺著休息。如果沒有此次美國的首次空襲，我一定忘記戰爭中喘了口氣的這一天。

新學年開始的季節，從台灣來的考生紛紛借宿我家。雖然是每年都有事，但今年的住客大都與我相同年紀。我是年頭二月出生的，跟在台灣剛念完舊制中學五年級的人大約同年，很談得來。

父親小學（在台灣稱作公學校）同窗的兒子正值考生的年紀，這年吳建熹來到我家借住。

他和我家店裡工作的年輕店員蘇君跟李君是小學同學，因此我們很聊得來。和吳建熹是台北二中同窗的何既明，也因這層關係成為我家的住客。

深聊以後發現何既明和我家是遠親關係。這在台灣是相當常見的事。這時期正面臨考試，他們沒有餘暇時間，但在考試結束後還是會利用暑假等假期來我家玩。我們暢談了許多年輕人之間的話題。

我們的話題也包含了我的故鄉台灣。他們在殖民地台灣遭受各種差別待遇。我出生於日本，沒有直接感受到類似的差別待遇。能夠聽這些生活在台灣的台灣人分享經驗，真是受益良多。

何既明告訴我許多事。我如飢似渴地向他吸取關於台灣的知識。他後來升學到醫學部，但似乎對政治也相當感興趣。也可能是身為年輕人，所以擁有強烈的正義感。

大阪外語在那時候才創校二十年，朝鮮出身的學生相當多，相較之下，我是出身台灣的第一人。不過之後小我一屆的楊克智就進入華語科就讀。他跟司馬遼太郎和以俳句著名的赤尾兜子是同學。楊克智畢業於台南一中，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是個喜歡音樂的老實人。

在外語有所謂選科生的制度。大多是畢業生才會用此制度，例如從英語科畢業後選修華語科。這類學生只聽講語學課程。更早之前，東大畢業的石濱純太郎（作家石濱恒夫的父親）

也是蒙古語科的選科生。

我入學外語的那年，神戶華僑廣東人陳德仁以選科生的身分進入華語科就讀。他比我年長六歲，是位白暫的英俊青年。我們姓氏相同，又都從神戶通學，因此常被認錯。

我後來才從華語科的老師那得知他為何成為華語科的選科生。在外語各個科都有兩三個兼修語（在別的學校稱為第二、第三外語）。兼修語不一定要非常精通，只要學習初步的知識，以便將來需要之時能夠馬上精進。比方說，我就讀印度語科，我的兼修語是波斯語。當時，華語科兼修的語言有蘇州語，也就是俗稱的上海話，華語科而後計畫將廣東話也列入兼修語。德仁兄精通日語（他的母親是日本人）和英語，學校希望他能擔任廣東話的講師。不過德仁兄給學校的答覆是，學生大都學習北京話，自己從沒正規學過北京話，所以沒有自信能勝任講師。對此，學校提議，讓他先和日本籍的學生一起學習北京話三年，德仁兄接受了，成為選科生進入大阪外語就讀。

於是陳姓二人組的我們就成為了同學。他那時候二十五、六歲，家裡在南京町上經營小有規模的餐廳「博愛」，已經結婚了。為了區分兩個陳同學，有時候大家會稱德仁兄是「已經有太太的那個陳同學」。

昭和十七年上半年是大東亞戰爭的序戰，前一年的聖誕節前夕攻下香港之後，目標在同年

的紀元節<sup>5</sup>（二月十一日）前拿下新加坡，但是戰況陷入膠著。直到二月十五日英國的軍事特使才舉白旗投降。

日本沉醉於序戰的勝利，沾沾自喜。但是四月時杜立德的首次空襲潑了日本戰勝氣勢一盆冷水。

其後日本的戰局情勢直走下坡。美國以往的作戰模式是戰機從航空母艦起飛後進行空襲，再飛到位於中國的基地，但在奪得馬里亞納基地後，改為往返型的作戰模式。

## 越洋的人們

為何台灣的年輕人要飄洋過海前來日本呢？當時的說法不叫作日本，而叫作「內地」。

橫渡海洋稱作——過鹹水。

此說法包含了許多意思。

鹹水是指海洋，不是河川或池子的水。對大陸的人來說，台灣的人是「過鹹水」的人。

這俗稱有著經驗豐富、知曉廣博世界的意思，但是也含有負面的語意。是指熟知世事、不容輕忽的人。

——從台灣來日本可說是過了兩次鹹水呀。所以認為你們無所不知，做任何事情都不會大意啊。

我曾經被這樣講過。或許是半開玩笑的嘲弄吧，但我已覺悟到，必須認清自己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並生存下去。

台灣有台北帝大附設的預科。在台北有醫專或舊制的台北高校，也有高等商業學校；台南

有高等工業學校。主要城市都有師範學校。

台北帝大創校的時候，台灣還有反對人士跑到帝國議會請願。請願團體的人來到神戶時，我的父親與他們會面並問道：

「為什麼台灣人要反對在沒有大學的台灣設立大學呢？」

他們的代表回答：「台灣的居民必須以稅金承擔設立大學的費用。即使大學蓋好了，能入學的也主要是內地人（日本人），台灣人除非成績特別優秀，否則就無法入讀。從過往的前例都能清楚地推斷出來。我們是反對只叫台灣人出錢。」

這是我剛出生時的事情了，台北帝大的創校是在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果不其然學生大多是內地人。台灣人不會就想讀這所大學。光是入學考試就有相當大的差別待遇。

因此，台灣的青年「負笈」橫渡鹹水。內地的學校不管你的故鄉為何，都不會有差別待遇。即使到了昭和十八年，在考試期間，台灣年輕人還是會飄洋過海而來。不過其人數和去年相比是少了些。

美國的潛水艇終於開始在東海出沒，往返台灣、日本越來越不安全。

何既明在入學那年的暑假應該曾經返鄉。他寄給我穿著制服、戴著學校帽子在台北公園拍的照片。不過，接下來的春假就不知道他有沒有回去了。越來越多人取消了乘船的計畫。

台灣姑姑家中發生了嚴重的問題。是關於姑姑的獨身女兒月雲的婚事。

月雲姊比我哥哥年長兩歲。比哥哥小三歲的我當時也快二十歲了，所以她那時應該是二十五歲。已經快超過適婚年齡了。

姑姑相當緊張。但是就算有人上門說媒，姑姑怎麼勸說表姊，她也不肯去相親。

——我不想住台灣。

最後表姊明白說出了這話。

——那日本就可以嗎？在日本也有妳伯父的家人，最年長的篤臣年紀還比妳小呢！妳能接受嗎？

聽說母女倆在台灣時還討論到這種事情。

在當時大家都嚴格遵守同姓不通婚的規矩。科學上也證實應該盡量避免近親結婚。雖然血緣相近，可是姓氏不同，就別管那麼多考慮一下吧？這種想法還是很奇怪。

父親的妹妹幼嫁到徐家，生下月雲。雖然血緣關係非常接近，可是月雲姓徐，兩家結婚並無大礙。

只是姑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月雲姊其實已經有戀人了。而且那是很早之前就開始的緣分。在我中學二年級返鄉時，聽

說月雲姊「正在戀愛中」。她的家在舊仔林，位於新莊城鎮外圍，是個荒涼的地方。明明是鳥不生蛋的地方，卻聽說有年輕的男人騎著腳踏車在附近徘徊。大概是為了見漂亮的月雲姊一面吧。

當事人表姊從台北二中畢業後，與升學到滿州醫大的余錫乾互許了未來。這才是不想住台灣這句話背後的本意。只有她的父母親不知道。

當時在滿州有位台灣籍姓謝的人擔任政府的閣員，因為這層關係有幾位台灣籍的人居處要職。余氏的父親是其中一人。余錫乾之所以志願進滿州醫大，其實是因為余家住在新京（改稱後的長春，滿州國的國都）。

他的父親余逢時效力於滿州國政府，在台灣是位書法家，是無人不知的名士。

他原本字跡潦草，後來奮發圖強，每天拿筆沾水練習書法，終於成為稀世名筆。

姑姑還倉皇失措地求神拜佛占卜女兒的未來，可是月雲姊的心意已決。

「不管是搭潛水艇還是什麼，我都要到滿州去！」

表姊毅然決然地拒絕了姑姑。

——一個獨身女說出這種話，大部分的人應該都不會當回事吧。因為一直是嬌生慣養的。父親丟出這樣一句話評論月雲想到滿州的意志。

前面提到我的刎頸之交何既明與我們家族是遠親，其中的關聯正是月雲姊他們徐家。這件事發生在我提前從大阪外語畢業的時候。昭和十八年下半年，日本近海的浪越來越大，平靜了。

＊

也有人跟月雲姊相反，想從日本前往台灣。

不用說，台灣在當時是日本的領土，可是住在那裡的人並不被認可為真正的日本人。在入學考試的敘述中也有提到，差別待遇是很嚴重的。

也有因差別待遇反而僥倖逃過一劫的事。那就是我們沒有國民義務「兵役」的問題。對純血主義的日本來說，他們無法放心與指揮台灣籍的士兵。

不過有軍夫這個制度。如同字面意思，軍隊的勞夫。並不是士兵，只是被軍隊差遣的「苦力」。

雖然稱作志願役，其實是強制分派數人至各郡公所。發生事變後，軍夫被送往中國各地戰線。志願入伍（實質上是強制徵用）時，也會像內地出征士兵一樣，為他們舉辦送別會。

我至今還記得一段送別軍夫的歌曲。

紅色帶子，榮譽軍夫

興高采烈，我等日本男兒

這是改編自台灣的天才作曲家鄧雨賢創作的〈雨夜花〉其中一段。真是哀憐的曲子。

台灣在小磯內閣<sup>1</sup>時正式發布徵兵令，於昭和二十年開始實施。不過，軍人的志願役（不是軍夫）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大學高專在校生的延緩入伍被取消，日本籍的學生以學徒出陣名義入伍時，台灣籍學生雖非徵兵，也被迫穿起軍服加入志願役。

我因為提早畢業所以已非「學生」，但是在大阪外語小我一屆的楊克智正是以此身分加入軍隊。與他同期的司馬遼太郎為學徒出陣兵，最後兩人在同個軍營學習軍事。

雖然不清楚全國有多少台灣籍學生符合這身分，不過光是關西地區就約有三十餘人。從台灣來的學生總是最先往東京發展，想必關東地區的學生是關西的數倍之多吧。

軍方當局將關東的數百餘人分散至日本內地的各個連隊，將關西地區的三十餘人送往台灣，讓他們在故鄉土地的軍營進行訓練。

大學高專畢業的學生在學校已經接受過軍事訓練，入伍之後考上幹部預備生的人想必不在

少數。

這只是我的推測而已，軍方當局應該無法和顏悅色地歡迎這些從台灣誕生且為數不少的台灣人教官。日本人身為殖民地的統治者，卻被台灣人教官指揮，一定會有日本人感到不愉快。

軍事當局苦惱於低階教官不足，所以將台灣人教官分散配置到日本內地的軍營，這對他們來說是絕妙的主意。三十多人已經不算少了，卻還有幾名好不容易返鄉的台灣人，以接受特殊訓練的名目被帶回日本。

總而言之，就讀關西地區大阪外語的楊克智與三十多名夥伴一同回到台灣入伍。

當時，在神戶有台灣同鄉會，我的父親擔任那裡的副會長。同鄉會為返鄉入伍的學生舉辦了小小的送別，我記得送別會上擺放了大量的白色印花布。這布是已經很難取得的物資，似乎是個會員大量囤積的。

我甚至到大阪港送別大家。我父親委託搬家行將楊克智寄宿在我家時的個人用品寄送到他台灣的家。戰後，聽楊克智說東西都有平安回到台灣。美國的潛水艇出沒越來越顯頻繁，不用說行囊了，連個人的安全都有疑慮。

我在大阪港送走三十多名台灣人學生，之後聽他們說那艘船並不是開往台灣，而是開到九州的門司港後，再搭乘別的船去台灣。

他們暫住在門司，左等右盼，就是等不到指定的運輸船。這事當然也是戰後我返鄉時從楊克智那裡聽來的。

某日，等得不耐煩的領導下達指令。

——今天允許大家自由活動。

卻偏偏在這節骨眼，引頸期盼的船隻靠岸了。大夥趕緊召回散在宿舍附近的學生，但是獨不見某人蹤影，最後整隊的人都沒搭上該船。

那某人就是楊克智。喜愛音樂的楊克智覺得入伍後，大概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聽音樂，所以跑到較遠的一間「音樂咖啡廳」，安靜地欣賞了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

找不到人並不能全怪楊克智，找人的那方也有過失，他們允許學生自由活動是不爭的事實。大夥指責他。

——都是你害大家來不及搭船。

雖然楊克智並未違反紀律，可是他依然感到內疚。想必內心一定認為自己給大家添麻煩了。

回到台灣後，大家反倒感謝起楊克智。

——多虧楊同學那麼喜歡音樂，我們才撿回一命。

一般船被潛水艇擊沉是軍事機密，不會對外公開。但是到達目的地後，會耳聞其他船的命運。

三十多名台灣人學生原本預計搭乘的船開出門司港後不久，就在對馬海岸被美軍的潛水艇擊沉，幾乎全員喪生在狂濤駭浪之中。

戰爭下，搭船就像與死亡為鄰，命運操在上天手中。

命運當前，人人平等。大約同個時期，月雲姊已飄洋過海，抵達滿州。台灣人學生也橫越同個海洋前往故鄉。之後選上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當時也在三十多名關西組的台灣人留學生中，這也是楊克智日後告訴我的。

李登輝就讀京大的農學部，想當然也在名單之中。我曾與這些學生接觸，目送他們的船離開，所以應該與站在三十多人中的李登輝有一面之緣，只是我對此沒有特別的印象。

去送他們的只有我一個人。剛好楊克智寄住在我家，又是小我一屆的學弟，其他人應該也無親人，所以我當時想代替他們的親人目送他們離開。

我們沒有高喊萬歲，也沒有高唱送別的歌曲。畢竟他們是要返回台灣入伍的，我還以為會有熱鬧的歡呼聲呢。

無論如何，當時我只祈禱他們的船程一帆風順。那時才剛收到月雲姊抵達滿州的音信。

## 上八時代

要報考舊制高專的高等學校，修完舊制中學的四年課程即可，也就是俗稱的四修。若要報考專門學校，則必須修完舊制中學五年課程，也就是一定要畢業才行。高工、高商、高農、音樂、美術、外語等學校無一例外。

外語專門學校除了東京外語和大阪外語，其他只有私立的天理大學。東京外語是四年制，我們大阪外語是三年制。學校常舉辦東西外語學校的運動比賽，少一年學生的大阪外語比較吃虧。

我們真正享受到大學生活是在戰爭開始前，前後不到一年。如今回想起來，一直到畢業前夕的生活都算悠哉。

我時常被問到什麼時候開始寫小說。以前是很喜歡寫作，不過沒有寫出「小說」程度的作品。我只是會將虛構的人物描寫進日記罷了，這是我寫小說的其中一種做法。成為小說家之後，也常以虛構的「我」的口吻來寫小說，尤其常用在短篇小說，但這並非「私小說」。我



的風格是讓我以主角或是敘述者的身分登場於虛構故事。

大阪外語時期的日記裡頭描述的雖然大部分是事實，但是偶爾會有奇妙的人物登場。只是連我自己也覺得這是本奇怪的日記，所以沒有保存。

雖然我喜歡寫作，但是我更喜歡看書。夏目漱石的作品帶有中國文人氣息，我很喜歡讀。畢業後就留在母校的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名稱為「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奇妙的是，這間研究所雖然隸屬於大阪外國語學校，預算並不是由文部省核發，我的薪資是由外務省給付。而且還不是來自正式機構，恐怕是以捐款形式支付。似乎是來自於那有名的機密費。

學校委任我，但是份不給薪的委任，我的薪水是從外務省的口袋掏出來的。

我還記得學校當時給我的解釋：

——如果不是任職於國立學校，就可能被徵兵。

我的工作編纂印度語的辭典（印日辭典）。只是處在戰亂之中，不知何時能夠完成。除此之外，研究所當時也計畫編寫阿拉伯語辭典，外務省還比較期待這本辭典出版。

在我入學前一年，大阪外語的阿拉伯語科才剛起步，此時，科主任中野英次教授病歿（他是德語科的學長，曾到開羅留學），無人能指導學生。當時懂得阿拉伯語的只有外務省幾個專職人員而已。這些人因為戰爭回到中央機關，大阪外語請他們每人一星期接替擔任講師。

這樣的因緣下，才與外務省有了連結。

澤主任告訴我：

——你不來學校也沒關係，可以在家裡工作。如果有問題想請教瓦爾瑪老師，累積十天分再來問也行。

雖說是研究所，可是既沒有建築物也沒有辦公室。在這提早畢業及義務勞動的時代，教室被占用是常有的事情。

我負責向印度籍的瓦爾瑪老師請教印度獨特的風俗及用語。在巴基斯坦與印度分別獨立之前，印地語和烏爾都語尚未被明確區別開來，只大略統稱為印度斯坦語。當時有名叫布拉茲的人編寫的辭典最具權威，因此我們依據他的辭典編纂。

我最想向瓦爾瑪老師請教的語彙，布拉茲的辭典中也有記載，但是不知為何解說不是用英語，而是拉丁語。很快我就明白了，因為那些語彙是羞於明說的猥褻用語。

舉例來說，後宮佳麗使用的「某樣物品」，這樣物品是兩人使用。宛若高僧的瓦爾瑪老師仔細地向我解釋：

——你知道保險套吧？印度不是用保險套，而是用動物長長的腸子。不能太容易破，袋子也可以，只要是細細長長的東西即可。將硬幣放入腸子中，要放很多喔，動一動，然後弄成

彎彎的。倒入熱水也可以。在後宮除了 eunuch（宦官），沒有其他男性，所以兩個女人一起使用。日本有這樣的物品嗎？

——從來沒聽過用硬幣解決。

我思考該如何用日語解說此物。這類語彙的解說多數以拉丁語寫成，我也曾考慮是否該為此去學拉丁語。

印度文學與中國文學在房事方面的描寫有極大差異。相對於印度的落落大方，中國除去極少數的例外，都是盡可能隱晦。印度語關於房事的詞彙相當豐富，因此印英辭典中的拉丁語氾濫。

瓦爾瑪老師知道我來自殖民地台灣，所以對我特別感興趣。印象中老師是勒克瓏出身，生於印度的英領時期，同樣身為殖民地人，才對我感覺特別親近。

在大阪外語念二年級的時候，我曾用相機拍下瓦爾瑪老師授課時的樣子當作畢業紀念。

老師熱心地指導，可是學生卻心不在焉。只要一開始上課，一定會有幾個學生舉起手說：

—— Pasaḍa。

Pes 是「前面」、eḍa 是「水」，也就是「小號」的意思，老師只有點頭答應的分。去上小號的那夥人直到下課都不會回來，因為已經在上課前點過名了。看來我們對老師太過任性了。

拍照的時候，老師在講壇上擺出姿勢，似乎想起了什麼，還在黑板上用粉筆寫了幾行烏爾都語的句子。或許老師認為是拍上課時的樣子，黑板上要寫些文字比較好吧。

——日本會在這場戰爭中獲得輝煌的勝利。

黑板上寫著這行字。

相片上的學生像在說著「Acchā」，這句話有點像是華語的「好！」。這張相片如今已不在我手邊，拍照的人是鈴木富二郎。

畢業後在研究所工作的時代，瓦爾瑪老師曾從懷中拿出裝有那張相片的信封，他取出相

片，盯著我說：

—— Mr. 陳，你最好也要像這樣多加小心，不知何時會被憲兵抓走呢。

我已忘了他是講烏爾都語還是英語了，只記得僅有「憲兵」兩個字是日語。

—— Śukriyā — (謝謝)

我用烏爾都語向老師道了謝。

\*

因為提前畢業的關係，我們就讀大阪外語的時間約兩年半，從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

四月至十八年九月底，但是我畢業後又留在研究所工作，所以往天王寺區上本町八丁目通學通勤了大約四年半。然而，校舍於昭和二十年三月十三日的空襲中，除了圖書館書庫外，全部燒毀了。

研究所沒有固定的空間，可以在自己家中作業，但是我希望書籍隨手可得，所以借用了圖書館辦公室一角，放置了辦公桌。

我並非向校方領薪水，所以不用支援任何校務，直到圖書館長從大平賴母教授換成金子二郎教授：

——為了學弟妹，你也做點什麼事情吧！

於是之後由我負責介紹新進書籍。即使當時物資缺乏，學校依舊保管了大批高品質的紙張，用做人學考試的試卷。單面已被印上題目等等，但是因為昭和初期，只有准考證號碼不會造成個人隱私問題。只要翻個面，就是難得的上等紙張。

金子老師將選擇新進書籍的職責全數交給了我。我當然先選擇畢業生的著作。

華語科的畢業生山內喜代美（昭和十五年畢業）翻譯了一位中國學者梁嘉彬著作的《廣東十三行考》，由日光書院出版，我推薦介紹了此書。

日後，我在寫《鴉片戰爭》時，必須調查廣東十三行，因此取得了台灣東海大學再版的《廣東十三行考》。

東十三行考》。

原作者於後記寫到，戰後不久來到台灣，在書店發現了日語翻譯的《廣東十三行考》，就買下來了。他驚訝書中附有原著沒有的參考文獻表，覺得這作法很有良心。另外，原著中引用歐語的時候，是直接引用原文，山內氏將其全部翻譯成日語。原作者梁氏畢業於清華大學，之後到中山大學、東京大學從事研究，因此，他清楚翻譯多麼精準到位。梁氏也很想知道究竟譯者為何許人也。總之，這本書於昭和十九年出版，梁氏於隔年終戰不久後，在台灣的書店買了這本書。

翻譯本中只簡單寫到譯者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學校，現任彥根高等商業學校助教。

昭和三十四年，彥根高商（現滋賀大學經濟學部）才將調查結果告知梁氏。山內氏於日譯本出版的隔年（昭和二十年）到廣島當兵，其後音信全無，或許是在原子彈爆炸中身亡。

梁氏於闊別二十三年再版的《廣東十三行考》中，將山內氏為日譯本寫的日語序文翻譯成中文，附在書後。

中日戰爭開戰那年（昭和十二年二月）本書初版發行，終戰那年前夕（昭和十九年一月）日譯本出版，梁氏感慨萬分，將山內氏視為「天涯知己」，對他死於非命一事，哀嘆「悲夫」<sup>1</sup>。

我已不記得我是如何解說山內的譯本了。當時，大阪外語除了老舊的入學考試的紙張外，

也備有活字印刷機，而且還有日本唯一的波斯文字、阿拉伯文字的活字版。雖然也有印地語的活字版，但是用於佛經印刷的，所以並非日本唯一。

即使具備這些特殊文字的活字版，但是沒有檢字排版的專業人員。澤英三老師的《印度文典》雖然使用了這個活字版，卻是老師親自檢字排版的。如果不懂該語言，就算有活字版也無法排列組合。

我們三年級時，《印度文典》完成，由丸善出版，在戰時算是相當精美的裝訂書籍。我反覆閱讀了好幾回，書本已變得破爛不堪。其實在校對這本書的時候，也讓我們學生參與以求萬全。可是，書完成之後發現，madad（幫助）印成了mamad，我還記得當時懊悔的心情。

因為已經無法進口書籍，我們的教材全是謄寫本。二年級已經開始閱讀普列姆昌德<sup>2</sup>的小說。

澤老師讚譽普列姆昌德是「印度的菊池寬」，能夠寫出優異的純文學，其數量驚人的通俗小說也一本接著一本出版。這個印度的菊池寬窮困潦倒，因此必須大量創作通俗小說。

之所以窮困是因為讀書人口稀少。他的孟加拉語作品比烏爾都語或印地語的著作更為優秀。泰戈爾也是孟加拉語作家，可是多以英語寫作。烏爾都語或印地語的作家，仍舊無法吸引更多的讀者。

三年級使用的教材是烏爾都語版的尼赫魯自傳（《自傳》）。我在預習時讀到「tushima」這個單字，因為看不懂而感到困擾。這個單字出現在尼赫魯少年時期對日本在對馬海峽戰勝俄羅斯一事感到興奮的段落。印度語也像中文一樣，會在固有名詞旁標上符號，謄寫版卻忘了標記那個符號。再加上，印度使用的文字中沒有相當於is的字，都以i代用，因此令我困擾的「tushima」在辭典中是查不到的。

那時圖書館有很多稀有書籍，我盡可能地運用圖書館的資源。尤其是在研究所工作時期，因為辦公桌被我搬進了圖書館，彷彿置身於寶藏之中。

與中國相關的書都被我借走了。魯迅的書我也是跟圖書館借來讀的。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模仿岩波書店，出版了【萬有文庫】，我因而有機會訓練自己閱讀中文書。

我記得自己精讀了其中一本萬有文庫，許地山的《印度文學史》。許地山曾到英國和美國等地留學，學習了梵語。曾以落華生為筆名寫過小說。他任職於香港大學，參與過抗日運動，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前夕驟逝了。

我閱讀他的《印度文學史》時，他已經不在人世了，當時的我並不知道此事。

絕大部分的文獻皆記載他為福建出身，實際上他生於台南，在甲午戰爭後，舉家遷至福建。他的父親許南英也是台灣出生，是個考中進士的文人。

\*

我將學生時代和研究所助手時期合併稱為上本町八丁目時代。最後一年歷經校舍遭受空襲燒毀、日本戰敗，這些戲劇性的變化。我在寫自己的履歷時，時常猶豫該如何描述這段時期。前段也提過，研究所的經營是依靠外務省補助，不過終戰之後，外務省無法再以相同名目撥出費用，研究所便在隔年（昭和二十一年）關門大吉。

由於研究所關閉，我也離開原本的職位。澤老師原先安排我從助教升為教授，但是因為戰爭結束，我的身分發生了巨大變化。

甲午戰爭時，兩國不管我們台灣人的意願，將我們的國籍從清國變更為日本。五十年過後，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我們的國籍又被改回中國。這個變更依舊不管本人意願，強行實施。如果是私立學校，國籍根本不是問題，但是大阪外語是國立學校，因此產生了許多複雜的問題。

只要不是日本人就不能「任官」。外語有眾多的「受雇外國人」，這些外國人不出席教授會議也不要緊，但是不能干涉學校行政，薪水比起正式任職的教授還優渥。

澤老師做了相關調查後問我：

「你的想法如何？」

雖然我對研究生生活尚有留戀，不過我原本就沒自信勝任教書的工作。澤老師到退休前應該還有餘力培養後任者，我認為該是急流勇退之時了。

於是我回覆老師：「很抱歉讓您操心，雖然是令人難過的決定，但是我還有其他想完成的事情。」

這個答覆，或許也讓學校鬆了一口氣。

我歷經五年的上八生活便在此告一段落了。我認為自己必須更深入了解故鄉台灣以及中國的事情，所以決定等待傳聞中會於近期載台灣人返鄉的船。

那個階段的上八時代，多是讓我感到痛苦的日子，不過現在回想起來，也有很多令人高興的事情。因為畢竟是充滿可能性、青春的日子。可說是以空襲、終戰當作壓軸的黃金時代。

是我兼顧研究生生活及文學興趣的時期。前不久陳德仁過世了。他如期畢業後，一邊做大阪外語的廣東話講師，一邊做每日新聞社出版的《華文每日》的記者。但在終戰後，他不得不出來帶領華僑圈。他擔任華僑總會的會長和中華會館的理事長一段時間，對華僑圈來說，他是無可取代的人物。前陣子有人拜託我撰寫他的追悼文，我試著回想生前的他，發現他時常談論文學。他是川端康成的忠實讀者，曾表示有機會想自己翻譯《伊豆舞孃》等作品。他年

紀輕輕就必須主持華僑圈的公共事務，是因為上一代的領導者太過偏袒日本，還組了「華僑挺身隊」協助日本作戰，以至於戰後被僑界排斥。

我記得自己曾試圖說服熱愛川端的他重新評價夏目漱石。那時，中島敦在《文學界》發表了〈李陵〉，我為此感到興奮，但是德仁比較期待橫光利一<sup>4</sup>（上海）的後續。

在研究所裡工作的除了教授以外，還有川崎直一。我很快與川崎交好。川崎是位三十歲左右的語言學家，他日後因此成為大阪外國語大學的教授。在當時如果沒有從事像樣的工作，就有可能會被盯上。我印象中川崎因為懂阿拉伯語而進入研究所。懂阿拉伯語的原本有印度語的前輩伴康哉，不過他做到一半被徵兵了。伴康哉退伍後回到學校復職，後來當上教授，還翻譯了《古蘭經》。當時只有大阪外語正式教授阿拉伯語，阿拉伯語在歐亞大陸的歷史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常有京都大學的學生來聽講。

其中之一是藤本勝次，他在學徒出陣前曾到大阪外語拜訪，那時與他聊了一會兒。他退伍後成為關西大學的教授，和伴前輩一起翻譯了《古蘭經》。中央公論【世界的名著】中的《古蘭經》正是伴前輩、藤本以及後來成為大阪外國語大學校長的池田修三人一同完成的工作。

神戶有清真寺，我常去那感受伊斯蘭教的氣息。我想起曾和家住京都的鈴木富三郎一同前往，應該是畢業前夕。我在某個星期六拜訪位於京都的鈴木家，還參觀了河原町的天主教堂

的彌撒。鈴木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參觀清真寺和天主教堂，有種混合了學問與浪漫主義的氛圍。清真寺附設給土耳其韃靼孩童就讀的學校，有位叫姐修琪的美女老師在那裡用阿拉伯語教小朋友《古蘭經》。

大阪外語的印度語教學重點較偏向烏爾都語（穆斯林使用的語言）而非印地語，所以有濃厚的伊斯蘭氣氛。這時期日本也有發行《回教世界》及《回教圈》兩種雜誌，對相關方面有很高的興趣。

我和川崎一起逛過神戶幾間專賣西洋書籍的書店。在生田神社南邊有間「羅各斯書店」，那間書店的老闆和川崎是早稻田大學的同窗，每當川崎來神戶時，我們就會順道過去。那時川崎才剛出版《荷蘭語文法》，不過其實他是世界語者。川崎有個正要上小學的兒子，他以世界語中「人」的詞彙 homo（ホモ）為兒子命名。當時世界語正遭受打壓，川崎是個相當勇敢的人。但是到了戰後，homo 多指 homosexual，川崎ホモ一定很困擾吧。

石濱純太郎老師是關西的世界語靈魂人物。石濱老師從東京大學畢業後，進入大阪外語的蒙古語選科學習，與我們有深厚的交情。我和川崎每到星期四，就會到石濱老師的家中拜訪。星期四是石濱家的會面日。我們都在星期四前往，奇妙的是除了川崎與我以外，都不見其他客人。或許是因為戰爭也接近尾聲的關係。

我還記得在石濱家中談論關於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涅夫斯基的事情。他是大阪外語的俄羅斯語講師，更是世界知名的語言學者，他於一九二九年歸國後，任教於列寧格勒大學。只是過了不久，他就因反革命的嫌疑被逮捕。也有傳聞他已遭肅清了。

「希望他還活著。」石濱老師表情慘澹地說。之後證實了涅夫斯基已於一九四五年被處刑。涅夫斯基尚未完成的西夏語解讀，其後大部分由大阪外語小我四屆的西田龍雄完成，這也有段因緣。

石濱純太郎老師的長男恒夫日後成為作家，這時期他出征在外，跟司馬遼太郎同在戰車隊。

作家藤澤桓夫的姊姊是石濱純太郎的夫人，藤澤還是單身，總是待在石濱家，他曾自嘲：「我是食客。」

某次我們拜訪石濱家，看著藤澤君如同往常玩著撲克牌的一人占卜，他開口說：

「陳先生，我有事想拜託你。」

那時是昭和十九年末。

聽藤澤說，有一群喜愛文學的大阪人想出版輕薄的文學雜誌，或者是將幾本雜誌集結成冊。並非同人誌，而是要在書店販售的書籍，因此大家躍躍欲試。印象中雜誌的名稱是《新

文學》。藤澤拜託我：「如果有印度有趣的小說，可以幫忙翻譯嗎？小說或戲曲都可以。」在此戰時，不大容許出版文學雜誌。我馬上察覺到，介紹「大東亞共榮圈」文學是個掩飾的名目。

剛好我手邊有《時代》(Zamana) 這本烏爾都語的雜誌。

「那我就從這本雜誌中刊載的詩裡挑選吧！」

我輕易地答應了他。

當時藤澤已結束在《朝日新聞》連載的作品〈新雪〉，是文學界中的大阪新星，他成為《新文學》的強力後盾。

\*

要研究戰時的文化狀況，第一步必須先收集每個人的經驗。

我的經驗似乎太過悠哉了。即使如此，我日復一日逛著二手書店，看到書籍一天天減少，關門大吉的店家越來越多，也能感受到這個社會正邁向某處。

那個「某處」，應該說是「catastrophe」吧。我感覺到，現階段或許還能這樣悠哉，但是不可能讓我一直這樣下去。

接受藤澤請託的前後幾天，何既明從東京遠道而來。在他來之前，我也曾去了一趟東京。為了什麼事情已經忘了，但我去了文部省。

我記得在文部省內是和倉石武四郎老師同行，所以應該是為了大阪外語大陸語學研究所正在進行的「蘇州語研究」的補助金。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的資金來自外務省，本來應該和文部省沒有關係。

我現在拚命地想記起來，可是對於這件事就是毫無頭緒。大概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只是想找個藉口上京罷了。

在東京與何既明見上一面，也是我的「待辦事項」之一。

——日本不輸的話，台灣就沒有未來。永遠備受歧視。為了我們自己本身，也為了子孫，我們必須在這裡盡己所能。天下無不勞而獲之事，該行動了！該是行動之時了！

這是何的意見。

天下無不勞而獲之事，也就是說除了認同恐怖分子別無他途。我閱讀為印度獨立奮戰的人所寫的文章，都是否定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他們情緒上較偏袒蘇巴斯·錢德拉·鮑斯。的武力爭鬥或孟加拉的恐怖分子。我與何既明討論過這種事。

也曾經想要製作炸彈，聽說比想像中簡單。我們也討論過將炸彈放置於何處最具效果。

我們明明沒有製作炸彈，話題卻越演越烈，還說到東京戒備較森嚴，所以在關西周邊引爆較適合。

——如果決定在關西引爆，就由你負責。

何既明對我說。

何既明是醫學生，因此免於學徒出陣。台灣人學生中的東京組被分散到內地各個部隊，關西組的三十餘人則回到台灣。不過關西組中有幾個人為見習士官，曾在日本內地接受訓練。李登輝就是其中一人，聽說接受過高射砲的訓練。

我上東京是在昭和十九年十月末至十一月初。十一月一日，我在上野附近看見從馬里亞納基地飛來偵查東京的B 29。目擊者異口同聲說，銀翼閃爍在秋天的藍天中非常漂亮。

看樣子從空中飛來的美國製炸彈比何既明做的炸彈搶先一步投下。雖說是滿腔熱血的青年之心，但也是典型的血氣方剛，至今依舊會將這件事情拿來當茶餘飯後的笑柄。

我回到神戶後，住進北野町一丁目的家。比起靠近造船廠的海岸通，離山林較近的北野町應該更為安全吧。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沒太大差別。不過北野町在那之後挨過兩次空襲，海岸通卻在第一次的空襲中燒盡。選擇北野町是正確的。

藤澤拜託我的〈印度現代詩抄〉，於昭和二十年正月交到川崎直一手中。



在如火如荼展開的空襲中，我的文章平安無事地活字化了。《新文學》的發行地是大阪，不過我不記得正確地點及公司名了。因為是要標上價格、擺放在書店裡的雜誌，所以姑且算是商業雜誌。這是我第一篇「公開」的文章，可說是我的處女作。

《新文學》（三月號）陳列在店裡頭之時，大阪因空襲（三月十三日）燒成火海，雜誌也幾乎燒毀殆盡。當然有送給執筆作家，可是不知道被誰拿走了，我手邊並沒有。

同月分還刊載了大阪知名作家織田作之助的〈猿飛佐助〉。把我的雜誌拿走後，未歸還的人應該也是想看織田寫的〈猿飛佐助〉，而非〈印度現代詩抄〉。

大阪天王寺一帶因三月十三日的空襲毀滅，大阪外語的校舍也從土地上消失。

接著，三月十七日的神戶空襲，位於海岸通的自宅也燒毀了。可說是一個時代就這樣結束了。

大阪空襲的隔日，我馬上前往大阪。雖然放有我辦公桌的圖書館辦公室已經燒毀，但是鐵製的書庫倖免於這場猛火。但是怕急忙打開書庫，馬上又會燒起來，所以必須過幾天，才能打開那沉重的書庫大門。

見到熟悉的書庫和書籍平安無事，我鬆了一口氣。

## 大火前後

我在研究所時，外語有另外一個大陸語學研究所，我與那裡的年輕學者交流也頗為愉快。

先前提到，我與倉石老師曾一同前往東京的文部省。那時，大陸語學研究所的高田久彥也同行。我記不得自己的要事為何（真是非常不負責任），倒是記得他們要辦的事情是領取「蘇州語研究」的補助金（或獎學金？）。高田從華語科畢業後，進入法語的選科就讀。

跟高田同屆從華語科畢業的富田竹二郎，其實是先從英語科畢業後，才以選科學習華語。

雖然富田也是大陸語學研究所的人，但是我入學時，他就到泰國留學了。因為大阪外語正在籌備泰國語科，所以富田被任命前往泰國留學。

富田畢業於神戶二中，老家在元町四丁目開喜慶用品店，就在我家附近。可惜我入學時，富田已經在曼谷，就這樣擦身而過。

富田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從英語科畢業，同一年，之後成為大阪外國語大學校長的伊地智善繼從華語科畢業。伊地智在我研究所工作時期，從中國返國後，便留在母校任職。

我不記得他是講師還是助教了，我們升學路徑相似，因此他非常照顧我。

大陸語學研究所以金子教授為首，有許多知名人士，所以我有些敬而遠之。伊地智老師到職後才稍微變得比較好親近。他們的研究所旁邊就是圖書閱覽室，我偶爾會順道去打聲招呼。

我們一個是最年輕的教師，一個是實習研究員，因此特別談得來。我不太記得聊了些什麼，可是未曾忘記我們時常聚在一塊兒談笑風生的時光。我也記得有時候陳德仁會加入我們的行列。現在想想，伊地智當時應該還是單身。

那時的我還徘徊在學問周邊。記得我曾不自量力地跟伊地智議論學問，但現在想不起內容了。想必是毫無內容的幼稚議論，頂多只是得意忘形地批評學術主義。

為了研究蘇州語，許多上海人進出大陸語學研究所。不僅是研究蘇州語，也有以純北京語朗讀《論語》、錄進錄音帶中，再加以檢討等工作。就讀大阪女子藥專的中國女留學生楊秩華雀屏中選朗讀《論語》，這位女士日後成為戰後才創立的神戶市立外國語大學的老師。

那時期，因為無法確保航路的安全，我家從事的貿易業越發困難。在我家工作的許氏及來自廈門的人陸續地返回家鄉。來自同鄉台灣新莊的人也在海上安全備受威脅前離開了神戶。當時的員工陣容正好符合工作量，因此沒有招募新員工。

躲過潛水艇攻擊、飄洋過海而來的物資，以甜食為多，是筆生意。

海域越危險，大家就越希望海外的親人趕緊返回家鄉，這是人之常情。在我們家，哥哥篤臣也應父親的意思，以實習的名義進入一間本社位於神戶的商社加藤物產上班。公司將他派駐到滿州的奉天（現今的瀋陽）。在我即將進入大阪外語讀書前，哥哥就遠渡滿洲了。

哥哥從滿州回來的時候，戰況還不算激烈，大約是昭和十八年的時候。正好是月雲姊從台灣到滿州的一年前。

哥哥在家幫忙父親的工作。雖然店裡頭廈門來的店員已經回國，可是還有來自金門的王氏及蘇氏，工作還能繼續。美軍幾乎掌握了所有制海權，實際上已經無法從事貿易工作了。不過幸虧我家與各地的海產店都有交情。

大多數的商品都被管制了，父親與哥哥應該施展不開吧。即使我沒有參與家裡的工作，一心向學，仍然很在意家裡的事業。

我家舉家移居到神戶，本家在台灣，但是那裡沒有能夠繼承祭祖的子嗣。

我的祖父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原本繼承祭祖的是長男家（稱之為大房）的事，但是祖父的兄長只有一個兒子，比我父親年紀還輕，上頭還有一個姊姊，而且結婚多年仍未生子，因此產生了陳家的祭祖之後該由誰負責的問題。

身為老二的祖父子孫滿堂。於情於理，祖父必須將其中一個孫子過繼給大房當養子。我家上面是四個男孩，所以約定「下次生男的就過繼給大房」。五男謙臣出生後，台灣那邊還催促著「不是約好了嗎」。不過我的母親頑固地拒絕交出自己的兒子。為人母的當然不會答應。結果父親又與大房約定「那就過繼下一個孩子吧」。小孩養在身邊一段時間後，一定會捨不得放手。所以大房認為應該在孩子出生後立刻接回台灣。接著母親又懷孕了。這次快要臨盆時，台灣那邊派人來待命準備接走小孩。這個任務交給了月雲的母親幼。姑姑每次和丈夫吵架，就會說「我要回娘家」，然後遠渡重洋來到我家。所以她很習慣這裡的生活。

母親生下男寶寶，取名為「本臣」。似乎是因為一開始就打算過繼到本家，所以取了這個名字。聽說本臣被幼姑姑抱走後，母親沒日沒夜地哭泣。

——你這個無情的人。

聽說母親念了父親一輩子。

本臣過繼到台灣後，母親又生了一男一女。扣掉出生後幾個月就夭折的兩個孩子（兩人都不是男孩），我家共有七男三女。父親似乎認為將其中一個小孩送給別人（更何況是本案）也不打緊。

可是對於母親來說，親生骨肉不管是七男三女還是獨生子女都是一樣可愛的。不過父親也

有他的立場，祭拜祖先才是最重要的。

愛寫信的父親從未斷過與故鄉的聯繫。只是到了戰爭後期，常常出狀況：

——那封信好像沒有寄到，這裡也都沒有收到信。

父親的信上會有「第十二號信件」之類的編號，不知道是一開始就有的習慣，還是擔心信件因戰爭出狀況才這麼做的。

最近看到清朝人的書信原稿，其中大部分有標註編號。有時信件中還有「關於此事已在七號信詳述過」等描述。

原本想將父親的信件當作書信的範本，可惜信件的影本與數量驚人的來信紀錄一同於空襲中燒毀。

\*

知道不尋常的時代將來臨，家人盡可能地聚在一處，避免分隔各地。

最小的弟弟在東京的學校，馬上就會被工廠叫去當學徒，所以父親叫他編個理由回來神戶。我也贊成父親的意見。但哥哥好像認為，既然被叫去學徒動員<sup>1</sup>，就依從指示比較好。

敏臣是一橋<sup>2</sup>的學生。當時校名正由東京商科大學改為東京產業大學。似乎是因為軍隊對

「商」這個字很反感。在戰後才又更名為一橋大學的。

——反正還是要當兵。

敏臣就這樣回來家裡了。

我們雖然擁有日本國籍，但因為是台灣人而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在當時卻以志願役的名義強制入伍。原本不被信任的台灣人是不會被收入軍隊的，可是隨著戰勢惡化，當局也無法再用這樣的理由不收台灣兵了。

朝鮮從昭和十九年開始實施徵兵檢查，台灣晚了一年，於昭和二十年才開始執行。敏臣他們已滿二十歲，是第一批接受徵兵檢查入伍的台灣人。我跟敏臣差了一歲，正確來說是差了一年又八個月。如果台灣也有徵兵制，我或許會比他早一年或兩年入伍。要不是因為提前畢業，我應該就要以學徒的身分志願入伍。

「反正日本輸定了。」

敏臣回來曾如此說道。

他在東京加入何既明等人的圈子，似乎受到很深的影響。

昭和二十年是終戰那年，終戰前日本挨過了無情的空襲及糧食不足的時期。

那個時候我以笨拙的腦袋思考著世界和平。身邊充滿騷亂。我也有受到川崎等世界語者的

影響。在當時，人們片面地認為對世界語有興趣的人是社會主義者。大概是對大杉榮<sup>3</sup>等人的印象過於強烈。

我沒有碰上三月十三日的大阪空襲。對我來說，化為灰燼的是我青春時代的城鎮大阪，而非幼年時期或年少時期的回憶。

空襲隔天我回到灰飛煙滅的城鎮。進入大阪外語就讀前，我一年大約只去大阪一兩次。我記憶中的大阪只限於上本町的大阪外語校舍和圖書館。現在想想，學生時代及助手時代，我只要工作做完，就盡可能早早趕回神戶。

比起大阪，深深地植入我心的是奈良或京都。我的素描簿裡幾乎沒有大阪的風景，大都是法隆寺、唐招提寺、興福寺跟三月堂的佛像等等。

大阪空襲持續了十三日和十四日。我所知悉的大阪不過是一小部分，只能把對神戶的認識套在大阪上，想像當時的狀況。

任何人都很清楚，一開始的目標的是港灣設備。想當然位於海岸通五丁目的我家是危險區域，所以暫時移居到北野町一丁目。

不過神戶是個東西距離長而南北縱深短的城鎮。從海邊移居到山邊，對當時的我來說是步行可至的距離，絕對不是適合避難的地點。

北野町的家是西洋式建築，煙囪上標示了建築年代為一九二五年。也就是大正十四年建造，屋齡二十年。所謂異人館，是指工匠用明治時期的日式建材苦心打造出來的洋房。到了大正時期，日本已能取得西式建材，此時建築的洋房就不叫異人館了。

這間房子的主人是位叫沙遜的猶太人。由我們家和同為貿易商的蔡氏共同租借。隔壁住著同為台灣籍的蔡氏，其中有敏臣瀧川中學的同窗東隆君。瀧川中學的棒球很有名，創立者家族中的瀧川儀作和中國有很深的淵源，與孫文也有往來，他贊助了最後一場位於神戶的「大亞洲主義」的演講。

蔡東隆就讀山口高等學校的理乙（醫學課程）科。廣東籍的陳顯明和他同年，就讀一高，其後從京大的考古學系畢業。同年的還有之後擔任NEC（日本電氣）會長的關本忠弘，這時的關本應該還在念姬路高校。其他同學還有打棒球的青田昇等人，十分熱鬧。

雖然租了北野町的房子，可是決定就這樣空著，打算找離城鎮遠一點兒的地方，以當時的用語叫做「疎開」<sup>4</sup>。可惜在找房子期間遭遇空襲。我們好不容易抑制了北野町的火勢，海岸通的店面卻燒毀殆盡。

三月十七日黎明時分，大批的B29襲擊了神戶。根據大阪等地的經驗，我們知道躲進防空洞也無濟於事，只能站在陽台眼睜睜看著空襲戲碼上演，危急時就逃到山裡。

北野町位於高台處，可以俯視整個城市。欣賞風景這樣的形容聽起來輕率無禮，但我們也別無他法。這個空襲很明顯是經過計畫的。

燒夷彈集中劃過夜空。就這樣某個區域被火焰吞沒，接著另外一個區域也成了火海，似乎不會重複攻擊。

三宮車站的東邊燃起了藍白色的火焰。炸彈落地的聲音，總感覺和別處不同。

燒起來的主要是海邊附近，感覺偶爾會將炸彈丟到離我們較近的地方。聽說夜晚的火焰會看起來比實際距離更近。

隔天，我們前往海岸通。

海岸通、祭町、元町已被燒個精光。我們家看起來是三層樓高的磚頭建築，其實只有一樓是磚頭砌成的。二樓和三樓是牆壁塗上砂漿的木製建築。陷入火海後，只剩下一樓的磚頭牆空虛地留在原地。房子裡的東西都已焦黑看不出原形。我們還發現像是人類肋骨的焦黑物嚇了一跳，結果是我中學時期用過的劍道護具，燒到只剩下頭盔的金屬。

燒盡失去的不只是建築物。曾居住在這個「城鎮」的人們再也無法回到此處居住。我強烈意識到所謂的滅亡。

\*

第二次的空襲是在六月五日。

父親在垂水的福田川河岸邊買了新房，是佔地廣闊的平房。

——即便現在看起來很寬廣，但從燒毀的遺跡來看，大概狹小到令人無法置信。

我根據三月空襲時所見的經驗，說了這些話。

——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結果被母親斥責。

不過，我切實感覺火燒的遺跡狹小得令人悲傷。

垂水的家似乎無須擔心。應該才編入神戶市不久。家中有水有瓦斯，但更令人高興的是還有一口井可以用手壓式幫浦打水。還有一座離房子有些距離的倉庫，我把那裡當作書齋。只是我不能保證這個家不會成為B29的目標，聽說附近有許多海軍經理學校等軍用設施。

當時的垂水町位於神戶市與明石市的交界處，垂水在神戶的邊境，旁邊就是明石市的重工業工廠匯集區。一眼望去是寧靜的田園城鄉，只有幾處零零落落的住宅。

靠近海邊頗有漁港鎮的風情，高台處有三菱和川崎造船廠高階職員的宿舍等等。

這是我成為作家後的事情了。紀尾井町的料亭福田家，時常被當作餐會的會場，我總是在等眾人到齊前，和老闆娘聊往事。老闆娘在戰爭末期新婚，住過垂水一段時間。先生是海軍的技術將官，或許曾在那附近的造船廠製造軍艦吧。那時期的先生每日徹夜趕工，出身東京的老闆娘隻身留守垂水，空襲警報來時備感不安。也就是說當時的我與她身處不遠。

因為有共同話題，每當我到福田家時，就會聊起空襲時代的垂水。住在垂水的老闆娘雖然日子清閒，可是形單影隻的她想必很不安。老闆娘現在已經去世了。

上次的空襲發生在夜晚，這次六月五日的空襲則從早上開始。小學已經疏散大部分的學生到農村，中學以上則被派到工廠幫忙。中學生在前往工廠的途中，聽聞空襲警報，大家紛紛到安全的熟人家中避難。

工廠其實都是軍需工廠，殘存的工廠在六月的空襲中，一間間地被摧毀。我的妻子當時還在念高等女學校的三年級，被派去住友螺旋漿幫忙。這天途中便前往朋友家中避難，所幸那裡沒有遭受直接的攻擊，她說真的是九死一生。

大阪外語的校舍因為在三月燒毀，所以我也沒地方上班了，我大都在家中待命。六月的空襲時，我就待在家裡頭。在垂水也能聽到B29的爆炸聲或高射炮從地面發射的聲音。光聽聲音就知道這次空襲的規模比上次還大。

而且本來以為很安全的垂水，這次也遭到一陣燒夷彈的轟炸。第一次的轟炸機大約一百架，這一次約有兩、三百架。

必須確認在神戶（雖然垂水也算是神戶市，可是在當時的認知中須磨以東才是「神戶」。垂水町是於昭和十六年才被編入神戶）的親戚友人的安危。空襲從早晨開始到中午前就大致結束了。

我與弟弟敏臣兩人一同前往神戶。須磨以東的鐵道已經停擺，我們盡可能沿著山路步行過去。我們走過了須磨、鷹取、長田、兵庫，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空襲後特有的氣氛，與其說是陰暗、沉重，不如說是微暖中某處飄散著腥味，令人不舒服的感覺。這氣氛越向東行越發濃重。

我事後想回想當時的情況，卻怎麼也想不起來。或許是因為人遇到不願回想的事物，就會想辦法遺忘吧。我曾經覺得我會想不起來這一天走過的足跡，就是這個緣故。

有件事情我倒是記得很清楚。地點在中山手通，我爬再度山時經常經過的路。餘燼還在冒著煙，周遭的建築物已全數燒盡。一個男人全身赤裸，躺著睡覺。

「他還好嗎？」

我邊說邊靠近他，弟弟拉了我的衣服試圖阻止我。我從弟弟不尋常的表情立刻察覺是怎麼

回事。那是一具屍體。

那一天，我看到了大量的屍體。大都是焦屍，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焦黑的遺體。但是在中山手看到的第一具屍體不是焦屍。那個人似乎是在中宮小學前寬廣的道路上，吸入濃煙窒息而死。所以我才以為那個人只是太累躺在那邊而已。

這只是一個開端，之後又遇到無數打擊人心的場景。

從中山手經山本通抵達北野町時，我鬆了一口氣。山本通整片被燒得精光，只剩下清真寺從外觀來看沒有受到波及。其他幾乎全數燒盡，但我們家租了沒住的沙遜洋房平安無事。隔一條路的東面鄰居家已經被燒了，那邊之前住著法國人。我們家住著年輕人，所幸能及時協助滅火。住隔壁的法國人是十歲的小男孩跟他的母親，不知道當天他們不在家。

外國來的敵人（美國人、英國人等）大都被扣留或隔離，但是不會對法國人採取這種處置。中國人也一樣，他們被當作汪兆銘政權（當時汪氏已身亡，由陳公博繼承其位）底下的人。可以推斷法國人處於貝當元帥協助納粹的維琪政權，下因而倖免。

神戶是空襲的目標，當然沒有考慮住在那裡的居民國籍。不過，像是白種俄羅斯人及經由同樣途徑逃亡的韃靼人等，雖然沒有國籍，大多進行集體疏散。

隔壁的法國人小男孩曾跟我們說：

「這個絕對要保密喔！我們家其實是美國人，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喔！」他的父親是法國人，到上海一帶從事商業活動，他和美國籍的母親待在神戶。還有一位白種俄羅斯的美少女奧莉卡，我之後才聽說她的父親在這場空襲中身亡。但有真相不明的傳言指出，她的父親是與同夥的白種俄羅斯人在空襲前不久決鬥而死的，編造死於空襲的謊言才能大事化小。

\*

走過中山手堆著屍體的路途、確認北野町的家平安無事後，稍微鬆了一口氣，不過更辛苦的還在後頭。

遭遇空襲的人會盡可能尋求更寬廣的空間作為逃生所。

北野町再往南行，有我從小熟悉的生田神社。那邊的確有較為寬廣的空地，周遭蓋滿了民房。以前這裡被譽為「生田之森」，此時的光景，令人難以相信以前曾經有座森林。逃到那裡的人實在可憐。

我在那裡目擊數量驚人的屍體，而且幾乎都是焦黑的遺體。

我與弟弟兩人一語不發地穿過那裡，四周還飄著濃煙一般的餘燼。

通過生田神社的鳥居後，就是戰後小吃店林立的鬧區。當時那邊很多二手家具店，還參雜了幾間二手書店，我也常出沒在這一帶。店家被燒得一間不剩。

在這裡也有無數的焦屍映入眼簾。我至今還記得，一具女性的焦屍像在保護小孩的火燒屍似地倒臥在旁。

我們在北野町遇見許多人，大概掌握了熟人的消息。不過在這種狀態下，不知要過幾天才能確認所有人的生死。

我們對過了那麼多天依舊無消無息的人不再抱希望，我的身邊也有這麼一個人。

聽說死於生田神社的人之中，有我出身台灣的友人吳鑑銘。還有教柔道的赤柴老師，他在我小學的時候醫治了我的骨折。聽說他是鎮裡的警防團長，應該是殉職的。

更衝擊我的是連動物都犧牲了。我們應該是在加納町三丁目附近發現了數具馬的焦屍。那時代運送重物大都依賴馬匹。

我的腦海中不禁浮現「修羅」兩個字。有人告訴過我，修羅是指不停戰鬥的人。我吸著修羅的煙，幾乎發不出聲音來。雖然我與弟弟在一塊兒，可是兩人都沉默地走著。我們來回琢磨跟三宮之間，但是感覺不到一點疲累。我只記得我的喉嚨非常地疼痛。

——戰爭結束後，先回台灣一趟吧。



我與弟弟敏臣還討論了這種事。我不記得是誰先說出口的。戰爭結束後的隔年，我跟敏臣兩人一同返鄉。我與敏臣差了一歲，實際上差了一年又八個月。以學年計算差了兩個學年。哥哥篤臣與我也差了兩個學年，可是我們實際年齡差了兩年又十個月。

敏臣生於大正十四年，他那一年不適用志願兵，與一般日本人同為徵兵制。當時他還是一橋的學生，準備八月進入豐橋的預備士官學校就讀。

大空襲後，我有很深的虛脫感。看著火燒後的遺跡，也只是徒增感傷。即使如此，我還是在神戶燒毀的市區及大阪學校的遺跡間來來去去。已經無須擔心空襲了。就算美國再怎麼富裕，也不會浪費燒夷彈去炸已成廢墟平地的城鎮。

火燒遺跡是安全地帶。

先前有提過上本町八丁目的校舍全毀，其實有兩間後期才增建的平房教室奇蹟般地存留下來。

學校附近的學生宿舍也燒毀，聽說宿舍裡的學生放棄搶救大間的主校舍，拚命地朝這兩間有點距離的教室灑水撲救。

其實這棟建築存放著紀念戰死或殉職畢業生的「烈士之碑」，有人認為是前輩的英靈保護了母校。

兩間教室的其中一間，稍微擠一下可以收容八十人以上。我們在那間教室上過地理、哲學、國文等課。另外一間教室比較小，印象中放了五十台打字機。

留在學校的學生被派去支援工廠，但是工廠也差不多被炸毀了。偏遠地域的學生因為糧食的關係，大都回鄉去了。

老師們因此閒得發慌。

「總算有點兒做學問的氣氛了。我們乾脆來辦讀書會吧？」

這是圖書館長金子二郎教授的提議。他說圖書館裡正好有幾本適合讀書會的書。

圖書館存放著好幾本美國的東洋學者勞費爾<sup>6</sup>的著作 *Sino-Japanica*，正好適合一人一本進行研究。內容如同其書名，探討中國與伊朗間的關係，即東西交流史。這本書依照「歷史」、「地理」、「植物」、「語言」等項目，又各別出版成冊。我們根據書名查找，發現有好幾本相同的書。

因為原文是英語，所以請英語科的森澤三郎教授解釋語句。我們套用「三四郎」這個名字，取金子、森澤兩位教授的名字，將讀書會命名為「二三郎之會」。我記憶中讀書會的成員有川崎直一、伊地智善繼、庭田四郎（英語）。我還記得每當庭田出席的時候，金子老師都會笑說「這樣一來，二、三、四郎就全員到齊了」。

終戰前後舉辦的這個讀書會壽命不長，應該只辦了幾次。不過讀書會的成員中，森澤、金子、伊地智等三人，其後都曾擔任大阪外國語大學的校長。

從類似書庫準備室的房間眺望整片火災後的風景，參加這個讀書會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卻在我的心裡留下鮮明深刻的印象。

這個模仿老學究般的讀書會多少撫慰了我空襲過後的虛脫感。

到了八月，新型炸彈炸向廣島和長崎，弟弟敏臣在這時期入伍了。

## 戰爭結束

台灣依據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被清廷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台灣又被返還給中國。

日本統治台灣正好五十年。

我於一九五〇年結婚，二〇〇〇年是金婚紀念。結婚時日與日本統治台灣的期間相當。感覺日子似長且短。

日本的殖民政策並不認可殖民地人民依徵兵制服兵役，可是允許志願役。到戰爭尾聲，徵兵制的觸角也伸進了殖民地。日本對殖民地一視同仁，認為這是「榮譽的入伍」。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開始，適齡者（滿二十歲）皆須入伍，我的弟弟敏臣是第一期。

不記得徵兵檢查的日期了，不過入伍是在八月。因為是廣島原子彈爆炸前的事情，應該是八月開始。弟弟雖是一橋的學生，卻進入了豐橋的預備士官學校，入伍時得到了伍長的臂章。接著馬上就終戰了，弟弟又在營隊待了十天左右才離開，軍旅生活還不滿一個月。

大正十四年出生的弟弟是第一期生，大正十三年出生的我如果還是學生，就會像楊克智一樣必須加入學徒出陣。

差了一年於是幸運逃過入伍，但這個時期，不管是市井小民還是軍隊，都同樣身處危險之中，沒有太大差別。

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最初被報導成「新型炸彈」，我馬上就察覺情況相當嚴重。

我直覺認為：（這樣一來，日本應該會很快投降吧。）

對日本人來說，就是戰敗。可是對我來說，除了戰敗一事，還必須改變自己的國籍。

雖然不清楚詳細的過程，但想像起來，日本應該會歸還海外佔有地，或至少是放棄殖民地。也就是說我們的國籍會有所更動。

其實連弟弟入伍時，我也沒有感覺很悲壯。

因為制海權和制空權都落入敵軍手中，這時入伍的人不會被帶到外地的戰場。沖繩的日本軍早已玉石俱碎。新入伍的士兵形同被囚禁在日本內地。

不光是軍營裡的士兵，我們也無法離開這座島嶼。

專攻外國語會使思考漸趨外向。我的個性說起來較為內向，但也有勉強自己外向的地方。大概是因為學過波斯語，我對西亞相當感興趣，傾心絲路。在當時日本對絲路的認識也才

剛起步。

主要是斯文·赫定的探險記，大部分有譯本出版，我也閱讀了這些書。實際上，海洋與天空都被封鎖，我哪兒都去不了。閱讀這些遊記彷彿身歷其境一般有趣。

我每週會到學校燒毀的遺跡一到兩次，感受書籍的氣息，從讀書會的 *Sino-Iranica* 再到絲路，好不愉快。我還閱讀了貼有「禁」字的書籍，比方說有愛德加·史諾<sup>2</sup>的 *Red Star Over China*。這本書裡頭還附有日本接收上海租界前發行的《西行漫記》，那是史諾作品的中譯本。

對我來說 *Sino-Iranica* 與《西行漫記》宛若不同的新世界。更特別的是閱讀時，我的身後是一片焦土，這使我永難忘懷。

一般都知道八月十五日是「終戰」那天。

不再有空襲、也無須燈火管制。大部分的市民都很高興戰爭結束。

再去轟炸火燒後的遺跡也毫無意義，大型的 B 29 再也不會出現在神戶上空。終戰前偶爾會飛來小型的格拉曼飛機。這些飛機不是從馬里亞納基地飛來的，而是艦載機。也就是說，美軍的軍艦已經來到日本附近。情勢簡直是快被將軍的一盤棋。

被通知玉音放送<sup>3</sup>的那一天上午，大多數人預想的內容是這樣的：

——陛下勉勵各位盡最後全力奮戰。

但是看在我眼裡，我認為日本已經山窮水盡了。

結果確實如此。只不過還是有人將陛下的詔書解釋成嚴正的鼓舞。恐怕是因為收音機的訊號狀況不好、雜音太多的關係。或許是因為有些人不願承認戰敗而擅自解釋。

以漢文訓讀體寫成的文脈難以理解，廣播後半段雜音又特別多。

——堪所難堪、忍所難忍……。

這一句話就是戰敗的意思。我清楚地聽到這句話，確信戰爭已經結束。

一般人聽到廣播時還半信半疑。廣播結束後，人們彼此交換情報，馬上就掌握了狀況。

老實說，大家應該都鬆了一口氣。鬆一口氣後，那湧上心頭的情緒就因人而異了。

＊

人們紛紛地走上街道。

工廠遭受空襲，人們大都在自家待命，而不能隨便在外頭遊蕩。因此心情上變得很想外出走動吧。

之前是極端的物資短缺，現在不知怎地冒出了各式各樣的物品。管制的權威掃地後，那些被嚴加管制的物資大量冒出，數量驚人。

在內地的軍隊馬上就解散了。有不少復員軍人帶回來的東西吧。

弟弟敏臣因為在豐橋，十天過後就馬上回家了。他帶回的物品只有毛巾兩、三條和幾袋軍糧麵包。

京都跟奈良未受到空襲轟炸，可說是救了世界文化遺產一命。美國因此被讚美說是不愧為有文化的國家。日本人認為這是華納<sup>4</sup>的提案，將他捧為京都、奈良的救命恩人，可是他本人從未講過自己救了文化遺產。美軍只是根據國策決定空襲地點。一定聽取了許多人的意見才進行決策，絕非依循他一個人的提議。

美國在中國打仗時，也小心翼翼地保護著文化遺產。

美國在日本空軍空襲重慶時，研究過擊毀一般市民居住的城鎮對恐懼感、同仇敵愾之念造成的影響。

美國向中國的學者詢問了文化遺產的狀況，從中國內地開始攻擊被日本佔領的城鄉。

據說中國的學者列了一張清單給美國，記載了哪裡有怎樣的文化遗产，遺產價值多大等等。其中一名學者是曾到美國留學的考古學家梁思永（梁啟超的兒子）。

梁思永是甲骨文學者，他應該有拜託美國千萬不要轟炸那個先前重埋起來等待挖掘的安陽殷墟。梁啟超是神戶的華僑學校中華同文學校的創辦人。這間學校於一九九九年迎接創校百

周年，邀請了梁思永的公子（留美建築師）。根據他的說法，美國委託他父親評估的是美國預計攻擊的亞洲地區所有的文化遺產。因此梁思永向美國報告京都及奈良是相當重要的文化遺產。梁氏深信是自己的報告才讓這兩市未遭受轟炸。梁思永也就讀過中華同文學校，對兩市有特別的情感。

如果是正式委託應該留有文書紀錄，超過一定的期間就能公開，我想要調查看看。

戰爭結束後，總算看見了未來曙光，不再有陣亡或爆炸。該開始考慮將來了。未來有許許多多的選擇，對青年來說想必相當振奮。

也有人反倒選擇減少，比如說以軍人為職志的人。或許很快就會出現取代軍隊的組織，可是在當時普遍認為軍隊會因此消滅。

我也面臨了幾個選擇。

不問個人意願被變更了國籍，所以原先計畫的道路難以繼續。大阪外語是國立學校，那裡的教授、助教授是國家公務員，也就是必須「任官」。除此之外，我也有「受雇外國人」的路可走，但這是非正軌的選擇。受雇的外國人老師大多指導「會話」，我並不想成為那樣的老師。

——新印度學、新波斯學。

我的目標在此。

過去曾修讀華語的學生打算放棄老古董的漢文學，朝支那學的研究邁進。

我不想再研究佛教經文，想讀普列姆昌德或泰戈爾。

「決定了！不做了！」

我認為自己必須更加深入熟悉中國的歷史及文學。此外，台灣雖說是我的故鄉，可是我只在那裡短暫居住兩三次。這回我終於有機會能夠親眼親耳去體驗從何既明那裡聽來的故鄉台灣。

數以萬計的青年——應該說是一群少年——來到日本。騙他們說可以邊工作邊上學，實質是讓這些十五、六歲的孩子在工廠做工。戰爭結束後，深知受騙的他們開始暴動。工廠不但不給薪，還將他們趕出去自生自滅。可想而知為何這些少年會如此脫序。

日本政府覺得麻煩，因此儘早送台灣人返鄉。

半年內前往台灣送返人員的船隻絡繹不絕。

在人手不足的戰爭期間，眾多台灣人被「徵用」前往日本內地。其中有很多才剛從公學校高等科（高等小學校）畢業的少年，日本承諾他們可以去上夜間中學，但是實際上學校早已工廠化了。他們被動員到神奈川縣座間的海軍工廠。終戰後，工廠負責人無影無蹤，也不發

薪水給他們。少年們的家鄉遠在海洋另一端的台灣，他們為了生活開始掠奪藏匿在軍營及工廠中的物資，引發了許多問題。其中少數中學畢業在工廠中擔任幹部的人成了少年的領導者。

欲返鄉的不只是座間的少年作業員，日本各地有不少從台灣遠道而來的成人作業員。他們聽說台灣的作業員可以跟同資歷的日本人領取同等薪水，所以一窩蜂地跑來內地。此事可以窺探在台灣的民族歧視何等嚴重。

成年的台灣作業員被叫做「打鐵仔」。由於台灣人相當果斷又機伶，不少人戰後在日本社會闖出一片天。他們之中有人滯留於此，也有人先行返國。

還有學生。幾百名學生以台灣版「學徒出陣」的形式入伍。可以延期當兵的醫科、理科的學生無須接受軍隊的洗禮，例如何既明等人便是如此，能夠繼續完成學業。當然空襲越演越烈時，依居住地區不同，命運也截然不同。

不過每個人的國籍都一樣從日本國籍變成了中國國籍。

——還是回去吧。有好多事情要重頭來過，越早重新開始越好。

當時的台灣學生大部分心裡都是這麼想的。

父親同窗的兒子吳建熹已經結束了見習士官階段，任官陸軍少尉。他當然希望能夠返鄉，

所以在返鄉前暫住在我家。同樣希望返鄉的台南人張鏡清是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他因為無依無靠，也來到我家作客。他是父親客戶的孩子。

住在神戶的台灣人組織了「台灣省民會」。本來於情於理應該要加入舊有的「華僑總會」，但是「台灣省民會」吸收的台灣人口，比那裡廣業公所（廣東）、福建公所、三江公所（江蘇、浙江、江西）以及北幫公所（天津、山東）的總和還要多。更何況「華僑總會」從古至今的總會幹部對日本當局（尤其是特高）逢迎阿諛，在華僑間不受歡迎。尤其是他們為了迎合日本的意向組織了華僑挺身隊，將華僑子弟送進軍需工廠，有許多人成了空襲下的犧牲者。可想而知總會的內部多多少少有些問題。

台灣的人們在事態穩定下來前，決定靜觀其變。發放物資等雜事不少，所以請等待返鄉的吳建熹等人來做義工。

＊

根據東京捎來的音信，何既明也想回台灣繼續做學問。再一、兩年就畢業的人，尤其是醫學相關的人應該留在日本比較妥當。不過這場戰爭的結束方式太戲劇化，反倒是燃起了青年學子的士氣。

——反正都要重頭來過，還是早準備比較好。年輕人大多這麼想。

在日本出生、自幼全家住在日本的年輕人，返鄉意願並沒有那麼強烈。「故鄉」全都在這裡，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弟弟敏臣過了十天就從預備士官學校復員回家，因為是一橋的學生，所以先去了東京一趟，他在那裡與何既明等台灣出身的人碰面，感染了他們一心回國的氣氛。

我在人生的起跑點遭受挫折。因為不再是日本人，當教授的路就斷了。如果問我「難道你不喜歡做學問嗎」，我必須稍微思考一下才能回答道。

——我並不討厭學問，可是對於學問的 rigorism（嚴謹主義），實在有點受不了。最好的方式是將學問當作興趣，然後找其他的事當作正職。

這是我人生的藍圖，但是以往的道路提前中斷，所以我還在修行中，無須著急。繞了幾年路也不要緊。我思考哪種「正職」適合我，最輕鬆的路當然是協助家業，從事相關工作，但這想法太天真了。經歷過世界性的動亂，如同父親所言，不能以為自己一路累積的經驗能夠派上用場。

我家的家業本來是農業，一直到曾祖父那一代都是台灣北部的農家。祖父是老二，做了點

學問後，決定離鄉背井討生活。

——以前的祖先是拿著犁跟鋤頭討生活的。到你祖父這一代才換拿筆討生活。我們家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家業。

這是我父親的口頭禪。這句話背後隱藏的意思是：「沒有任何束縛你們的事情，盡管想做的事情吧。」

父親一直想成為技師，卻事與願違。

聽說父親有些擔心二十一歲就遇到挫折的我。我並沒有那麼執著於學究生活，我的不安是來自於，覺得自己身為中國人，卻對中國、台灣的事情一無所知。

對中國的知識是看書而來，對台灣的情報則是從何既明等友人口中得知，我自己非常明白這樣是不夠的。

我決定與弟弟敏臣一起回台灣。剛好借住在我家的吳建熹也要返鄉，住附近的一家台灣人也要回去，同行的夥伴越多越令人放心。

敏臣預計在台灣或是中國的大學繼續學業，我決定先玩個一、兩年再看狀況。

總之像我家這樣的大家庭，如同我父親經常開的玩笑一樣，就算一兩個人跑丟了，也不會有人發現。那時候我家中除了吳建熹，還有住了半年的張鏡清，也有在空襲中受傷的同鄉親

戚。家中客人眾多，母親想必非常辛苦，不過一定也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

幸虧我家是買賣海產的貿易商，有管道可以取得糧食，而且還有華僑團體或是台灣省民會送來的「特別配給品」。糧食問題和戰時比起來，已經緩和許多。

姑且不論被派到遠處的同学，我與在附近營區的同学再次相會。

同學大都入伍當兵，當然也有沒入伍的人。有人因為身體缺陷，在入伍檢查時是丙種，或者直接免除兵役。就讀阿拉伯語科的同期生沖正弘，在空襲尚未發生前打了通電話來研究所。他說如果我有機會來東京，一定要去找他。我問他：「你還沒有要去當兵嗎？」他說：「因為我神經痛所以免除了。」

這位沖氏而後成為主宰瑜珈協會的大人物，在我得到直木賞不久，他又給我撥了通電話。

「如果有機會，幫我的協會寫個評論吧。我也致電拜託福田（司馬遼太郎）了。」他道。

「我是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決不評論主義。」我如是回答。雖然我沒有向司馬問起沖氏的事情，恐怕他也跟我做了同樣的回應。有報導說沖氏帶領瑜珈相關人士到國外時，突然逝世了。果然與身體的缺陷有關吧。

戰後我最擔心的是印度語科的同期生鈴木富三郎。他是海軍預備學生，很早就當上少尉，駕駛戰鬥機了。不過他的任務主要是訓練預科練習生。德丸猛也同樣是預備學生，還搭乘過

沿岸守備的海防艦，他也平安復員回來了。我與他們在神戶還是大阪再次相會。不過在軍令部解讀暗號的預備生田川善次郎與佐藤譽等人，復員後回到島根及德島，所以在我回台灣前都無緣見到他們。

到陸軍去的大夥則是各奔東西。本城五雄進入大阪的二三部隊，他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二三部隊的部隊長是大阪外語時的教官今田大佐。他在所有人的面前說：「大阪外語的畢業生出列，我有特別的任務交給你們。不可以忘記你們所學，快去讀書吧！我已經知會過校長了。」給了他們特別待遇。因此，本城穿著見習士官的制服出現在研究所，不過他不是來讀書的，是來休養身體的。

到陸軍去的大夥中也有像倉橋麟太郎一樣，被派到大陸戰場去了。還有人像蒙古語科的福田一樣，先被派到大陸戰場，之後又因所屬戰車隊為防衛本土安全而被叫回國內。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偶爾有正要出發至戰地的畢業生來訪。馬來語科的同期生鹽見季彥穿著海軍少尉的制服到訪，他的父親應該是軍醫少將。他的馬拉松成績一直都拿第一，運動員的他非常適合軍服。我之後才聽說他是特攻隊，戰死於沖繩外海。

這些事情我是日後才知道的。終戰之後，很多消息不明朗，因為空襲和疏散，難以跟不在家中的友人取得聯繫。是個不安穩的時代。



\*

我認真地迎接這個巨變的時代。

此刻，我決定再學習新的語言，就是俄語。舉例來說，拉施德丁<sup>5</sup>的《集史》(Jamī al-Tawārikh) 等著作，無論英語、德語或法語都沒有譯本出版。我聽說第一冊的蒙古史終於有俄語譯本出版。為了讀波斯語版，我覺得應該備有一本俄語版。

或許是因為我腦海中浮現了身為在野學者理想模範的石濱純太郎老師，才開始學習俄語。在石濱家中常被推薦、出現在話題中的書籍都是俄語的著作。我一直很惋惜自己看不懂那些書。

當然不用說，華語才是我最該學習的語言。不過託祖父的福，雖說不懂標準語，可是我可以直接讀懂福建南部的方言。長大後也沒有人特別教我，我只要「看到」書，就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自己的前途只有自己能決定。至今別人為我計畫的道路被放置了一個無法跨越過去的障礙物，說真的我鬆了一口氣。畢竟想到我只有一條路走，就有一種窒息感。

——現在可以隨心所欲選擇。

這樣說出來，會有種解放感。我小的時候喜歡爬進櫃子裡頭東想想。

——那個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回想起當時思考的事情，在那時我小小的腦袋瓜中編織著許多不同的故事。

這些白日夢偶爾會跑進我的現實生活中。

——唉呀，這不就是小說家的氣質嗎？

我開始這麼認為。

某雜誌希望我以〈我的文學青年時代〉為題寫一篇散文。我毫不猶豫地回絕道：「我沒有文學青年時代。」

大阪外語孕育出庄野潤三、陳舜臣、司馬遼太郎等職業作家，這三個人都沒有參加文藝部。恐怕是因為我們三人都不喜歡文藝部營造的文學青年氣氛。

文學青年代表熱愛文學的話，那我當然是文學青年。我喜歡的作家是夏目漱石，相當沉迷於他的作品。戰後也重複閱讀了他主要的作品。

我幾乎不太讀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對此我自己也感到不安。頂多讀過魯迅等人的作品。因為已經有日語譯本出版，我向學校借了原文書，對照著譯本來讀。

返鄉之後，在回歸中國的台灣，應該可以自由地閱讀中國的現代書籍。所以我決定讀一讀

祖父放在家中的藏書。

我家有明末清初王夫之撰寫的《讀通鑑論》。這本書參考《資治通鑑》，評論了秦始皇到五代的歷史。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此書由上海的世界書局出版，是祖父死後的第三年。發生特高事件時，父親對特高解釋道：

——這本書是亡父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以為是祖父的書。

不過這本書不是祖父的，似乎是父親向上海訂的。王夫之生前沒沒無聞，是在死後的一百七十年才被同鄉的曾國藩讚美其業績。還發行了二百八十八冊《船山（王夫之的號）遺書》，一時蔚為風潮。

民族思想崛起，深深地影響了清末的知識分子。王夫之是每當有國家問題時，就會被人拿出來回顧的人物。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都會有人說：「如果是船山應該會給這樣的意見吧！」

王夫之的青年時代經歷了明朝滅亡，他思考了很多滅亡的原因。

日本人當然不知道王夫之是何許人，所以當時藏有此書也不打緊。不過父親為防萬一還是

說這是祖父的書。

王夫之批判過朱子學也批評過陽明學，說起來他是唯物論者。他尚未發行的著作近年陸續在中國大陸出版。

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深切體會到自己正處於大環境的歷史分水嶺。光是我自己本身，無關我個人的意願，國籍就被更改了。還因此被剝奪了選擇前途的自由。

既然如此身處歷史的轉換期，我就將這「巨大變化的時代」寫成歷史吧！——當時還是青年的我做了這個重要的決定。

但是《讀通鑑論》評論了秦朝到五代。作者王夫之是明朝快滅亡時期的人，他並不是寫他自己生存的時代。

為了寫自己生存的時代，我必須收集資料、保存這些資料。至少我們認為「歷史」的「學問」是相當嚴謹的。

我在當時腦中浮現出歷代的「實錄」與「正史」。

杜甫的詩被世人稱為「詩史」，我知道是因為他以詩描述「時事」。

——那麼我用小說來描述時事不就好了嗎？

我這麼想。

現代的歷史學者翦伯贊<sup>6</sup>說過一段有名的話，「想知道清代的歷史，讀關於清朝歷史的諸論文，還不如讀一本《紅樓夢》。」當時的我還沒聽過這話。

但是我在心中某處早就知道：大家會知道赤壁，並不是因為讀過正史的《三國志》，而是因為讀過《三國演義》或看過三國戲劇的緣故。

## 歸鄉

雖然決定了要返鄉，但我出生在神戶，被問到故鄉在哪裡時，還是得稍微思考一下。我想這種情形不只有我得面對，許多出生於都會區的孩子都面臨相同的問題。

神戶開港之際，兵庫港港口附近的聚落，人口不過一到兩萬而已。這些人應該有資格說神戶是自己的故鄉吧。往後經過十餘年，「西南之役」<sup>1</sup>展開，神戶成為軍隊基地，據說當時人口約有十萬。

在十萬神戶人當中，真的以神戶為故鄉的不到一成。當人口到達百萬時，真正的「神戶人」所佔比例也變得更為稀少。

在神戶的優點就是有「工作機會」。首先就是跟港灣相關的工作。即便像我家這種小貿易商，每當前往台灣、上海、香港、新加坡、加爾各達、馬尼拉等地的商船出港日撞在一起時，也必須雇用大量的臨時工。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甚至人手不足到向人力仲介商抱怨「缺人缺到都想哭了」的狀態。

此外還有許多造船廠、煉鋼廠、紡織廠等，人們從各地聚集來神戶，我們小的時候，這些人已經有了第二、三代，有時也會聽到他們說「下次放假時，要不要回鄉下」這樣的對話。他們口中提到的鄉下，大多是附近的淡路、丹波、播州，出身岡山、德島的則意外地多。我家前面的「中突堤」是沖繩航線的起迄點，因此附近有不少沖繩人，記得住家附近的房子中，有掛著沖繩燒酒「泡盛」字樣的看板。

與我一同玩耍的童年玩伴，雖然各有鄉下老家，但大家確實都自認是「神戶人」。

即便因為戰爭災害而得回「鄉下老家」的人們，大概也不太確定自己究竟算不算是歸鄉吧。

——等情勢穩定下來會再回來。

大家踏上回鄉路途時都這麼說。所謂情勢穩定後回來，意思是即便住家因空襲燒毀，只要能找到收容災民的臨時居所，就會回來。另外一些與鄉下老家關係已經比較疏遠的人，則是從一開始便沒打算回去。

大部分的人都已經認定神戶是自己的故鄉。實際上，我們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只有一點不太一樣，就是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遙遠的故鄉。這不只是距離上的遙遠，還包含了已經足以稱為「異鄉」的心理距離。因此我們無法輕鬆地說「等情勢穩定下來再見」。畢竟戰爭之後，連國籍都不再相同。

「必須抱著回去至少得待上一年，不，應該是兩年的決心啊。」

我與弟弟打算回「故鄉」時，父親這麼說。雖說如同往常，他說了不想限制孩子的自由，仍交代了我們好幾次，不能立刻打算回來。不過，父親也完全沒說過反對的話。

六男本臣也在台灣本家，父親與台灣的連結還相當強烈。雖然因為工作出差的需要會到日本，不過在我們舉家遷居神戶之前，也就是直到二十八歲之前，父親都在台灣生活。

恐怕我與弟弟提起返鄉的話題，多少勾起了父親二十多年前在故鄉生活的回憶。

「我本來想在大陸工作吶。」

這是父親的口頭禪。

父親還單身的時候，曾經為商務出差到山東省濟南一陣子。當時好像是在歷城縣，位於黃河南岸的泰山山麓上，是華北的商業中心地帶之一，父親負責去賣昆布與日本的海產品。

父親似乎特別中意濟南這個又稱為泉都的名勝之地。秦始皇封禪時登上的泰山，好像也給父親相當深刻的感受，因此幾年之後他開設商店時，特別挑了個泰字放在店名裡。

父親也向故鄉的朋友捎了話，大概是想，今後恐怕需要他們幫忙照顧我們兄弟倆吧。

返回故鄉的人數眾多。

有學生、徵用的勞工，以及任職台灣企業而被派遣到外地的員工的家屬，雖然後者數量並

不多。企業員工，例如從神戶被派到新加坡的人，會先回到家人居住的神戶，再一同返台。但過沒多久似乎也辦不到了。當時只好本人直接從派任地返台，家人則從赴任外地前居住的日本各地返台，全家人在台灣重新團聚。

這種情況出乎意料地多。另外台灣人受聘於日本企業，本人被派遣外地，家人則居住於日本的例子也不少。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出入境全部都在GHQ<sup>2</sup>的管轄下，當時已經不再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不允許進入日本國內。

在我們居住的神戶周遭，有許多台灣人家族都屬於這種狀況。

因為是返鄉，本來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但在當時的局勢下，如果回到台灣，便無法如過去一樣可隨時返回日本。因為台灣已經歸還中國，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與台灣，成了外國的關係。當時在台灣還有生活憑靠的人們，便都喜孜孜地回國了。

而我們的情況，是日本留下兩個親兄弟，我與弟弟前往「等於是異鄉的故鄉」。因此，與當時返國潮中大部分回鄉的情況不同。

住在神戶的台灣人中，有些也決定藉著這次機會返回故鄉，大家會交換資訊。

同鄉的人裡，受到戰爭災害的人也不少。也有許多人為了躲避空襲而疎開，地點多在神戶附近。日本人需要疎開時大多都有鄉下老家可去，但我們沒有這樣的地方。

原本住在都市近郊的日本人，當時也覺得過於危險，因而選擇回到更遠的鄉下，這種情況下他們便把自己農地的住家借給台灣人。而且不限於台灣人，許多中國籍、娶了日本太太的人也是如此。這些人靠著這種連結，才能從城市疎開。

等戰爭結束後，城市多化為焦土，但這些人仍舊回到有許多朋友的神戶來。

在焦土般的神戶與同鄉再次相聚，彼此開始討論起今後生意的話題。分別一年，或者頂多只是分隔半年的重逢，劫後餘生的人對舊日時光的懷念肯定更加強烈。這個時期也是「同胞愛」最高漲的時期。

\*

戰爭結束後到了第二年，大家見面的機會終於逐漸增多。

我們台灣人過去也拿日本國籍，住在日本的人也不少，所以並沒有獲得什麼特別待遇。不管是到區公所或市鎮集會的「町內會」集合，或者受到軍需工廠徵調等，都跟日本人沒什麼兩樣。

但不具日本國籍的普通中國人，在沒有上級的徵調指示下，只能自己挺身而出，自行組織「挺身隊」協助日本。編制了華僑挺身隊員的工廠同樣遭受空襲，造成許多華僑青年男女犧

性的悲劇。

當時華僑的指導者遭受到相當多的批評，接著便由年輕人，也就是至今為止沒有浮上檯面弄髒雙手的人出場。

說到這些年輕人，有些是南京汪兆銘政權送來的留學生。不過這些人背負了很大的原罪，因為他們是日本傀儡政權派來的同夥。最終大家推舉了一名年輕的在日華僑，陳德仁。

因為他是我的同學，對於他成為華僑界的領導者，我個人當然舉雙手贊成。他本身是神戶中華料理老店「博愛」的小開，母親是日本人。戰爭末期他在大阪外語教授廣東話，也擔任《華文每日》的記者。只不過，他的北京話也是在大阪外語學的。

從大阪外語畢業後，他曾考慮暫時回國。當時去他家拜訪，看他與新婚的夫人整理行李，完全是一副準備外出旅行的模樣。不用說，正是回中國的準備。我對他說：

——聽說有潛水艇出沒喔。

他卻回答那種東西沒啥好害怕的。

汪政權的閣僚中有一位名喚林伯生的人物，當時擔任宣傳部長，他非常欣賞陳德仁，聽說曾邀請陳德仁回國協助自己。

雖然準備回國，但因有空襲，又沒有船隻航行，這個想法終究沒能實現。

陳德仁是個帥氣的小伙子，不管在哪裡都很顯眼。或許被稱為中國戈培爾。的林伯生，想把陳德仁當作自己的宣傳樣板。納粹黨的戈培爾最後落得自殺的下場，而幫助日本的林伯生則因漢奸罪被處死刑。現在想想當時陳德仁沒能回去，實在是好事一樁。

戰爭結束後，陳德仁被推舉為華僑領袖，相反地我則決定回台灣。

我父親認為男孩子長大離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我母親卻沒那麼輕易放手。因此雖說是返鄉，我們的家仍然在神戶。我母親相信：

——男孩子一旦離開家中，就很難再回來了。

包括我家，以及住家附近的其他家庭，已經有許多實際的例子，因此這種想法確實有一定的說服力。

我要回國之前，必須與母親訂下一個約定，那就是完成一樁婚約。即便戰爭結束的隔年，我才不過二十二歲而已。

為了疎開，我們一家人搬離當時居住的海岸通，借住北野町的沙遜家異人館，當時與我們一同居住的還有同為貿易商的蔡榮業。蔡氏與我家一樣，都在海岸通四丁目擁有附倉庫又兼住家的店鋪。對雙方來說這都是第二間房舍，因此合租了一套房子。蔡家有位女孩子，跟我很和得來，經常與我交談，從外人的角度看來，或許覺得我們感情相當不錯吧。雙方生活環

境也相近，看起來就是相當登對的兩個人。

當時我說現在談婚約會不會太早了些，結果母親說，結婚或許還太早，只訂婚約卻沒有這個問題。對方其實還在女學校就學當中，而且我即將與弟弟兩人前往台灣。弟弟打算在台灣或前往大陸完成大學學業。我則橫豎看起來就是會過著光棍生活的人。

在台灣有許多親戚與父親的朋友，他們看到單身的年輕人，大概不會放著不管。屆時如果遇到什麼麻煩的情況，跟對方說「我已經訂婚了」，應該就能順利度過，母親大概是抱著這樣的想法吧。

雖說是訂婚，也只是形式上而已。畢竟那是個物資缺乏的年代，只是做個儀式向祖先報告一下。

回國的船期在戰後隔年的二月底到三月上旬，由舊軍港吳港發船。正確的出發日期有點草率地忘了，不過抵達基隆後的幾天，還記得跟人聊過：

——今天在日本應該是陸軍紀念日，不過因為日本戰敗，沒有舉行任何慶祝儀式。日本的陸軍紀念日，訂在日俄戰爭中奉天會戰獲勝的三月十日。雖然沒到學校放假的程度，不過我還留有小學或初中時，老師在朝會還是第一節講解奉天會戰的記憶。

與弟弟在搭船之前，我想帶著未婚妻到哪兒去遊玩一下。

但戰爭剛結束，也沒什麼氣氛好的場所可去。因此選了之前在大阪外語受軍事教育訓練時經常去的生駒，之後又去了枚岡神社。當學生的時候，曾經在枚岡神社看過梅花，相當感動，當時卻還沒到梅花開放的季節。所以那應該是在一月中旬之前的事。

在這之前一些時候，有五、六位台北二中畢業生來我家寄居。何既明因為事忙而無暇前來，很遺憾。不過，他說過想要儘早回國，所以當時很期待能回台灣相見。

這段時期記得去了有馬溫泉。大家在同一房間內並排而睡，那時應該是自己帶米過去吧。同行者之中有一位熱愛馬克斯思想的馬克斯男孩，頻頻說明唯物論。不過當服務生來鋪床的時候，他卻問「北邊在哪裡」。

發意見時意氣風發的馬克斯男孩，也經常評論台灣的迷信，最後卻仍保持傳統迷信，要把枕頭靠北邊才睡，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這件可笑的事情。

如此這般，我們悠閒地等待開船。感覺來日方長的青春時光，總飄散著一股海洋的味道。

\*

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二月，從神戶搭船回國的人，大約有一百五十人左右。不過我們並非從神戶港發船，而是由舊軍港吳港出發。

我們從神戶出發，搭「蒸汽火車」前往吳港。雖然有許多人到神戶站來送行，不過只有台灣省民會幹部數人，跟著大家一起來到吳港。

從神戶搭蒸汽火車的，不是只有居住於大阪、神戶區域的台灣人。收到神戶站火車發車時間通知，領有台灣省民會或各地華僑總會開具回國證明書的人們，都能夠免費搭乘火車與乘船。除了住在神戶的人之外，還有來自大阪、京都的人。從神戶一起出發的人我只認識盧先生與王先生兩家。各地主要的華僑人士都來神戶車站送行。

當時在東京頻頻發生台灣人與朝鮮人的問題。台灣與朝鮮的人們已經脫離日本的統治，但還沒出現能適當管束他們的政府。他們與當地的非法組織發生爭端，而日本處於無警察狀態，導致美國佔領軍的介入，甚至發生了武裝抗爭。相關人士遭到美軍逮捕後，接著又發起了釋放運動，這次以美軍為對手的「激進分子」再度被美軍逮捕。

因為我們身在神戶不太清楚東京的狀況，所謂的「黑市事件」<sup>4</sup>應該牽扯了許多複雜的問題。甚至有傳言說，這群表面上引起騷動的人，背後應該有股勢力在操作。

對要返國的台灣人，也有人發送傳單，上面寫著：

——被任命為台灣行政長官的陳儀，過去是政學系的政客，在他擔任福建省省長的時代，有段鎮壓民主分子的晦暗過往。為了揭穿他的假面具，我們回國之後仍須持續努力。

戰後，甚至四處有傳聞說，有一部分的中國人說自己其實是CC派的幹部，對於在戰爭期間不配合的人，他們有權暗中解決這些分子。

「如果是CC派的人，應該要隱匿這些事情才對。他們會這麼說，正好證明他們是假的。當然在神戶也確實有真正的CC派人物。」

父親曾經這麼說過。

CC派是國民黨的右派團體，CC既是陳立夫、陳果夫兄弟姓氏的大寫，也是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的簡稱，因為曾主導過恐怖攻擊而令眾人恐懼。攻擊的對象，也就是所謂的「民主分子」。

政學系並非秘密結社，或許可以稱他們為新官僚派系，他們之中如張群、何應欽等，許多與蔣介石一樣都當過日本留學生。成為台灣新領導者的陳儀，也屬於政學系，這個集團被稱為知日派。

——知日派不見得是親日派。

父親所屬的團體中有喜歡議論政治的人，對於即將歸國的我們，主動教導了許多事情。從他們口中我們得知，台灣的行政長官陳儀不僅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而已，還進入陸軍大學求學，太太雖然是日本人，但兩人並未生育子女。



此外我們也注意到台灣不像中國其他的領土，首長並非「省長」而是「行政長官」。除了「行政」之外還有「軍政」，由「警備總司令部」負責。而警備總司令也是陳儀。

——感覺上中國也把台灣當殖民地一樣支配。

曾經有位前輩這麼說。

當時我想，應該不至於吧。

台灣才剛剛脫離殖民地統治。在這種情況下，馬上又面臨新的殖民統治，未免太過悲情了。

與父親同輩的台灣人，特別是從東京來的人之中，有些屬於「在故鄉台灣待不下去的人」。這些人被日本警察盯上，所以難以待在台灣。根據傳聞，這些人大部分聚集在上海。其中言行激烈的人，很早便前往重慶。這些人的名字也傳到神戶來，我雖然是初次耳聞，但父親似乎從很早已前就聽說過這些人了。

我在回台灣期間，中國（中華民國）派代表團（之後成為大使館成員）到日本，成員之中有一位出身台灣的謝南光。他本名是謝春木，留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前往大陸從事對日與對台的情報工作。除此之外還有早稻田畢業的黃朝琴與慶應畢業的連震東等，也與我約略同時期從重慶回到台灣。之後他們全都擔任了政府要職。

連震東的父親是連橫，號雅堂，也就是《台灣通史》的作者。內容當然是以漢文寫成，採西式裝訂，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完成出版。該書出版尚有段曲折。當時還在日本統治時期，這本書的出版不太受歡迎，因而他先取得前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溫故知新」的題字，藉此當作護身符，才讓書本面世。為了這件事還遭台灣人指摘「媚日」，但媚日僅限於為了讓《台灣通史》出版，至於從隋朝大業元年（六〇五年）寫到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日本領有台灣為止的內容，並未被認為有媚日的傾向。

往後成為台灣副總統的連戰，是連橫的孫子，也是戰爭期間離開台灣的連震東的兒子。

難以在台灣待下去的人，也就是原本不遵守日本國策的人，當日本勢力從台灣退出之際，他們便大大方方地返回台灣。

「連震東或黃朝琴開開心心回台灣了，不過也有些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人，他們大概會觀望一陣吧。你們呢，今後才開始要想自己的意見，所以還沒關係。唉，先別急著講自己的意見，要先仔細觀察周圍的情勢喔。」

從東京趕來送行的前輩，一邊笑著一邊如此告誡我們。

\*

從神戶站出發之際，時間已經接近傍晚。

我記得當時有類似送行會的活動。從東京來的某年輕學生，喝得酩酊大醉。頭上戴著不知哪所高中的帽子，說自己在抗議日本政府的集會中發表過一席談話。

在東京的話，應該可以從橫濱或橫須賀等處搭船回台灣。雖然如此，他仍特意跑來神戶搭船，這其中恐怕有些緣故。搞不好，還是被日本警察或GHQ公安相關人員追著逃來的。

我們在夜晚的昏闇中通過廣島，所以無法看見核爆後的慘狀。等睡醒睜眼一看，已經到達吳港了。我記得似乎在吳港又度過了一晚。

所搭船隻的名稱已經忘了，可能叫做「大安丸」吧。當我正為這個吉利的船名感到開心時，從東京浦和高校來的學生，歪著嘴說：

「當然是大吉大利啊。從沒被美國潛艦幹掉過，至今為止的航行都平安無事呢。」

「能搭這艘吉利的船，算是種幸運吧。」

我順著他的話如此回答。

那是一艘三千噸還是四千噸的貨船。船長身穿舊海軍的士官制服，不過已經把領子上表示階級的領章拿掉了。軍階推測應該是少佐或中佐吧。不知道是出身士兵學校，或者是許多此時期畢業自高等商船學校的人之一。不過確定不是預備學生出身，因為預備學生不是航空科，就是暗號解讀的重要人員，但比起需要多年經驗的航海科，他們還不夠年資擔任船長的

角色。

船上並沒有艙房隔間，只把寬敞的船艙當作一個大房間，裡面集合了大約五百人左右，行李也在一起。

乘客不是只有來自神戶的我們。我們與一些認識的人聚集在一起，搭船出發，這段回憶其實記不太清楚。發船的時候並沒有送行的人。畢竟吳港是軍港，所以船艦出發時沒人送行也算理所當然。軍港出航屬於軍事機密，不管什麼船隻應該都是秘密發船。

船是上午開出的，因此到當天傍晚為止，應該還在日本近海附近。

有些人已經裹著毛毯睡著了。不過因為是乘船的第一天，大家帶著興奮的心情，因此睡著的人不多。時間大概來到晚上九點左右。

突然，發出鏽喘一聲巨響，船隻不妙地搖晃起來。接著，可以感覺到引擎似乎停了下來。大家都一起站了起來。

不用說，已經睡著的人，因為聲響和晃動也都醒了。因為燈光還亮著，可以看到許多人跑向船艙出入口。

不只是我，應該所有人都反射性地猜想：

——是水雷嗎……？

不過，如果是水雷，應該還會伴隨著爆炸的聲響，但我們並沒有聽到這種聲音。

「觸礁了。沒什麼嚴重的狀況！」

為了讓乘客平靜下來，船員大聲嚷著。

「陸地就在附近。請大家放心。」

「請大家鎮靜！」

在戰爭期間恐怕遭遇過更危險狀況的船員，儘可能以平緩的語調向大家說明情況。

這時大家才知道船隻大概卡在什麼東西上方，並沒有誤觸水雷。

「可以看到對面的燈光。」

在船艙中可以聽到甲板傳來這樣的話語聲。

我與弟弟一同爬上甲板。弟弟說他可以看到遠處的燈光，我卻什麼都看不到。估量大概是相當昏暗的燈光吧。

終於探照燈打亮了觸礁的船艙。船艙似乎只有被礁石撞凹，還不至於發生進水的損毀。船隻緩緩的離開暗礁，行駛到鹿兒島的某個港口停靠。港口名稱忘記了，大概只是漁港程度的小港口。當時駐軍的軍官自然出來關切狀況。

—— Last night damage。

船長（大概原本是艦長）以這種程度的英語與駐軍的士官溝通。

因為沒辦法靠這艘船繼續航行到台灣，所以要大家改搭小型的海防艦繼續前往台灣。

海防艦原本當作沿岸警備之用，本來是由舊的戰艦或巡洋艦擔任，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也開始量產船團護衛用的簡易化小型船隻。與我同期的預備學生，要不就駕駛飛機，要不就解讀暗號，再不就是搭上海防艦。

小型驅逐艦頂多配戴著小口徑砲而已。無須多說，這些艦載砲在日本戰敗後都遭卸下了。

我已經忘記這船的人總共搭幾艘海防艦了。因為是小船，恐怕也得要有四、五艘吧。乘客擔心自己的行李，因為全都還放在原先觸礁的貨船上。之後大家必須分別搭乘小船，而且又很緊急，大家擔心人與行李走散。畢竟這不是普通的旅行，大家幾乎都是帶著全部家當返鄉。會擔心行李，也是人之常情。

這個歸鄉團中有位團長。名字已經忘記了，在日本是位律師。那個人大聲對眾人說：

「大家把行李集中到同一艘船上。不要讓行李分散。寄放行李時領到的號碼票，請好好確認保存。不會有問題的。」

陷入混亂的乘客聽了才逐漸鎮靜下來。

不過同行的一位高校生卻說：

「說什麼不會有問題，就算是那個律師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幸好我的行李就這麼一只皮包，不寄放隨身帶著也沒問題。」

他與我們移乘到同一艘船上。原本應該稱做艦，但既然已經移除艦載砲，還是稱船即可吧。從鹿兒島到台灣的航程，想到要搭這種小船便覺得有些不安，不過小歸小，這船過去終究是艘軍艦。

航程總共花了三天，幸運的是天氣都很晴朗。

我們——說來也就是我弟弟敏臣、一直居住在我家的吳建熹、張鏡清，以及出發時突然出現，迷樣般的浦和高校學生林阿才等人，因為年齡相仿，所以都一起行動。在撤除艦載砲的甲板上，空間剛好足夠讓我們五個人橫躺下來。

——對台灣而言，日本統治了五十年，究竟有什麼意義？

航程間的對話，雖然也會出現這種困難的主題，不過最有趣的話題，卻永遠都是馬上就可以吃到的台灣故鄉美食。

接下來我們的眼前會出現什麼？大家滿心期待，眺望著海洋，一邊無止境地聊天，一邊懵懂地思考著逐漸接近的故鄉。

## 登陸

我想海防艦應該沒有什麼艦名。記憶中應該像潛水艦一般以「い」幾號、「ろ」幾號的方式編號命名。我們所搭乘的海防艦，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初左右，抵達了基隆港。

當時下著霧濛濛的小雨。原本基隆就以多雨出名。往後台灣各地豎立起蔣介石銅像時，只有基隆設置的銅像，身上會穿著雨衣。這麼說大家應該就能理解基隆跟下雨有多深的緣分，以及基隆的雨有多麼出名了。

五十幾年前的情景，細節部分大概都很模糊了。

大家確實有分搭海防艦，但總共搭了幾艘，已經想不起來。行李都被集中在同一艘船上，但並不在我們搭乘的這艘船。

雖然拿著號碼票去領行李，我卻少了一只皮箱。不只是我，其他幾位寄放的人也發生了行李掉失的情況。說什麼號碼票是行李寄放的證據，實際上根本就派不上用場。

——就這麼一張紙片，根本起不到什麼作用。日本人雖然會擺架子耍威風，但至少事情會

做好。阿山就只會耍威風，連事情都辦不妥。因為相信那些人，所以才落得這種下場。接下來還會發生許多類似情況，而且誰也不會出來負責。

行李領取處的台灣人職員就這麼告訴我們。

「阿山」，或者只講一個「山」字，是台灣人稱大陸人時使用的字彙。原本應該說成「唐山人」。例如說：

——三代之前曾祖父剛從唐山來的時候……。

這樣的說法，表示台灣人意識到自己原本也是唐山人。因此這個詞彙最初也不見得帶有輕蔑的意味，至多就是指涉帶點鄉下人的感覺而已，就像在市鎮中生活的人迎接來自農村的伯叔父時，多少都會有點羞赧的心情。

不過在我家卻把「唐山客」當作有錢人的意思來使用。其中可能包含了多重的意義吧。

但到了戰後，「阿山」卻直接了當是一種蔑稱。我是在抵達台灣當天，於行李領取處初次聽到這個詞彙。

我的行李箱外觀還算氣派，不過裡面的行李大概連竊賊看了都會感到辛酸，大部分都是書本，而且看來都是賣不了什麼錢的書。

我回到台灣後首先想學俄語。因為拉施德丁《集史》中的蒙古史，當時只有俄語版有完整翻譯。因此學習俄語，對我而言是開啟學問殿堂的入口。

我的行李箱中大部分空間放滿了俄語的文法書與辭典。從當時的世界局勢來看，要能自由購買外國書籍大概還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所以我決定暫時把研究波斯的夢想繼續當成夢想，並覺悟到當下之急，還是先學習中國的事務，特別是剛回到故鄉台灣。

領完行李後，原本以為能夠立即回新莊鄉下，但卻遇到了阻礙。同船的乘客（或者該說同「船團」的乘客）中，竟出現了法定傳染病患者（不確定是否如此稱呼），因此全員被勒令禁止上岸。想到可能要關在狹小的船艙中，內心不禁一陣鬱悶。

不久，來了一道指令，不要大家待在船艙中，而是移動到另一處的「隔離醫院」。隔離期間一週，如果一週後沒有出現新的患者，才能開始釋放。從新莊本家來的叔母，與本臣同來迎接我。本臣因為沒有本家的繼承權，因此父親說服百般不願的母親，一出生就送給本家當養子。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養子，而是真的把襁褓中的嬰兒送去。當時將他抱去的，是父親的妹妹陳幼，也就是月雲姊的母親。

因為打從出生就分離了，因此對我而言，這是初次碰面的弟弟。本臣還沒上學，不過似乎已經知道自己在家族中的立場，他看起來很害羞，卻也很惹人憐愛。

當時不得不請叔母與本臣先回新莊。從新莊搭巴士來台北，大概需要半個鐘頭的時間，再

由台北搭火車到基隆，應該又要花一個鐘頭。不過這個時期，有載貨用卡車會隨時撿客開往基隆。往後我前往基隆，也是利用這種載貨卡車。

對於隔離病人這種非常文明的舉措，我個人相當認同，但在隔離醫院中卻看不到像是醫生的的人。

另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就是到了晚餐時間，竟然沒有提供食物。

——這種小事，自己想辦法解決。外頭不是啥都有賣嘛。

一位（像是）職員的人這麼告訴我們。

看到我們一臉驚訝，那個人又說：

——我們沒有領到那種預算。

就這麼說明。

這個設施，按理就是要把可能的病人與一般人隔離，現在竟然叫我們自行出外採買，這不令人啞然無語嘛。

而看起來像是這裡職員的人，似乎也與醫療業毫不相干。若非如此，大概也不會說出這麼欠缺常識的話。

——這地方根本不能待。

大家這麼說著，陸續有人把行李整理好就離開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我們的小團體也決定：

「明天如果沒有改善，我們就離開吧。畢竟現在天色也晚了。」

如果是在新莊或台北附近區域，或許還有什麼應變的方法，我們成員中像盧太太還是台南人，而她先生人在漢口，至今尚未能聯繫上。

——不回台灣或許還好一些啊。

耳中傳來其他團體的微弱話語聲。

——可是，我們的住處遭到空襲燒毀，剩下的只有防空壕，所以還是得回來呀。

——吃的東西還不少啦。而且又便宜喔。

從下船到抵達隔離醫院的途中，可以看到攤販賣著各式各樣的食物。而且就這麼一小段路，便可看到許多日本沒有的東西。

——看這香蕉長得多好。不知道已經幾年沒有看過整串的香蕉了。

我們圍觀著不知道誰買來的香蕉，才終於實際感受到，自己確實回到台灣來了。

\*

在船上，我們都唱著感傷的懷鄉歌曲。

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曲子叫做〈雨夜花〉。是台灣優秀作曲家鄧雨賢的作品，台語歌詞有好幾種，甚至還有以「軍夫之歌」之名改為日語歌詞的版本。連西條八十，都對這首歌熱愛不已，據說還因此創作了〈雨之夜之花〉的歌詞。改了歌詞後立刻就能套原曲歌唱，記得當時大家都各自寫下日語歌詞，在船上唱了起來。更改的歌詞是大家合作寫成的，理當只有當場會唱，但沒想到很不可思議的，事隔五十年後還清晰記得如下一段歌詞：

在南國的 台灣

不知何時綻放的 愛之花

不變的誓言 密藏胸中

溫和微笑的 花瓣啊

確實完全是台灣式的纖弱旋律。大家對著中國東海合唱出這麼感傷的歌曲，之後卻急轉直下，必須直接面對故鄉的嚴峻現實。

雖然在基隆的隔離醫院住了一晚，隔天我們這團的人就決定要離開了。其他團的人似乎也都在討論離開的事情。

老實說其實已經走掉約半數的人，一下船就離開，根本沒來隔離醫院的人也不在少數。雖然有像是職員的人在，但離開時也不見有人出來制止，似乎沒有任何相關的罰則。

——雖然食物得自己想辦法，不過似乎不需要住宿費。要不要再住個兩、三天看看？有些人這麼提議。

「就自由解散吧。大致上我們是該遵守規則。不過雖然有規則，但違反了也不會受罰，中國式的作法似乎就是如此啊。」

來迎接親戚的當地人這麼告訴我們。

對住在台灣的人而言，接觸這種「中國式」的作法，期間其實還不長。

日本是在前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投降的。但日本正式簽署降書時，已經是十月了。因此大陸官僚開始來施行「中國式」統治，也不過才五個月的時間。

我們搭的船抵達基隆港，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上旬。

同行的人們在隔離醫院待了一晚，第二天就各自回家了。

這個時期從日本歸來的客船，好像只要船上出現病人，就會把全員都放到隔離醫院去。

從東京出發回來，比我們更早些到的何既明一行人，似乎也遭遇相同的狀況。之後從何既明那邊聽說了不少當時的情況。他們船上載了許多學生與從軍隊退下來的學徒兵。從日本各地入伍的學徒兵，大概都是當時在東京就學的台灣人學生。而在關西就學的楊克智等人，則是返台後才入伍的。另外還有很少數的人在台灣的部隊入伍後，又返回日本接受軍事學校的教育。何既明就是與這樣的人一同返鄉的。

何既明很喜歡讀書。往後國民黨統治的時代，書籍檢閱非常嚴格，我所寫的書，即便是推理小說也不能帶進台灣。甚至如果雜誌上有刊載我的文章，也必須把刊載的那幾頁剪掉。

之後何既明即便當上醫師，也會抽空來日本，把自己關在旅館中兩、三天，從早到晚貪婪地閱讀在台灣不能讀的書。

這麼愛讀書的何既明，在這趟船班中竟認識了一位比他更愛讀書的人。有句成語叫「廢寢忘食」，這個人連吃飯的時候手都不離書。這位就是與何既明一樣具有高大身材，從京都大學農學部成為學徒兵進入日軍部隊，名為李登輝的人物。他們也遭送入隔離醫院，當時何既明對李登輝說：

——你這麼愛書，去買食物的事情就交給我吧，你在這裡讀書就好。

好讀書的兩人，在此意氣相投。返鄉船上有許多的相遇，年輕人的友情也自此萌芽。何既明與李登輝的友情之後長久延續，直至今日。從東京搭船的人，大多數是年輕人與學生，而從關西出發的返鄉人，似乎以一般人士居多。

我們從基隆雇用了一輛卡車前往台北，依稀記得大家都站在後方載貨板上。

我叔父住在新莊郊外。與今日不同，當時四周都是田地。五十年後再度返鄉一看，台北與新莊的住家連綿不斷，當年巴士車站的附近，也成了連成一氣的好幾戶住家。叔父的家距離巴士行車的公路，步行大約需五分鐘，農家的前面有一灘小水池，水牛就橫躺在裡面。五十年後連想要看條牛都難了。

本臣這些孩子都赤身玩耍。不只小孩，連大人也都裸著身體。上次歸鄉已經是九年前的事情了，眼前的景致幾乎完全沒變。小孩子拿著竹竿趕鴨的景色，也完全一樣。

我與叔父商量今後的事情。

——因為這裡是鄉下，吃的東西倒是沒問題。不管你是要讀書，還是想幹點別的什麼工作，都不需要擔心。

叔父這麼跟我說。

——暫且看看狀況吧。畢竟社會上變化挺大的。

弟弟敏臣要繼續他的學業，我自己則認為就這麼出社會工作也無妨。而且此時還想跟在日



本認識的人，以及父親的朋友商量看看。雖說想要出社會工作，但究竟該怎麼辦才好，我自己仍不清楚。

在大學時代確實有心想要做點研究，但台灣究竟有沒有我想研讀的學科呢？就算想學有關印度或伊斯蘭等的相關學問，似乎也只能靠自己獨自鑽研。

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的大學應該只有台北帝國大學這麼一所。該大學有文政學部、理農學部、醫學部、工學部等，戰爭期間雖然也設立了預科，但我並不理解詳細情形。總之，隨著戰爭結束，學校遭中國政府接管後，便處於不明朗的狀態。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日本所謂的「終戰」，對中國而言算是「戰勝」。至於收回台灣，一般都以「光復」這個詞彙來表現。原本的意思是回歸中國後，「光明將再到來」，但以日語發音，光復與「降伏」(Kou-fuku)同音，這只能說是一種諷刺吧。

## 歸隱田園

一九四六年是台灣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前一年是戰爭結束之年，台灣歸還給中國。台灣的民眾大概都理解，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結束了。

曾是值得歡慶的一年。

不過只是半年光陰，就不得不使用過去式來表達這股情緒。

——光復

——還我山河

到處貼滿了這種傳單語句。

「光復」是指已經滅亡的王朝重新復甦時所用的詞彙。漢族王朝的「明朝」覆亡，開始異族統治的「清朝」，之後再度迎來漢族的時代，在辛亥革命時是經常使用的一個字眼。例如蔡元培和章炳麟等浙江集團的人組織了「光復會」，便是眾所周知的例子。

還我山河這樣的語句，對於復歸中國的台灣，可說正好合適。

貼在電線桿或居家牆壁上的這些傳單語句，表現出台灣人高昂的心情。五十年期間身為殖民地的人民，受盡了眾多差別待遇，當下正是拋掉「被統治者」這個沈重帽子的時機。

因此大家都熱烈歡迎來自大陸的人們。但是，新來台灣的一般大陸平民，大多只是把這混亂時機當作絕佳商機的「淘金客」。

許多行政、軍事相關成員，也都把「接收」日本公部門財產當作第一要務。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抵台上任，隔天十月二十五日從日本最後一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手中，接受了正式的投降。受降場所就在台北公會堂<sup>1</sup>，有趣的是該處也是清朝台灣巡撫的衙門遺跡。

此時中國領台大部分的職位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而這班人周遭的中、小職位，基本上都是靠裙帶關係任用，這點大致無誤。

一旦踏上「官途」，人們就想從職位中獲得好處，因此拚命中飽私囊。只要手中握有權限，就立刻當作收受賄賂的工具。

從大陸來的官僚，大部分都穿著類似往後中國稱為人民服的「中山裝」。據說是孫中山，也就是孫文愛穿的服裝。有些人還傳說得煞有其事，說這些人為了收受賄賂，特別訂製了大一號的服裝。

街頭巷尾也屢屢傳出「狗吠雖然吵人但至少還會看家，而豬吃飽了就光會睡覺」這樣的說法。狗指涉著日本人，豬呢，就是指大陸來的人。

抵達基隆後，就經常聽到狗跟豬的說法。這是當時台灣人共通的話題，也是極普遍的常識。我本家（對父親來說就是系出同祖父的親族）的叔父叫做錦祥，是父親的堂弟，不過因為他也是本臣的養父，所以與我的關係相當密切。我與弟弟敏臣回到台灣後，大小事都依賴著本家的這位錦祥叔父。

錦祥叔父雖然話不多，但是位誠實可靠的人。照慣例應該讓我們居住在親戚附近，而我們的親戚幾乎都住在新莊，所以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從現在的市鎮看來，台北與新莊已經連成一氣，不過當時看起來仍是一派田園風光。

我與弟弟回來台灣，我是想看看狀況再決定未來，弟弟則是想繼續學業。但親戚之中好像也有些人謠傳，說我們打算全家都搬回台灣，為了這個目的，才先派我和弟弟回來探查情況。月雲姊去滿洲結婚了，當時尚未回來。她的父親徐火炎是當地略具知名度的仕紳。

「如果想買家具的話，現在是大好機會喔。我打算添購一些，要不要一起去？」

徐火炎如此邀約。他是相當具有威嚴的人物。這位名字中帶火字的男人，聽說年輕時完全就是人如其名。我對徐先生說明，我家並沒有舉家回台的意思，不過既然對方邀約了，還是

一同前去台北看看。

當時日本人剛開始撤退，還有差不多半數的人仍在等候當中。公園裡面排滿了要賣掉的物品，全都是日本人在販售。大概因為撤退時有行李的限制，所以必須賣掉好整理吧。隨著戰爭結束，許多人的收入都斷了，靠變賣東西換點飯吃，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火炎先生的目標是家具，但這類物品並沒擺在公園裡販賣。在公園賣東西的，大多數是女性，男人好像都在家，等著要把家具等大型物品賣給熟識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陌生人。

我記得我們在日本人的住宅區繞，並且拜訪了兩、三戶認識的人。火炎先生不會說日語，而拜訪的對象則能說幾句台語。當時雖然殺了價，但最終火炎先生卻什麼都沒買。

「在那公園賣東西的主婦裡面，有些人平時根本不跟台灣人講話。」

火炎先生邊搖頭邊這麼說。

除了錦祥叔父、火炎先生之外，一些親戚也為不瞭解台灣情況的我，做了許多說明介紹。有時突然造訪某些家徒四壁的親戚，對方竟然還請我吃飯，讓我相當過意不去，內心直想著這麼做好嗎？不過，這對當時到處都是大家族的台灣而言，好像是極其普通的事情。

即便是住在附近的人，在幾代之前說不定也是親戚。就這樣，拜訪親戚和與附近的鄰居打招呼，似乎也平安無事地完成了。

＊

日本人正忙著返鄉事宜，但也有些人獲得「留用」。其中有一些是台灣不可或缺的技術人員或研究者。

台北帝國大學的熱帶醫學、熱帶動植物、或者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等單位的人員，許多都受到留任。不過也不是一直留任下去，大概一年或兩年之後也得回國。

「不趁現在把他們的知識學到手，之後大概會後悔吧。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台灣。我們盡到應盡禮儀，然後盡量從他們身上吸收知識吧。雖然大部分都屬於自然科學，不過人文科學應該也有些知識可學。我想找兩、三個人一同去找老師商量，屆時你也一起來。」

當時何既明如此提議。

我就僅有這麼一次，跟著一起到教授家中拜訪。

台北帝大隨著戰爭結束也遭廢止，之後改為國立台灣大學。

我只去過一次台灣大學，而且是一個人自行前往。何既明當時正要參加從日本醫學部轉學台大的考試，還不算台大的學生。不過我突然直接跑到校園裡也不見得能與教授見面，所以還是先透過留任的日本教授介紹，才見到了知名的林茂生教授。

台灣大學承續了台北帝大，但當時尚未正式開始上課。行政職也處於不明狀態，不過林先生似乎從日本統治時代就是預科的主任，可能會擔任日文稱為文學部長的文學院院長。

在寬廣的房間內有張大書桌，另外有好幾位看起來像秘書的人。我單刀直入地請教對方，能否讓我在這裡借用印度與西亞的書籍。

林茂生先生懷疑地看著我，大概以為我是來找工作的年輕人。

——之前也來過一個說不要薪水，只要有張書桌與座位就好的人。不過我拒絕了。至少要寫好論文拿來讓我審查，如果審查沒通過，不管要不要薪水，都不可能在大學裡安插職位。先拿論文來。

林先生大概說了這麼一段話。

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光是能與他見面，交談上幾句，林先生就算施惠於我了。當時，林先生已經年屆六十。

比成為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杜聰明年輕一歲，林先生則是台灣第一位文學博士<sup>2</sup>。

——北有杜聰明，南有林茂生。

這兩個人經常並列在一起。杜聰明出身於北部的淡水，林茂生則出身於南部的台南。至於我，光是能與這位名人見面，就感到萬分滿足了。

林茂生先生專攻哲學。他從東大文學部畢業後，在師範學校與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任教，之後拿台灣總督府的公費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返台之後回原職任教，不過他留學期間學校名稱已經改變，所以回來後成為台南高工的教授。之前的商業專門學校已經廢校，改為新設的高等工業學校。

台北已經有一所高商，而台南又有一所商業專門學校，因此引發了兩校領域重疊的議論，結果就把台南的學生轉學編入台北高商，作為交換則在台南新設立台南高工。林茂生先生擔任的科目是英語、德語和哲學，與學校性質變更沒太大的關係。

這種事情也是我回台灣之後才知道的，感覺上當時不管新設立或廢止學校，都有點隨性。而中國的學制裡並沒有高專，所以林茂生先生失去了任教的學校，而成了台灣大學的教授。既然國家改變，學制隨之修改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我三月回到台灣，距離去年八月台灣變天換國，也不過才半年的時間。依照日本的學制，新學年從四月開始，而中國與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相同，新學年都從九月開始。對我而言從三月學業結束到九月開學為止，還多出了半年左右的時間。

我自付這半年也不能糊里糊塗地放空度過。在這段變革期有許多需要忙碌的事，至少必須先瞭解新政府的施政方針。我老家新莊在日本時代屬於新莊郡，是一個廣大的行政區域，而

本區的中心就在新莊街，當時人口約有一萬。現在則把郡改為鄉，把街改為鎮。

——一鄉一中學，也就是每個鄉應該都要設立一所中學。

這是新政府的方針。

中學包括與日本新制中學相當的初級中學，以及與日本高校相當的高級中學。各鄉至少要設立一所初級中學。

因為從新莊搭巴士三十分鐘即可到台北，而台北就有數所公私立高級中學。在日本統治時代，中學都是初中部、高中部並設的「中學」。

——這不就是把高等科延長一年而已嗎？跟之前的制度也沒多大差別。

——校舍應該如何籌設？

——現在沒有日本人了，小學校不就都空了？

——對啊。就算是新蓋校舍，也得要兩、三年後才行啊。

日本的殖民統治基本上就帶著差別待遇。日本人就讀「小學校」，台灣人則就讀「公學校」。現在日本人返國了，小學校的校舍就會空下來。居住在新莊的日本人數不多，因此小學校的校舍很迷你，不過建築物仍然是小而精美。

公學校也設有尋常科與高等科，但新莊郡十多所公學校當中，只有新莊街的公學校設有高等科。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有些台灣人就把新政府對初級中學的要求，認知成日本統治時代的公學校高等科兩年，再多延長一年的形式。

校舍的問題解決之後，剩下的就是教師招聘的問題。

當時說服了從日本回來的新莊有力人士鄭聯銘擔任校長。鄭聯銘已過世的父親，曾擔任過新莊街的街長。

鄭聯銘相當年輕，只有三十出頭，就讀台北高校後進入東大法學部，畢業之後於日本的古河電工服勤數年，之後與我們一樣搭船返鄉。從東大在學期間起，每次他返鄉時都會來我家露個臉，大家都是熟人。除此之外，他弟弟鄭聯昆也在我父親的商店工作了好幾年，可說是與我們交情頗深的一家人。

那時鄭聯銘就問我：

「舜臣，你願不願意到一所新學校來教英語？」

我原本返鄉時就打算在台灣花個一、兩年，對不甚熟悉的故鄉略盡一己棉薄之力。能在新莊的田園間謀得一職，而不是在鄰近的台北市區工作，對我而言完全是求之不得的差事。

我內心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了陶淵明的詩句：

——守拙歸園田。

## 開始授課

日本統治時代，台灣行政單位的「州」，相當於日本內地的「縣」。台灣光復之後便把「州」改為「縣」。因此我們家就變成台北縣新莊鄉新莊鎮。

新莊鄉因為要設立一所縣立中學，地方上的有力人士都忙著到處奔走。新莊鎮人口約有一萬人，但如果算上整個新莊鄉，人口數則會多出一倍。

地方行政長官是鎮長（日本時代的街長），而當時的鎮長陳國治比我父親年紀小一些，兩人還是同一所公學校的學長學弟關係。已經去世的街長則與我父親同年級。這個地方就是如此，大致上大家多少都相互認識。

我們的新莊鎮，現在已經改為新莊市，聽說人口達到三十五萬了。我故鄉新莊的人口，幾乎增加了三十五倍。市鎮背後有淡水河流過，過往的河道更深。清朝時代與大陸交易的戎克船<sup>1</sup>可以一直開到新莊。往後因泥沙淤積，河道變淺，新莊扮演港口的角色，在清朝就已經落幕了。

因為新莊過去是港埠，所以貿易商會集中此處，也為市鎮帶來繁榮。

台灣居民大多出身福建，不是來自泉州，就是漳州，但兩者之間並不和睦。新莊的商人大部分是泉州出身，隔著淡水河對岸的板橋則以漳州人為主。台灣屈指可數的大富豪林本源一家是漳州人，原本住在新莊，但據說因為新莊是泉州人地盤，住起來不甚舒適，所以之後他家便搬到板橋去了。新莊來自泉州的居民又多來自同安縣，在某種意義上自己人的集團意識相當濃厚。

設立中學時也幾乎都以自己人來做安排。校長鄭聯銘；美術、衛生的杜潤庭；社會、地理、體操的吳建熹；音樂的張德福等，大家都是本地人。

但國語老師就出現問題了。因為能說北京話的人不多，而這又是「國語」，是整體教育的中心。當地水利組合的洪金益，在戰爭期間前往大陸，並在對岸娶妻。

因此大家便邀請洪夫人出馬。洪夫人姓高，這位高慧貞女士原籍江蘇省鎮江市，做為台灣人的太太，台語也講得非常流利，比起在日本長大的我還要強上許多。

數學課拜託物理學校畢業的蔡鵬程。他原本不是新莊人，不過因為是大地主，在新莊擁有土地。他又是鄭校長台北二中的同期同學，因此某種程度上也算是自己人。順帶一提，蔡鵬程的雅號是萬里。

校舍有了，教職員也湊齊，短短的時間內就把一切都準備妥當。

我是三月返鄉的，但新學期要從九月才開始。日本統治時代新學期從四月開始，現在如果要讓學童先休息個半年，將會產生問題。畢竟這段變革期間是相當重要的時期，因此最終仍決定從四月起就開始授課。

在中國有一種制度叫做「先修班」。

例如大學入學考沒錄取，而成績已經非常接近錄取標準的學生，大概會收個一班左右，稱為「先修班」。經過一年的授課，第二年若是通過入學考試，便讓學生正式入學。

如果依照這個定義來看，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九月之間，台灣所有的學生都可以算是先修班學生。

台北縣立新莊初級中學創校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但實際上從四月起就已經開始上課了。我便是從四月開課起，站上了講台。薪水確實從九月開始由台北縣政府發下，而在之前的「先修期間」，則由地方有志之士負責提供。

從鄭校長到我們，對這所新設的學校都寄予偉大的夢想。台北縣大約十所新設的中學，都在此時一起創辦。

在此之前，台灣人只要說起進入中學就讀，就意味著走上菁英路線。當時能升學的人數並

不多。以新莊為例，想要進入中學就讀，就要每天搭半小時的巴士到台北市通學，而一般家庭都無法辦到。不過從這個時期開始，在地方上就設有三年制的初級中學，因此新莊的鄉親父老都懷抱著希望：

——我們的孩子，絕對也行！

因為許多家長覺得通學的交通費負擔沉重，中學就盡量補助地方上的交通費。而且大家認識到舊制中學要讀五年，但初級中學只要三年就能畢業出社會，因此有許多家長便抱持著先讓子弟就讀，看看家境能否在三年內好轉，或者就讀後如果子弟成績優秀，到時候再來考慮未來的心態。

當時也有一股趨勢，就是認為至今為止所受的日本教育已經派不上用場，大家想要重頭學過。因此不只有公學校（小學校）六年級畢業生想進入初級中學，連高等科一年級、或者已經讀完高等科二年級的學生，有許多人也希望能夠入學。而已經讀完五年公學校的學生，如果成績優秀，現在也可以讓



1946年9月，新莊初級中學開學，自神戶回到台灣的青年陳舜臣擔任學校英文老師，展開在台灣的生活。  
王錫榮／拍攝，王邦良／提供

他們提早入學。鄭校長本身中學讀完四年就跳級進入舊制高校，因而提出這樣的意見，認為優秀學生跳級可以減輕學生本人的負擔。

總之，一九四六年是個新舊交替，算是非常的一年，所以也出現了很多非常的處置方式，這也是不得已的狀況。

原本日本人專用的小學校現在已經空了下來，所以可以直接利用這些校舍。因為預估明年起學生人數會減少，因此今年盡量多招收一些。校方決定，今年例外地招收三班學生，明年起則以招收一班為方針來進行。

沒多久後，來了一位胡玉樹老先生擔任總務主任。新莊靠山方向有處名喚「山腳」的地方，胡老先生就是當地的人。可能因為山腳這個地名不雅，所以現在改稱為泰山。

進入總務處會計課的是蘇定芳。蘇定芳曾在日本我父親的店中任職過幾年，就讀公學校時與吳建熹是同期同學。如此這般，這所新設學校的教職員工中，有半數以上都是熟人。

學校的校工名為謝溪。初次碰面時謝溪就對我說：

「你父親的家，就在我家附近。你們去日本之前，他一直都對我很親切。你的祖父當年也相當疼我呢。」

他年紀好像比我父親小一些。



「啊，您就是謝溪先生啊。」

我這麼回答他。知道我聽過他的名字，他似乎相當開心。我會知道謝溪這個名字，其實有一段緣由。我的父親是我祖父的長男。當三男出生之際，正好是我父親進入公學校就讀的時候。祖父把三男取名為「登波」，之後便到公所去提出登記了。

據說在中國有個忌諱，往上追溯五代祖先，祖先有用過的名字都不能給兒孫使用。有些家庭則是牌位上的名字都不能使用。有些人也會往上追溯六代祖先的名字，兒孫都不可以使用。取名字有規矩，不能亂取。畢竟叫喚剛生下來的嬰兒，一定是直呼其名，如果嬰孩與伯父同名，叫嬰兒的時候就對伯父不敬了。這些祖先名字用過的字，就叫做「避諱之字」。不過應該避開哪些字，並沒有很明確的規則可以解釋。

祖父的三男，也就是我的三叔，雖然取名登波了，但某天某位遠房的伯父突然來訪。祖父一見到這位伯父的面，就抱頭說了句：「糟啦！」原來大家都稱這位伯父「波伯」，他其實是遠房親戚，我家族譜上原本不避諱波字也無妨，但這位波伯偶爾就會像這樣突然登門來訪。而且好像是個意見挺多的人。當波伯問起嬰兒的名字時，祖父剛好想起附近一個嬰兒名字叫謝溪，隨口就回答說：

——「叫溪啦。名字叫登溪。」

——「喔！叫溪啊？好名字呀！」

波伯聽了就這麼說。從那之後，三叔就被叫做登溪。因為波伯三不五時會來訪，所以不能喚其本名。不過在學校或到公所時仍以日文叫「登波」，因為波伯不會講日語，所以沒啥問題。三叔從嬰兒時期開始一直到死去為止，只要以台語叫他，必定得稱他登溪。

校工謝溪先生，竟與我家有這麼一段因緣。

\*

到九月正式開學之前的這段期間，從四月開始先展開先修班式的教學。三月剛回到台灣的我，原本打算暫時遊玩一番，現在卻沒辦法了。

因為這些緣故，我的工作早早就確定下來。接下來就是弟弟敏臣就學的事了。當時接續台北帝大的國立台灣大學，為了接受原本在日本各大學就讀的學生，弄得一團混亂。如果背後沒有一定政治實力，沒辦法當上校長。

過了段時間，知名的歷史學者傅斯年扛起台大校長重任，他揭示一個大原則，就是「台灣大學將舉行本校獨自的人學考試，只有考試合格者才能成為本校學生，不接受任何的關說」，如此才解決了轉學、入學的問題。一開始只有日本大學的轉學問題，不過之後隨著國共內戰

逐漸激化，也開始發生中國內地大學來的轉學問題，學生的抱怨從最初的「為什麼明治大學可以轉學台大，法政大學就不行？」逐漸發展成「為什麼浙江大學可以轉學台大，中山大學就不行？」

對此，傅斯年校長主張，「台大不是要收學校，而是要收學生」，要求想入學的人都必須通過考試。提到傅斯年校長，許多人只知道他對中國古代史提出「夷夏東西說」的獨特解釋，不過他對學校行政也展現了相當的實力。

其實我對「夷夏東西說」相當有共鳴。中國古代史不該只從夏商周做縱向切割，而應將中國大陸的夷族與夏族並列而論，從彼此交替興亡的角度來思考。

敏臣的升學管道不只限於台灣，有些人建議去大陸的學校也不錯。正好當時在推動讓台灣年輕人前往大陸各地大學升學，此舉除了可以讓年輕人儘早適應中國的環境，另一個目的大概也是為了舒緩從日本回台的學生全想擠入台大的狀況。政府以「內地升學公費生」的名義，公告募集一百名學生。舉凡高級中學畢業、大學預科或本科的在學生，都有資格申請。

敏臣認為這是最適合他的升學管道。當時申請者好像超過三百人，敏臣也是其中之一，而且順利考上了。合格人數正好一百人，其中女性僅有兩名。

台灣省這一百名內地升學公費生，在台北接受了約三個月的語學訓練。全體集中住宿，就像日本的「合宿」訓練一般，在這段期間也決定要分配到哪些大學去。除數名學生分配到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北方的學校外，其餘大部分多在南方的大學，特別是廈門大學地區的方言與台灣相同，都是閩南語，記憶中分配了超過二十名的學生進入該校。以地區來計算，最多人前往上海，其中與華僑關係匪淺的暨南大學，和廈門大學一樣也分配了大量的學生。上海除此之外，復旦大學、醫科的同濟學院等也收了一些學生，因為是來自台灣省的委託，所以對方都是國立大學。

還有些人從日本的大學醫學部轉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藉由這次應徵公費留學生的契機，部分學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敏臣分配到暨南大學的商科。雖然說是分配，不過聽說全部的公費生都進入了各自想加入的科系。敏臣是一橋的學生，轉入暨南商科，也算是相當妥當的選擇吧。

成為中學教師後，我開始察覺到語言上的問題。其實大部分的老師都面臨同樣的情況，就是講北京話都怪腔怪調。

幸好第一期的學生，再怎麼樣也受過六年日語教育，說日語雖然不那麼流暢，但聽日語卻沒太大問題。甚至可以說，教算數時如果以中文講加、減、乘、除，他們反而不容易聽懂。

在敏臣接受訓練時，我們這些教員則以高慧貞女士為老師，展開了中文學習會。在當時的

台灣到處都可見到這般風情。

但是從大陸來的人們的言行舉止，卻對台灣人的這股熱情澆了一盆冷水。不斷來到這個寶島上的淘金客，在各地做出缺乏常識的行為，惹來人們的訕笑。嘲笑都還算好的，有些時候他們甚至會引起人們的憤懣。

那時候只要台灣人聚在一起，就是在說大陸來的人，也就是「阿山」的壞話。不過新莊這個小鎮，幾乎沒有阿山居住。說不斷有阿山到來，那也是台北的狀況，日本人撤退之後，他們過往在新莊的住居大部分都還空著。大陸人大量從台北湧出，大概要從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軍於內戰中敗北後，軍隊、官僚、平民大量流入台灣的時候才開始。

公費生訓練結束，包括敏臣在內的這些學生準備要離開台灣，已經是秋天的事情了。在這之前，公費生的家長打算成立一個彼此聯絡的組織。

雖然是只差一歲的兄弟，不過我也確實是公費生敏臣的兄長。在日本稱為父兄會，中國則稱為家長會。這個內地升學公費生家長會，從選出律師陳逸松擔任會長後便正式啟動。

在這個家長會上，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的廳長也有出席。名字我忘記了，因為同為大高會會員而與陳逸松先生認識，日語說得相當好，與我們交談時都使用日語。所謂的大高會，是在日本受過大學與舊制高校教育的人所組成的會。在日本留學生中被視為菁英集團。

因為是公費生，所以學費由公費提撥，但有些家長仍怕錢不夠用，所以家長會上也教導我們匯款送錢的方法。我已經任教開始領薪水，而且在台灣又沒有需要扶養的家人，所以把每個月薪水的三分之一都寄送給敏臣。

雖然國共內戰即將展開，但這個時候包括首都南京，以及其他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廣東、重慶等都還在國民黨的掌握之下。因此到大陸就學，大家認為還不是太危險的事情。

\*

新莊初級中學從四月就開始上課，但正式創校卻是由九月開始。

當時有辦開學典禮，在此並不想評價典禮究竟是華麗盛大還是質樸簡素。因為是縣立學校，從台北縣的縣長到各級長官都會列席。他們全都是「阿山」，也就是從大陸來的官僚。

首任縣長的名字叫做梅達夫。為何我竟能記得半個世紀前一位縣長的名字，那是因為大家給他取了個綽號叫「賣豆腐」。以北京話發音的梅達夫三字，跟台語發音的「賣豆腐」非常相近。當時我們之中職位最高的校長，年紀也不過三十歲（還是二十九？），其他人都還只是二十啣嘴歲，年輕人經常一起開玩笑胡鬧。

縣長的致詞當然不可能還記得，印象中有一處提到了「皇帝」這個詞。畢竟是典禮，不是

只有學校相關人士，包括鎮長在內，許多具身分地位的來賓也都出席了。縣長說話當然使用國語（北京話），一旁帶有口譯。講到某個點上，口譯突然卡彈，縣長便在講台上以手指比劃寫字，透過這方法翻譯。這時寫的就是「皇帝」這兩個字。前後的脈絡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是說今天已經是共和制了，不再有皇帝了之類的話。

開學典禮同時還有一個「文物展」共襄盛舉，用了一間教室陳列一些文物，但已經記不得是由誰提案了。文物由當地的有力人士提供，陳列的大多是清代人物的書畫，其中一幅卷軸以半展開的方式展出，我這種所見不多的人，光是看了就覺得是幅非比尋常的精美山水畫。說不定那只是一幅臨摹的作品，但當時確實是深受感動。

許久之後當我看到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相片，只覺得這與當初開學典禮時，贊助文物展的那幅讓我感動的卷軸，十分相像。就算果真如此，此畫全長達六公尺，當時究竟是看到哪個部分我也不清楚，但至少那種筆觸非常相似。說到富春山居圖，現在真品收藏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當時則應該還收藏保管在四川的某個洞窟中。畢竟是名畫，應該有許多摹本才是。或許是畫家為了自己作畫的修練而作，也有可能為了賺錢而製作的贗品。

我認為如果真的在文物展上看到富春山居圖的話，肯定是相當優秀的摹本。在蘇州有個叫做欽家的地方，有在賣摹本與贗品，雖然大眾知道那不是真品，但價格仍然不斐。即便同樣是贗品，只要知道那是欽家製作的作品，就會具備相當的「信用」。

「這幅畫是誰提供的呀？」

當時我請教擔任美術老師的杜潤庭。

「果然你也被這幅畫吸引了。這是從郭懷福母親那裡借來的。不愧是幅好作品吧。」

杜潤庭這麼回答。

郭懷福這位學生原本不是新莊人。父親是在爪哇被稱為砂糖王的華僑界大人物，本籍好像是福建廈門，在台北市另外擁有一處房產。當戰爭情況激烈時，他們也「疎開」到台北市近郊的田園小鎮新莊來。

既然戰爭結束了，郭家為何不搬回台北呢？聽說是因為終究要搬回廈門，所以打算只要搬一次家就好。杜潤庭告訴不太理解狀況的我說：

「郭懷福在爪哇的家，大到可以把整個新莊鎮都涵蓋進去。」

郭家從日本統治時代開始，好像就擁有日本與中國的雙重國籍。而郭懷福的母親是大陸人，她父親好像還是哪一省的省長。

「那，郭就是軍閥的孫子囉？」

「不過，那個人好像已經被殺了喔。」

這些資訊大多是杜潤庭教我的。從母親這邊來看是軍閥的外孫，父親家則是華僑大財閥。郭君身材高大，作為財閥家的孩子，總是穿得相當樸素。他有一個姊姊，在台北的第三女高（制度改變後成為台北第二女子中學）通學。姊弟好像都盡量過著不引人注目的生活。

不久後我得知郭懷福母親的身世，著實吃了一驚。她是遭暗殺的新疆省主席楊增新的女兒。楊增新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楊增新出身雲南，清末進士，歷任甘肅與新疆的官吏，辛亥革命之前為道員。道，在清朝地方行政上位於縣、府、州之上，例如台灣在設省之前，便隸屬於福建省台灣道。道員就是其行政長官。革命後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他繼續擔任新疆的省長兼督軍，一手掌握行政權與軍權。

楊增新並非革新派，屬於老派的政客，但人品高潔又具才幹。民國成立前後政局不穩，中國本土捲入軍閥混戰的狀態，人民生活非常辛苦。但在這種情況下，具有多民族、多信仰的邊境新疆卻維持了近二十年的安穩狀態，一般評價認為全是楊增新的功勞。

一群不滿楊增新古色蒼然老派作風的人，於一九二八年七月發動政變，暗殺了楊。楊增新過世後新疆大亂，後來擔任省長的金樹仁又是個無能之輩，讓新疆更加混亂。中日戰爭後南京政府無暇管理新疆事務，新產生的實力家盛世才藉機與蘇聯聯手，但德蘇戰爭後蘇聯情勢

惡化，盛世才又轉而接近南京政府。

——楊增新果然是了不起的人物。

時至今日，人們重新給了楊增新高度的評價。

一如預期，郭懷福只有短暫在學，很快地就轉學去廈門了。他要轉學前來學校打招呼，母親也一同前來，當時是我第一次見到郭懷福的母親。

出身雲南的郭母，是位身材高挑的美人。我還記得當時這位儀表堂堂的母親，對同來學校的兒子說：

——向老師們打招呼！

以流暢的台語命令式地要求兒子。

我與郭懷福母親見面，就只有這麼一次。據說後來郭懷福因為父親事業的關係，又前往了印尼與新加坡。

之後就不知道郭懷福的狀況了。只隱約聽說，略懂日文的他好像與日本的企業做過貿易。

\*

為了決定英語授課的教材與教科書，我記得還數度前往台北。大概都是從商務印書館或開

明書店出版的書中挑選。

我所選的是林語堂所編，開明書店出版的版本。為了幫學生準備三年後的高級中學入學考試，曾經調查過其他學校都使用些什麼教科書。結果台北縣幾乎都使用林語堂的開明書店版本。

這本教科書附了一本教師專用的使用手冊，閱讀裡面的內容，上頭寫著英語教學時，反覆練習非常重要，說明時應該盡量避免使用國語（北京話），而要下功夫盡可能以簡單的英語進行。當時看到這段話，我便決定採用這本教科書了。

我最擔心的，是能否用自己靠不住的北京話授課。其他的老師也都盤算著混用台語和日語，好歹總能教下去。只不過正式上課還是得用北京話，此時林語堂的教科書告訴我們，盡量不要使用北京話，這不是太令人感激了嗎。竟然有這樣的教科書！我便開開心心地採用了林語堂的版本。

偶爾（記得應該是一年兩次左右）會有人來台北縣看教學狀況，每次約五到十分鐘。那段时间我就會點個程度不錯的學生，問他：

How old are you?

How many brothers do you have?

後來負責台北縣的教育科視察員在某次講評中，評論說我的授課方法是英語教師最理想的教學方式，還讓我不好意思地縮了縮頭。

台北縣政府位於板橋，與新莊隔著淡水河相望，市鎮規模較新莊大一些。台北縣在日本統治時代屬於台北州，州廳位於台北市。但在中國的制度中，不會把縣與市的公所設在同一處，當時便把縣的公所（也就是縣政府）設於板橋。因此像我們學校這類縣立機構，需要辦理什麼業務時便得到板橋去。

我們教員鮮少前往，但行政人員則經常得跨河到板橋去。至少我們的薪水就必須每個月到縣政府去領取一次，而當時的交通工具僅有「渡船」而已。

我雖然領台北縣的薪水，但實際上三年內僅有一次前往板橋縣政府的經驗。那一次應該是在開學典禮後沒多久，因為我記得當時郭懷福還在我們學校就讀。前往的原因是：

——第一屆台北縣立初級中學國語比賽。

比賽於縣政府所在地的板橋舉辦。第一屆在日語裡意思就是第一回，而所謂的比賽便是要競爭分出優劣，換成日語來說，這就是由縣政府主辦，台北縣立初級中學的「國語優勝大會」。

我被委託的任務就是帶參賽學生前往比賽場地。根據縣政府發下的通知，平常家庭中就使

用國語（北京話）的學生，不能參加比賽。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畢竟從北京轉學來的學生，日常生活就使用北京話，最近才開始學習北京話的台灣學生根本無法與他們相提並論，因此才會加上這個條件。

我們一開始考慮派出郭懷福，但如果推舉他參賽且獲勝，大概其他參賽者會抱怨。如果被認定是來自國語家庭，也就是平常在家就使用國語的孩子，參賽資格恐怕會遭質疑。我忘了需不需要填寫雙親出身地的資料，但因為對參賽資格有設限，光是母親出身雲南一項，就抵觸了資格。其實以他的狀況，母親已經熟習台語，很難說是絕對的北京話常用家庭。即便如此，萬一被懷疑還是不太妙，所以高老師最後還是推薦了其他選手參賽。

高老師推薦的是一位名叫李秀卿的女學生，並且立刻展開個人特訓，之後還派了幾名老師一同護衛她前往板橋。我就是其中之一。

說來有點不好意思，搭渡船過淡水河的事我還記得，但最重要的國語比賽，我卻完全不記得了。我只確定沒有拿到冠軍，但成績應該相當不錯，因為回程時大家並沒有愁眉苦臉。在搭船回家的途中，還記得老師都慰勞李秀卿說：

「幹得好！辛苦啦！」

記憶中既不是冠軍，也不是殿軍，所以應該是亞軍吧。在船上的時候，李秀卿一直抱著

類似獎狀的東西。

渡船是最原始的那種，在船頭划槳咿咿啊地前行。那天的事情大致都忘了，不過對李秀卿十五分鐘左右的演講題目，卻不可思議地記得很清楚。往後想要自我激勵時，這題目就會脫口而出。

——學生應該埋頭苦幹。

「這題目會不會太硬、太嚴肅啦？」

杜潤庭好像不太贊成，但既然是國語的比賽，最終還是以國語老師的意見為準。

「不會啦，這題目就帶著一種悲壯感不是嗎？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很悲壯啊。」

鄭校長也如此贊同。

對學生而言，從「あいいうえお（aiueo）開始，花了六年時間學的日語全都作廢了，今後得改學國語（北京話）。難道这不悲壯嗎？而且一開始學了六年的日語，還是與他們母語大相徑庭的外語。

（在年輕的時候遇到這種事，其實還算是幸運的了……）

最終只能這麼自我安慰。

要開始學習新語言，年紀越輕越有利，這是不變的法則。在這層意義上，被我們教導的學

生，比身為教導者的我們更有利。

必須忍受艱苦埋頭苦幹的應該是我們吧。如此一想，或許就是在這種思考下，才會想出這個題目吧。

在那個時代，不只學生，連我們這些教師都還很年輕。

這個國語大賽，不知之後是否還有舉辦第二屆、第三屆？至少在我腦袋裡，就只記得這麼一次。

## 消逝的牧歌時代

一九四六年，戰爭結束的隔年，實在是慌亂的一年。

決定回到不太熟悉的台灣，回來之後我很快就成為新開設的初級中學的教師。

弟弟敏臣被選為內地升學公費生，公費生可以到大陸各地的大學就讀。敏臣在中文研修期間結束後，也於這年內進入上海的暨南大學。雖然新學期九月便已開始，不過台灣學生卻得等到十月才出發。

公費生由基隆乘船，前往大陸各地的大學。我也陪著弟弟到基隆，感覺來送行的家長人數並不多。想來這些學生都已經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只要放假立刻就可以回來，還特意來送行或許有點太過誇張。而且公費生是從台灣各地招募來的，他們在各自的家鄉應該早就辦過送別會了。

基隆港的船埠，過往停泊著定期開往神戶的大阪商船或近海郵輪，現在則停著往返上海，名為中興號的船隻。比富士丸或高砂丸稍微大些，還稱不上豪華客船的程度，不過也是超過



一萬噸，相當具有分量的船隻。該船會定期航行，相當可靠。船期是星期幾現在已經忘了，不過當時只要看到該船抵達，便可以知道又到星期幾了。

——上海與基隆，今後將成為我國海運航路的幹線。

當時海運相關人士經常這麼說。

在雄偉的中興號作為背景下，公費生在碼頭上集合。當時以為是全員集合，不過仔細一想，便會發現去廈門大學或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並沒有必要行經上海。所以應該是除了前往廈門與廣州的人之外，全員都到齊了吧。

不管如何，這恐怕是本次一百名公費生中的大部分人，能齊聚一堂的最後一天。之後就算放假返鄉，再從家鄉返回學校，他們已經不會再有這樣的團體行動了。

根據報紙的報導，北京與上海附近的學潮越來越興盛，到處都有警察與學生對立，偶爾也會發生暴力事件。公費留學生就在這波學潮當中前往即將就讀的大學。

台灣學生不太習慣中國的「學潮」。然而從報紙或雜誌的學潮報導中，經常可以看到上海復旦大學與暨南大學的名字。

——連話都還不太會說，萬一情況危急的時候千萬別露臉呀。  
我們這些家屬大概也只能提出這種程度的建議。

一百名公費生之中我所認識的，僅有台北二中畢業，後來進入日本中央大學的杜長庚而已。可是一經交談後，發現杜長庚是這群中最偏激的，讓人不禁擔心起來。除此之外，面對這群初次碰面的人，敏臣也介紹了幾位與我認識。其中一位便是羅美行，往後他都使用白明這個名字。像這種不願給台灣家人添麻煩而取別名去參加學生運動的人，也不在少數。

姓白名明，反過來念就是明白。中文裡的明白，就是「我懂了」的意思。相反的意思就是「我不懂」，而這也是把明白反過來，取名白明的理由。

白明到上海不久也捲入了「學潮」的漩渦當中。他是從仙台舊制高校回國的人，台北二高時代還是位馬術選手。上海當時為了鎮壓學潮，官方動員了警官，其中包含了一隊騎警，似乎準備好要衝散學生。白明不怕馬，而且他觀察那些馬匹，發現牠們都屬於「殘留馬」。

在戰爭期間，日本從國內運來了大量軍馬，等戰爭結束後，士兵一批批被送回日本，但軍馬一匹也沒回收。這些馬就成了所謂的「殘留馬」。既然是殘留馬，白明就更不怕了，因為他跟這些馬言語相通。白明悠然地走入等候衝散學生的馬隊中，對馬囁嚅了幾句後拍拍馬屁股，馬便轉頭往右邊走。一頭接著一頭，只要白明靠近的馬，都轉頭朝右轉往後邊走去。

這件事相當知名，當時報紙還寫了「學生愛國的熱情，連馬匹都感動得撒離」的報導。二十年後進入文革時代，白明卻因為這件事情被說成與警察有所勾結，還因此受到相當的清

算鬥爭，這是後話。

送走敏臣之後，記得公費生家長會有舉行集會，討論的內容大概都是有關於如何給學生送錢的事。公費生中有幾位，當他們返鄉時，我還曾在台北與他們短暫相遇。在台灣與大陸交通完全斷絕之前，剛好有半數的公費生返回台灣。而杜長庚與白明則都留在大陸。

留在大陸的「殘留組」與返回的「歸台組」，剛好人數各半。殘留組往後四十年都沒辦法回台灣，不過當時大家自然還不知道這些事情。我除了星期日之外，每週會騰出一整天的休息時間。那一天會搭巴士或騎自行車到台北，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要辦的事情，就是去見見朋友，到書店巡看一下，偶爾也到市場攤販去吃點東西。當時我最喜歡的休憩場所就在永樂町<sup>1</sup>的市場，不過現在該市場已經消失了。攤販小吃中我喜歡的是「燒肉圓」，大概一個拳頭大小，皮不是由小麥粉，而是以芋粉為主材料做成。往後也見過、吃過較小的燒肉圓，自己也曾在家試著做過，但一直沒見過像永樂町市場販賣的那麼大的肉圓。永樂町在光復後改名為迪化街，不過當時幾乎沒人使用迪化街這個名稱。迪化是烏魯木齊的漢名稱呼，那一帶都是盤商聚集的街道。

針對個人客戶直接販賣的商店，多集中在「大稻埕」，日本時代稱為太平町，光復後則改為延平北路。

現今要從新莊進入台北，已經築了幾座跨越淡水河的橋樑，但當時只有一座「大橋」<sup>2</sup>。由新莊前往台北必須通過這座大橋，下橋後接上的就是繁華大街太平町通，也就是延平北路。

\*

當時與朋友見面大概都在這些地區。在這個時間點上大概已經改名了，但我們仍習慣稱永樂町與太平町。這些地段都是大直道，與人相約相當方便。或許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怎麼老是會在這幾處遇到朋友，那是因為這大道與其他街道不同，商店眾多，光線氣氛都很明亮之故。與永樂町出身的杜長庚見面時，而不是約在永樂町而約在太平町，記得那次見面應該是繼去基隆送他前往大陸後隔年的暑假吧。

「大概有段時間無法碰面了吧。因為必須與餓到皮包骨的人一同奮鬥……。」

他這麼一說，我立刻察覺背後還有含意，但也只能回答：

「是嗎？那請加油吧。」

與他再次相見，已經是四十年後的事情。碰面場所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他的房間裡，此時他擔任著外事主任的職位。他告訴我自那次與我在台北別離後，就加入了浙江的游擊隊。有關

游擊隊的話題非常有趣。有次他們被國民黨的軍隊追擊，他們便沿著一座小山丘逃，逃著逃著繞了一圈，竟追上對方部隊的尾巴，接下來換成對手開始逃跑，游擊隊「沒辦法」只好展開追擊的狀況。說到這裡兩人都忍不住笑了出來，不過在當年的那種危急狀況下，這可不是什麼好笑的事情。

我從一九八〇年代後半到九〇年代前半，對「孤島文學」產生了興趣。去上海社會科學院造訪杜長庚也是為了這個原因。所謂的孤島，指的就是上海租界，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向英美宣戰為止，租界就宛如孤島一般。在日本佔領下的區域無法出現抗日運動或發出抗日論述，但一進入他國租界後就可以了。當時租界發行的雜誌與書籍，刊登了在日本佔領下不被允許的言論與藝文作品，這些便統稱為孤島文學。當日本對英美宣戰後，這些東西應該都遭沒收與毀棄。到了戰後，當時的這些文學大致上都獲得整理修復，但我認為應該還留有一些其他作品，因此才來造訪社會科學院，而我這位過往的游擊隊鬥士好友，也全面地提供協助。

大約在送走公費生的前後期間，我巧遇了大阪外語小我一屆的學弟楊克智，地點果然又是在太平町。他屬於關西方面學徒出陣的一人，當時我一路送他到大阪港，從那次相別之後，一直到這次巧遇才又再見。

我們聊了一些他回國的經過，並告知當時他留在住宿處的行李都已由我父親代為寄回，有鑑於當時海上情勢相當不安穩，行李竟然還能寄達，簡直可以說是奇蹟。他告訴我當天他只是來台北辦點事情，其實現在已經在故鄉台南找到教職。同樣屬於關西集團的李登輝，距離他擔任總統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而這個時期還沒有什麼特屬於他的專有稱號。

到台北，好幾次都是去拜訪何既明。有次還停留得太晚，在他家借住了一宿。記得那是為了舉杯慶祝他順利轉學到台灣大學醫學院。

當時適逢何家在整修，而且還沒完工。跑到人家還在整修的宅邸去借宿，實在有點失禮。況且他家又是米穀商人，大家進進出出，我突然逗留一晚肯定給他們添了不少麻煩。

當時我都從叔父家到學校通勤，騎自行車大約十分鐘，午餐時間仍回叔父家用餐，不過我自己也發現這樣似乎太依賴叔父了。

正好當時學校開始在討論準備宿舍的事情。過去教員都住在新莊附近，原本不需要宿舍，不過因為校長家由他弟弟負責處理生意，而當校長的哥哥沒有自己的住處，說來實在不太方便，因此才提起此事。

新莊鎮的有力人士於是開始商量要替中學校長準備宿舍。恰巧，當時有空出一個相當寬廣的宿舍。那就是原本由日本人搭建的「新莊神社」神主住家，也就是廟祝的住家。

當年不管日本人去哪裡，都會建造神社，大概是當作一種征服的象徵吧。征服行動結束後人們撤走了，而神社的正殿因為難以移作他用，往往任之頹圮，但神主的住家還能使用，所以就照原狀保留了下來。

台北也建有「台灣神社」，可以說是台北各地神社的總公司（日語稱「本山」），不過戰爭期間因火災燒毀，原址之後建了圓山大飯店。

新莊鎮人口大約一萬人，加上附近的聚落頂多也只有兩萬人，其中日本大概不滿千人。神社作為征服的象徵，也會強迫台灣人必須前往參拜，而為了展現征服者的威勢，征服者便把神社蓋得頗為宏偉。特別是在過去淡水河河道還夠深的時代，新莊曾經是一個繁榮的港鎮，之後才逐漸衰微，因此舊時的寺廟建築，與稍後的市鎮規模相比，往往給人超過需求的宏大感。新的神社或許也承繼了這個傳統，所以蓋出了超過新莊鎮需求的龐大建築，而神主的住家也較平常的規格來得更寬廣。

神務所（神社辦公室）與神主的住家是完全分開的，鄭校長與夫人帶著兩個還小的孩子，在此處過著一家四口的日子。那時校長問我：

「我一家人只需要神主的住家空間就足夠了，舜臣你要不要住外側的神務所區域？」

我抱著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項安排。從這裡到學校，只需步行五分鐘。

關於怎麼吃飯，這麼說好像有點不太負責，不過我真的記不太清楚。叔父家是農家，因此隨時去都有飯可吃。叔父家不管何時總有幾位按季節來幫忙的工人，叔父總讓他們隨意在碗公裡盛米飯，配上花生或醃菜填飽肚子。台灣是橫跨亞熱帶與熱帶的島嶼，因此服裝上不需要過於費心。在台灣只要不是太奢華，其實日子還挺容易過的。

在學校的時間，飲食會由商家外送過來，只要下訂即可。因為那時沒有電話，所以會請校工謝溪先生幫忙訂餐，偶爾也請學生幫忙跑個腿。

這段時間雖然已經聽到責罵蠻橫「阿山」的言論，但在新莊暫且還看不到這些挨罵的主角「阿山」。

我們鎮上理髮店中有一位福州人，戰爭期間經常被日本警察責備「不夠衛生」。對於從戰爭時期便居住於此的人，我們並不稱他們「阿山」。只有在光復後，逞威風囂張的外省人，才是所謂的「阿山」。

我們的國語老師高慧貞女士是江蘇省鎮江人，她也不是我們所稱的「阿山」。因為她在戰爭期間便與前往大陸的台灣人結婚。她的丈夫是擔任水利組合理事長的洪金益，不僅是台灣人，也是堂堂的新莊之子。她的台語比我們還要流利，偶爾也會跟我們一起說「阿山」的壞話。

過往曾是繁榮的河港市鎮，現在卻成為夕陽小鎮。即使有搭巴士前往台北只需三十分鐘的優點，人們仍不願留在新莊，造成人口持續外流。

曾有人提議，可以打出：

——沒有阿山，令人心曠神怡的市鎮。

以這樣的口號來振興市鎮發展。但也有人告誡：

——這種說法太不謹慎了。

我從過去賣「御守」（護身符）的神務所窗戶仰望青空，沉浸在牧歌時代的氛圍裡。但牧歌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

## 一二一八事件

或許因為我是在神戶長大的，所以很喜歡港都，比起台北，我更適應基隆的氣息。由於距離台北不算太遠，休假時我經常前往基隆。

蔡東興的弟弟就住在基隆。蔡東興是過去我在神戶北野町時的鄰居。他弟弟在基隆經營的公司，商號與神戶的公司相同，都叫怡利公司，我曾去拜訪過，還接受了一頓款待。當時的台灣，只要在吃飯時間到人家家裡去，都可以放心在餐桌前坐下來。

基隆的蔡家也是貿易商，他家經手的商品項目與我家相同，是以海產為主的食品與雜貨，與我家在神戶的公司屬性相同。蔡東興過世的父親是神戶台灣人的長老，過世之前一直擔任台灣同鄉會的會長，而我父親與王昭德擔任副會長。蔡東興父親過世後，王昭德升任會長，我父親則繼續擔任副會長。不過除了台灣同鄉會之外，還有一個實際情況不明、叫做台紳協會的組織，每年固定設宴聚會兩次。似乎是個什麼都不做的會。

「光是吃飯的會，還不如就停辦吧。」

年輕時我不懂事，曾經這麼說過。

父親則說：「事情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從大家那邊籌得的資金，即便想歸還也沒人願意領取。現在只要每次宴會吃掉的費用都超過利息，一段期間後本金就能順利花完。」

事情源頭得追溯回明治時代。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功進行了近代化改革，得以與歐美各國並列為經濟先進國家。這肇因於日本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可供驅使。日本國內確實有廉價的勞動力可以使用，但在日本的周遭，其實還有更廉價的勞動力來源。

那就是從韓國（朝鮮）、台灣等殖民地流入的，薪資低廉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量勞工。如果沒有這些勞動力，很難想像日本的經濟力還能如此強大。

台灣的勞工大多都在九州の煤礦坑工作。煤礦公司將他們與外界隔離，而且礦坑宿舍受到嚴密監視，根本無法外出一步。

薪水則以「金券」方式發放。說是金券，也不過就是張紙片，無法在礦坑商店之外的店家使用。煤礦公司還會大量借錢給工人，說是借錢，借給工人的也是金券，對公司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根據父親的說法，煤礦公司很歡迎工人借錢，因為在礦場沒有其他的娛樂，賭博盛行，公司方面默認這種事情。

賭贏了就把錢全拿來喝酒花掉，輸了就向慷慨的公司借錢。等到察覺狀況不對時，大家都已經欠了一屁股債，而且欠款額度都非常高。走到這個地步，他們終於覺醒了。

——他們只靠一些紙片，就打算綁住我們，一輩子當奴隸使用。

——誰能忍受當奴隸啊！

——不管如何，先從這裡逃出去吧。

——聽說到神戶就有開往台灣的船。目標首先瞄準神戶！

聽說一開始來了五個先遣部隊的人。其中有幾位似乎會說一點日語。當時的台灣還有些人留有清朝的髮辮，因為辛亥革命還沒發生，台灣之外的華僑都還留著髮辮。逃走的礦工總算來到神戶，四處找尋留髮辮的人乞求幫助。

——還留在山上但想回台灣的友人，至少有百人以上。  
他們如此訴求。

這件事情並不容易辦。要收容一百多人，騰出一間倉庫或許容納得了，但還必須籌措一百多人返回台灣的船票費用。住在神戶的台灣人，為了救助同胞開始了募款活動，五人先遣部隊已經先回台灣，之後船資也籌到了，但那一百多人卻遲遲沒有出現。或許在那之後，礦坑的警備變得更加嚴厲了吧。

集資之後一百多人卻沒來，讓這筆資金就這麼懸在半空。之後這筆資金就成為台紳協會的

基金，從明治時代起作為會員聚餐費用，一直延續到昭和時代。

人不管在什麼時代，都會有想要幫助同胞的精神。集資當時並非只有台灣人出錢。那五位逃出來的礦工，在神戶最初似乎是向廣東人求助。當時來到神戶的台灣人，半數以上都已經不留髮辮了。因為已經算是日本國籍，不需要遵守清朝規定必須保留髮辮的法律。清朝亡於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時，日本是明治四十四年。

我在經常造訪的基隆，曾偶然遇到過去在父親公司有一個辦公座位的客商林天俠。他是特高事件的主角，遭日本驅逐出境。依據特高沒收的文件才知道他對父親有過背信行為。他見到我時，應該帶著相當複雜的心情。他對我說：

——如果您有寫信給令尊，請幫忙轉達，說我十分思念他。

他以永春地方帶有強烈腔調的發音，把「思念」說成「焦念」。那種曲折的發音一直殘留在我的腦海中。

對於回台灣後第一個度過的正月，並沒有留下太多印象。這裡當然是指農曆新年。過年自然有人辦桌請客，不過這種事情一年到頭都有，或許因此才對正月沒有特別記憶。比方觀世音菩薩的誕辰啦，某某將軍的忌日等等，都會有人辦桌。

某天，聽到一陣敲鑼打鼓，有人宣布：

——今天是咸豐某年，某公等四名的忌日，將辦桌請客，供奉牲果……。

而且繼續四處周知。詢問鎮上耆老，也沒有人知道這個祭典的詳細起源。比較多的說法是，這天是與鄰鎮械鬥的紀念日，至於鄰鎮，就是與新莊隔著淡水河的板橋。板橋人多出身漳州，我們新莊則多為泉州人，稍微遇上點什麼事立刻就會打架，這就是所謂的「漳泉拚」。

拜土地公的日子，會安排不要與鄰近地區的祭祀重複。如此便可辦桌兩次。例如萬華與新莊就分別辦在農曆五月一日與五月十三日，萬華何既明那邊先辦桌請客，大概兩週後便輪到我們這邊招待他們。

\*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端於台北的紛爭，成為台灣近代史上最大的事件。實際上事情發生於二十七日的傍晚。台北大稻埕附近有人檢舉販賣私菸。台灣從日本時代起，香菸是由專賣局統一販售。戰後中國接收台灣後，台灣之外的地區都可自由販賣香菸。

是為了充作政府財源，才保留日本時代的專賣制度。他們說日本的東西全都是遺毒，應該盡量消滅。但是在中國其他省分都沒有施行的香菸專賣制度，卻繼續實行。因為他們不認為香菸專賣是日本餘毒，而是方便的制度。

上層外省人大資本家從上海一帶輸入香菸，底層的台灣零售商人則負責販賣，而菸販大多是靠此為生的窮人，其中又以女性居多。販菸適合不耐體力活的女性與小孩從事，是社會底層邊緣人的賺錢管道。

台灣的專賣局，有專門取締私菸的組織。他們的穿著與一般警官無異，有時候還穿得比一般警官更有派頭。而且確實起了個「糾察隊」的名稱。

二十七日當晚，六個糾察隊員舉發了一位中年寡婦販賣私菸。販賣私菸時會把香菸排列在小台子上，一人來取締，立刻把台子折起來，像背皮包一樣背著台子上附著的背帶，如此便能趕緊逃跑。當天的取締屬於突襲，那位寡婦來不及逃跑，私菸商品與收入皆被沒收。

這些香菸說是商品，其實是菸販向供貨的上家借來的東西，就算全部賣完，下家零售者也只能獲取微薄利潤。遭檢舉後販賣收入與商品皆被沒收，那位寡婦就必須賠償上家。因此她拚命哀求取締者歸還沒收的商品與金錢。

六個糾察隊員自然不聽她的哀求，一腳踢開緊揪隊員的寡婦，並以當時所持的槍械擊打寡婦的頭部。大稻埕即便到了傍晚，過往的人潮依然很多。看到寡婦被踢開且遭槍械毆擊頭部，民眾群情激憤，痛斥糾察隊員。那些隊員懼怕圍聚過來的群眾，一邊逃走一邊開槍，最後逃至附近的警察局。

他們當時的開槍，造成了一個人死亡。因此群眾聚集越來越多，包圍了警察局。最後是由武裝的憲兵隊把他們從警局中帶出。群眾則點火焚燒專賣局車輛以壯聲勢。遭焚燬車輛中堆放著專賣商品，那不僅是貧苦菸販，也是一般大眾怨憤的標的。

那麼為何二月二十七日發生的事件，要稱為二二八事件呢？有一個說法是二十七日受流彈波及而亡的只有一人，但到二十八日當天，死亡人數卻增加到六人。無論如何，這個引發數以萬計犧牲者的事件，不管是二十八日也好，二十七日也罷，總之香菸事件發生於二十七日。往後國民黨的情報軍官，還提出一種神奇的說法，認為這次檢舉私菸並非偶發的事情，而是共產黨員約定以二月二十八日為期所引起的計畫性陰謀。

因為二二八這組數字內，出現了兩次「二」，最後以「八」做收，排起來不正好是一個「共」字嗎？

這個軍官還巡迴全島，到處散播這個說法。當然沒人相信他這套說詞，不過，作為台灣人把至今為止累積的怨憤暫時抒發出來的一天，大家都記住了二二八這個日期。

這一天台灣人開始抗議前一晚發生的事情，並要求要處罰負責人，場地則選在行政長官的公署前。一開始大家到專賣局抗議，因為沒有進展，改前往拜訪台灣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不過這個老奸巨猾的男人並未現身。



前晚的事件立即傳遍台北，引發群情激憤。原本台灣人對阿山的感受，是一種期待之情，但是發覺自己遭受背叛後，失望感不斷增強，最後終於轉變成憎恨。會把大陸來的人叫做「阿山」，其實帶有五十年前甲午戰爭時保護不了台灣人、現在還敢盛氣凌人的情緒。這種情緒宛如火山熔岩，隨時都在等待爆發的時機。

行政長官公署前負責警備的衛兵，必定感受到那股熔岩即將爆發的情緒，恐懼開始蔓延。他們都是荷槍實彈，為了保衛長官而選拔出來的精銳部隊，並獲授權得以臨機應變採取行動。面對這樣的情況，衛兵的指揮者肯定判斷，遭包圍的長官公署受到台灣民眾的襲擊，因此下令開槍。

群眾在槍聲中四散。之後留下了六具遺體。

這件事情很快在台北市內廣為周知，消息也傳到台北近郊。當然傳遞的消息並非完全正確。人口約一萬的新莊，沒有任何一戶平常人家的家中擁有電話。鎮公所、農會、水利組合、學校等單位是有電話，但像是新莊中學，除了與縣政府聯絡以外並不太使用。對方家中沒電話，想撥也沒辦法。平常需要打電話的人，可以到公所、組合或學校借用電話。聯絡完畢之後，再撥一次給台北的電話局，問剛剛那通電話的費用是多少，然後付給借電話的單位。

即便在那個通訊不太發達的年代，這樁發生於台北的事件仍以極快的速度傳播開來。長官公署前死傷者人數，也從個位數到百位數不等，跑出了各式各樣的說法，我們位於新莊，其實並不清楚事情真相。只能等在台北工作的人回來後，從他們口中聽取資訊，儘管如此仍然摻雜了許多不同版本，而廣播電台都是「阿山」的，因此最初的時候大家並不信任廣播。

彷彿為了替長官公署前的悲劇討回點公道，接下來最熱烈的話題，就是如何對「阿山」展開報復。

人們開始在街上抓住阿山，施以老拳加以制裁。不過要如何判斷是否為阿山，也是個問題。一開始嘗試以是否能講台語來區分台灣人與阿山。通常台語是指閩南語（福建省南部方言），台灣人之中約有八成通用此語，但客家人並不使用。與少數原住民溝通用的語言則是日語。

以日語攀談，如果對方沒法回答，應該就可以認定是阿山。有些年長者或未曾就學的台灣

人也不懂日語，這種時候就憑感覺分辨。

——你是蕃薯還是豬？

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是台灣人，應該會回答「我是蕃薯」。大家看台灣地圖，形狀就像蕃薯。台灣人從以前就自稱「蕃薯仔」。而「豬」自不待言，是指阿山。

打阿山——這樣的行動，不僅在台北，也在台灣省各主要都市展開。

＊

二二八這個字眼，對台灣人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外省人的官僚、警察殘酷地射殺台灣人，才造成了這起事件。最初僅是台灣人為了復仇，只要確定對方不是台灣人，便開始毆打這些外省人，就是如此單純的連續事件而已。

這與世界各地發生的民族紛爭雖然相似，但不管台灣人或外省人，都屬於同一民族。我戰後才踏上的台灣土地，五十年前因甲午戰爭割讓給日本，居民也因此成為日本國民。

在此之前台灣人「清國人」，不只是台灣，滿族以外的中國人都對身為「清國人」這件事情懷抱著複雜的情感。即便如此，台灣人也沒有因為成為「日本領民」而沾沾自喜。之後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中華民國成立後，大家那份複雜的情感才暢快許多。

一九三六年，台灣最具代表性的仕紳林獻堂，於上海發表了一場名為「我回到祖國了」的演講，造成相當大的問題。這句話其實是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口頭禪，說了應該也不至於有什麼問題，但日本軍方相關人員卻雇用了一些暴徒，在園遊會上襲擊了林獻堂。這就是「祖國事件」。

在「祖國事件」發生後不到十年的一九四五年，台灣便回歸祖國了。台灣人憧憬著祖國，並對「光復」感到狂喜。但這段狂喜的期間卻極其短暫，台灣人很快嚐到了深刻的失望。從希望到失望間的落差，如此巨大。

幾乎可以用急轉直下來形容這種激烈的變化。

——不應該如此。祖國應該不會如此對待我們。只要等陳儀那群人離開，就會改善許多。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對祖國還有所留戀，所以抱有這種期待。可是，光復後一年又過一些時間，大家逐漸理解，不管如何等待，終將是徒然。

專賣局持有武力，而其他機關也同樣擁有武裝。例如鐵路就有鐵路警察隊，三月一日引發開槍殺人事件的就是他們。他們對一群來問列車何時出發的學生開槍掃射。

憤怒又激動的民眾前往鐵路管理局抗議，當局請來的軍隊卻出動了裝備機關槍的卡車，開始向街頭掃射。據說此時出現了約三十名死者，傷者則超過百人。

宣布戒嚴，一夜槍響不絕。不知道軍隊是要狙擊平民，還是要進行威嚇。恐怕兩者皆有吧。當天我留在叔父家中。外面傳來啪啪聲響，隔壁的爺爺還一派悠閒地說：

「那是爆竹的聲音嗎？唉呀，今天是哪裡辦廟會呀？」

不過從集會回來的叔父則邊搖頭邊說：

「阿山好像在反擊啦。我們這附近還沒有人找過阿山的麻煩，如果能不出大亂子就好啦。」騎自行車到台北的大橋，大概是花不到二十分鐘的距離。

當時借用叔父外屋，名為阿昌的老人大聲說：

「喂！大家有聽說嗎？是共產黨啊。從基隆一路殺過來了。一群穿著全紅制服的軍隊。從來沒看過那樣的軍隊呀，穿著紅色制服的軍隊。唉，大家打算怎麼辦？要逃去哪裡？舜臣呀，你知道共產黨的領導嗎？那傢伙，懂台語嗎？」

阿昌爺爺在哪裡聽到這些話的？或者只是他信口胡謔也說不定。周遭的人只擺出阿昌又開始「發作了」的表情。

大家雖然稱他阿昌爺，但並不知道他的年齡，只知道他孑然一身，據說他的妻子逃婚了，而結過婚的證據，就是與他共同生活的一個兒子。

當日本展開對南洋方面的戰爭時，他兒子被以「軍夫」的名義徵召了。雖然說是志願制，其實是強制徵召。

他的兒子成為軍夫，肩上披著紅布條被歡送上戰場，且就此一去不返。因此才說阿昌爺孑然一身。可是，阿昌爺好像不認為自己的孩子死了。實際上那段期間仍有一些派往遠方的軍夫，因為某些情況復員返鄉較遲，偶爾仍能回來台灣的情況。

——可是，就像舜臣一樣，不就是遲了一些嗎？一同出發到現在還沒回來的人還很多呀。

阿昌一口咬定地說。

他既不識字，也不瞭解世間的一般常識。

有些人質疑說，

——老爺爺，最近是不是腦袋有問題啦？

也有些人回答得更刻薄：

——說什麼話，老爺爺跟以往一樣啊。那個啊，是他從小時候腦袋就有問題啦。

把從其他人那兒聽來的話現學現賣，他還不至於說錯，因此也不至於讓人覺得太奇怪。他最喜歡的一段，是一個有關渡船的故事。船夫開航的時候，吆喝說，「來！開船囉。從現在起不管颶風還是起浪，大家都休戚與共了。」其中一位身為大地主的船客卻囂張地說，「我的命運跟你們才不一樣」，但接著風一颶，顛覆了船隻，最終大家仍舊是一樣的命運。

——三重埔（位於新莊與台北之間，現在的三重市）流傳一個結尾不同的版本。翻船時乘客彼此互相幫忙，但有錢人因為態度囂張，身軀又肥大，結果沒人出手搭救，最後只有大地主一個人溺死了。他說我的命運跟你們才不一樣，這結果倒也符合他自己的說法。

阿昌甚至連不同版本的故事都能正確無誤地介紹給其他人。

「要逃就要趁現在。我也打算逃走啦。兒子回來了如果找不到家人，那不是很困擾嗎？但如果共產黨來了我也要逃跑囉。」

阿昌兩手盤胸，挺直腰桿擺出一副很了不得的樣子。

阿昌爺因為賭博賺了點小錢，找了個算命師。那個算命師算出阿昌爺的兒子還在南方的小島上活著，告訴阿昌爺說還在等船。阿昌爺不管找誰算都得到相同的結果，因而藉此安慰自己，認為這結果肯定沒錯。

不過，我認為阿昌爺其實也隱約知道兒子大概已經死了吧。

這樣一來他只能孤單地活下去。他會說服自己兒子還活著，或許是委婉地希望能與其他的乘客享有共同的命運吧。

但從台北傳來的聲響並非爆竹，而是槍響無誤。此時軍隊還算少數，對於佔壓倒性多數的民眾力量，感到恐懼。

當時收音機已經普及，內容大致播放著官方的新聞，以及廣播藝人說的單口相聲——在日本應該叫做「漫談」，相當受歡迎。加上當時撤退回國的日本人放手釋出收音機，也讓新莊附近的廣播較為發達。

行政長官陳儀與大家約定，戒嚴令將於二月一日深夜解除，但看似完全沒有要解除的樣子。

\*

有人一語道破，說應該以軍閥時代的想法來對應這種情勢，果然是很中肯的看法。對長期待在大陸的人而言，這種時期執政者會採取什麼行動，大家都很清楚。

在大陸正值與共產黨對決的最後階段，重兵必須放在對岸。為此，當下台灣只調來最低限度的兵力，對他們而言，目前台灣缺乏鎮壓「叛亂」的武力，所以必須緊急從大陸派遣「鎮壓軍」來台。

這個調遣大概需要數日時間。為了爭取這段期間，才會表現出違心的讓步之舉。

曾經在大陸經歷過各種謀略的「台灣人」都心知肚明，陳儀提出的幾個讓步方案，不過是賺取緩衝時間的伎倆。但這些瞭解狀況的人，畢竟是少數派。

陳儀只是在等待軍隊到來而已。原本陳儀計畫調動台灣南部軍隊北上，但因新竹市民等在鐵道上阻攔，讓他未能如願。另一方面從數量上來說，確實也必須仰賴大陸派遣的增援，而擁有最高決定權的蔣介石，肯定認為不能放任台灣這狀況。原本在與紅軍的對決上，一兵一卒也好，都希望能盡量增加人數，但因應陳儀的請求，此時只得含淚決斷分兵增援台灣。

三月八日，國民黨憲兵隊第四團搭乘「海平號」抵台，接著二十一師團的八千士官兵也搭

乘「太康號」上岸。這些部隊與之前駐台的「阿山兵」不同，是配備美軍轉讓武器的軍隊。他們從最初即被告知，因為在台灣有敵人，所以必須前往執行戰爭任務。登陸的時候他們便開槍迎擊。二月二十八日當天雖然也有開槍，但新莊幾乎聽不到聲音。三月八日的槍聲，因為有萬餘人的軍隊臨陣胡亂掃射，聲音就非同小可了。其中還包含了一些機關槍。

當時學校已經放學，因為學生幾乎都是新莊人，在這點上似乎不太需要擔心。

當時聽得出來那可能是槍聲，卻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過幾天前，陳儀還公開認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sup>1</sup>，也禁止士兵出現在街上。原來從一開始他就沒打算遵守這項約定。

處理委員會的宣傳部長王添灯<sup>2</sup>之前在廣播上指摘說：

——雙方都已經那樣約定了，穿著棉襖的男人還是悠閒地走上街頭。

駐守台灣的國民黨士兵，都穿著棉襖軍服。

陳儀應該打電話與大陸方面聯絡過了。聽到王添灯的廣播，陳儀大概在收音機旁冷笑吧。聽說從大陸打來的電話通知說，增援軍隊分乘海平號與太康號，已由上海出發，而陳儀準備要幹的事情，此時就已決定了。增援部隊抵達的同時，立刻宣布處理委員會為非法組織，接下來就要展開虐殺。

除了毫無分別的濫殺外，還有鎖定特定目標的政治性殺人，更有報復性的殺人計畫。陳儀的下屬肯定急忙製作了黑名單。

陳儀許可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了要提出給當局的要求事項，當時正忙於整理文書。與此同時，陳儀也在撰寫宣稱管理委員會並非合法組織的文件。

當時我所聽到的槍聲，究竟殺死了多少台灣人？

只在遠處聽聞槍響，讓我感到非常內疚。隨著那些槍聲，同胞的性命一個一個隕落，而自己當時對此沒有切實感受，讓我至今仍懷抱著罪惡感。如果被問到當時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聽著那些槍響，我只能回答：

——懷著滿心的祈禱聽著。

如果問我祈禱些什麼，就是祈求實際聽到的那些槍響，不是恐怖的殺人槍彈聲，而只是威嚇用的空包彈聲響。

雖然聽見聲音，但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想要聽到接近事情真相的談話，得等到許久之後了。

當時許多人都喪失了性命。於日本長大、在台灣幾乎沒有熟人的我，少數交往不深的友人中竟也有遭槍擊（或刀傷）而殞命的犧牲者。

返台之後我曾有段時間考慮是否能在大學過著研究生生活，因而前往拜訪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文學院相當於日本的文學部）。這位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後於母校東京大學取得文學博士學位的飽學之士，面臨台灣的現狀也無法沉默以對，因此成立了「民報」報社。而《民報》的論調肯定引起陳儀一幫人的不快，把他當成敵對者加以殺害。

——先拿論文來。

台灣的第一位文學博士<sup>3</sup>曾對我這麼說，當時的話語依舊在我耳邊。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得知自己也在黑名單之列，連忙藏身友人宅邸，才倖免於難。陳儀這幫人，把所有的台灣知識分子都視為敵人。

以前在神戶遭受空襲的時代，我們全家曾疎開到神戶北野町，當時隔壁的蔡東興也搬了過來，在北野町成為鄰居。蔡東興夫人王氏有兩位優秀的弟弟，兩人自台北高校進入東京大學，畢業後哥哥王育霖通過司法考試，在日本成為檢察官（日文稱「檢事」），之後他和我同時期回到台灣。在台灣他當上了法院檢察官，並嚴厲舉發阿山的貪瀆行為。

他自知也在黑名單上，因此打算逃到某處，卻在避難途中遭逮捕。對方翻開王育霖的西裝內側，確認上面縫有「王」字，便當場帶走。這位具有強烈正義感的法院檢察官，身影不復得見。他的弟弟王育德是明治大學的教授，不管什麼情況下都拒絕在西裝縫上姓名的服務。

之後他投入台灣獨立運動，可惜壯志未酬，於前些年已然過世。

我雖然不認識本人，但在廣播上經常聽到聲音的王添灯，也遭人殺害。他是知名的茶商。民族資本家陳忻<sup>4</sup>，我只聽過他的名字，他因為抵抗浙江財閥，因而被浙江出身的陳儀盯上。他從家中被人帶走，大家都不相信他也遭殺害了。

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人數，據說有兩萬人到三萬人，而從台灣的人口統計來看，當年人口較前一年減少了約六萬人。

＊

根據鎮壓台灣人的國民黨政府的說法，二二八事件是暴徒的陰謀。

在三月十日的紀念週上，蔣介石發表了對於此次事件的演說。紀念週就是為了紀念孫文，各機關單位於週一舉辦的儀式。儀式首先會由機關首長宣讀孫文遺囑。

——革命尚未成功……。

遺囑由這句開頭，該文據說由躺在北京病床上的孫文對汪兆銘口述，汪負責筆記。新莊初級中學當然也舉行了這個紀念週儀式，記憶中是在上課之前進行，十分鐘左右便結束。

當時，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舉辦的紀念週長官致詞，屬於重要文獻，不能輕忽，文稿肯定

經過再三斟酌。而且根據在紀念週活動上聽過蔣介石致詞的人說，講稿內容全部印刷出來分給所有聽眾。因為如果沒文字稿，沒人聽得懂蔣介石的浙江腔中文。演講時就照著印刷的講稿致詞，一字一句分毫不差。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紀念週上，蔣介石也談及了二二八事件，定調為由日本統治餘毒加上共產黨員煽動造成的暴動。

所謂日本統治的餘毒究竟是什麼？或許是指穿木屐、說日語，閱讀日本書籍吧，但我不懂這與二二八事件有何關連。

國共合作失敗後，進入內戰狀態，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共產黨當然被視為非法。雖然有共產黨員潛入台灣，但他們並未在我們面前現身。

日本統治時代也是，台灣有日本共產黨的支部，乃屬非法。在相繼檢舉下組織處於潰散狀態，終戰時已經沒有任何煽動叛亂的能力。

當時台灣共產黨中，有一位名為謝雪紅<sup>5</sup>的女性黨員，出獄後在台中附近開了一家酒家。之後聽說，二二八事件是由她在背後推動。但此次事件主要發生在台北，光靠她在台中的一黨人，實在很難想像能煽動整個事件。

之後聽取許多人的說法，將之串連組合，試圖拼湊出真相花了許多功夫。台灣聽到的只有官方資訊，將此事件視為「叛亂」，而應該是來自上海的印刷傳單則使用「民變」這個詞彙。我仍舊待在新莊，因此暫時沒接收到林茂生與王育霖的悲劇消息。新莊有到台灣大學通學的人，因此得以很快確認了何既明平安無事。

在上海的台灣人都集合在台灣同鄉會館同感焦躁。他們的領導者是之後也擔任過官僚的楊肇嘉。我弟弟敏臣和其他學生也在該處聚集，聽取廣播訊息。他們聽到的廣播與我們在台灣所聽的相同，但上海的台灣人還有其他的資訊網。當台灣的事件處理委員會對陳儀提出三十二條要求時，上海的台灣人已經知道為了以武力鎮壓台灣，國民政府動員了第二十一師與憲兵隊第四團。

因為國共內戰方酣，擁有大量軍隊可供調度，所以可以立刻調集在華東、華中地區對中共作戰用的兵員。上海的台灣人利用所有可行的聯絡方法告知、呼籲大家：

——前往鎮壓的部隊正在搭船當中。

——與其交涉，不如趕緊逃跑！

——王添灯先生處境最危險。立刻逃往山地！拜託高砂<sup>6</sup>的兄弟們！

——前往琉球也行。總之在大量軍隊抵達台灣前，趕緊逃走！

雖然拚命打出摩斯密碼，但此時由上海往台灣的線路並不通。

上海的台灣人，不僅聯絡台灣，也試著與日本取得聯繫，抱著一絲微薄的希望，估計著是否能透過日本，以其他什麼方式通知台灣，結果仍未能成功。

最後上海的台灣人請出了東京中華民國代表部的同鄉謝南光。他是當時大家認為對政府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很可惜的是已經遲了一步。

據說電話那頭傳來的謝南光話音，充滿悲愴。

萬事休矣。殘殺部隊已經渡過台灣海峽了。

殘殺部隊一面持槍胡亂掃射，一面由基隆挺進台北。二十一師是配有美國裝備的精銳部隊，憲兵第四團也是精挑細選的軍團，與大戰結束之後旋即進駐台灣、背上背著雨傘鍋子的軍隊不同。當時熱烈歡迎國軍的台灣民眾，很快便改以「阿兵」這個蔑稱來稱呼這些部隊。國民政府軍隊的情報人員也察覺民眾反應急轉而下，他們推測會造成由歡迎到蔑視的落差，問題大概出在服裝與裝備上，之後針對這個問題逐漸改善。三月八日，搭乘太康號與海平號而來的士兵，穿著裝備都相當好。但問題不是外表服裝，而是他們此行的目的，他們是被派來進行殘殺的部隊，這是最惡劣的。

他們濫行掃蕩沒有抵抗的市民，簡直讓我不敢相信。而且是抱著鎮壓叛亂的名義執行。在二二八事件中遭殺害的人一直被當作叛徒，這實在讓台灣人忍無可忍。

在那個時候，處理委員會的人還談起了台灣將來的夢想，但在「叛亂」的名義下，這些想法遭到全盤否定，至今仍然記得我們當時的憤怒。王添灯先生的聲音，透過廣播直達我們的心中。

提起二二八事件，對像我們這種地方上的人來說，就等同於透過廣播聽到的王添灯的聲音、蔣渭川的聲音。

事件發生四十年後的一九八七年，終於針對過往一直視為叛亂的二二八事件，舉行了紀念典禮。這是為該事件進行名譽恢復的第一步。到了一九九七年二二八紀念館開幕，這已經是事件發生五十年後的事情了。而紀念館的設置場所，就位於當年廣播電台的遺跡處。

＊

對國民政府而言，台灣人的激憤之情必須要有一個——套用一個我不喜歡的詞彙——「出氣孔」。

遭台灣人怨恨的陳儀，之後在台灣被槍決，但行刑理由並非二二八事件的責任。陳儀是在一九五〇年受刑，距離事發已經超過三年。陳儀在事件之後雖然辭去了台灣省行政長官的職



務，但叛亂已鎮壓完畢，所以絕非因此事而遭免職，最好的證據就是他在事件之後的五月辭職，但立刻轉任浙江省主席。浙江省是他與蔣介石的出身地，是非常重要的省分。從台灣轉任浙江，毋寧是一種榮升。殺害台灣住民，完全不是什麼罪惡。

三年後狀況已有重大變化。國共內戰中，共產黨幾乎已經站上凱旋的大道，蔣介石則逃往台灣。共產黨的軍隊如怒濤一般南下，迫近了浙江省，而省主席陳儀據說與共產黨有所交易，並遭當時蔣介石派遣去的湯恩伯將軍識破，湯恩伯因此逮捕了陳儀。

遭逮捕的陳儀被帶往台灣，處以槍決。罪名是與共產黨串通。雖然在台灣行刑，但罪責在於他策劃如何讓共產黨不流血接收浙江，而非追究殘殺台灣人的行為。讓陳儀在台灣受刑，自然是帶有一種抒壓「出氣」的效果。

陳儀就讀日本的士官學校，之後升學陸軍大學，獲得同鄉蔣介石的賞識，成為「政學系」這個政治集團（以何應欽為領袖）的明日之星。陳儀的太太是日本人，聽說二人沒有子嗣。日後，根據中國重要人士（例如白崇禧）的回憶錄，陳儀在浙江的事件似乎是被冤枉的。雖然引共軍入浙可能是冤枉的，但在他未曾受罰的二二八事件上，台灣的所有人都認定他是有罪的。

三月八日從基隆開始發出的槍響，是我人生最惡劣的回憶。整個三月幾乎都待在新莊，沒

有離開過。台灣的幹道中，有一條從台北直通縣政府板橋的馬路，軍隊的移動大多利用此道。新莊說起來大概只能算是後街小巷。從表面看來，二二八事件前後好像沒有太大的差別，即便有軍隊駐紮，也是下了一番功夫努力，只保有可以隨時移防的有限兵力以便有效利用。

關於新莊駐紮軍隊的記憶，大概就是這個時期，以及大約兩年後國民政府軍敗給共軍那時，這麼兩次。因此每次回想，往往會把這兩回混在一起。不過，從規模來說，第二回的數量佔壓倒性地多。二二八事件之後來的，大多是把原本對中共作戰用的士兵流淚輾轉運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部隊。

之後穿著西裝的宣撫隊到學校來，向各單位的人「講話」。由於規定必須有超過半數的職員出席，因此我也前往了位於小學禮堂的會場。

二二八事件開始之際，台灣人報復了外省人（阿山），但新莊因為沒有阿山，所以我一直認為新莊不曾發生這種私人制裁的情況。但後來才得知，原來還有為了做生意而路過的外省人。

「這個新莊人心地善良地保護了外省人，把他藏匿起來，不讓暴徒找到。那位外省人已經平安無事回到台北了，而且為了要我們代為轉達感謝之意，還特意出面報告這件事情。那位保護他的人，就是這個中學的校工。」

穿著西裝的宣撫員如此說明。說到我們學校的校工，不就是工友謝溪嗎？我的叔父原本取

名時用了個「波」字，與遠房的某位伯父名字有所重複，因此當伯父來訪時，我祖父靈機一動借用了附近一個嬰孩的名字。當時借用了的「溪」字，就是來自我們的工友謝溪。

謝溪把那個外省人藏匿在學校裡。讓對方穿上粗劣的工作服，把他偽裝成自己的遠親，有點殘障，嘴巴不能說話。至於他怎麼會想到做這種事情，原來是某天夜晚，謝溪發現這個男人躲在學校的廁所裡，看到謝溪就雙手合十頻頻拜託懇求。不知道他是哪一省的人，總之言語不通。兩人靠著比手畫腳溝通，終於對方能夠理解要他暫且假裝成無法說話的人。

這件事情謝溪沒跟任何人提過。如果巡迴的宣撫員沒說，謝溪肯定絕口不提。謝溪原本就是位不多話的人。

——總之，看起來就是很可憐。

對這件事情謝溪只說了這麼一句。

因為報導受到管制，在台灣大概無法理解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情況。四月起我開始思考如何獲得資訊，因而跑了趟台北的美國文化中心，心想閱讀放置該處的雜誌，應該可以稍微理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人在台灣，面對發生在台灣的事件，卻得透過美國雜誌來理解狀況，實在相當諷刺。

果然在《時代》(TIME)雜誌上，用了相當的版面刊載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報導。因為是五十年前閱讀的報導，詳細內容已經不復記憶，但還知道標題有 Thanks Snow Red 這麼幾個文字。我知道這是對共產黨的女鬥士「謝雪紅」名字的直譯。

她身為日本共產黨，在日本統治時期便有遭人檢舉下獄的經驗。獲釋後就在台中開了一家酒家。

二二八事件當時，恐怕她確實做了許多工作吧。但事件的發端在台北，又是在眾目睽睽下發生，因此國民黨的情報網絡不管如何說這是由共產黨煽動的，也不會有人相信。而且即便潛伏地下的共產黨想要誇大、顯示他們的功績，自稱與二二八事件有多大關係，但有不少民眾身為現場目擊者，至少大眾對周遭真實情況應該還是清楚的。

《時代》雜誌的報導中指出，謝雪紅似乎已經逃離台灣，進入中共佔領的大陸地區。報導中還有另外一位 Thanks，因為與國民黨同路而招民眾怨怒，家具遭人拿到馬路上燒毀。這位 Thanks 應該就是女性議員謝娥<sup>7</sup>，本身也是一位醫師。

在同一期的《時代》雜誌中，也有國共內戰的報導。這個時期國民黨方面氣勢似乎還很強，該期的主要文章其實是國民政府軍佔領了共產黨根據地延安的報導，比起刊載二二八事件的版面大上許多。

——畢竟，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地位，也不過就是如此而已啊。

我自己感到些許的失落。

為了閱讀英語雜誌，我在美國文化中心花了大半天的時間。之後我向何既明提起這件事，卻被他責罵說：

——那地方是蔣介石特務盤桓的場所。今後你務必要小心啊！

後來我知道了第一家上海人經營的書店，不管《時代》或《生活》，沒有受審的雜誌，要多少有多少。

延安與台灣的事情刊載於同一期的《時代》雜誌，今天回想起來，只能說是充滿了象徵性的意義。

對台灣的增兵持續了一段短暫的期間，延安則迅速被共軍奪回。國共內戰以此為界，之後國民黨逐漸處於不利的地位。果然，世界變得越來越狹小，而且不容置疑地，台灣在世界史上所佔的重要性，也正在急速增加。

## 紛亂不息

因為二二八事件實在太具衝擊性，導致事件前後發生的其他事的記憶都有些朦朧。如果在平常狀態，應該多少會在心頭留下點印象，但這段期間大部分的事情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當然，新莊中學從九月起開始了新的學年。鄭聯銘校長最初就與鎮上的有力人士約定好，只擔任一年校長，因此接下來必須找新的繼任者。這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的事情，所以即便是縣府方面，也說會尊重校方對繼任者的選擇。

人選似乎相當難尋，後來好不容易來了一位擔任過小學校長的徐老師。他並非新莊人，而且之後還想回故鄉士林，因此這又是一次短期任職的約定。這種人事，似乎與地方選出的縣會議員有所關連。

除了校長的交接之外，這段期間還有負責數學的蔡鵬程老師過世。他出身物理學校，與鄭校長為台北二中的同級生，算算不過是三十出頭的年輕人而已。我們都以他的雅號稱呼他「萬里先生」。鵬程萬里是句成語，在《莊子》一書中有提到九萬里，敬畏於無法達到這樣

的境界，因此只取了萬里。萬里先生的兄長為知名的漢學家，我們也把他請來新莊中學。台灣大部分的人都說閩南音，與福建南部的發音幾乎相同。

王育霖是二二八受難者之一，他的弟弟王育德是一位言語學家，他主張閩南語和台語是兩種不同的言語。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台灣在文化上也與大陸呈現不同的進展，他舉出台語中混入了大量的日文詞彙做為證據。有鑑於他的兄長王育霖含冤而亡，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能夠理解為何他會主張台語、閩南語是兩種不同言語。這是在拜讀他的巨著《台灣語彙》（東大畢業論文）時聽到的論述，當時適逢他到神戶拜訪姊姊，而我也正好返回神戶雙親的住所。不過從我在台灣的時候開始，便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

除了蔡老師教授台語的「國文」課，也有高老師教授國語（北京話）的「國文」課。因為是過渡期，使用台語尚被容許。我離開台灣之後，相關單位便開始禁止以台語教學，如果在學校說台語還會被罰錢，藉此獎勵學生說國語。日本殖民時代也有同樣的狀況。使用台語會受處罰，這點前後兩個政權完全相同，獎勵常用國語這點也一致，只是所謂的國語，在日本統治時代是日語，現在則改為北京話。

台灣人有一個機會可以設立大學，校名定為延平學院。延平是地名，在福建省有下轄六個縣的延平府。台灣人企劃的學校名稱，使用福建地名或許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不過那也是因為台灣人視為開山始祖的鄭成功，曾受封「延平郡王」之故。此外，日語中稱的「學部」，中文則稱「學院」，綜合大學稱「大學」，從而單科大學便只使用學院之名。

東京大學的畢業生有想要設立大學的意願。我想鄭聯銘也與這所大學有所關連，但是政府卻不許可延平學院的設立。在尚未獲得成立許可之前，仍有人以各種夜校的方式持續進行授課，鄭聯銘暫且也在這種夜間班級講課，每週都要授課幾次。不過政府應該不會准許成立這種以台灣人為中心的大學。

不久，鄭聯銘進入了台北高校時代的好友林挺生經營的大同公司，這是台灣的大企業，甚至擁有自己的附屬工業學校。鄭聯銘在大同公司擔任類似經理的職務，不過應該有參與附屬工業學校的經營，而且肯定也把新莊初級中學校長的經驗活用於此。

隨著鄭聯銘離去，吳建熹也離開學校。他以學徒兵的身分進入日軍的連隊，戰爭結束時已經成為少尉。終戰後到回台灣之前大約半年的期間，在我神戶家中作客，順便給熟識的實業家幫點忙。小他一歲的弟弟吳建煥，台北高校畢業後進入台灣大學工學院的土木科就讀，因為年紀相仿，所以我們有遠足健行等活動時都會帶上這位弟弟。

我服務的新莊初級中學新的一年級生入學了，這算是第二屆學生。第一屆學生除了小學校六年級畢業的人之外，還包含了高等科一年修畢、二年畢業，以及更早之前的畢業生等等，

再加上修完小學校五年級課程後成績優秀的跳級生，這些人等總共編成了三個班級。當時屬於過渡期，可以這麼處理。第二屆開始便不需要這種特別的考量，只收了一班學生，而且理所當然是男女同班。

學生之外，老師也必須進行補充。為了取代亡故的數學科蔡老師，聘來一樣從物理學校畢業的王印標老師。

國語老師只靠高老師不夠，因此拜託了福建出身的林鍊生、潮州出身的楊氏與方氏。姓還記得名卻忘了，他們二人是中山大學的學友。另外還來了一位廈門大學畢業的女老師林羽儀。雖說是外省人，兩位出身福建的林老師都通曉台語，兩位潮州人講的話大家也能聽懂六、七成。潮州話大概有一半是福建南部方言和廣東話混合而成。

外省人的同僚往往一有更好的職位就會立刻辭職，雖然林鍊生老師的表哥任職新莊警察署長，但他表哥在任期間，林老師仍是熱心在校教課，與其他的外省同僚不同。

其他課程果然還是委託了台灣人。法商學院（由台北高商改制而來）畢業的張義明與體操課的劉啟輝兩人，同樣都是新莊出身，與教音樂的張德福是親戚。

教化學的蘇仲卿，屬於戰爭期間疎開來到新莊的家族，可以說是半個新莊人。他當時還是台灣大學的學生，到畢業之前都在此任教。從新莊中學畢業的學生有許多進入理科學系，或許是受到他的影響吧。

與吳建熹相同，有一位林老師也是在日本求學期間被徵召為學徒兵，之後成為日軍的幹部候補生。不過林老師進入學校的時候，我正準備返回神戶，因此與他錯身而過。

至於不是新莊出身的台灣人教師，有一位嘉義出身的劉碧堂老師。他與我弟弟相同，都是以公費留學生資格前往暨南大學就讀。

當時大陸情勢變得相當詭譎，一九四八年左右，一半左右的公費生都返回台灣。他當時也還是學生，但已經完全放棄上海的學業，打算轉學進入台灣大學。不過因為需要賺錢生活，就當作打工，來到新莊中學任教。

他身上發生的悲劇，是我回到神戶家中後才發生的。因為當年的通訊狀況不佳，當時我暫時不知道他遭人檢舉下獄的事情。

\*

之後，新莊初級中學的校長由徐老師換成陳炯澤老師。他也是新莊人，有一個弟弟，在台灣大學醫學部小兒科擔任教授。不過，大家對陳炯澤的評價卻是：他是個怪人。因為他年過四十仍然單身，這在新莊被視為怪人，好像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陳校長體型肥胖，四十歲左右已經頭髮全白，但他靠染髮劑辛苦遮掩自己的白髮。除了染髮劑之外，氣喘藥也是他的必備品。他過去就讀東京的駒澤大學，專攻佛教哲學，對漢語典籍有相當高的解讀能力。而他也是我們第一屆學生代表陳垣光的叔父。

劉碧堂是在陳校長時期進入新莊中學任教的。之前這兩位應該也沒有特別熟稔，連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這位新來的同僚，竟與我弟弟同樣在上海就學。

我弟弟從上海回到台灣後，尋思要回到日本，不過這在公費生中算是特例。普通的歸國公費生，離開大陸的大學之後應該都會努力嘗試轉學到台灣的大學。劉碧堂也是如此。

日本敗戰之後，原本正在日本各學校就讀的台灣人學生集體返台，發生了一波轉學潮，現在彷彿當時狀況的重現。而且這次希望轉學的人當中，除去公費生後，幾乎都是外省人學生。國共內戰即將落幕，陸續從大陸逃來台灣的，不只是將士官兵，還有大批來自校園的學生。與逃來台灣的國民政府系統官兵相同，逃來的學生大概也屬於國民黨政府系統的學生。

他們全擠到台灣最優秀的台灣大學，要求自己無條件入學。

劉碧堂一方面在新莊中學教書，一方面熱衷於轉學問題，這種情況也是能夠理解的。不過，我對他還算放心，因為他個性溫厚，大概不至於做出什麼太過偏激的事。劉碧堂不至於有什麼危險的左傾思想，我還比較擔心他可能遭受左傾分子的暴行。

在轉學問題上，與劉碧堂等學生交手的，就是台灣大學的校長傅斯年。傅斯年校長還在北京大學就讀時適逢五四運動，他是學生裡的中心人物，後來退學前往外國留學，做為一位學者，傅校長也是一流的人物。

傅斯年身為學者的學術業績，可以著名的「夷夏東西說」為代表。他直接反對以往一直採取的夏、商、周的歷史區分方式，特別主張夏朝與商朝處於相同時代，是東西並立的兩股勢力。在他身上可以見到年輕時在北京大學討論戲劇改良的那種文人風範。他在最困難的時代擔任台灣大學的校長，不過他是具備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經驗，也是位有文教行政實際成績的人物。

「對方是壞人吧？」

我曾經這麼問過，不過劉碧堂笑著回答：

「以相撲來比喻的話，對手根本還沒站上比賽的土俵呢。現在都還是與職員拉東扯西的階段。等到把傅大砲拉出場的時候，才是正式要分出高下的時機。」

傅大砲就是傅斯年的外號。

「相當有趣的對決，可惜我很快就要回日本了，沒辦法看到結果啊。」

我這麼回答。

如前所述，我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回到日本。當時日本還處於美國佔領下，與台灣無法自由通訊。而台灣則是因為國民政府軍的全面撤退，也進入臨戰狀態，對外通訊得接受嚴密的檢閱。特別是在台灣，各種發言都必須小心謹慎。

說實話，我沒想到劉碧堂的事情，會變成如此重大的問題。

事情是我離開台灣後的隔年發生的，也就是一九五〇年的時候。警備總司令部的軍官突然來到學校，說要逮捕劉碧堂。陳炯澤校長對此提出抗議。恐怕對方也是備齊文件才來抓人，對此陳校長主張非法逮捕而提出抗議。此舉肯定惹怒了對方，軍官說：什麼不法！既然如此，你也一塊帶上。事情演變至此，劉碧堂與陳校長當場被一起帶走。

當時劉碧堂的表情如何，我不在現場並不清楚。後來請教當時在場的同僚，據說劉碧堂臉上一副有所覺悟的模樣。這麼說起來，從事發一個月前開始，就聽說有人觀察到劉碧堂老是不心神不寧的樣子。

因為沒有事情前後相關資訊，我不是很有自信這麼說，但他可能是中了國民黨「那一掛」人的招。

所謂「那一掛」，就是為了維持蔣介石獨裁而存在的，類似秘密警察的團體。有CC派、藍衣社<sup>1</sup>、軍統局<sup>2</sup>等等，好幾個不同的組織，彼此間為了爭功勞而展開各種活動。至於純真的劉碧堂是被哪個組織設計了，我並不清楚。

「那一掛」人有好幾個不同系統，但不管在哪個組織內，都沒什麼正經的人，似乎全都是一堆性格扭曲的傢伙。例如戰爭期間倒戈汪兆銘政權的「那一掛」人之中，就有李士群、丁默村等人物，他們怎麼看，都帶著一抹詭異的陰影。李士群後來遭人毒殺，丁默村戰後被當作漢奸處決。他們被形容成是「不帶人類情感的怪物」。

設計陷害劉碧堂的，就是這麼樣的一群男人。他們只顧著追求自己的功績，為了達成目的，完全不管會讓多少人流淚。對於這群人，我實在沒法不怨恨。

在轉學問題上，劉碧堂確實有不滿，但抱持同樣不滿的學生也不在少數。解決問題時為了能對自己更有利，他們往往會組成各種不同的團體。

劉碧堂也受到邀約，在某個團體的連署運動中列名。這就是「那一掛」人特意接近心懷不滿的學生後，為了釣他們上鉤而設計的機關。遭檢舉之前，從這些學生的朋友提供的證言看來，他們已經略感不安，也就是說，或許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察覺到自己可能遭人陷害。審判的結果，他遭判七年徒刑，並於火燒島（這個不吉利的名字往後被改為綠島）入監服刑。在隨時可能發生戰爭的台灣，即便服刑結束，也無法保證必定能夠獲得釋放。

在新莊中學，劉碧堂是一位什麼都能教的老師。擔任過地理、歷史、社會科的教師，一部

分的體育課也委託他授課。他體格好，感覺相當強壯，但火燒島的惡劣氣候卻腐蝕了他的健康，沒多久他便死在獄中。等我得知這件事情，已經是許久之後了。

劉碧堂是個不太說自己事情的人，某次他卻對我說，「陳老師，聽說你是有未婚妻的人啊。」還促狹地微笑了一下。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也有一位未婚妻，他在獄中過世時，來領取遺骨的便是未婚妻。

實在是件令人深感哀傷的事情。

## 台灣春秋

新莊初級中學的校長陳炯澤並非犯罪遭人檢舉，而是教員劉碧堂遭逮捕時，他挺身而出威脅對方說：「身為校長，我願意為他做保證，如果要逮捕他，就得把我一起帶走。」結果軍警果然依言把他一起帶走，而他也因為這件事情被解除了校長職務。

這是我結束在台三年時間，回到日本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我在台期間發生的大事，說來就是二二八事件了。台灣從國姓爺鄭成功的時代開始，一直都有反抗中央政府的傳統，清朝時代也有林爽文之亂<sup>1</sup>，一直有所謂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的說法。

日本統治時代叛亂依然持續，較大的事件有余清芳的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等等。叛亂的主因都是受到「歧視與差別待遇」。

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是一名叫余清芳的男子，假託台南西來庵有神諭，自稱皇帝，並與抗日領袖合作，計畫武裝起義的事件。



一九三〇年，被視為最親日且最開化的霧社，也發生了反抗事件。這次事件日本方面似乎相當震驚。差別待遇這種事情，被歧視的一方永遠會記得，但歧視他人的那方卻不見得有所自覺，這是這種事件的特徵。

——為什麼，這麼一位模範青年會……。

事件的首謀，竟然是親日派的高山族，這點讓日本人非常驚訝，但其實問題的根源還是在差別待遇上。

從那之後，台灣人轉為在政治上對統治權力進行抗爭。為了避免遭檢舉違反日本的治安警察法，在那個時代，這幾乎是台籍知識分子唯一的選擇。

而台灣的悲劇在於，對抗日本統治時認定是民族問題，但在對抗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時，仍必須使用相同的問題意識。

二二八事件結束之後，在大陸的台灣人陸續返台。月雲姊一家人也終於回到台灣。她先生余錫乾，畢業於長春的醫科大學，並在該地醫院工作。滿洲的學校與日本相同，都以日語授課，而滿洲的醫科大學也與日本的醫大學制相同。該校學生中有許多日本人，他們也與其他離開日本本土的學生一樣，得費盡心力才能撤回故鄉日本。日本方面為了撤回國民而派出船隻，另一方面美國佔領軍也加以支援，總之，重點就是先讓流落在外的國人返回日本國內。

不過，月雲姊的狀況是，日本戰敗後他們變成中國人，所以無法以日本人身分採取撤退行動。日本人離去後，蘇聯軍隊到來，接著中國共產黨軍隊進入，然後國民政府軍也加入，該區域持續混戰的狀態。

加上終戰前後，月雲姊剛好懷孕了。而她先生是醫師，在當時醫生與醫療物資均缺乏的狀況下，余錫乾的醫師身分，對當地人而言肯定是一項貴重資源。等到月雲姊一家終於回到位於新莊外圍名為舊仔林的娘家時，余錫乾談起了日本敗戰之前新京（長春）流行鼠疫的事情。為了進行嚴密的防備，看病時在醫生的白袍上還要加套其他衣物，他自己說當醫生從來沒那麼緊張過。

比起蘇聯軍、國民黨軍、中國共產黨軍等等的混戰，余錫乾說對抗鼠疫的事情，更讓他印象更深刻。

——報導管制也很嚴密——與其說管制，應該說都被禁止報導了吧。

年輕的余錫乾熱心說明。

回到台北後，余錫乾在當時機場附近的松山區購入了一家醫院，一直開業看診到最近為止。該醫院的名稱為泰安醫院，與我父親的商店同名，不過並非因為我父親之故才取此名。月雲姊稱我父親為「舅父」，她說：

「醫院的院名偶然與舅父的商店同名。這家醫院原本就叫泰安，我們問了附近居民，大家都說用熟悉的名稱最好，因此保留了原名。而且對患者來說，這也是個挺吉利的院名。」

我曾數度造訪過這家醫院。

何既明是月雲姊夫家那邊的親戚，所以也曾與他一同前往這家位於松山的醫院。

月雲姊的女兒名字叫「瀋」，因為她出生於瀋陽。最近中國的簡體字寫成「沈阳」，在日本傀儡政權的滿洲國時期，該市名為「奉天」。

當時平常的執業醫師開始使用鏈黴素，這種新藥。余錫乾也從香港進貨，但說明書不是德語而是英語，反而造成了他的困擾。因為全篇皆為英文，他便委託我說：

「我的英語，從二中畢業後退步許多。舜臣啊，你能幫我翻譯這份說明書嗎？」

結果，因為余錫乾的委託，讓我有翻譯鏈黴素文獻的經驗。當然，我是翻譯成日語。余錫乾的父親是漢學家，而且是書法名人。在一些門牌或者看板上經常可以看到他父親「余逢時」的簽名，不過余錫乾本人已經完全屬於說日語的世代了。

某次與何既明一同前往泰安醫院時，在醫院見到了小「瀋」妹妹在等候室搖搖晃晃地走著，身為醫學院學生的何既明提醒月雲姊：

「不應該讓小孩子進到醫院的候診室唷。」

月雲姊抱起小瀋妹妹說：

「稍微一個不注意就跑出來了。」

余錫乾、月雲、何既明以及我，感覺就像站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每個人都各自忙得如陀螺一般，光是能夠見面，便能讓人感到內心安穩。不過從另一方面而言，大家各自生活的那一面，肯定也都有地獄般痛苦的部分。

我當時過著沒有電話的生活，要跟什麼人約去哪裡，究竟怎麼約的，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不可思議。例如現在講的去余錫乾醫院的事情，腦袋中完全不記得聯絡的細節。不過當時經常利用自行車，或許填補了這段空白吧。

\*

二二八事件的善後，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至今為止我一直深意識到自己對台灣所知不多。從還在日本的時候開始，就一直抱有這種情結。在日本受到空襲之前，大阪的阪急百貨店內設有書籍賣場，販賣台灣發行的雜誌。我經常走逛京都、大阪、神戶等地的書店，這三處都有販售地方發行的雜誌，但有賣台灣書籍的卻只有阪急百貨而已。台灣總督府的大阪事務所就位於阪急百貨附近的堂島大樓，這或許多少有點關係吧。

我進入大阪外語後，開始購讀這些台灣相關雜誌，心想至少在印刷活字上能多接觸一些台灣的氣息。雜誌的名字我忘了，應該是文藝相關雜誌，由當時在台灣的日本人西川滿<sup>3</sup>所主持。

台灣人開始在台灣文藝界以日語發表作品，是昭和時期的事情。初期的文學家有賴和、楊逵等優秀的作家。

楊逵的〈送報伏〉<sup>4</sup>先在台灣的報紙上刊登，之後在東京的雜誌文學獎上獲得第二獎。不過當年首獎從缺，因此可說實際上他就是第一名。當時我還是小學生，所以沒什麼記憶，不過稍後這個作品由魯迅的弟子胡風譯成中文，題名〈送報伏〉，在上海出版後獲得相當高的評價。

賴和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數度被捕下獄，後因病得以出獄，但未到終戰便病逝。他本身也是一位優秀的醫師，非常照顧後輩。因為在日本統治時代屢次被捕下獄，戰後他被視為抗日義士，一九五一年入祀「忠烈祠」，在日本大概就是類似靖國神社的地方吧。可是，因為有人中傷他是共產黨員，賴和又從忠烈祠除名。大概在一九五八年左右，相關人士，特別是受過他照顧的人們，蒐羅資料幫他製作了全集，藉此澄清對賴和的中傷。一九八四年賴和的名字再度放入忠烈祠，那已經是蔣經國擔任總統、李登輝擔任副總統的時代了。

戰爭結束後，作家吳濁流也以日語書寫作品。此人畢業於師範學校，歷任教職、新聞記者，也曾經前往大陸，光復之前返台，從事過各式各樣的職業。碰巧某次我到大同公司拜訪鄭聯銘時，吳濁流偶然也在附屬工業學校擔任老師。此外，我在新莊中學的同僚吳建熹，也在該校擔任訓育主任。

在這樣的緣分下，我被介紹給吳濁流老師，也有一些交談。吳濁流是客家人，因此我們交談時，日語是最方便的選擇。

吳濁流當時跟我說：

「這真是讓我吃了一驚。我也是在別人的推薦下嘗試做做看而已，沒想到啥都不用做，就能賺到這麼多錢啊。簡直讓人不想再流汗辛苦工作了。特別是啊，完全不知道其他賺錢方法的寡婦，真的是很感謝這種賺錢方式吶。」

當時因為利率高漲，地下錢莊業者橫行，他們從民間集資，以高於銀行利率的利息調動資金。想要知道今天黑市的利息是多少，只要在台北永樂町附近走一圈，立刻就能知道。

——利率漲跌三百六十五天

滿城人士皆為之瘋狂

報紙上甚至出現這樣的標題，諷刺城中人心情隨著利率上下而時喜時憂。吳濁流不贊成這樣的拜金主義，但對不知道其他賺錢方法的寡婦而言，他認為地下錢莊倒是值得感謝的。

吳濁流一直講這種事情，幾乎沒提起關於文學的話題。不過我記得請教過他一件事，就是在他小說中有一位人物，名叫胡志明的台灣人，我問他使用胡志明這個太過響亮的名號，是否給作品帶來困擾。

他回答說：

「我其實沒怎麼在意。」

這個名字與越南革命家一樣。大概當時越南並沒有太過受到矚目，因此胡志明的知名度也沒那麼高。

大同附屬工業學校之後逐步升格為專科學校、工學院（大學），當時還是高級中學等級，因此算是新莊初級中學畢業生升學的管道之一。而且我的前任校長還在該校擔任理事還是其他什麼重要職務，雖然忘了當初是為了什麼事情前往拜訪，現在琢磨一下，大概是為了去請對方照顧新莊初級中學的學生吧。如果推測無誤，那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五、六月時的事。

距離我在大同公司的附屬工業學校與吳濁流碰面，已經過了五十年。當時吳濁流還要去見另一位朋友，我也與鄭聯銘及吳建熹有約，因此與吳濁流只談了利息很高的事情。

當時我還不知道自己能夠成為作家，那個時期與吳濁流，就只有如此淺薄的交往而已。

吳濁流生於一九〇〇年，當時還沒五十歲。根據年表他於一九七六年過世，但他的代表作《亞細亞的孤兒》早已完成。他還在世時便創立了「吳濁流文學獎」，盡力培育後起之秀。

另一位作家楊逵，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當年的四月，被來台進行鎮壓的國民黨軍隊帶走。當時與他一同被帶走的同伴都被宣判死刑。大約此時國民政府換下陳儀，任命魏道明為新的台灣省主席，政策也由單方面的鎮壓，轉換成蘿蔔與鞭子交替的做法。

楊逵因此獲釋。之後他創辦了文藝雜誌，把魯迅、老舍、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譯成日文，做成一個系列在台灣出版。這其實意味著他想讓台灣人儘早熟悉中國近代文化。過沒多久，魯迅等人的作品在台灣便成了禁書。

時間上的分界點，就在於國共內戰中國民黨軍敗給共產黨軍，撤退逃來台灣之際。

一九四九年一月，楊逵起草了一篇〈和平宣言〉，訴求停止內戰與和平建國的理想。這篇文章是以謄寫版手工印刷，發行份數很少，而且也就不過是份草案，結果《大公報》的記者就拿去上海刊登了。

剛到任不久的第三代台灣省主席陳誠知道後，勃然大怒，恰巧楊逵正在演講活動當中，便一併把他和朋友都逮捕了。

大概從這個時期起，陳誠開始四處搜捕匪諜，展開了「白色恐怖」<sup>5</sup>。楊逵的夫人葉陶也於四月三日遭到逮捕。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離開台灣的，當時僅有耳聞〈送報伏〉作者楊逵遭逮捕的傳聞。至於他因為撰寫〈和平宣言〉遭判決十二年徒刑，則是之後才知道的事情。他的夫人葉陶女士因證據不足獲得釋放。

日後，楊逵服刑十二年後獲得釋放，於一九六一年離開火燒島監獄時，他曾如此說道：

——那是我一生中獲得的最高稿費，我只寫了六百字，卻吃了十二年免費的飯。

生於一九〇五年的楊逵，於一九八五年過世。晚年受美國的大學聘任，也再次到曾經留學的日本遊玩。他從台灣的中學退學後，在東京通過了檢定考試，因此曾在日本大學就讀過。

\*

相隔四十年我再度回到台灣時，泰山巖附近的變化讓我感到相當的震撼。泰山巖是道教的寺廟，在台灣一般稱為道觀。當時沒有僧人，只有不知是道士還是俗人的人。

當年此地的環境絕佳，只需開口請求，任何人都可以借住。雖然有兩位像道士的人，但他們似乎也只是擅自進住，並非正式的住戶。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會為來客準備餐食。

連續兩年的學期末休假，我都到此作客。學期末敏臣從上海回來，但他回台灣時有許多事情要忙，鮮少到叔父家露臉。因此前往泰山巖幾乎都是我獨自一人。我在那兒時總理首書中，當然學校的同僚或者學生也會前去遊玩。有一位李姓女學生的家就在泰山巖隔壁，她們因此數度前去遊玩。

不過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享受閱讀。一九四八年對「禁書」的管制還不嚴格，到了一九九九年才變得極其森嚴。

內戰中失利的國民政府軍官兵，陸續續續一批批來到基隆。一九四九年情勢特別緊張。

那時我也不是我一直待在泰山巖。從新莊市鎮騎自行車到道觀只需二十分鐘，到台北也不需要一小時。

一九四九年，我為了辦理返回日本的手續，屢次前往台北與基隆，好幾次遇到了大批戰敗的士兵。

當時街頭巷尾都竊竊私語「葵丘的詛咒」。在紀元前六五一年的春秋時期，諸侯會盟於葵丘<sup>6</sup>。會盟也就是諸侯會師，立下盟約的意思。這段典故在《孟子》中有詳細記載，因而較廣為人知。

此次會盟的盟主是齊桓公，黃河沿岸的宋、鄭、衛、魯諸國，為了防備南方超級大國楚國

而締結盟約，盟約中有各種約定，其中之一是：

——無曲防。

防，指的是堤防。當時不管多小的國家都有取勝他國的方法，那就是掘毀對手國內的堤防，造成水患。這方法絕對可以戰勝對手，但對方也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掘毀我方的堤防，這就有點類似當今的核武。

孟子寫下這段記錄時，已經距離葵丘之盟三百年以上，過往的諸侯遵守盟約，但孟子時代的諸侯因時空環境不同，已不再遵守當年的約定，僅剩這條「無曲防」仍舊被大家遵守。這與懼怕對方報復故不可使用核武的道理相仿。

黃河兩年就會在某處發生一次天然災害，但到本世紀為止尚無人為造成的大潰堤。黃河改道大約每百年發生一次，不過那也非人力所為。宋朝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黃河大水患，據說溺死者數以百萬計，那仍舊是天災所致。但在中日戰爭初期（一九三八年），敗走到徐州的國民政府軍為了阻止日軍追擊的步伐，在河南省花園口以人為方式掘毀堤防，造成八千萬溺死者，受災戶兩千萬人的慘況。

葵丘之盟「無曲防」一條，大家遵守了兩千五百年，到那時終於被打破。另外有一個說法指出，執行這次人為潰堤的，是蘇聯的軍事顧問團。

無論是誰傳出的，這個「葵丘的詛咒」說法在民間廣為流傳，當我遇到那些殘敗士兵時，好像從哪裡聽到了這種說法。

事實上，那是當士兵進入基隆的收容所時，從一旁圍觀的群眾中聽到的耳語，有個人說：——因為打破了葵丘之盟，才落得這種下場。

我循聲找尋說話的人，原來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我記得他還喃喃自語接著說：

——而且二二八事件的大量冤魂都還沒解脫啊。

當然此時二二八事件還被當作暴徒叛亂行為，事情還在持續收拾的狀態。雖然大家都明白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但除了官方說法之外，其他事情都不能提。為了不說錯話，許多人只好選擇了沉默。

我離開台灣，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兩年多後的事情，當時社會對此事件仍記憶猶新。因此看到了大陸來的殘兵敗將，很自然便想到了二二八事件。

當時國民政府的軍方不得不把對共軍具有實際作戰能力的部隊調往台灣進行鎮壓，他們肯定感到非常不甘心。不過，必須以這種形式迎接鎮壓軍隊的台灣民眾，他們的憤怒與失望，卻是國府軍隊的數倍以上。

之後許多對政治感到失望的台灣人，似乎把精力移到經商上。從一開始目標就非常「官」，

而只在庶「民」的道路上邁進。日後令人驚訝的台灣經濟奇蹟，或許正是二二八事件後遭到壓抑的能量，變成岩漿一般噴發、展現出來的結果。

一九八七年，二二八事件經過四十年後，台灣政府終於解除戒嚴令，民眾得以開始舉行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並要求有關當局公開事情真相。政府因此設置了事件調查委員會，並約定於一九九二年公開詳細調查結果，並豎立紀念碑。

二〇〇一年一月，我站在該紀念碑之前。五十四年前士兵掃射的槍砲聲，又在我腦海中響起。事件中犧牲之人的臉龐不斷浮現又消逝。

實際上，當我站在大批敗軍之前準備告別台灣之際，二二八事件並沒完全落幕。劉碧堂當時還精神飽滿地在新莊中學校園內發號施令。我回到學校時仍與他談笑了一陣。

楊逵的死刑被取消，稍後返回社會，卻因為二十張手工謄寫版印刷的〈和平宣言〉，惹怒了陳誠，又遭送往火燒島服刑十二年。我回到日本那年的四月，才風聞台灣發生了這樣的事。不過當時我猜想，應該關滿一半刑期就能獲得釋放吧，果然我的想法還是過於天真了。

我為了與船公司交涉經常前往基隆，而該地的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正好在這段時間遭逮捕處死，因為他被認定與共產黨機關刊物《光明報》有所關連。依據年表這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事情，距離二二八事件已經過了兩年半。而且就剛好在我要前往日本，在基隆準備

搭船之前發生。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件事情，恐怕在許久之後才公布吧。

\*

大約隔了半世紀，我回到泰山巖一看，簡直不敢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景色。

過往泰山巖的廟前是由平坦的山坡形成的廣場，周圍沒什麼人家。面對著廟宇位於左手邊的李家，他們女兒於新莊中學在學期間轉學，進入台北的女子師範學校。也就是說，初級中學兩年讀完後，可以進入師範學校的本科。位於廟宇右側有一小段距離的王家，女兒碧雲也進入了女子師範就讀轉學班。她家經營雜貨鋪，店面也有賣香菸。此處是清朝明志書院的舊跡，據說在當時是相當有名的學校。

在田園風光中，散居著些許人家，完全是一派閒適的地方。

——這裡是泰山巖喔。

即便旁人這麼告訴我，四十年後再度爬上廟前的緩坡舉頭仰望，卻看不到絲毫與過往相似的景象。

——應該有廟宇吧。

——這就是廟宇啊。你看，那不是廟門嗎？

——山坡呢？

對方以莫名其妙的表情，低語說道：「山坡？」

我終於理解到，原來方才穿過的人馬雜踏之處，就是過往綠色的山坡，而坡上現在建滿住家，因此完全遮蔽了過往的「山坡」。

四十多年前，整個廟區只有兩位道士的廟宇，現在有如大馬路般的熱鬧。我在商店內買了線香，穿過雜踏的人群，好不容易才看到香爐得以插香。我快速參拜後便匆匆離開了。當時借住的房間在哪裡？學生練習英語話劇的廣場應該就在走出房間的不遠之處。——我懼怕自己的往昔舊夢遭到破壞，未向任何人探問便乘車離開了。

泰山巖廣義上仍屬於新莊，應該是新莊的泰山鄉吧。當年遠足經常前去附近的觀音山。從台北也可看到觀音山，不過我並打算特意爬上山去，因為說不定會再度讓我的往日記憶幻滅。

有一次曾前往台北近郊的烏來，並非學校遠足，只是個人行程，帶著幾位學生與大約三名同事一同前往，當時該地幾乎沒有人煙。現在已經是台北市民熱鬧的休閒娛樂場所，但當時只是個適合用「蠻荒之地」一詞形容的地方。此時也是終於再度開啟與日本交流的時期，還記得一位家中有姊姊的學生帶了一本《婦人俱樂部》。

學生的畢業旅行跑去了台南。台灣的畢業都在暑假之前，因此旅行應該是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隔年，社會上的緊張氣息較為鬆弛，不過這肯定是政府有意營造的氣氛。

在隨之而來的「春天」，目標是收攬人心，但大陸的戰況急速惡化，這個「春天」顯然持續不了多久。說戰況惡化，當然是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的。

到了一九四九年，戰敗的軍隊不斷來到台灣。搬運來台的不只是軍隊而已，我們當然是事後才知道的，在中日戰爭之前，曾將故宮中大量的文物運往四川各地「疎開」。此時這些文物又被運往台灣。

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故宮文物將要運出北京之際，遭到北京市民的反對，他們曾說：

——政府珍惜文物，要把它們送往安全之處，那麼就不珍惜人民嗎？

對此，相關負責人則回答：「人民有腳，能夠自己逃跑，文物沒有腳，沒法兒自己逃啊。」如此苦苦向大眾說明。

運往台灣這次，由於是戰亂之中的緊急搬運，並未對外公開，所以也沒出現抱怨的人。

當時的公路不像今天這麼壅塞，不過某段時期警察卻警戒得異常森嚴。夜晚我們悠閒地騎著自行車通過公路，突然冒出了以前從沒遇過的「盤查」。而且對方還躲在樹蔭底下，這



種事情即便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也不曾有過。那個時候因為出示了身分證，平安無事地通過了。不過從那之後，就再也不敢讓身分證離身。

有傳言傳說蔣介石要來台灣。很快地傳言便不再只是傳言，任何人都認知到那是即將發生的事實。大陸的戰況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已經可以說是絕望的狀態。

——台灣是塊被詛咒之地。

——陳儀這些人全都被詛咒了。

浙江省主席陳儀似乎允許進逼的共軍不流血進入浙江境內，作為交換條件，他要求共軍必須保證他的身家安全。此事遭他的朋友、擔任京滬衛戍總司令的湯恩伯察知，進而將他逮捕。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消息，還差五天，二二八事件便屆滿兩週年。陳儀遭逮捕的消息傳到台灣，被說成是「二二八事件的詛咒」。陳儀於隔年遭受處決，他是因為出賣浙江給共產黨而遭問罪，與二二八事件並無干係。

然而，特意把陳儀帶來台灣處決，據說多少帶有想要消除民怨的意圖。另外還傳說湯恩伯曾跪求蔣介石，饒過自己逮捕的朋友陳儀一命，不過最終並未獲准。

我與同事前往台灣東海岸旅行，記得應該還是在大陸戰局尚未那麼緊繃的一九四八年。

我弟弟參加的第一屆公費生一百名（傳說之後少了一人，只有九十九人），泰半都回到台

灣，並且不再回大陸復學。敏臣打算與我一同回日本的家，因此他在上海的大學大概一直處於無故缺席的狀態吧。

公費生制度只舉辦了一次，之後好像就沒再公開招募第二屆了。那是為了解決當時從日本湧回大量學生的特別制度，之後情況改變，轉為由大陸流入大量的學生。其中也有類似劉碧堂這樣，一個人同時捲入兩種情況的例子。

——軍隊的數量多到令人討厭啊。

我們只能一邊看著新莊名產布袋戲，一面拉雜閒聊，每天過著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日子。生命充滿了閉塞感。特別是像台灣這樣的島國，更給人強烈的封閉感受。

——政府要人的子弟，好像不斷出國去啦。阿山從台灣人身上壓榨金錢，他們的孩子再拿著這些錢去美國。

大家都互相這麼說。

## 別了台灣

我開始準備回日本自家，在第一屆的學生畢業後，我也正式辭去了新莊初級中學的教職。弟弟敏臣也將一起返回日本，當時他認為與其繼續學業，不如回日本隨便找份上班族工作更妥當。因此他先到與父親做生意的茶行去當見習生。他的公費生好友當中，留在大陸繼續上大學的人與轉學回台灣的人，大概各佔一半。那家茶行的主人建議我們儘早返回日本。

——你們兩位是令尊託付給我的重要人士。現在的情況極其惡劣。我從上海的同業那邊聽到各樣的消息，真實狀況比報紙報導的更加危急許多，甚至已經到了連那位同業也下定決心要前往美國的狀態。萬一你們發生個三長兩短，我將無顏面對令尊。當下已刻不容緩，請趕緊回家去吧。

雖說返回日本，但已經不比過往，台日已經不屬於同一個國家，需要辦理各種複雜的手續。我借用了茶行的打字機，製作了申請文件，不是向日本政府提出，而是提給GHQ，該填寫「日本」的部分，都必須改成「佔領地日本」(occupied Japan)。

——我已經在幫我兒子辦理去美國留學的手續。  
茶行的老闆這麼告訴我。他兒子的年紀與我們相仿。

新莊初級中學第一屆學生的畢業典禮於一九四九年六月舉辦。我從返回台灣的一九四六年起，開學典禮之前便開始教導他們，到他們畢業為止，任教時間超過了三年。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在日治時代以日語完成小學教育，進入中學後重新接受北京話的教育，屬於特殊時代的孩子。我在新莊初級中學最後的工作，便是協助學生的升學與就業。就職部分我的人際關係不夠充分，而且在台灣初中畢業學生的就職，大多仰賴個人關係，校方並不太介入，所以我大概都在協助指導升學，這個部分進行得相當順利。想要升學到高級中學（包含工業、商業與師範學校）的學生，大致都能進入他們所希望就讀的學校。

雖然我在教員時代並不算是個勤勉的老師，不過卸下教職後回顧一下，業績似乎還不算太壞。

從六月的畢業典禮到十月出發回日本為止，一九四九年的這幾個月，對我而言算是非常忙碌的日子。那時幾乎每天都要到台北，除了辦理出國手續，還需要對在台三年半的各種人情世故進行妥善收尾。

何既明當時已經畢業，正忙著擔任實習醫師，他也有自己的計畫。二二八事件時，他曾冒著危險擔任與當局交涉的角色。據說他從那次經驗之後，產生了許多的想法。

——眼下只想專心致志成為一個好醫師。

雖然他這麼說，不過並非代表他要帶著超脫的心情疏離這個紛擾的塵世，看著台灣的現狀，他年輕的熱血依然洶湧沸騰。

——台灣人的意識還太低落。無論如何，應該先提高台灣人的意識。為此目的，就需要啟蒙運動。我打算從開書店起步，先弄些舊書來賣，邊賣邊籌備出版社。就算是岩波<sup>1</sup>，也是從小書店起家的啊。

何既明說他的目標是想成為台灣的「岩波書店」，也拉我一同入股幫忙。

——我現在正提出返日申請手續，要入股幫忙恐怕有點困難，畢竟差不多得要開始整理行囊了，不過如果有要留下來的書，我會拿去給你。

我這麼回答。何既明帶著遺憾的表情說：

——真可惜啊。現在已經拉了五個好友加入，就先從這樣的基礎開始吧。

五位書店的好友，大概都是年紀相仿的年輕人，或者類似何既明一般的準醫師，或者擔任大學助教、助教授等級的工作。日後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也是這五位朋友的其中一員，當時正擔任台灣大學農學院的助教。

他們只是單純想做點台灣人的啟蒙運動而已，但蔣介石政權卻對年輕的知識分子深懷警戒。這五位朋友之中有兩位於白色恐怖中遭逮捕槍殺，一位在擔任助教時病逝。剩下的李登輝與何既明兩人，處境也不安全。白色恐怖的時代，特別是知識分子，大家都過著如履薄冰的日子。當醫師的何既明暫且還好，針對勞工問題與農業問題經常發表激烈言論的李登輝，便處於危險的狀態。

二二八事件以後，每逢李登輝有危險時，何既明就會把他藏到經營米穀生意的自家宅中。白色恐怖時代，藏匿者與主犯同罪，如果沒有相當的覺悟，不可能如此幫助朋友，這應該稱得上是剷頸之交了。

書店五人組的事件，是我離開台灣後才發生的。我在台大醫院附近的小吃攤與何既明告別時，兩人聊到的書店計畫，還只在租店鋪的階段。如果當時我也參加了書店集團，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狀況？何既明在《陳舜臣中國圖書館》第五卷的月報中曾經如此寫道：

——如果舜臣也參加的話，因為他逃跑比較慢，萬一當時遭逮捕，就不會有今天的文豪陳舜臣了。

當時還為選擇搭飛機或搭船返回日本而猶豫。搭飛機幾個小時就可抵達，搭船的話需要三天時間。

——請搭船回去吧。搭飛機回去的人當中，有些遇到相當麻煩的狀況。

茶行的老闆這麼教我們。

如果搭飛機前往日本要去九州辦事，萬一遇到需要延長滯留期間，或者需要變更事項等狀況，本人還得回到入境地點的東京辦理，會造成相當大的困擾。而且飛機只有台北—東京航線，大阪機場僅限於軍用用途，不開放給民間飛機使用，因此無論如何，入境地點一定得在東京。

——搭船抵達神戶後，可在當地辦理手續。美國的作法，是申請文件只要錯一個字，就得回入境地點重新辦理，相當麻煩呀。搭船回神戶吧，這樣會輕鬆許多。

茶行老闆對許多細節甚為熟稔。因此我們取消了機票，改搭客輪。所幸機票與船班都由 Jardine Matheson 公司代理，更改過程意外順利。Jardine Matheson 公司中文稱為「怡和洋行」，是鴉片戰爭以來的名門商店。

穿過古色古香的怡和洋行大門時，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帶著奇妙的興奮感。該公司位於台北的淡水河附近，該區域並排著許多外國人的公司。我很想調查看看他們活躍於東亞時期的資料。我會對鴉片戰爭感興趣，就是從進入怡和洋行台北辦公室，辦理返回日本手續時的那份興奮與悸動開始的。

\*

十月，在中國是個忙碌的月分。

中華民國的建國紀念日是在十月十日，一九一一年的這天，武昌新軍起義，推翻了清朝政府。這個紀念日也稱為「雙十節」，即所謂的「國慶」日。而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天安門發表宣告的十月一日，也是當作「國慶」來慶祝，只是大陸方面的「國慶」是從一九四九年開始舉辦第一次。那段時間我正好在等待返回日本。當時還是沒有電視的時代，消息自然是從廣播上聽來的。

我到月雲姊家拜訪時，正巧廣播正在介紹中共政府的首腦成員，所有的人名中都加上了個「匪」字。這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人民政府主席是毛匪澤東、副主席劉匪少奇、國務院總理周匪恩來，大致以這種方式播報。平常我只知道報紙中經常出現的朱德、彭德懷、林彪等軍人的名字，此時廣播中接二連三出現了我不知道的名字。余錫乾因為曾待過東北，有實際捲入國共內戰漩渦的經驗，所以認識不少廣播中的名字，他充滿興趣地聆聽廣播報導。

——是我聽漏了嗎？好像沒有海軍呢。

余錫乾歪著頭說。

別說聽漏了，當時我根本沒在聽。不過余錫乾注意海軍負責將領的心情我卻很能理解。畢竟國民政府軍遭到共軍追擊，遠逃到台灣來，對住在台灣的人們而言，追擊的共軍是否會跨過台灣海峽攻擊，絕對是重要的議題。共軍自稱為人民解放軍，他們究竟有沒有海軍可以迫近台灣呢？

從內陸的延安突圍而出的人民解放軍，理所當然沒有像樣的海軍。但即使如此，台灣人仍然很在意中共的高層人事中，是否有負責海軍的人。

只要有台灣海峽，共軍就不至於進入台灣吧——這是在台灣的共通見解。但另一方面，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蔣政權」未來應該會更加嚴格控管台灣，因此二二八事件絕非僅只是過往的惡夢，他們從大陸帶來了如此大量的軍隊，往後民間要成立組織加以反抗，恐怕難如登天。要對執政者挑撥性的舉止更加戒慎小心才行。

如果我沒有先訂婚，或許就不會回日本，而會選擇留下來幫助何既明等人開的書店。書店五人組變成六人組，在白色恐怖之下，逃得慢的我，或許將如何既明所說的，將會遭逮捕而從世上消失吧。

正如我看過二二八事件地獄般的場景，弟弟也在上海暨南大學看過鎮壓學生運動的地獄般場面，因此我們兩人都想要趕緊回家。而且我們兩人都在神戶有未婚妻，何既明也知道這件

事，並沒有特別挽留的意思。

書店的構想，是由大家各自提供手邊現有的書本，讓有需要的人得以購買。因為台灣已經無法購入日本的書籍，因此這其實是個相當好的想法。我回日本之後也提供自己能夠取得的書籍。而提供最多書籍的，就屬原本即擁有大量書籍、自己簡直就是書店主人的李登輝了。

從基隆出航的日子大致已經確定，接下來必須把雜務處理完畢，好整以暇地等待航期。我們搭乘英國籍渡輪，名為LOKSANG號，漢字寫作「樂生」，原本是以廣東話發音。

與親戚朋友打完招呼，要離開叔父叔母家時，他們幫我做了大量的「肉脯」（肉鬆），這是把豬肉做成粉狀或絲狀的食品，是我最喜歡的食物之一。幾年之後我與開高健<sup>2</sup>一同演講旅行時，他告訴我說：「我最喜歡肉脯了，去越南或廣東的時候，就會在紙上寫肉腐，外出求購。」我聽了便告訴他，應該是寫成肉脯，而非肉腐，他頑固地堅持說，是豆腐的「腐」，甚至要跟我打賭。我說「我知道我一定會贏，所以不跟你賭」，但他卻毫不理會。我們旅行回來後過了一陣子，突然收到他寄來的一封信，裡面還有一張日幣一萬元的鈔票。信中寫說，我徹底輸了，十幾年來從未質疑過，也從沒查過字典，一直堅信該寫成肉腐，實在感到慚愧之至，因此特別奉上現金一萬日元，請拿去為令郎添購些書本。當年與開高先生談起肉脯的話題時，就讓我回想起叔父叔母起個大早炊煮肉脯的情景。

這些肉脯果然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實際上樂生號上的餐飲實在不怎麼樣。

而船隻究竟何時出航，連公司也不知道正確日期。這點實在是相當靠不住，我只好每天都到台北永樂町的怡和洋行去問船是否已經到了。樂生號航行於日本和加爾各達之間，是一艘四千噸左右的小型客貨船。

——這是一艘從二戰之前便開始航行的老經驗船隻，雖然好幾次都傳出要報廢的傳聞，但至今仍安全航行當中。完全無須擔心，敬請安心搭乘。

怡和洋行的買辦就這麼跟我說明。聽完之後究竟是該安心還是該擔心，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了。

想到要暫時離開新莊與台北，內心還是相當感傷。當初決定回台灣時，原本只想待個兩年左右，不過日本與台灣已經與過往不同，不再屬於同一個國家，而且日本還在美國的佔領之下。我沒料想到這種狀態會持續這麼久，而中國的內戰對台灣的影響也超過預期，因此在台灣一待就是三年多。

位於台北、曾經照顧過敏臣的茶行，成為船公司與我們之間的聯繫場所。船公司透過茶行聯絡到我們，通知樂生號已經入港。我們兩兄弟原本還在等候，當下趕緊動身趕往基隆。樂生號不是停在海面上而是直接駛入港口停泊，如此一來便無須透過小艇接駁搭乘，這實在方

便許多。

雖說是客貨船，也不過是在寬廣的船艙空間內排上整排的床鋪而已。如果貨物多的話，大概船艙內也會擺放貨物吧。只不過這個時期肯定不會有太多的貨物。

從我們登上船後，樂生號仍保持靠岸狀態停留了一晚，第二天終於從基隆港出發。

灰色的基隆港都，背後是一整片台灣的綠色，這一切逐漸遠去。

——別了台灣！

三年半前我從這個基隆港上岸，今天又從這裡離開。對於一個擁有兩個故鄉的人而言，這實在是萬分複雜的心情。

\*

樂生號雖然號稱客貨船，其實幾乎就是艘貨船，只有在船艙有空位時，才讓船客搭乘。順著這個道理來推想，難怪船公司遲遲不發登船許可，一直讓乘客等到最後一刻，此時如果船上已經載滿貨物，大概就會拒絕乘客登船，而改要求大家「請搭乘下一班船」吧。

幸好當時貨物不多，能夠為乘客騰出空間。這條加爾各達—橫濱航線，會經過新加坡、香港、基隆、上海，之後前往神戶，但因為此時有「政變」，所以本次航程將不停靠上海。所

謂的政變，指的是共產黨戰勝蔣政權，控制了上海。船公司似乎暫時不發船到上海去。

搭樂生號從基隆出發的乘客，除了我們兄弟倆之外，還有一位老人。我們當然不認識他，不過對方卻認識我們的父親。那位老人上船沒多久，就因為暈船的緣故，不再離開船艙到室外去了。

比我們先登船的旅客只有一位，是個印度人。他是所謂的甲板旅客<sup>3</sup>，只付了最低的費用搭船，頭上盤著頭巾（Turban），看不出實際年齡大小。因為蓄著鬍鬚，身上又穿著皺巴巴的衣服，給人一股老叟般的感覺，但實際年齡或許很年輕。

這位印度人是錫克教徒，因為在神戶住有許多錫克教徒，因此我們一看便知。十六世紀時，那拿克（Guru Nanak）創立了這個教派，這些人便是他的信徒。那拿克批判了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並充滿野心地統合出了一個新的教派，信徒以印度旁遮普地方最多，所以某些時候也會稱旁遮普人為錫克。如果在名字之後帶有「辛」（singh）字，聽到這個名字就知道是錫克教徒。他們不可剃髮與剃鬚，只能以頭巾纏繞包覆，因此從服裝外表一看便可知是錫克教徒。

樂生號的這位甲板旅客，雖然不知道名字，不過名字後肯定有個「辛」。樂生號的隨船醫生也是位印度人，他偶爾會照顧這位身形邋邋的同胞。我們問了船醫，才知道大致情況。

錫克教徒既勇敢體格也強壯，在軍隊中錫克人非常醒目，可以算是過往英屬印度陸軍中的招牌看板。在英國的勢力範圍內，以警衛、守衛或保鏢等身分活躍。在上海的工部局（位於外國租界內的行政機關）警察中，有許多錫克教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已經回收所有的租界，一部分錫克教徒職員被外國人的單位吸收，但之後因中國共產黨崛起，這些人也不得不離開中國。運氣好的人能在香港受雇，但大部分的人仍舊回到本國。逐漸地，留下來的人數越來越少，整群人離開的情況也不再出現。樂生號上的這位錫克教甲板乘客，可以算是逃離較慢的租界人種吧。他如何潛入樂生號，我並不清楚，不過就在這年五月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當時這位錫克教徒大概就匆匆忙忙搭船逃離了吧。理所當然他身上並沒有護照之類的證件。

這位錫克教徒想要回到自己國內，但無論在香港或新加坡，甚至終點站加爾各達，都不准他上岸。無法登岸，就只能一直留在船上。結果他就如傳說的「漂泊的荷蘭人」<sup>4</sup>一般，不被任何國家所接受，只能一直在海上飄蕩。

船上有這麼一名客人，船公司自然感到萬分困擾，但又無法將他趕下船。印度方面大概也相當為難。當時印度與巴基斯坦雖分別獨立，但仍處於過渡時期，印度還是由英國國王任命的總督負責管理印度自治領地；一直得等到隔年（一九五〇年）一月憲法生效之後，才正式成為印度共和國與巴基斯坦共和國。

錫克教徒雖然與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都保持友好的關係，但過往曾受過蒙兀兒王朝皇帝奧朗則布（伊斯蘭教徒，在位期間自一六五八至一七〇七年）的鎮壓，因此最終選擇了向印度靠攏。

在混沌的世間，這位平民與樂生號一般，只能不斷飄蕩，並祈禱下一次的航行，加爾各達當局能夠接受自己這麼一個印度國民。

在無聊的船旅當中，只能持續仔細觀察這位我們也不能多說什麼的錫克教老先生，除此之外別無他事可幹。船順著紀伊水道逐漸接近神戶港。

眼前似乎浮現了神戶的模樣。

我好像還沒從這個角度看過神戶。之前回台灣的時候，是從廣島縣的吳港搭船出發，當時是搭火車離開神戶的，而且還是半夜。

神戶在一九四五年三月與六月受到大空襲，我當時是置身其中看著遭炸毀的神戶，而非從外觀看。首次從外頭看神戶，還是從現在搭乘的樂生號甲板上瞥見的。

當天是個晴朗的好天氣。十月底秋高氣爽的絕好天候，彷彿在祝賀我的返鄉。

神戶自從受空襲成為殘破的廢墟，至今已經過了四年。雖說開始重建，但畢竟戰爭結束未



久，還沒什麼讓人驚艷的復原成果。回到神戶後立刻發現，在市內有兩處寬廣的美軍軍營，分別稱為 East Camp（東營）與 West Camp（西營），除此之外並沒有屋舍林立的模樣。在廢墟中緊急搭建的建築，大概都只是並列的平房景致。我站在甲板上遠眺著這一切。

船隻逐漸靠近神戶。

——那邊有個龐大的建築物。那是什麼？

樂生號的船員指著陸地方向，他們恐怕是初次來到神戶的船員吧。船醫似乎已經跑過不少次這條航線了，說了句：

——那個呀，就是這個喔！

他一面說著、一面擺出揮棒的姿勢。

那個巨大的建築物就是甲子園球場。球場周遭沒有比它更大的建築，我們從海上看到甲子園的堂堂姿態，我還記得當意識到甲子園依然屹立時，那種鼻頭突然一酸的感覺。

甲子園是高校（當時的中等學校）棒球的聖地。特別是當年兵庫縣的預賽全都在甲子園舉行，我們當學生時經常會去加油。球場食堂的咖哩飯以既便宜又好吃出名，這也是去加油時的樂趣之一。這光景宛如充滿少年時代回憶的甲子園，最先出來歡迎我回來一般。

樂生號在神戶的堤岸靠岸，我的歸鄉之旅也告一段落。

日本此時還在美國的佔領之下，港灣自然也受佔領軍管理，我們感覺自己就像是外人一般。入境時的海關審查只是很業務性地在船上辦完了事。

舊金山和約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簽訂的，正式生效則得等到隔年的四月。我回到日本家中後，大概有兩年時間都還屬於美國佔領時期。

——這恐怕是自己人生的一個重大區隔吧。

我下了船站到岸上，放眼四周神戶的景色，心中如此暗忖。

## 獲頒亂步賞為止

戰爭結束後，我在台灣待了大約三年半。

一九四五年八月隨著戰爭結束，我的日本國籍自動消失。不過消失的不只是國籍，連自己的未來也失去了方向。在戰爭期間，連是否能活下來都沒把握，因此不太去考慮將來的事。

戰爭結束了，我們的「前途」總算變得比較踏實。對我而言必須面臨的另一個現實：原先認為是自己「前途」的方向，無論如何已經行不通了，現在的我必須選擇另一條路走。

我大膽（也可以說任性）地選擇了做學問的道路。我對印度充滿興趣，也對至今為止的印度研究只停留在佛教相關議題上感到不滿，因此想要朝向新的印度學研究邁進。

會有這樣的想法，多少是受到當時研究風氣的影響。當時日本對中國的研究，也有脫離古典漢學家主導、想要走出新支那學的傾向。

我回台灣之前，聽到外務省不再給澤老師補助，因此研究所不得宣布結束。原本以為我可以保持無給職的「囑託」職位，但因為我已經喪失了日本國籍，無法在國立學校中任職，

雖然有另一套「外國人雇用」制度，但那並非適用正式研究員的制度。

如果是在私立學校，而非擔任國立學校的教職員，大概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吧。可惜，日本除了東西兩所國立外國語學校之外，其他學校都沒有印度語或波斯語的講座。從離開學校返回台灣時，我便思忖著要找尋其他學術周邊的工作。

回到神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結婚。訂婚後立刻前往台灣，想想實在相當不負責任。不過一別竟長達三年半，也是離開之際始料未及的。在台灣住了兩年左右，對二二八事件感到失望，當時就想要離開台灣。不過那時只能利用走私用的船，也就是所謂的「走私船航路」。

「不可以搭那麼危險的船回去。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恢復正式的通航。」  
與父親做貿易的茶行老闆賴先生給我如此忠告。

之後果如其言，大約一年之後，我們便能夠依循正式手續前往日本。  
雖說如此，日本重建的路途仍然非常漫長。

父親的貿易工作也還沒完全恢復，生意上經常發生問題，而主要原因都出在日本仍處於美國佔領下。

結婚之後，我先幫忙父親的貿易工作，算是走上幾乎與學術工作無關的道路。那是還沒有蜜月旅行習慣的時代，只有到近郊一趟當天往返的郊遊。

「或許沒辦法經常帶妳到處遊玩，因為我喜歡讀書與寫作。」  
我這麼告訴太太。

在台灣的時候，我偶爾會夢見神戶的市街。我夢到的不是遭空襲悲慘摧毀、人們垂頭喪氣縮著身子行走的神戶。我的夢中永遠都是青空萬里、光朗燦亮的神戶。

一九四九年十月，相隔三年半後返家。記憶中那幾天都是好天氣，或許偶爾有下雨吧，不過完全不記得了。我的神戶，連做夢都會夢見的神戶，現在正親眼看著她。雖然神戶還在美軍的佔領下，不過那種事情已經無所謂了。

我從位於神戶垂水的家回台灣，這趟到神戶，則回父親新購的、位於布引町的住宅。不管前往台灣還是神戶，都使用「回」這個動詞，這就是我的命運。

在台灣の三年半期間，提起讀書，大致都是中文書籍，既有古典也有現代作品。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斷斷續續讀完《紅樓夢》。至於從日本帶回台灣的書，二二八事件後便反覆閱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沒想到在不同的時期與環境下，即便閱讀的是同一本小說，也會給人如此不同的印象。過往學生時代的閱讀，泰半都帶有一點非讀不可的義務性質。

在河合祭治郎<sup>1</sup>的《學生與生活》中，列出了長串的書名，特別是上面記有符號者，就屬於必讀的書籍。當我回到日本後，發現自己再度沉溺到閱讀世界中。

不過，我已經二十六歲，並且組織家庭了。

成為學者的道路已經被堵住，為了生活我必須從事些工作，而且希望這工作最好與學術相關。一時難以覓得符合這種條件的工作，暫且選了最簡單的選項，就是留下來協助父親的貿易事業。我父母育有七男三女，我是老二，即便不繼承家業也無妨。

當時各地華僑通信時都使用漢文，稱之為尺牘。我在台灣的時候也稍微習慣了使用漢文。

雖然我沒有學習過正式的商业尺牘，但能夠運用一般的漢文，似乎已經足以應付日常工作。過往由父親負責撰寫的尺牘，現在改由我來書寫。我會先寫好草稿，讓父親讀過並幫我訂正。父親鮮少訂正我寫的東西，不過在過程中卻教導了我許多相關的知識。

我們貿易的對象大多是個人商店，這些商店寫來的信件，有些由父親與兒子共同署名。回這種信件時，必須將父子的名字並列，並在下方寫上「賢喬梓」。與台灣的商店做生意，因為正是「日語世代」活躍的時代，寫信時使用日語便足夠。但對於香港、新加坡、檳城、吉隆坡、加爾各達、曼谷、西貢等地的商家，無論如何大多都使用充滿古風的尺牘文。

民間貿易終於再度開放，交易的商家因為經過戰爭與戰後的混亂時期，經營世代有所變更，而歇業的商家也不少。

似乎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民間貿易才逐漸恢復到以往的規模。貿易的型態與從前差異甚大，甚至連父親也開始感到困惑。

不過，採用信用狀付款的方式，這點則遠比過往安全。二戰之前，大概都是開立六十天或九十天的本票付款，風險相當大，因此必須謹慎選擇交易對象。例如有人下單訂購一百箱干貝（貝柱），我們就會回信說目前現貨只能提供五十箱，這就是為了減低對方本票無法入帳的風險。

目前為止，許多大型的華僑商社，都因這類本票糾紛倒閉。使用信用狀決算，靠著海運提單<sup>2</sup>，銀行便會支付費用。

那個時代幾乎都靠電報在聯絡，尺牘只能算是一種確認的信件。

大阪外國語學校位於上本町の校舍遭到燒毀，有段期間移到了高槻聯隊舊基地去，之後又搬回原址。給我們上哲學課的平則俊雄老師回來擔任校長，大阪外國語學校也升格成為大阪外國語大學。

經常與我一同前去拜訪石濱純太郎老師的川崎直一，因為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的關係，成為外國語大學的言語學教授。澤老師還是老樣子，不過因為廣島有英屬印度陸軍駐紮，他得去教導他們日語，同時也得協助處理外交上的事宜，生活似乎非常忙碌。

——印度的言語情狀，今後好像會起很大的變化呀。

當我前往澤老師位於蘆屋的住家拜訪時，他如此告訴我。

印度將變為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共和國，而大部分居民為伊斯蘭教徒的巴基斯坦將與印度分開，成為獨立的巴基斯坦共和國。印度的國語是印地語，巴基斯坦國語則為烏爾都語。這兩種語言原本是相同的，我們可以理解成：文字書寫時印地語採用天城體 (Devanagari，也就是所謂的梵語字)，烏爾都語則以阿拉伯系統的文字書寫。但當它們分離各自獨立後，印地語中的梵語 (Sanskrit) 詞彙肯定會逐漸增加，而烏爾都語中的阿拉伯/波斯語詞彙也會更顯濃厚。

經過了五十年，現在觀察外國語大學中的授課，果然印地語和烏爾都語是在不同的課堂上講授。如此看來好像澤老師的預言確實說中了，不過其實不只是澤老師，只要是對印度有所關心的人，大概都能預測得到這個情況。

自回到日本起，我繼續保持學習波斯語。從學生時代我便非常喜歡波斯語課程。例如奧瑪·開儼的《魯拜集》(Rubaiyat) 等書，我幾乎全文拷貝了。

從早上到傍晚，都在寫商業尺牘，到了晚上就是讀書，或者試譯《魯拜集》，因為仍想要讓自己保持在學術相關的領域當中。

沒多久韓戰爆發，因為戰爭而產生的「特需」<sup>4</sup>滋潤了日本的景氣。在前一場大戰當中，日本國土幾乎化為焦土，受到毀滅性的破壞。這次卻因為鄰國的戰爭，在幾乎不費一兵一卒的狀況下大量受益。甚至有些人稱這種現象為「神風」，不過對受戰爭禍害的鄰國人民而言，聽到這個形容肯定會震怒不已吧。

雖然社會上都說有「特需景氣」，不過像我家這種做點小生意，出口海產加工品與雜貨的商家，卻沒有遇上特需的景氣浪潮。當時有聽說為了「特需用」而從北海道大量收購魷魚乾的事情。因為這個收購，造成魷魚乾的價格突然上漲，反而給我們這些做平常買賣的商家帶來相當大的困擾。

當時加爾各達來了一筆魷魚乾兩千俵（一俵約一百五十公斤）的訂單。這是極不尋常的數量。根據父親的經驗，印尼全國一整年也只不過需要一千俵的程度，是不是對方實際上是想買個幾百俵而已呢？父親苦思不解。

不過二千俵的海運提單也提出了，銀行也收到了貨款的本票，這筆買賣已經算完成。至於兩千俵的魷魚乾究竟該怎麼處理，已經不關我們的事情了。即便如此，父親仍然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

也有人猜測說：

——食品進口這個項目需要輸入許可證，大概是證件期限快到了，不管如何先進口一大批

魷魚乾，之後再想辦法轉賣到新加坡一帶去吧。

另外也有人解釋：

——你們真不知市場的動向。現在東南亞的大量夜店中，最受歡迎的就是「魷魚乾」，一些製作機器能簡單把烏賊壓扁的人，現在瞬間都發了大財。買個一千、兩千俵魷魚乾沒啥值得吃驚的啦。

如果換成在今天，立刻可以前往進行市場調查，但當時想要辦理出國的手續卻相當困難，因此只能出現這種混雜了推想的「市場臆測」而已。

＊

我離開神戶前往台灣時，距離戰爭結束不過半年的時間。神戶的大部分地區都遭美軍B 29轟炸機的燒夷彈炸毀或焚燬，放眼望去都是慘不忍睹的瓦礫碎片。

文學史上有一個「燒跡派時代」<sup>5</sup>，正好就是我在台灣的那段期間。

透過市民的努力，將廢墟逐漸重建起來，知悉這些情況，讓我的內心湧上了各樣的情感，也因此從台灣回到神戶。我不在的這段期間，學生時代的好友，有些已經出社會工作，有些則持續在學業上精進。

這段時期投身商業界的同輩，部分是因為朝鮮戰爭的關係，逐漸忙碌起來，只顧著埋首於自身的工作。有段期間大家還經常在大阪或京都碰面，但此時也到了好友該結婚的時期，於公於私大家都忙到不可開交，因此就不那麼常見面了。學印度語的好友中，十三個人畢業後，幾乎都去當兵。甚至有三個人成為海軍預備學生，鈴木還成了戰鬥機駕駛員，幸好大家都平安無事回來了。不過在其他的班級，如印尼語的塩見便加入了特攻隊而命喪戰場。

戰爭結束後過了四年，大致瞭解朋友的狀況了。戰爭時期我們的同學接受完軍官的訓練後，便差不多要開始加入實際戰鬥。福田定一是比我們小一年級、蒙古語科的學生，但因為他曾重考一年，實際上應該跟我們同級才對。他在滿洲完成軍官教育，做為本土作戰的重要軍員之一又被叫回千葉。在我們班上，類似他這種狀況，也就是接下來立刻就要站上作戰第一線的人還不少。

我們這些人聚在一起時往往會出現，前一秒預備學生出身的海防艦船員還在向駕駛戰鬥機的人抱怨，「你們這些駕駛員，從來沒從空中掩護過我們」，下一秒就開始針對印尼的棉布輸入許可進行預測評估，並互相交換意見。

剛從台灣回來的時候，對於自己在台期間日本流行的語彙，例如「戰後派」<sup>6</sup>，並不理解其意。不過，日本終於來到了大家都能對這類外來語新詞習以為常，且能不帶抵抗感脫口而

出的時代了。

雖然想拿現在的神戶與空襲前相較，不過其實也沒什麼好抱怨的。畢竟與遭到焚燬的廢墟時代相較，還是值得讚揚一聲：重建得非常好呀！

即便如此，戰後廢墟般的場所，在某些角落仍然可見。遭燒毀的痕跡已經逐漸消失，只剩下空地。這距離空襲不過十年吧。人們都拚命工作，沒有注意到市鎮的容貌正在變化。大概就在「重建」這個字眼已經讓人感到有點過時的時候，我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下定決心要靠著筆桿過生活。

應該說是上班族嗎，還是該說是商務人士呢？總之從台灣回來後的這十年，都過著非我本意的日子。

作為一個擁有家庭的男人，已經育有一男一女，我對生活並沒有什麼不滿。如果就這麼一路過下去，或許也不會出現什麼問題。不過，自從我立志做學問的志向遭受挫折之後，「至少希望能走上作家的道路」，便成為我新的志願。

讀書是我從小培養的興趣，閱讀傾向則偏重歷史與虛構故事兩類。小學生的時候，我是《少年俱樂部》的忠實讀者，當然也非常熱中江戶川亂步的《怪人二十面相》。我與推理小說的邂逅，便起始於此。

第二次的邂逅，是在大阪外語一年級生的時候。本多平八郎老師的英語課時間，講授了柯南·道爾有關超自然的文章，因為對作者產生了興趣，所以加入研究社閱讀了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故事。

從台灣回到神戶後進入亂讀的時代，那時讀了艾勒里·昆恩 (Ellery Queen) 與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作品的新譯本。二戰結束前，我在中學時代經常讀《新青年》。雜誌上刊載的偵探小說，現在才知道那時閱讀的都是節譯版。

我在小學時代曾經於很短的時間內骨折過三次，之後便有了骨折恐懼症，一直都盡量遠離運動類的活動。我的讀書量能比同伴多，大概是因為把運動的時間都挪給閱讀了吧。

除了奧瑪·開儼的詩，我對他的朋友，也就是被稱為「山中長老」的哈桑·沙巴，同樣很感興趣。可惜他為數眾多的著作，隨著阿刺模忒堡<sup>10</sup>遭旭烈兀（成吉思汗的孫子）攻陷，皆付之一炬，現今他的文章只能散見於其他人著作中的引用部分。將這些斷簡殘篇蒐羅之後，或許可以多少理解「山中長老」的著作。

阿刺模忒堡陷落後，據說沒有人投降，但「山中長老」一派仍暗中逃亡。在孟買有一個尼查里·伊斯瑪儀 (Nizari Ismaili) 協會，便自稱是他們的後裔，其指導者阿迦汗 (Agha Khan) 與其子阿里汗 (Aly Khan) 皆為天下聞名的大富豪。現在該協會仍發行各種刊物，

我也透過日本的丸善書店購入了一些出版品。只是，阿刺模忒的後裔成為大富翁，且與好萊塢女星<sup>11</sup>搞花邊新聞，實在令我無法釋懷。

透過丸善購入的書本中，有愛德華·布朗(Edward Granville Browne)<sup>12</sup>的《波斯文學史》共四冊。實際上購入之前我只有一本第四冊，所以現在我手邊有兩本第四冊。至於為何會只有第四冊，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在一九四一年進入大阪外國語學校，當年其實挖到了許多外文書籍。同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這之前留在日本的英美人士與同盟國人員都撤離日本，他們離開時便處理掉許多舊書。神戶以前便有外文書籍的舊書市場，會接手從外國船隻的船上圖書室汰換下來的舊書。據說年輕時的江戶川亂步，曾在橫溝正史<sup>13</sup>與西田政治<sup>14</sup>的介紹下，於神戶外文舊書市場找尋平裝本書籍，有一個說法認為這正是日本推理小說的肇始，此時還是昭和初年的時候。下一波外國人返國並拋售外文書的浪潮，則是在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恐怕我手中持有的愛德華·布朗《波斯文學史》第四冊，就是在這個脈絡下購得的。當時神戶有家名為羅各斯的外文書鑑價商，少見的珍本大概都在該書商手中，很少流通到我們周遭。一直到空襲變得越發激烈的時候，極為昂貴的書籍，如羅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的《智慧七柱》等作品，仍然擺放在我們身高構不著的高層書架上。

我在台灣的時候，曾在台北的舊書店看到一列排放有矢野峰人<sup>15</sup>落款的外文書籍。當時趕緊試著找尋有無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英譯的《魯拜集》，果然還是找不到。矢野峰人是台北帝大的教授，以身為《魯拜集》的重譯者而知名。

我試著把《魯拜集》由波斯語譯成日文，而且譯稿也大致完成，大概與此同時小川亮作<sup>16</sup>也翻譯出了一個版本，並由岩波文庫出版。我讀了小川的翻譯，確實是非常優秀的譯作，在他之後如果還提出我的試譯版本，恐怕會貽笑大方。伴隨我度過青春的《魯拜集》，能夠找到一位優秀的譯者，讓我感到相當高興，也祝福此次出版。

別了，《魯拜集》！接著我思考下一個目標：

——現在，就是推理小說的時代了！

考量日本小說的歷史，接下來會受到大眾歡迎的肯定是推理小說。所有小說都有推理的要素，但如果出現「偵探」這個詞彙，就會讓人聯想成以偵探為主角的小說，如此一來類型將非常受限。「偵」字在日本一開始還不歸類在常用漢字內，都以平假名寫成「探てい小説」，因此有段時間也以「推理小説」的漢字來表現小說類型。這個用法出現後大受好評，之後即便「偵」字列入常用漢字，「推理」一詞仍舊沿用至今。

我發現無論讀什麼小說，其中一定包含了推理的要素。照這個道理來說，無論寫什麼小說，



都可以成為推理小說。

決心在學術周邊討生活的我，開始以故事作家為目標。我對大部分純文學作品感到失望，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故事性。缺乏故事性指的是，雖有故事卻少了合理性。缺乏合理性，對我而言就等同於缺乏內容，因此我從最初便對浪漫派文學抱持著戒慎之心。即便如此，我似乎也被歸類為這一派作家。恐怕我的故事性太過強烈了，所以才被如此歸類吧。無論是故事性過強，或者缺乏故事性，都交給評論家去討論吧。

最費苦心的，應是該以何種觀點來看故事。我基本的態度，就是保持不要失去普世性（cosmopolitan）的觀點。

不知從何時起，我開始有撰寫歷史小說的想法。在台灣的時候曾經讀到，甲午戰爭後清朝割讓台灣時，清廷在台官吏之一的丘逢甲，一度逃回清國本土，而且帶走了約十萬兩之財，對此丘逢甲曾嘆曰：

人間成敗論英雄，

野史荒唐恐未公。

所謂的野史，或許指的就是小說之流吧。

不過寫下丘逢甲「挾款以去」的是連雅堂的《台灣通史》，並不能稱之為野史，我因此感悟，所謂的歷史小說撰寫，必須更加慎重才行。

現代史因為相關人士多還存活，要從正面直接切入，無論如何書寫難度都相當高。

我個人思忖，最好的方法還是要在自己的腦袋中，像為歷史著色般構思故事，再以想像的方式來書寫，如此會更為容易。

雖然還有太太與小孩要養，但我仍想要儘早脫離「貿易」這項工作。幸運的是，剛好排行第四的弟弟辭去了在東京公司的見習工作，回到了父親店內幫忙。原本這應該是身為哥哥的責任。雖然我有想過要外出見習修業，但如果對方公司讓自己擔任不可或缺的重要職位，那就不是簡單說聲要辭職便能輕鬆回家的事情。

一九五七年一月，長女誕生。對我而言是第二個孩子，但卻是第一個女兒。

——嫁女兒可得花不少錢啊，要振作點喔。

周圍的人都對我這麼說。

即便不這麼說，我自己也有所覺悟，必須擔負起父親應盡的責任。可是，這個孩子剛出生沒多久就感冒了。

當年好像流行著很嚴重的感冒。

我們前往的小兒科醫院，醫師是從我太太還小時便幫她看診的老醫師。

——畢竟還是嬰兒，請務必小心吶。特別是今年的感冒據說非常兇險啊。

被醫師這麼一說，我們夫婦倆都有點哽咽起來，小嬰兒一副鼻塞相當痛苦的样子。

——遇到這種情況，請幫小嬰兒把鼻涕吸出來。直接以口罩罩住嬰兒口鼻，幫她吸出來是最好的。整個晚上都要注意嬰兒的樣子。這兩、三天是最要緊的時機，請爸媽輪流照看吧。

就這樣，我們夫婦便開始輪流照顧嬰兒。因為兩個人分攤一整夜的時間，所以分成「前半夜」與「後半夜」。當然不至於一直盯著嬰兒看，而是陪在身旁，幫著吸完鼻子後，看她樣子好像暫時舒服許多。接下來一段時間，十分鐘，或者二十分鐘甚至三十分鐘，她便能睡得安穩。不過絕對不能讓嬰兒離開視線，因為病情還是隨時可能有變化。

某種意義上，看護也算是段無聊的時間。既不可睡著，又不能恍惚。如果在什麼緊要的時刻卻大睡不醒，那後果可不堪設想。

——不如來讀書吧。

可是，如果選了令人讀來昏昏欲睡的書，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當時的吉田茂首相以愛讀書而聞名，他最喜歡讀的就是《錢形平次捕物帖》<sup>17</sup>。看來這部隨手可得的作品是個合適的選項，捕物帖屬於偵探小說的類別，我毫不猶豫買回來閱讀。

確實一如預期，這部小說擁有提神劑的作用，不過同時也產生了另一種效果。那就是閱讀後讓我覺得，這種程度的作品，我自己應該也能寫得出來吧。

恰巧我也不想繼承家中貿易事業，正在找尋其他的生存門道。至於靠翻譯印度語或波斯語，很顯然根本無法養家活口。

——不是還有推理小說嗎？

這又是我喜歡的領域，如果能成為「吃飯的行當」，家中經濟上也能安心吧。

實際上我已經寫過類似小說的作品了。不過那也僅只是「類似」小說的作品，不堪一讀。搬家的時候（一九九八年）好像又出現了幾張當時的稿紙，我把它們全都扔了。我以為那只是與文青朋友以交換書信的形式，寫出一種自我意識過剩的文章罷了。

想要寫能夠在社會上出名的文章，選擇推理小說實在是再正確不過了。我會開始大量閱讀推理小說，就是因為有長女出生之際，感冒生病這段緣由。

我閱讀推理小說，也兼著練習英文，閱讀的大多是柯南·道爾與切斯特頓<sup>18</sup>等正統派的作品。當時神戶的舊書店當中，原文書的角落還剩有一些作品，而外語推理小說都集中在一處。在空襲下遭毀滅成廢墟的神戶，市鎮容貌已經大為改變，不過這還是在昭和三十年代初期，多少仍能看出過往的殘光片影。

在書店的一角，總是會遇到一個人，久了也就互相記住對方臉孔，不過也僅止於點頭之交而已。對方年紀看來與我相仿，只因為同樣是推理小說迷，所以彼此帶有點親近感。等我獲得亂步賞後，我們才互相報上姓名，知道彼此究竟是何人。他其實是任職於神戶製鋼的課長，大名早川節勇，他翻譯過約翰·狄克森·卡爾 (John Dickson Carr)<sup>19</sup> 等人的作品，並以「早川推理」的名義出版。狄克森·卡爾寫有柯南·道爾的傳記<sup>20</sup>，難怪給人一股親近感。

早川結婚得很晚，後來由西田政治擔任介紹人結婚時，我也出席了婚宴。早川翻譯推理小說的事情，連他在神戶製鋼的同事片岡都不知道。不過不管是片岡還是早川，今日都已經過世了。

\*

從事家族事業的這十年，可以說是我成為作家前的準備期。

我從小開始，周遭的人就說我經常在茫然神遊。實際上那種時候，就是我在思考「故事」的時候。小時候想的當然都是不值一提的「故事」，當立志成為作家後，便必須想出能讓大眾接受的「故事」了。

我回日本過了一陣子，剛好碰上英國女作家約瑟芬·鐵伊<sup>21</sup>因為寫了《時間的女兒》(The Daughter of Time) 而成名。故事敘述一位住院中的蘇格蘭場督察，躺在病床上閱讀相關資料後，依據推理的方法推翻了歷史上的通說，不認為英王理查三世殺害兩位身為王位繼承人的姪兒。這屬於一種搖椅偵探類型的故事，而推理的對象，則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這點最為引人入勝。

我藉此察覺，想要爭論歷史的話，材料應該要多少就有多少。沒記錯的話，南條範夫的《三百年的面紗》(三百年のベール)，也是在這個時期出版，著作內容就是在推理德川家康出生的祕密。

例如，唐代最著名的皇帝唐太宗，為了與其兄長，也就是太子建成爭奪皇位，發動玄武門之變殺害了太子，正史上幫太宗粉飾得很好，比方說把擁有正統皇位繼承權的建成太子，描述成全無戰功之輩。

——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

《舊唐書》如此這般，把平定西河郡的功勞寫成屬於太宗一個人的功績，但同樣在《舊唐書》列傳第八寫殷嶠一節中提到：

——(殷嶠)從隱太子(指建成)攻克西河。

明白肯定太子建成參與西河一戰，而他的功績卻在不經意間遭人徹底抹消與忘卻。

這種文獻上的矛盾，從各方面進行爭辯，對歷史迷而言或許十分有趣，但一般人恐怕不會感興趣吧。我考量過幾個類似唐太宗問題的故事，但覺得日本的讀者應該不太關心這樣的主題。因此，我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採取類似《時間的女兒》的書寫方法。

相較於此，我們周遭的人們都體驗過「亂世」，都遭遇過時代風浪的翻弄，在那股漩渦當中，所有的利害與愛恨都交織在一起。而這樣的情況也往往成為連結犯罪的契機。

我父親商店內的接待室有各式各樣的人往來，他們會談論各樣的話題。接待室面對著馬路，進出相當便利，而且店面距離當時國鐵的元町站徒步不到五分鐘，即便不是為了洽談生意，等人或等車時，稍微過來打聲招呼的熟人也不少。即便待在後頭辦公室工作，仍能輕鬆聽到接待室的閒聊。因為戰爭結束至今不過十幾年，因此聊天內容許多還是與戰爭有關。

我一邊辦公，一邊進行類似小說「取材」的行動，思考琢磨我尚未問世的「故事」構想。戰後好不容易民間的貿易逐漸上了軌道，店鋪接待室內來自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買家也增加了。而在尚不瞭解東南亞情況的年代，從顧客處聽到的談話，都是相當重要的資訊。透過這樣的方式，我蒐集的資料內容也變得更加豐富。

我早期寫的推理小說，大概都是把在商店接待室中聽到的對話，或者在鎮上與熟人的對話，加以衍生、變形後寫出來的。即便想要靠自己創作，最後大部分仍是從某些人那邊聽來一些「種子」，再培養發芽後的成果。雖然我總是告訴自己，必須自行創出些想法。但就算是從頭到尾都靠自己想像，我也必須承認那不可能是與他人完全無關的原創，到目前為止，我是透過各樣的人生曲折才能置身於此，我體驗過各種經歷，聽過許多人的談話，才得以書寫，沒有這些經驗，閉門造車是無法創作出小說的。

從《枯草之根》獲得江戶川亂步賞之後，接下來就是《三色之家》、《弓之屋》、《憤怒的菩薩》、《割破》等，我不斷書寫，新的長篇推理小說逐一問世，這是因為之前有過那麼多的累積，才能出現的成果。

從台灣回到家後的這十年，雖然是實業家（使用這個詞彙時內心總會感到一陣彘扭）的時代，但也是成為作家前累積經驗的時代。此時有股不想只甘於寫推理小說的心情，可以的話也想寫寫一般小說，偶爾也希望寫點歷史小說。可以說是相當具有野心的一段準備期。

對鴉片戰爭感興趣，大概也是從這時開始。在獲頒亂步賞的許久之前，我便開始收集相關文獻。神戶住有許多台灣人，成人之間都參加了同鄉會或買賣上的商業組合，大致相互認識。可是孩子因為必須上學，相互認識的機會並不多。例如巴拿馬帽、珍珠等貿易商，各個業界內雖然有往來，但卻鮮少向外連結擴展。戰爭結束後，到各地就學的人畢業了又回到神戶，並組成學友會等組織，大家再度聚集一堂。我從台灣回來的兩、三年後，是學友會活動最熱

烈的時期。除了集會之外，華僑學校的教師組成了棒球隊，打些友誼賽，大家也會帶著家人一起去海浴旅行。

不過就如大多數的場合一樣，大家的事業逐漸變得繁忙，各自都擔任一些職位，負擔起家族事業的責任，聚會就漸漸少了。我獲頒亂步賞時大家還在聚會上送了我一些紀念品，但之後的聚會我就逐漸缺席了。

我有我自己的夢想，而父親也有他的夢想。日本的民間貿易雖然已經敞開大門，但對中國的貿易仍然受到諸多限制。這個時期日本與中國尚未建交，因此只能以變形的協定，也就是所謂LT貿易的形式來進行。LT是廖承志<sup>22</sup>與高崎達之助<sup>23</sup>姓氏第一個字母的縮寫，這是由他們兩人簽署的貿易「備忘錄」<sup>24</sup>。大家依據這個備忘錄勉強進行貿易。

當時雖然有進口青島桐木與河南桐木，不過父親在戰爭之前曾代理北海道的昆布，大量輸出到天津，因此希望能再度做起這筆生意。關於昆布貿易，是因為中國礦坑或礦山的勞工苦於缺碘，因而作為營養補充的重要食品來輸出，不只在二戰前，其實從江戶時代開始，昆布便經由長崎或琉球大量裝運送往中國。

江戶時代的琉球，實質上既屬於薩摩藩管理，又是清朝的朝貢國。琉球國王更替時，會接受清朝的策封，如此便可以朝貢之名進行貿易。

琉球從清朝輸入許多產品，但關於輸出，除了硫磺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物品，因此才以昆布等非琉球自行生產的物資權充輸出的品項。當然，這也是因為清朝方面有這樣的需求。

雖說是朝貢品，但清朝仍希望能收到實用的物資。硫磺是火藥的原料，屬於國防軍需，因此規定有必須進貢的最低額度。最初其實馬匹屬軍事用途，也規定了進貢的數量，但琉球馬匹嬌小，因此往後就被排除在朝貢品項目之外。原本因為馬匹太小要退還給琉球，但朝廷卻認為如此太過失禮，反倒斥責了負責官員。至於昆布，雖然不屬軍事用途，但清朝經濟採銀本位，因此開採銀礦的礦工健康，從國家立場來看也不容忽視。

因為這個緣故，不產昆布的琉球囤集了大量的昆布。不需多言，自明治開港之後，任何地方都可以收集昆布輸出，父親再次「向天津輸出昆布！」的夢想，追求的正是重現昆布貿易的黃金時代。

不過這個夢想最終仍舊無法實現。我父親過世的時候，尚且不知道這樁貿易無法成功，也算是一件好事。一九七〇年代中國各地成功養殖昆布，已經不需要依賴外國輸入即可自足。不僅如此，一九七二年日本反而從中國輸入了約一千噸的昆布。這一年父親還沒看過這些統計數據便溘然長逝。最初進口的是大連與青島的產品，到了一九七九年，連福建昆布也在日本登場了。幾乎所有的中國海域，都可以取得昆布。

時代走到了一個大家稱為「不再是戰後」的時期。我們已然站在一個新的時代之中。

據說桐木原本產於中國，經由朝鮮傳來日本。可以用來製作櫃子和許多家具、精細木作、雕刻品、各種琴具等等。過往高級的木屐也多採用桐木製作，現在這方面的需求已大為減少。不過，收納各種高級物品的桐木製木箱，幾乎仍都採用進口木材。琴具製作也成為最近的一種風潮。

我們輸入桐木之際，河南省產的桐木評價比山東桐木更好，不過進口賣給製作木器的師傅後，竟發生對方使用電鋸切割時突然乒的一聲被彈飛的狀況。原來是桐木中殘留著子彈，進而彈開了電鋸的刀刃。換句話說，這應該算是不良品，不過客戶卻不太能對我們抱怨。

——因為大概二十年前，貴國的軍隊曾帶著槍砲到這附近盛大地打了一仗啊。  
這麼解釋後，對方大概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了。

我們公司從新疆進口過葡萄乾給某釀酒公司，對方要求我們，此事絕不可讓其他人知道。從那個時候開始，商場上已經開始出現產業間諜的問題了。

戰爭結束過後十五年，我終於找到畢生的職志。一開始我想找有關印度或波斯的工作，但卻無法成為國立大學的正規研究員，因此轉換跑道尋求其他出路。看樣子這世上還是有我自己能夠辦到的事業。

——不是能寫小說嗎？

因為當時還是嬰兒的女兒感冒，與太太輪流熬夜看顧孩子時，讀了些小說，託那些小說之福才出現了這個發想。

——這樣的小說我畢竟寫不來。

如果一開始我就如此投降，大概當時就會去找其他的工作了。

——如果是這種程度，稍加努力或許我也能寫得出來。

很幸運地，當時我讀的是給我這種感想的小說。

透過講談社的雜誌，我得知了江戶川亂步賞。這是江戶川亂步為了紀念自己六十大壽而設的獎項。

據說最初江戶川亂步是為了平常照顧過他的推理界人士，帶著回饋給大家一項禮物的心情而開辦這個獎項的。

第一屆在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頒給了《日本偵探小說辭典》的作者中島河太郎，第二屆則頒給了出版「口袋推理叢書」的早川書房。如果照這種規模頒發下去，大概接下來就難以找出下一任的得獎者了，因此從第三屆開始，對外募集長篇小說，並將獎項頒發給其中作品最優秀的作者。

從而，第三屆（募集作品的第一屆）頒給了《只有貓知道》的作者仁木悅子，第四屆頒給《溼濕的心》作者多岐川恭，接著第五屆頒給了《危險的關係》作者新章文子。

第六屆獲獎者從缺。我以第七屆的亂步賞為目標，攤開了稿紙。

只要是推理小說，就要有謎團，而且必須將其解開。謎團不可以是無機的，要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誕生出帶有體溫的謎團。又因為這是一種娛樂，不能餘韻不佳。謎團要強烈才好，最好能與殺人事件扯上關係。那麼，有可能出現不讓人反感又餘韻繚繞的殺人嗎？

我如此思考著。我很享受思考。如果有人問我「您的興趣是？」，我會回答「做白日夢幻想」，當年甚至還被老師要求：「去找點更正經的興趣吧。」在還是舊制四年中學的時候，我懷著開玩笑的心情對老師這麼說過，不過自己走過大半輩子後反而開始思索，這或許不再是個玩笑。

根據徵文的規定，大概要寫五百張稿紙<sup>25</sup>，此外得獎者可以獲頒夏洛克·福爾摩斯像乙座，作品則由講談社出版，可以領取版稅等等條件。

我從去年（昭和三十五年）開始構思，到隔年四月完成《枯草之根》，拿到郵局去寄出投稿。

那個時候新聞正在報導反對卡斯楚的勢力接受美援，在古巴登陸卻遭擊退的消息。

七月二日，收到講談社寄來的明信片，說明《枯草之根》進入最終決選，想要知道我的簡歷。往年江戶川亂步賞大概都在八月上旬發表結果，該年度的評審委員有江戶川亂步、長沼弘毅<sup>26</sup>、荒正人<sup>27</sup>、木々高太郎<sup>28</sup>、大下宇陀兒<sup>29</sup>等五人。

當時的《神戶新聞》報社會在八月上旬延攬知名講師舉辦夏日講座，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當年的八月二日延攬到的便是木々高太郎。我自己胡亂猜想著：「木々老師這天來神戶，所以二日不會有亂步賞的選拔，應該是三日或四日才會選出獲獎人吧。」

八月四日我一如往常外出上班。我內心期待獲獎這件事情，除了我太太之外，並沒有向任何人提起。到辦公室後照舊開始寫商業尺牘，做翻譯電報等業務。從七月到八月，我們主要處理的海產商品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期，大家都在等待秋天新進貨的海產。交易量不多，這個時期也不適合囤貨，實在沒什麼需要忙的事情，因此當天我比平常更早下班離開公司。

適逢生田神社正舉辦夏日祭典，我便盤算著繞過去看兩眼。我心想在這麼熱的時節，就算有選拔會，也會在更晚的時刻才舉行吧。生田神社位於我通學的校區之內，經常會遇到熟人。在廟會一定會遇到的，就是負責打擊「神戶太鼓」的岸本。他與往年一樣對我大喊：「喂，要不要去吃冰呀？」「不啦。今天必須早點回家。」我以拿著公事包的手微微揮手拒絕。岸本與同樣打太鼓的小紀（キーやん），都是大家熟悉的受歡迎人物。不過小紀其實是中國的

廣東人。因為他並不在華僑的同文學校上課，而是直接在日本學校上課，所以人們幾乎都不知道他的出身。日後當神戶太鼓前往加拿大公演時，只有他持中國護照，在辦理手續上與其他同伴不同，那時候大家才知道是這麼回事。

這個時候我左手拿著紙袋，所以不加思索地以拿著公事包的右手揮手。與岸本告別後，走山本通往位於北野町的自宅前進，行至半途，公事包的提手突然鬆脫，沒辦法，只好把公事包夾在右臂腋下，這麼抱著走回家。

——公事包的提手脫落，是不是告訴我告別上班族的生活呢……。

突然腦袋中旋過這麼個念頭。或許因為亂步賞正在選拔當中，腦袋裡才會冒出這種沒頭沒腦的事情吧。靠近三本松的斜坡時，太太抱著女兒，走出來到香港上海銀行的公司住宅前迎接我，我遠遠便可看到她在對我招手。當年我的住宅距離太太跑出來迎接我的道路，其實有兩分鐘的步行距離，在此之前誰也沒走這麼遠出來迎接過我。肯定是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太太臉上也展現出歡欣的笑容。

在那瞬間，我立刻了解了。

## 後日譚

之後的四十年，我不曾回到台灣。在台灣經歷白色恐怖的悲慘時代，何既明偶爾會來日本，並且告訴我暫時不要回台灣，因為當下情勢還是相當危險。何既明會來，是因為他身為愛書家，特意跑來日本讀書。台灣處於戒嚴令下，許多書籍都遭禁，無法盡情閱讀自己想讀的書。例如我的著作竟然也都成為禁書。何既明當時來日本，就去書店大採買，然後從早到晚在旅館內讀書。

我之後成了作家，屢次前往中國大陸旅行，加上父親商店也做些中國貿易，因此無法一開始就順利獲得前往台灣的簽證。

在台灣，蔣經國總統在解除戒嚴令（一九八七年）的隔年過世，由李登輝接任總統。在這種外在環境條件俱全的狀況下，一九九〇年我終於能夠再度踏上離開四十年的台灣土地。這次返台，何既明當然表示贊成，還費心幫我做了許多斡旋。我以受到《中國時報》邀請的形式，於台北舉辦了一回演講。我過去的學生也特別趕來捧場，之後還舉辦了盛大的同學會。



當年我回日本時給我做肉脯的叔父與叔母，都已經超過八十五歲了，不過兩人還算健朗。弟弟本臣，當年我都讓他坐在自行車後座，送他去小學校上課，現在也已經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了。

月雲姊和她的先生余錫乾也來旅館看我。戰爭結束當年出生的小潘，現在人在美國。為了看孫子，夫婦倆好像經常前往美國。說到美國，本臣的長子大學畢業後，也在矽谷工作。就像這般，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似乎遠比與日本來得深厚。

關於我的返鄉，何既明在背後幫了我許多忙，不用說，這其中也肯定有李登輝的支持。我前往總統府時，李登輝在三位隨行人員的陪伴下，與我在接待室見面。這三位隨從全部都是外省人。

「來！我們用什麼語言來交談？國語（北京話）、閩南語（所謂的台語）、還是講客家話（客家話是李登輝的母語）？還是要說英語或者日語？」

李登輝笑著問我。

「還是講日語最容易溝通吧。」

我這麼回答。

我們以日語對談，途中李登輝會對三位隨行人員解釋：「陳先生方才這麼說，接著我那樣

回答。」我就這麼若無其事地聽著總統的口譯，與總統談話。

這屬於公開訪問的行程，之後還前往總統官邸拜訪。這時候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話題。例如NHK申請要在同一個節目中，同時播出台北與北京兩處故宮的文物，但台灣方面堅持要放入「中華民國」的字樣，讓這個企劃一直無法推展。那時苦心想了一個方法，採「中國」這個名詞，既可以是中華人民的簡稱，也可以是中華民國的簡稱，或許就能跨過這個障礙。「我會思考看看。」李登輝當時只是這麼回答，不過之後問題確實很快解決了。這是文化上的問題，另一個則是人道上的事情，我把身為公費生而留在大陸，約四十個人的名單拿給李登輝，希望能幫助他們早日返回故里。

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人民往來，已經大為放寬。不過在一九九〇年仍有一些限制，例如中國共產黨員禁止到台灣。公費生當年大學畢業，大概都具有一定的地位，擔負一定的責任，這也意味著他們是共產黨員。只不過，他們多數都已七十幾歲，屬於退休狀態，如果不能協助他們盡早返鄉，這狀況實在可憐不是嗎？有辦法的人如果有機會，會利用香港與親人再度相會。不過大部分的人是沒辦法這麼做的。

新華社的陳先生在台灣訂婚後，對未婚妻說「馬上回來」，接著便前往大陸，不久兩岸交通斷絕，時間一長，陳先生也就放棄等待，在北京結婚了。他台灣的未婚妻比他等了更長一

段時間，而且還盡心照顧他的雙親，之後才終於放棄，在台灣與其他人結婚。陳先生以新華社特派員身分到日本來，趁此機會與故鄉的人聯絡上，過去的未婚妻，在現任丈夫和家人的陪伴下，前來與陳先生見面。陳先生事後告訴我，見面時他只是一直伏跪在她的腳前。我交給李總統的名單，其實就是陳先生製作的，大部分的人除了本名之外，因怕留置中國而給家人帶來麻煩，都另外取了別的名字。

不久，公費生終於能夠回到懷念的故鄉，有些人還回來了兩、三次。就算當時我不遞交那份名單，他們應該終究可以返台吧。一切都是時光荏苒。當年的荏苒時光能善待我們，讓人不得不由衷懷抱著一股感念之情。

那之後又過了十年。二〇〇一年五月，為了慶祝《每日新聞國際版》在洛杉磯創立而舉辦了紀念活動。當時招待了兼高薰，與我前往進行演講與座談。會場大約來了四百多名人士，大多為住在美國的日本人，但其中竟然有一位是我在新莊初級中學第一屆的學生，陳垣光。當年還是十六歲的青春美少男，今天站在我眼前的，已經是接近七十歲的老人了。陳垣光是非常優秀的學生，台北的高級中學畢業後進入台灣大學電機系，短暫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後前往美國並在波音公司任職。在慣用英語的社會中度過數十年，去年好像終於退休了。因為生活上較為空閒，為了不想忘掉小學時好不容易學到的日語，開始認識在美的日本人，盡量

找尋練習日語的機會。

那天的聽眾之中，除了陳垣光夫婦之外，還有幾位台灣人。其中有一位老人走向我來，跟我說「我是賴新居的兒子」，並報上姓名，讓我著實吃了一驚。那不正是與我父親做生意的茶行老闆的名字嗎？要從台灣回到神戶前，他曾經大力照顧過我。當年為了返回日本必須向GHQ提出申請，都是借用茶行的打字機來繕打申請文件。

陳垣光是新莊初級中學校長陳炯澤的姪兒。劉碧堂事件時，陳校長因為挺身而出保護劉，也被憲兵隊帶走。畢竟雙方沒什麼關係，猜想陳校長應該很快就可以回家，但向陳垣光一打聽，似乎還遭到半年左右的拘留。陳校長之後擔任議會的職員，在前往桃園姊姊家中遊玩時，因氣喘發作而身亡。

又讓人細細想起了那個動亂的時代。

現在站在我眼前的陳垣光，在受過六年日本教育後，不得不突然切換為中國教育。到美國進入飛機公司，工作到退休之後，還努力要重新複習半世紀前學到的日語，不想任其荒廢。這不正是在亂世中成長茁壯的孩子最真實的模樣嗎？

## 編注

### 童年歲月

1 尋常小學校：明治維新至二戰期間（一八八六一—一九四〇）存在的基礎教育機構。一九〇〇年統一修業年限為四年，並增設四年高等科；一九〇七年改為六年、高等科兩年。畢業後可進入舊制中等教育的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實業學校，和小學校高等科、青年學校普通科等。根據一九三六年的統計，尋常小學校畢業後完全未升學的學生只佔百分之十三。

2 青年學校：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至二次大戰結束前存在的日本教育機構。整合了原本的實業補習學校和青年訓練所，針對尋常小學校畢業後未進入舊制中等教育學校就讀的青少年設立的社會教育機構。頭兩年稱普通科，後五年（第四、第五年只收男生）稱本科，學習內容包含公民科、普通學科、職業科、體操科，女生還有家事或裁縫科。二次大戰開始後，為補充軍需生產力，此類學校的學科時數減少、職業科目實習時數大幅增加，名為教育機構，實際上淪為戰時動員組織的一環，教育內容空洞。

3 今東光（一八九八一—一九七七）：出生於橫濱的天台宗僧侶、小說家、參議員和易經研究者。因父親的船員工作四處遷居，在神戶度過青少年階段。自豐岡中學校退學後前往東京闖蕩，一九二一年參與川端康成等人的《新思潮》雜誌第六次創刊，正式踏入文壇，之後陸續發表《軍艦》、《朱雀門》等作品，評價頗高，被歸為新感覺派作家。一九三〇年出家，法號春聽，隨後沉寂多年，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回歸文壇，五六年發表小說《お吟さま》，獲得直木賞。代表作有《惡名》、《河內風土記》等，以描寫日本近畿河內地區的風土人物為主。一九六八年曾當選參議員，川端康成擔任其競選總幹事。

## 位於海岸通的家

- 1 學徒出陣：日本於二戰末期的一九四二年，為補兵力不足，徵召當時在學的二十歲以上的文科學生及部分理科學生從軍。除日本國內，也包含台灣、朝鮮、滿州等日本殖民地的學生。
- 2 特別高等警察：日本從明治末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敗戰為止，專門取締思想犯罪、鎮壓政治活動的警察，最初設於警視廳特別高等課，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已遍設於日本全國各地。簡稱「特高」。

## 中山手和北狹長

- 1 勝海舟（一八一三—一九九）：日本幕末開明政治家、江戶幕府海軍負責人。本名義邦，維新後改名為安芳；海舟是號，由荷蘭學研究者佐久間象山授予他的篆刻印章「海舟書屋」而來。曾入長崎海軍傳習所，後留學美國學習海戰軍事。一八六二年再次進入幕府領導海軍，並於神戶設立海軍學校。幕府崩垮前夕與討幕軍將領西鄉隆盛議和，使江戶和平開城。明治維新後在政府中短暫擔任外務大臣、兵部大臣和參議兼海軍部長等職。
- 2 上海事變：即一二八事變，日本稱為第一次上海事變。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軍突然向上海開北，由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帶領的第十九路軍發動攻擊，隨後又進攻江灣和吳淞。國際勢力雖出面調停上海的戰火，卻對日本侵占東北採取放任態度，同年三月一日，日本便在中國東北成立了滿州國。
- 3 爆彈三勇士：東京《日日新聞》用語，《朝日新聞》稱為肉彈三勇士，指日本陸軍獨立工兵第十八大隊的三名一等兵江下武二、北川丞、作伊江之助。在一二八事變中，在上海郊外的廟行鎮陣地，用爆破筒成功破壞蔡廷鍇的十九路軍修築的鐵絲網，三人皆身亡。另一說為日本軍方杜撰美化出來的故事，實際上是軍方將引信剪短，三人在伍長逼迫下抬著炸彈還來不及放置便爆炸身亡。

- 4 警防團：即消防隊，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根據「警防團令」改稱警防團。
- 升學

- 1 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簡稱L/C，是銀行依照進口商的請求，開立給出口商的文書，開狀銀行承諾在該文書上的規定條件下，代替進口商負責支付貸款的責任。

- 2 南條範夫（一九〇八—二〇〇四）：日本小說家、經濟學家。東京出身，本名古賀英正，東京帝大法學部、經濟學部畢業。最初從事研究工作，一九四九年進入國學院大學擔任教授直到七九年退休，期間同時從事創作，包括歷史小說與風格獨特且以殘酷聞名的劍豪小說等，作品數量驚人，年過九十仍持續寫作。五六年《燈台鬼》獲得直木賞，八二年《細香日記》獲吉川英治文學賞。七五年獲得紫綬褒章（由日本政府頒發，授予學術、藝術或運動領域中貢獻卓著的人）。

- 3 一二二六事件：由日本陸軍皇道派和統制派的派系鬥爭引發的一次政變。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部分日本陸軍「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領士兵於東京各地刺殺政府及軍方高階將領中的敵對方「統制派」，其中甚至有兩位前任首相遇害。但他們並未成功殺害時任首相岡田啓介和佔領皇居，最終於二十九日棄械投降。直接參與者多被處以死刑，間接相關人物亦被調離職務，皇道派影響力自此衰弱。

- 4 六大學聯盟：一九二五年成立，由位於東京的早稻田、法政、明治、立教、慶應義塾和東京大學六間學校的棒球部組成的學生棒球聯盟。一九四三年因為戰爭關係遭文部省強制解散，一九四六年恢復活動。

5 別當薰（一九二〇—一九九）：出身兵庫縣西宮市的棒球選手。職棒生涯曾效力於大阪虎（阪神虎）和每日獵戶星（千葉羅德海洋）等隊。一九五七年退休後擔任教練。二〇〇八年上映、背景為學徒出陣時期的電影《Last Game—最後的早慶之戰》，就有以他為範本的角色。

6 別所毅彥（一九二一—一九九）：本名別所昭，出身兵庫縣神戶市的棒球選手。職棒生涯主要效力於讀賣巨人隊，累計兩百二十一次勝投，至今仍是該球團最高紀錄。一九六二年退休，六三年起擔任棒球播報員；廣為人知的特色是，若遇巨人隊落後，播報態度立刻大變。

### 水災前

1 客商：將家鄉土產巡銷給各地盤商，接著在巡行地購置商貨再販售回家鄉的商人。

2 再度山：位於神戶市中央區西北部的小山，山頂據稱有奈良時代留下的觀音靈地。空海和尚（弘法大師）於延曆二十三年（八〇四年）前往唐朝長安習經途中路過此處曾來參拜，祈求船旅平安和學問成就，回國時再度來此修行，故得名。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規劃為再度公園，為神戶著名的登山健行地。

### 飄落的旗幟

1 真言密教：密宗在日本稱作密教，因唐朝中期中日交流密切，印度前期、中期密宗信仰經由空海和尚（弘法大師）傳回日本。西元八〇四年，空海入唐求法拜惠果和尚為師，惠果毫無保留地將密宗大法傳授空海，並封他為「真言付法第八祖」，賜他「遍照金剛」法號。空海回國後開創真言宗，又因以東寺為發源地，也稱為東密。

2 護摩：讀作 *homa*，火供之意，源自婆羅門教，原是吠陀時代印度人的祭祀活動，後融入佛教成為修行儀式的一種。護摩自隨著東密傳入日本後，便逐漸融入神道，成為神道修煉的儀式之一。

### 太平洋戰爭前夕

1 庄野潤三（一九二一—二〇〇九）：出身大阪的小說家。大阪外國語學校英語科畢業、九州帝大東洋法文學部東洋史專攻。一九五五年以〈泳池邊一景〉獲得芥川賞，與遠藤周作等人同為戰後「第三新人」之輩的代表作家。作品產量驚人，陸續獲得新潮社文學賞、讀賣文學賞、野間文藝賞、每日出版文化賞等。代表作品有：〈靜物〉、〈傍晚的雲〉、〈明夫與良二〉等。

2 中突堤：位於神戶市中央區，建於大正時代的神戶主要碼頭。一九六三年豎立的神戶地標之一神戶港塔便位於此處。

3 何既明：外科醫生。曾就讀東京帝大醫學部，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是知名外科醫生林天祐的學生。曾任天佑醫院院長、南海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和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副理事長，因李登輝總統的摯友身分為一般民衆所知。二〇一一年十一月過世。

4 軍夫：軍隊中負責雜務勞動的粗工，不具軍人身分。

### 戰爭的序幕

1 緬甸戰役：指一九四一到四五年，日本入侵並佔領緬甸的戰事。當時緬甸為英國殖民地，位於中國西南方，西接印度，戰略地位重要，因此日本為切斷滇緬公路補給線以孤立中國，並建立南亞防衛圈、作為入侵印度的基地等企圖而入侵緬甸。

- 2 佐藤榮作（一九〇一—一九七五）：運輸省官僚、政治家。出身山口縣的釀酒世家，畢業於東京帝大法學部，高等文官考試合格。在鐵道省工作二十年，於運輸省次官任內辭職，加入民主自由黨（自民黨前身），以非議員身分入閣，之後當選眾議員並連任十次。經歷內閣官房長官、郵政大臣、電氣通信大臣、建設大臣、通商產業大臣等職後，一九六四年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執政七年八個月，是日本連續任期最長的首相，也是自民黨唯一當選四次的總裁。任內經濟快速成長，政績斐然，不但讓日本 GDP 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從美國手上拿回沖繩的治理權。在外交上極力偏向中華民國，是最後一個於任內訪問台灣的首相。一九七四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兄岸信介（舊姓佐藤）及外姪孫安倍晉三亦為總理大臣。
- 3 赤尾兜子（一九二五—一九八一）：出身兵庫的日本俳句詩人，代表作品有《蛇》、《虛像》、《歲華集》等。
- 4 大和平野：亦稱大和盆地，即奈良盆地，大化革新、天皇執政之前的大和政權即由此興起，也是之後奈良時代的文化政治中心。
- 5 紀元節：《日本書紀》記載，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於古曆（應指西元前六六〇年）一月一日即位，日本紀元由此日開始，故名紀元節。二次大戰結束後廢除，改為日本建國紀念日，日期定於新曆一月十一日。

### 越洋的人們

- 1 小磯內閣：小磯國昭（一八八〇—一九五〇）於一九四四年七月繼東條英機之後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主張與重慶國民政府談和未果，不滿一年即辭職下台。小磯國昭為陸軍將領，曾任朝鮮總督，任內多次鎮壓朝鮮人民的抗日活動。戰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判處無期徒刑，後因食道癌死於獄中。

### 上八時代

- 1 悲夫：悲嘆之意，「夫」為語助詞。最早出自《莊子·讓王》。
- 2 普列姆昌德 (Premchand, 一八八〇—一九三六)：英屬印度小說家。現代印度、烏爾都文學的巨匠，一生寫了十五部長篇小說，以及約三百篇短篇小說，有印度「小說之王」美譽。早期用烏爾都語寫作，後來改用印地語；秉持現實主義的批判風格，創作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特別是印度種姓制度下人性的黑暗面與悲哀；也因作品富含民族思想，導致殖民印度的英國當局不滿，一再遭到查禁。
- 3 中島敦（一九〇九—一九四二）：出身東京的小說家。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國文學系，父祖皆為漢學專家。自小便體羸弱，因氣喘幾度病危，又多次經歷生離死別：二歲父母離異，三歲祖父去世，十五歲繼母過世，接著陸續失去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二十九歲時長女出生僅三天就夭折；加上甲午戰爭後日人普遍輕視中國，使得漢學家成為一種尷尬的過時產物，這些都造成中島敦一生的陰影。代表作有《光與風與夢》、《山月記》、《南島譚》等。
- 4 橫光利一（一八九八—一九四七）：出身福島的小說家、詩人。因熱愛文學，在父親反對下進入早稻田大學預備文科就讀，後因病弱休學。一九二三年發表小說《蠅》和《太陽》出道，奠定了文壇地位。隔年與川端康成等人創辦《文藝時代》，推動新感覺派文學。二戰期間成立日本文學報國會，並策劃大東亞文學者會議，國家主義的色彩鮮明。代表作有《上海》、《機械》、《旅愁》等。
- 5 世界語：最為廣泛使用的人工語言。波蘭眼科醫生柴門霍夫於一八八七年奠定基礎。柴門霍夫的目標是創立一種簡單易學而靈活的語言，是國際輔助語言，用來促進世界和平及國際了解。據估計全球能流利使用世界語的人口約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
- 6 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Subhash Chandra Bose, 一八九七—一九四五)：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律師與極左派政治人物。是主張印度獨立的激進分子，曾領導東亞印度獨立聯盟。一九四三年十月成立自由印

7 織田作之助(一九一三—一九四七)：出身大阪的小說家，以描寫大阪的庶民生活著名，別名「織田作」。一九三九年作品《俗臭》入選芥川賞。代表作有《夫婦善哉》、《青春的反證》等。熱愛大阪名店自由軒的咖哩飯，曾寫下「虎死留皮，織田作死留咖哩飯」的句子。

## 大火前後

1 學徒動員：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因軍備生產需求提高，勞動力嚴重不足，自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起，動員中學校以上學生每年數日至工廠勞動(當時稱為「勤勞奉仕」)，直到戰爭末期昭和十九年，全面強制中學校以上學生進入工廠，學校教育名存實亡。

2 一橋：日本知名的優秀大學，政、經、法、商等學科特別出名。最初為一八七五年森有禮創設的商法講習所私塾，一八八四年由商農務省直轄，改稱東京商業學校，之後校名經歷兩次改變，一九二〇年升格東京商科大学，四四年改稱東京產業大學，四九年大學改制時更名為一橋大學。知名作家二葉亭四迷、永井荷風，及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皆出身此校。

3 大杉榮(一八八五—一九二三)：思想家、社會運動家、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出身愛知的軍人家世，曾就讀名古屋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並修習法語，成績優異，因不服管教遭退學。後進入東京外國語學校就讀，接觸社會主義和世界語，開始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且屢遭逮捕。與神近市子和伊藤野枝的婚外情事件曾引起軒然大波。一九二三年九月，東京大地震之後兩週遭憲兵甘粕正彥逮捕殺害(甘粕事件)。

4 疎開：日語，指戰時將都市人口疏散至鄉間。台語中也有此詞彙，應寫作「疏開」。

5 維琪政權 (Régime de Vichy)：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統治的法國；正式名稱為法蘭西國，亦稱為維琪法國。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國攻陷巴黎後，當時的總理貝當向德國求和，根據法德停戰協定把法國分成兩個地區，法國北部、中部約佔全國四成的區域由德國治理，此區政府所在地後遷至法國中部的城市維琪，故名。一九四五年瓦解。

6 勞費爾 (Berthold Laufer, 一八七四—一九三四)：美國東洋學者、人類學家。生於德國科隆猶太人家庭，萊比錫大學博士，通曉漢語、日語、藏語。一八九八年移民美國。一九〇一年起多次在中國進行長期考察，對中國的玉器、瓷器、象牙雕刻和牌樓等都有研究。自述「深愛中國的國土和人民」。晚年為憂鬱症所苦，最後於芝加哥跳樓自殺身亡。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伊朗文明史的貢獻》(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為其代表著作之一。

## 戰爭結束

1 斯文·赫定 (Sven Anders Hedin, 一八六五—一九五二)：瑞典地理學家、地形學家、探險家、攝影家、旅行作家。一八八五年開始中亞之旅，從俄屬中亞、波斯(今伊朗)，一步步深入亞洲。九〇年跟隨駱駝商隊進入喀什，從此他的探險生涯便與西域緊密結合，被譽為「西域探險之父」。一生在中國西部探險考察長達四十餘年，發現了喜馬拉雅山脈、雅魯藏布江、印度河和象泉河的發源地，羅布泊，及塔里木盆地沙漠中的樓蘭遺蹟、墓穴和長城，也撰寫了多本極具分量的作品，如：《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中亞與西藏》、《絲綢之路》、《長征記》，以及厚達八卷的《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中亞科學考察報告》等書。

2 愛德加·史諾 (Edgar Snow, 一九〇五—一九七二)：美國記者，因其在中國共產黨革命期間的著作聞名，被認為是第一個訪問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西方記者。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十月，經宋慶齡介紹，到陝甘寧邊區並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等共軍領導人。之後持續發表關於陝北共軍的報導，隔年三七年彙整這些報導寫成《紅星照耀中國》於英國出版，之後的中譯本做了少量增刪改名為《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大為暢銷。過世後一部分骨灰葬於今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3 玉音放送：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昭和天皇簽署「終戰詔書」，表示接受美、英、中、蘇四國在波茨坦會議上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同意無條件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昭和天皇親自宣讀終戰詔書並錄音，翌日透過日本放送協會（NHK）正式對外廣播。這是日本天皇的聲音首次向大眾播出。日語中，天皇的聲音被敬稱為「玉音」，「放送」則指廣播。

4 華納 (Langdon Warner, 一八八一—一九五五)：美國探險家、藝術史家。畢業於哈佛大學，後留學日本，專攻佛教美術。傳說是他建議美國當局放棄轟炸日本的文化古都，京都、鎌倉兩市都立有華納的紀念碑。

5 拉施德丁 (Rashid-al-Din Hamadani, 一二四七—一三二八)：伊兒汗國丞相、學者。出生在伊朗哈馬丹一個猶太人家庭，後來改宗伊斯蘭教，歸附蒙古軍，二十歲時，成為阿八哈汗的御醫，後被合贊汗委任為丞相。受合贊與完者都汗委託，撰寫一本世界歷史全書，於是他召集一個編輯小組，成員有中國學者、喀什米爾的喇嘛、法國天主教士、波斯人和蒙古人等，完成了《集史》，比西方編撰的第一本世界史早了五百年。

6 翦伯贊（一八九八—一九六八）：維吾爾族，原籍湖南桃源，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歷史系主任。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五四運動以後被稱為史學界的「馬列五老」之一，與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范文瀾並稱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時被指為「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遭受凌虐，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與妻子一同吞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 歸鄉

1 西南之役：主張「尊皇攘夷」、反對幕府權威的舊薩摩藩（今熊本縣、宮崎縣、大分縣及鹿兒島縣等地）士族首領西鄉隆盛，在明治維新後經常抗議新政府的命令，引發政府的忌恨、迫害，被迫以清君側名義起事，是日本最後的內戰，最終遭政府全數殲滅。西南戰爭的結束代表明治維新以來的倒幕派正式瓦解，然而此戰驗證了明治軍事改革和西化的成果。

2 GHQ：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為執行美國政府單獨佔領日本的政策，麥克阿瑟將軍以「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名義在日本東京建立盟軍最高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在日本通稱為GHQ。

3 戈培爾 (Paul Joseph Goebbels, 一八九七—一九四五)，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被稱為「宣傳的天才」。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研究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喜劇，先後從事記者、銀行出納和證券交易所傳喚員。一九二四年加入納粹黨，被任命為在柏林地區的領導人，幾年後便成為黨內的重要人物。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及納粹黨執政後，被任命為宣傳部長，對德國媒體、藝術和資訊的極權控制隨之開始。直至最後一刻始終陪在希特勒身邊，希特勒自殺不久後，戈培爾也毒殺六子後自殺。

4 黑市事件：即澀谷事件。一九四六年三月，東京新橋的台灣人與日本公司發生土地租借糾紛，雙方多次協商仍無共識，日本公司便僱用當地的黑社會「松田組」準備驅逐台灣人。七月十四日下午台灣商人張育勳遭刺傷，要求「松田組」交出兇手被拒，隔天便前往當地警察署報案，但警方不願介入，之後雙方發生鬥毆，事後日本警方檢查澀谷黑市，逮捕數名台灣人，台灣人開始向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求援。十九日，駐日代表團為保護台灣攤商安全，以卡車載送返回東京郊區居住地，因而與澀谷日警發生衝突，混亂中警察開槍，造成數名台灣人死傷。事件發生後，台灣有上千名學生示威抗議駐日美國憲兵對台灣人處置不公，企圖包圍台北美國領事館。美方要求陳儀予以保護，並建議請台灣民間人士出面調解，於是蔣渭川偕同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上百位同仁協助引導遊行隊伍，並陪同學生代表進入領事館表達抗議，使該次示威抗議得以和平結束。

5 政學系：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內部派系，是一個較鬆散的集團，以民意代表及行政官員為主體（主要是反對孫文的黨員組織「歐事研究會」成員）。可分為北洋政府時期的政學系，以及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的新政學系。



## 登陸

- 1 西条八十（一八九二—一九七〇）：詩人、作詞家、法國文學者。東京出身，早稻田大學文學部英語科畢業，曾留學法國索邦大學。與北原白秋同為大正時期的童謠詩人代表。詩人之外，歌謠作詞者的身分也相當活躍，日本電影《支那之夜》的著名插曲〈蘇州夜曲〉歌詞便是他的作品。

## 歸隱田園

- 1 台北公會堂：原址為清朝時期建於一八八九年的布政使司衙門，是當時全台最高行政機關。日治時期直到新的台灣總督府廳舍（今總統府廳舍）完工前，此處為台灣總督府辦公場所。一九三一年，總督府以紀念昭和天皇登基為由，委託知名建築師井手薰設計專為舉辦集會活動的公共建築，台北公會堂因此於一九三六年落成。一九四五年，接管台灣的國民政府將之更名為中山堂。

- 2 作者對林茂生教授本人以及兩人曾經見面的場景印象深刻，而在本書多處提及。但或許因為記憶久遠，作者對林教授的生平描述與實際狀況略有出入，以下簡單說明：林茂生出生於一八八七年，較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年長六歲，生於台南基督教家庭，父親林燕臣為清朝光緒年間的秀才，母親郭寬則是舉人之女。在求學階段，林茂生先赴日本攻讀哲學，成為第一個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士，後來又在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派遣下，前往美國留學，一九一九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是台灣第二位哲學博士（台灣第一位留學歐美的哲學博士，應是一九二七年在德國柏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劉明電）。林茂生自美返台後，先後擔任長榮中學教務主任、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今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今成功大學）教授。戰後協助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並創辦《民報》。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林茂生身兼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校務委員並代理文學院院長，是當時重要的學界意見領袖。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由兩位不明身分的武裝人士挾持離家。被當時的陳儀政府指為陰謀叛亂，逮捕後不久即遭處決，成為二二八事件中著名的犧牲者。

## 開始授課

- 1 戎克船：junk，指中國沿海或內河帆船。自清朝起，貿易、移民甚至偷渡，大多都以戎克船載運，橫渡台海兩岸。

## 消逝的牧歌時代

- 1 永樂町：約略在當時的大稻埕商業區，現今的迪化街當時稱為永樂町通。
- 2 大橋：台北大橋。一九二五年六月竣工，一端引道接於南北向的太平町通（延平北路），另一端聯絡三重，全長四百三十餘公尺，為壯觀的七跨鐵橋。後因老舊，於一九六九年與一九九六年兩度重建。

## 二二八事件

- 1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二二八事件後，地方仕紳和民意代表決定出面與政府交涉，三月一日上午，臺北市參議會邀請國民大會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三十多人，在中山堂成立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推派黃朝琴、王添灯等人與陳儀會面，提出共組處理委員會等請求。陳儀批准協調作法，並建議擴大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當天傍晚陳儀發表談話，同意組織處理委員會商討善後事宜，且承諾自凌晨零時解除戒嚴並釋放市民。二日，陳儀同意蔣渭川等人提出的四項要求，召開處理委員會籌備會議，之後決定以商會、工會、學生、民衆、政治建設協會代表共組委員會，各縣市參議員和國民大會代表亦可參與。但這讓黑道、特務分子介入而更加複雜，派系領導權力問題浮現。八日，國民黨部隊抵台展開鎮壓行動，陳儀宣布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為非法組織而命令解散。

- 2 王添灯（一九〇一—一九四七）：台北安坑人，台灣文化協會成員，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一九四六

年當選為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並任《人民導報》社長、《自由報》社長。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部長，負責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三月八日國民黨部隊抵台展開鎮壓行動，十一日於家中睡夢中遭到逮捕，被國民黨軍警以酷刑折磨，再淋上汽油活活燒死。

3 作者在此處的敘述與實際狀況略有出入，林茂生是台灣第一位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畢業生，但並未在東京帝大取得博士學位，而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教育哲學博士學位。因此，林茂生應該是第一位東京帝大的文學士（而非文學博士）、第二位哲學博士（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應是留學德國取得學位的劉明電）。

4 陳忻（一八九三—一九四七）：號若泉，台中縣大甲鎮人，臺灣金融界的先驅。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後，回台創設日本時代第一家台灣人經營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對台灣金融體系奠基貢獻良多。曾任台中州州協議會會員，也是《臺灣青年》的編輯之一，參與過台灣留學生組織的新民會以及台灣文化協會。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在台實施信託法之際，合併大東信託等三家機構，設立台灣信託株式會社，由台灣銀行、華南銀行等共同出資，陳忻雖仍任總經理，多數股份則被日治政府直轄的台灣銀行掌控；台灣信託在戰後由行政長官公署接管，實際運作仍由陳忻主導。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因陳忻留美背景，與美國情報員關係較佳。四六年三月被以「漢奸」罪名逮捕入獄，後無罪獲釋。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陳忻雖無實質參與，因其名望被推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民衆代表，之後遭軍隊逮捕並處死。

5 謝雪紅（一九〇一—一九七〇）：原名謝阿女，台灣彰化人，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之一，被稱為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幼時因家貧失學，後遇台中大地主、霧峰林家之親戚張樹敏，成為其妾，共赴神戶三年，自修日文與漢文。之後前往青島，接觸五四運動，思想漸受衝擊。返台後經營洋服店，二一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二五年至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吸收共產主義思想，並改名為謝雪紅。二七年參與建立「台灣共產黨」，積極投入左派運動，曾因此入獄。二二八事件中組織台中二七部隊，堅持對國民政府採取武力抵抗。事敗後逃出台灣，終生未返台。四八年進入中國大陸，歷任中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職，也是中共建國初期對台政治的主要發言人。後於反右運動被打成台盟頭號大右派，遭迫害病逝北京。

6 高砂：タカサゴ (Takasago)，是日本古代對台灣的稱呼，由タカサゲン (Takasagan) 訛轉而來，在日本古籍中也寫作塔伽沙谷、塔伽沙古等。高砂之名一說源自於平埔部落打鼓（打狗，タアカオ，Takao）社，另一說源自打鼓山（打鼓山，タアカオスア，Takao-sua）。打鼓族居住在台灣西南岸一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故高砂原指台灣西南岸一帶，後來轉變為台灣全島的名稱。日本治台後，延續清朝舊慣稱原住民為「蕃人」，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皇太子裕仁（後來的昭和天皇）訪台，接受原住民舞蹈歡迎，當時某將軍介紹「這是當地的蠻族舞蹈」，裕仁當場反問「你為什麼稱朕的國民為蠻族？」認為「蕃人」有歧視的意思，之後對台灣的原住民都改稱「高砂族」。

7 謝娥（一九一八—一九九五）：台灣第一位女性外科醫生。出身艋舺，留學日本東京女子醫學校，一九四二年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院第一外科服務，戰後開設康樂醫院。二二八事件時奔走協調，反引發民衆不滿，進而搗毀醫院，焚燒醫療器材與家具。曾任台北市議員、制憲國大，四七年以全省第三高票（約十四萬）當選立委，四九年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公共衛生博士，後滯美至九一年方返台，九五年於台灣過世。

## 紛亂不息

1 藍衣社：全名中華復興社，核心組織為「力行社」，「藍衣社」為其別稱。核心組織力行社最早由幾名黃埔軍校學生於一九三二年組成，強調擁護蔣介石以建立其「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為目標。到了三八年，因發展到過於龐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加上對日抗戰開始，該社解散。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於停戰協定中要求撤除的反日團體亦包含藍衣社。

2 軍統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是中華民國情報機關之一。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在中央設立專職情報的「黨務調查科」，三一年中華復興社的密核心組織力行社下設「特務處」從事暗殺活動，兩者於三七年合併為軍統局。早期的領導人為陳立夫、戴笠，四六年戴笠死後由毛人鳳繼任；四九年軍統主要機構撤至台灣，於台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持續執行國內保防工作及情報搜集，並主導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等白色恐怖事件。

## 台灣春秋

1 林爽文之亂：由天地會領袖林爽文發動的一場抗清行動，為台灣清治時期三大民變之一。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廿六日（一七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因台灣府知府孫景燧取締天地會，逮捕林爽文之叔伯，林率軍劫獄反抗，號稱五十萬群眾響應，兩日攻下彰化，殺孫景燧等人，進駐彰化縣衙門，自稱「盟主大元帥」。至十二月（隔年二月）全台除南部台灣府、諸羅，中部鹿港外均陷落。之後閩浙總督常青調集福建、浙江、廣東等地兵馬親自來台，加上引發漳泉械鬥，最終林爽文遭生擒斬首。台南市三級古蹟赤嵌樓內設置的九尊鳳凰駝碑書刻了事件始末。

2 鏈黴素 (Streptomycin)：第一個應用於治療肺結核的抗生素。其硫酸鹽為白色或微黃色粉末或結晶，易溶於水，性質較穩定。口服不易吸收，一般作肌肉注射。副作用為耳毒症，損害前庭神經和耳蝸神經，可導致聽力喪失。

3 西川滿（一九〇八—一九九）：台灣日治時期的作家與文藝工作者。三歲時父親西川純被派至台灣，因此隨雙親來台，期間除一九二七至三三年返日就讀大學外，直到日本戰敗、四六年離台為止，在台灣度過約三十年的歲月。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法文科，後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二三年以作品〈豬〉投稿《台灣新聞》，獲新年文藝徵文一等獎。次年與版畫家宮田彌太郎創立《櫻草》文藝雜誌，之後陸續創辦《台灣風土記》、《華麗島》、《文藝臺灣》等雜誌。其中，《文藝臺灣》較代表日本人的台灣觀點，與從該刊出走的張文環等創辦的《臺灣文學》正呈對比。

4 送報快：日文原名〈新聞配達夫〉，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開始連載於《台灣新民報》。後入選東京《文學評論》，是台籍作家首次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確立其小說家的地位。

5 白色恐怖：日文原文為「赤狩り」，獵捕紅色，即追捕共產黨之意。原本來自同一時期美國出現的「赤色恐慌」(Red Scare)，肇因於參議員麥卡錫以極具煽動性的手段，緝拿美國境內共產間諜的一連串舉動，也被稱為麥卡錫主義 (McCarthyism)。作者提及台灣的這一波羅織罪名搜捕共黨行為，即為國民黨的白

色恐怖統治。

6 葵丘：《孟子·告天下》記有葵丘之會。齊桓公與諸侯約定，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

## 別了台灣

1 岩波書店：日本出版社，以學術研究及佛學書籍的出版起家。一九一三年，岩波茂雄在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開了一家舊書店，命名為「岩波書店」，隔年出版了夏目漱石的小說《心》，正式進軍出版業。岩波書店不只出版了大量的學術書籍，也出版《岩波文庫》等叢書，推動經典作品與學術研究成果的普及，對文化大眾化影響頗大。二戰以後，產出許多自由派思潮的書籍，與保守派思潮書籍的大型出版商文藝春秋被譽為日本出版業的雙璧。岩波書店的薪資曾是日本出版業界公認最高。

2 開高健（一九三〇—一九九）：出身大阪的日本文學家。與大江健三郎為同時期的作家，寫作十分嚴謹，內容風格卻帶有輕鬆與幽默感，小說之外也擅長寫散文和食記；走訪四十多個國家，也是地位相當崇高的旅行作家。曾冒生命危險親往越戰第一線採訪，並致力於反戰運動。一九五八年以《裸之王樣》獲得芥川賞，七九年以紀念老舍的小說《玉碎》獲得川端康成文學賞，八一年獲菊池寬賞，八七年又以《耳之物語》獲得日本文學大賞。

3 甲板旅客：deck-passenger，即沒有船艙鋪位的旅客。

4 漂泊的荷蘭人：又譯「飛行的荷蘭人」或「徬徨的荷蘭人」，出自華格納歌劇，描述一位船長因觸怒天神而遭詛咒，只能一直在海上漂泊的故事。

## 獲頒亂步賞為止

1 河合榮治郎（一八九一—一九四四）：社會思想家、經濟學者。受父親影響對社會問題十分關心，一九一五年東京帝國大學法政學科畢業後，進入中央政府農商務省工作。後因他起草的勞動改革方案未獲接受而辭職，二〇年轉於東京帝大教授經濟學史。二二年赴英國進修，返國後授課主軸轉向社會政策，激烈抨擊法西斯主義，甚至因此與校內右派勢力對立，被迫辭去教職。

2 海運提單：Bill of Lading，簡稱 B / L，日語稱「船荷證券」，中文則有提貨單、提單、貨單、海運提單、載貨證券等譯名。

3 奧瑪·開儼（Omar Khayyam）：十一世紀中葉到十二世紀早期的波斯詩人、天文學家、數學家。代表作品詩集《魯拜集》係以波斯文寫成的四行詩，又譯《柔巴依集》，在十九世紀由愛德華·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英譯後廣為人知。因本書作者於後文提及台北帝大的矢野峰人教授重譯過此書，因此此處採用矢野的漢字譯法。

4 特需：日文中又稱「朝鮮特需」或「朝鮮戰爭特需」，係指韓戰爆發時，在韓美軍或在日美軍特別需求大量戰爭相關物資的情形。而這些服務需求刺激了日本經濟的景氣發展，故此波景氣也稱為「特需景氣」。

5 燒跡派時代：「燒跡」原指火災後的殘跡，這裡應該指因二戰遭受轟炸後的廢墟狀態。從字面意思可以理解為「戰爭廢墟派的時代」。「燒跡派」此語也衍生出所謂的「燒跡世代」，指二戰期間間出生或二戰期間就讀國民學校的一群，這個世代兒時普遍經驗過戰爭推毀後的廢墟狀態。

6 戰後派：日語アブレゲール來自法語 après-guerre，表示「戰後」之意。例如二戰之後嘗試創造新文學的野間宏、中村真一郎等人的作品，即被稱為「戰後派文學」。此外，戰後不再遵守過往思想、不受舊道德拘束的年輕人，也稱為戰後派。

7 江戸川亂步（一八九四—一九六五）：日本推理小說的開拓者，是本格派推理小說的代表作家。本名平井太郎，一九二三年在《新青年》上發表受到高度評價的處女作〈兩分銅幣〉，從此開始推理小說（原稱偵探小說，在他的倡導下改名）的創作。筆名取自美國推理小說家愛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日文發音。長篇推理小說系列成功塑造了名偵探明智小五郎。戰後致力於推理小說的研究與評論。四七年，在其倡導下成立偵探作家俱樂部，任第一屆會長（後改組為社團法人日本推理作家協會）。五四年，為慶祝他六十大壽，設立江戸川亂步賞，獎勵新人推理作家。《怪人二十面相》為其代表作之一，又譯「干面人」，反派主角是善於易容、專偷藝術品的大盜。

8 新青年：博文館發行的雜誌，創刊於一九二〇年。主要刊載海外推理小說，並鼓勵有志於從事推理創作的新人投稿，許多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說作家，如江戸川亂步、橫溝正史、夢野久作等人，都是在《新青年》雜誌斬露頭角。一九五〇年停刊。二次大戰爆發以前，日本推理小說的本格派作品百花齊放，由於引動這波風潮的作家多半以《新青年》作為發表園地，因此稱之為「新青年時期」。

9 哈桑·沙巴（Hasan Sabbāh）：十一世紀末期伊斯蘭教尼查里派人物，也是活躍於伊朗北部的著名暗殺組織阿薩辛派的創始人。

10 阿刺模忒堡：波斯語 Alamūt，意思是「鷹的巢穴」，是裏海南岸的一個古代城堡遺蹟，位於今伊朗吉蘭省境內厄爾布爾士山脈三千公尺高峰，距離德黑蘭約一百公里。一〇九〇年起是伊斯蘭教尼查里派的主城，後來又成為阿薩辛派的主城。二二六六年，蒙古人攻陷阿刺模忒堡，摧毀了這座城堡，阿薩辛派遭到毀滅。

11 好萊塢女星：指美國一九四〇年代紅極一時的性感女星麗塔·海華斯（Rita Hayworth）。於一九四九年嫁給阿里汗（Aly Khan）王子，是她一生五次婚姻中的第三次。

12 愛德華·布朗（Edward Granville Browne）：英國劍橋大學文學史家、東方學家，曾參與波斯立憲革命。

- 13 橫溝正史(一九〇二—一九八二)：推理小說家。出生於神戶，大阪藥學專門學校畢業後短暫從事藥劑師工作。一九二六年受到江戶川亂步邀請前往東京，後擔任《新青年》等雜誌編輯，同時從事創作和翻譯。但戰後作品才受到矚目，四八年以《本陣殺人事件》獲得第一屆日本偵探作家俱樂部獎(後更名為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長篇部門獎。作品數量驚人，代表作有《獄門島》、《八墓村》及《惡魔的手毬歌》等，其中以金田一耕助為主角的偵探故事最為知名，共有七十七部。
- 14 西田政治(一八九三—一九八四)：推理小說家、翻譯家。
- 15 矢野峰人(一八九三—一九八八)：詩人、英語文學家。出身九州，京都帝國大學畢業。曾任第三高等學校與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台北帝大時期與任職同校の後輩島田謹二成為終身莫逆。戰後擔任過東京都立大學總長、東洋大學校長等職。專攻英文詩，翻譯與評論眾多，本人出版過《幻塵集》等詩集。《四行詩集 古代波斯》即他重譯奧瑪·開儼的詩集，一九三八年由台北日孝山房出版社出版。
- 16 小川亮作(一九一〇—一九五二)：出身新潟，曾任外交官，並於日俄協會(位於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學習俄語。也曾以日本外務省留學生身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學習波斯語，並因此邂逅了《魯拜集》原典。
- 17 錢形平次捕物帖：野村胡堂的作品，多次被改編成電視劇、電影、舞台劇等。一九三二年在文藝春秋發行的《文藝春秋 ALL 讀物》創刊號中，刊載了以錢形平次為主角的首篇作品《金色處女》。從這篇起，到五七年止的二十六年間，野村總共創作了長短篇計三百八十三篇，內容為主角平次與部下八五郎發揮推理能力與投錢技能解決各種事件。
- 18 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一八七四—一九三六)：英國作家、文學評論家、神學家。熱愛推理小說，他撰寫的作品以布朗神父為主角，弗蘭博為其搭檔。布朗神父篤信天主教，身材短小圓胖，戴著圓框眼鏡，頭戴圓頂寬邊黑帽，身穿黑袍，與講究物理證據的福爾摩斯不同，更擅長心裡推演。切斯特頓共寫了五十一篇以布朗神父為主角的短篇推理小說。
- 19 約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 一九〇六—一九七二)：美國推理小說家，亦化名卡特·狄克遜(Carter Dickson)，以密室殺人小說聞名。
- 20 柯南·道爾的傳記：書名為*The Life of Sir Arthur Conan Doyle*，中文譯為《柯南·道爾的一生》。
- 21 約瑟芬·鐵伊(Josephine Tey, 一八九六—一九五二)：原名Elizabeth Mackintosh，是位歷史學家，鐵伊是她寫推理小說時的筆名，後來以此名聞名。鐵伊與阿嘉莎·克莉絲蒂、桃樂絲·樹爾絲(Dorothy L. Sayers)並列推理小說第一黃金時期的英國三大推理女作家。鐵伊各部作品風格迥異，內容水準極高，一生只寫出八部推理小說，與其他二位產量型推理女作家截然不同。
- 22 廖承志(一九〇八—一九八三)：曾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熟知日本事物，為中國培養出許多對日事務專家。高崎達之助(一八八五—一九六四)：日本政治家、實業家，歷任電源開發第一任總裁、通商產業大臣、第一任經濟企劃廳長官等職。
- 23
- 24 L T備忘錄：日文稱為「日中L T貿易覺書」(日中貿易に關する高崎達之助・廖承志の覺書)。一九二二年九月，周恩來總理與日本眾議員同時也是自民黨大老松村謙三，為了擴大中日貿易而進行相關會談，雙方合意基於平等互惠與循序漸進的原則，推動彼此貿易。同年十月，由高崎達之助率團至北京，十一月九日與廖承志簽訂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取兩人姓氏「廖(Liao)」和「高崎(Takasaki)」的英文字首命名「L T」。
- 25 五百張稿紙：日本一般稿紙為四百字一張，五百張約二十萬字。
- 26 長沼弘毅(一九〇六—一九七七)：大藏省官員、實業家、文藝評論家。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早稻田大學經濟學博士，熱愛推理小說，書寫與翻譯過不少推理相關書籍。

- 27 荒正人（一九一三—一九七九）：日本藝文評論家。熱愛推理小說，也撰寫、翻譯過推理作品，擔任江戶川亂步賞評審多達十四次。
- 28 木々高太郎（一八九七—一九六九）：大腦生理學家、推理小說家。曾任日本探偵作家俱樂部（今推理作家協會）第三屆會長。小說、評論、詩作及其他著作甚多。
- 29 大下宇陀兒（一八九六—一九六六）：本名木下龍夫，推理小說家。曾任日本探偵作家俱樂部第二屆會長。

## 後日譚

- 1 兼高薰（一九二八—）：日文寫作兼高かおる，記者、日本旅行作家協會會長。本名兼高ローズ，可能是將「兼高 Rose」寫成片假名，之後取玫瑰薰香之意再轉為「兼高薰」。出身神戶，父親為印度人，香蘭女學校畢業後前往洛杉磯留學，之後成為記者，走訪超過一百五十國。

## 陳舜臣年表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二四年	大正十三年	〇歲	二月十八日，出生於神戶市神戶區（現中央區）元町通七丁目，父親陳通、母親蘇嬌。	
一九三〇年	昭和五年	六歲	四月，於神戶市立諏訪山尋常小學校入學，住在多華僑的「廣東村」，即現在的中央區中山手通三丁目。	
一九三二年	昭和六年	七歲	搬到現在的中央區北長狹通四丁目。	九月十八日，滿州事變。
一九三三年	昭和七年	八歲	轉學到神戶尋常小學校。	
一九三四年	昭和九年	十歲	搬到現在的中央區海岸通五丁目。	
一九三六年	昭和十一年	十二歲	四月，進入神戶市立第一神港商業學校就讀。	日本二二六事件。
一九三七年	昭和十二年	十三歲	父親的店遭到特高警察搜索。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
一九三八年	昭和十三年	十四歲		七月，神戶大水災。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四六年	昭和二十一年	二十二歲	決定放棄學者之路前往台灣。 作為歸台前提，奉命與蔡家女兒錦墩訂婚。 三月，回台住在新莊叔父家。 在新莊初級中學擔任英語教師。	七月，中國本土內戰全面展開。
一九四七年	昭和二十二年	二十三歲		台灣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八年	昭和二十三年	二十四歲		十月，中國之國民政府軍隊從東北地方開始撤退。 十一月，請求美國軍事援助。
一九四九年	昭和二十四年	二十五歲	六月，新莊初級中學第一屆畢業典禮，正式辭去教職，著手返日事宜。 好友何既明計畫與李登輝等人開設書店，因預訂返日而婉拒參與。 十月，回日本。初次寫小說（沒有題目）。	十月一日，中華民國政府遷台。 十二月，中華民國政府遷台。
一九五〇年	昭和二十五年	二十六歲	三月二十六日，與小五歲的蔡錦墩結婚。	六月，韓戰爆發。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四二年	昭和十七年	十八歲	從春天至秋天，被動員去挖掘現大阪瓦斯大樓斜前方之「大防空壕」。 九月，因戰爭緣故提前畢業，成為母校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助手。 陳舜臣升上二年級，選擇波斯語作為第二外語。	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 四月十八日，神戶初次遭受美軍空襲。 六月，中途島海戰日本大敗，戰事日益嚴重。
一九四三年	昭和十八年	十九歲	陳家借住貿易商好友蔡家位於北野町一丁目的洋房，以躲避空襲。 三月十三日，大阪外國語學校在空襲中幾乎被燒盡。 三月十七日，神戶大空襲，位於海岸通的陳家被燒毀，為躲避危險，五月搬到神戶垂水區。 戰爭結束後國籍變更，無法在國立大學擔任助教授以上職位，辭去大阪外國語學校助手工作。	六月五日，神戶大空襲，街上到處都是焦黑的屍體。 八月六日、九日，美軍於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	昭和二十〇年	二十一歲		十二月一日，第一次學徒出陣。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五二年	昭和二十七年	二十八歲		四月二十八日，舊金山和約（對日和平條約）生效。
一九五三年	昭和二十八年	二十九歲	妹妹妙玲透過「華僑返國計畫」前往中國大陸，在天津與舊識林麗韞重逢，後經安排任職於撫順戰犯管理所。	日本與北京政府簽訂《北京協定》，同意恢復航運往來，並進行雙方僑民遣返事務，在日本的華僑與台灣人開始藉由「華僑返國計畫」前往中國大陸。
一九五五年	昭和三十年	三十一歲	妹妹妙玲由撫順戰犯管理所轉任北京廣播電台，與林麗韞等人參與對日宣傳工作。	
一九五七年	昭和三十二年	三十三歲	這時期漸漸開始寫小說。	中共發動反右鬥爭，許多在中國大陸的台籍人士遭受衝擊。日本首相岸信介訪台與蔣介石會談，雙方同意強化合作關係，日本與北京政府關係轉趨低潮。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五九年	昭和三十四年	三十五歲	熬夜看護生病的女兒時，閱讀推理小說而萌生這樣的感受：「這種程度的作品，我自己應該也能寫得出來吧。」從此成為作家的決心更加堅定。	
一九六〇年	昭和三十五年	三十六歲	十月，《風中》（風のなか）於第十一屆文學新人賞入圍最終決選（筆名陳左其）。	岸信介政府與美國修訂《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各界展開廣泛的安保鬥爭。
一九六一年	昭和三十六年	三十七歲	八月，《枯草之根》獲第七屆江戶川亂步賞（筆名計三十六）。	
一九六二年	昭和三十七年	三十八歲	發表以戰後台灣為場景的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	
一九六四年	昭和三十九年	四十歲	妹妹妙玲因採訪東京奧運，以中國廣播代表團成員身分訪日。相隔十年後家人重聚。	
一九六六年	昭和四十一年	四十二歲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七三年	昭和四十八年	四十九歲	寫作許多中國相關隨筆(評論)。 八月至九月,赴中國旅行,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此後不得入境台灣。	
一九七四年	昭和四十九年	五十歲	發表自傳體小說《青雲之軸》。	
一九七五年	昭和五十年	五十一歲	十月,獲神戶市民文化賞。	
一九七六年	昭和五十一年	五十二歲	三月十二日,母親蘇嬌去世。 九月,《敦煌之旅》獲第三屆大佛次郎賞。	四月,蔣介石去世。 九月,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
一九七七年	昭和五十二年	五十三歲		五月,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總統。
一九七八年	昭和五十三年	五十四歲		
一九七九年	昭和五十四年	五十五歲	參與NHK《絲路》電視節目演出,首次前往中國西安。	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
一九八一年	昭和五十六年	五十七歲	四月,成為松蔭女子大學教授,教授文學概論課程(至一九九八年三月止)。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六七年	昭和四十二年	四十三歲	十、十一月,首部長篇中國歷史小說《鴉片戰爭》全三卷,由講談社出版,此後陸續出版以中國歷史為題材的小說作品。	
一九六九年	昭和四十四年	四十五歲	一月,《青玉獅子香爐》獲第六十屆直木賞。	東大安田講堂事件。
一九七〇年	昭和四十五年	四十六歲	三月,《再見玉嶺》、《孔雀之道》獲第二十三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	三月十四日,日本萬國博覽會在大阪舉開。
一九七一年	昭和四十六年	四十七歲	五月十八日,父親陳通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實錄·鴉片戰爭》獲第二十五屆每日出版文化賞。	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原擁有的「中國代表權」,成為聯合國會員,並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一九七二年	昭和四十七年	四十八歲	七月,在夫人陪同下,初次訪問沖繩。 十月六日,陪同母親初次赴中國,由日本紅十字會取得身分證明。	五月十五日,美國歸還沖繩施政權。 九月二十九日,日中共同聲明,恢復邦交。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九六年	平成八年	七十二歲	十月，獲大阪藝術賞。	二月十二日，司馬遼太郎過世。 五月，李登輝成為台灣首位民選總統。
一九九五年	平成七年	七十一歲	一月十三日，住院五個月後出院，四天後發生阪神、淡路大地震。 三月，獲第五十一屆日本藝術院賞。 十一月，獲第三屆井上靖文化賞。	一月十七日，阪神、淡路大地震。
一九九四年	平成六年	七十歲	八月十日，寶塚歌劇八十周年紀念演講中，因腦溢血而倒下，住院五個月。 九月，台北市「舜臣圖書室」開館。	一月，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談「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一九九三年	平成五年	六十九歲	一月，陪同好友司馬遼太郎前往台灣進行寫作取材。 獲第六十三屆朝日賞，NHK開始播映大河劇《琉球之風》。	
一九九二年	平成四年	六十八歲	三月，重新確認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諸葛孔明》獲第二十六屆吉川英治文學賞。	
一九九一年	平成三年	六十七歲	十一月，台灣旅行，至台北、高雄、花蓮、台東等地。與遠流出版公司簽約，正式在台灣出版作品中文版。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八三年	昭和五十八年	五十九歲	十月，《叛旗：小說李自成》獲第十二屆翻譯文化賞。	
一九八四年	昭和五十九年	六十歲		五月，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擔任副總統。
一九八五年	昭和六十年	六十一歲	二月，參加《絲路》電視節目演出，獲得第三十六屆NHK放送文化賞。	
一九八七年	昭和六十二年	六十三歲		台灣解除戒嚴。
一九八八年	昭和六十三年	六十四歲		一月，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
一九八九年	昭和六十四年 平成元年	六十五歲	二月，《茶事遍路》獲第十四屆讀賣文學賞的隨筆紀行賞。 十月，正式取得日本國籍。 十一月，睽違四十一年後再次回到台灣。	一月七日，昭和天皇過世。 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 三月二十一日，國民大會選舉李登輝為中華民國總統。
一九九〇年	平成二年	六十六歲		

POC 03  
半路上  
道半ば

作者 陳舜臣  
譯者 林琪禎、黃耀進  
叢書主編 陳思宇  
日文編輯 黃筱威  
企劃編輯 黃恩霖  
封面設計 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內文排版 邱 筠 ychiuu@gmail.com  
印刷 漢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6年7月  
定價 380元  
I S B N 978-986-92364-3-0

出版者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322 號 B1  
電郵 guerrilla.service@gmail.com  
網站 https://guerrillalibrary.wordpress.com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guerrillapublishing2014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聯繫總經銷。

總經銷 前衛出版社 & 草根出版公司  
地址 104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153 號 4 樓之 3  
電話 (02)2586-5708  
傳真 (02)2586-3758

本書為創譯通達（北京）諮詢服務有限公司授權在台灣地區出版發行繁體字版本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rights reserved and arranged by Power of Content Taiwan under the license from Chuang Yi Tong Da (Beijing) Consulting Firm.  
All rights reserved.

西曆	和曆	年齡	陳舜臣大事記	東亞大事記
一九九八年	平成十年	七十四歲	十一月，獲日本皇室頒贈勳三等瑞寶章。	
一九九九年	平成十一年	七十五歲	早稻田大學綜合學術情報中心設置「陳舜臣 Library」。集英社《陳舜臣中國 Library》全三十卷、別冊一卷，開始發行。	
二〇〇〇年	平成十二年	七十六歲	在台北舉行結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紀念會。	五月，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台灣首次政權輪替。
二〇〇三年	平成十五年	七十九歲	獲第七屆海洋文學大獎特別獎。 出版自傳《半路上》、讀本《Who is 陳舜臣?》。	
二〇〇八年	平成二十年	八十四歲	二度腦溢血。	
二〇一〇年	平成二十二年	八十六歲	七月，台北淡水的一滴水紀念館設立「陳舜臣紀念文庫」。 與作家水上勉的遺族水上露子、窪島誠一郎在台灣進行對談。	
二〇一四年	平成二十六年	九十歲	五月六日，位在神戶的陳舜臣亞細亞文藝館展開試營運，當日乘輪椅參與活動。	
二〇一五年	平成二十七年	九十一歲	一月二十一日，於神戶去世。	

國家  
圖書  
館出  
版品

預行  
編目  
資料  
CIP

半路上  
陳舜臣著；林琪禎、黃耀進譯

一初版  
—台北市：游擊文化，—(POC; 3) 2016.07  
面；14.8 x 21 公分

譯自：道半ば  
ISBN 978-986-92364-3-0(平裝)  
1. 陳舜臣 2. 傳記 783.18

105009709